



*KARDELJ*  
*sećanja*

# 卡德尔回忆录

1944-1957

新华出版社

K835.431/4

# 卡 德 尔 回 忆 录

1944—19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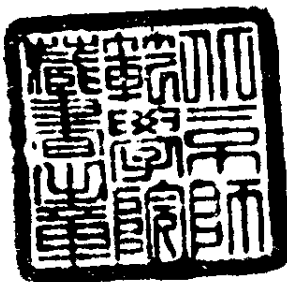
(南) 爱德华·卡德尔著

李代军 邵云环 曹荣飞

夏士华 赵金河 译

达 洲 徐坤明 校

D1345/19



新 华 出 版 社

834218

~~~~~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

## 编辑委员会：

弗拉迪米尔·巴卡里奇博士  
斯塔奈·多兰茨  
斯特凡·多罗尼斯基  
法迪尔·霍贾  
拉扎尔·科利舍夫斯基  
谢尔盖·克拉伊盖尔  
茨维耶廷·米亚托维奇  
弗朗茨·波皮特  
彼得·斯坦鲍利奇  
维多耶·扎尔科维奇①

---

① 以上编辑委员会成员，均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除波皮特外，又均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成员。——译者注



1944年摄于科切夫罗格



1955年摄于拉多夫纳

## 译 者 的 话

爱德华·卡德尔（1910—1979）为南斯拉夫党和国家杰出领导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青年时就矢志于共产主义事业，从1934年起就成了铁托的最亲密的战友。铁托曾说：“半个世纪以来，卡德尔同志一直是我国革命运动从不退却、不知疲倦和毫不动摇的战士”。卡德尔对南斯拉夫人民的解放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结合南斯拉夫的革命实践，对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进行了重要的探索。

卡德尔1975年首次提到要写一部回忆录，来回顾和记载南共的成长过程和南斯拉夫人民在南共领导下的斗争史，计划从1927年起写到1957年。但是他一直公务缠身，未能动手。1978年下半年，尽管身罹重病，他还是克服了种种困难，开始口授拟议中的这部回忆录的第三部分，即1944—1957年部分，打算由近而远，写完这部回忆录，但是他没有来得及完成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就与世长辞了。

卡德尔逝世后，南由党政领导同志组成专门的编辑委员会，组织专家负责整理、编纂这本回忆录。全书共分两部分。前一部分为回忆，系据卡德尔生前口授的录音整理而成，仅作了若干文字上的改动，加了一些脚注。第二部分为附件，均系根据卡德尔本人的意见和要求汇编而成，是对第一部分的重要

补充和诠释。

卡德尔生前曾表示，他写这本回忆录的目的不是为个人树碑立传，而在于批判地来分析、探讨社会的问题、时代的状况和他所参与的事件。因此他的回忆的特点是客观、翔实，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即便对他本人当时的一些现在看来未必妥当的判断和做法，他也如实记述。

本书原正题为《为新南斯拉夫得到承认和独立而斗争(1944—1957)》、副题为《回忆》，现改为《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系全文译出，仅删去附录的人名录。

译者

1980年10月



## 序 言

《为新南斯拉夫得到承认和独立而斗争（1944—1957）》这本书，尽管在副题中有《回忆》这两个字，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回忆录，也就是说爱德华·卡德尔在这里写下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回忆。他从来不愿意写点什么只谈自己的东西，尤其是不愿意写自己的传记，写自己的生活的道路，用传统的回忆录的形式来写，那就更不愿意了。因为象卡德尔这样的有所创造的人是不需要回忆录的，是不需要通过这种方式让世人来了解他们，来认清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干了些什么的。他们的事业对他们作出了说明。

卡德尔的《回忆》反映了他的愿望和他作的努力的结果，他曾经希望在晚年哪怕是部分地实现自己的一个宏大的计划，那就是记述南斯拉夫革命工人运动和共产党，即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1927至1957年期间的工作和活动。在这一计划的范围内，他有十分明确的构想，并对战前时期（1927—1941）、战时（1941—1944）和战后时期（1944—1957）作了划分，考虑了题材结构，并标明了在每一个时期应当成为基础，构成“一章的核心”的那些问题和事件。

在叙述材料的性质、特点和方式方面，卡德尔从一开始起就有定见，他1975年第一次谈到他要写回忆录，当时他特别强调，他所要从事的是“特殊的写作，不只是具有回忆录的性

质，而且是对某些问题和事件进行批判性的分析”。他当时说，目的不在于准备写他的传记，而在于批判地探讨社会问题、时代的状况以及他所参与的事件。

关于这一点，他后来曾多次谈到，强调他打算写“某种回忆录，结合进行历史性的分析……在这项工作中，我愿多谈谈时代，谈谈我们的人民解放运动的政治基础是什么，谈谈政治行动以及谈谈我们的政策如何反映在实践中。这项工作将是既带有史科学的性质，又带有回忆录的性质。”此外，他还解释说，回忆录的实质和宗旨应当是对我们党和我国社会各个发展阶段的各种现象和事件从思想上加以分析，他同时又补充说，他所指的是同他的革命活动相关联的那些现象和事件。因此，“写出来的应当是对时代、企望和党为之奋斗的目标的带有回忆录色彩的回顾”。

由此可见，这本《回忆》的产生反映了卡德尔的一个愿望，就是让当代的读者了解一定时期和事件的历史事实，首先是新南斯拉夫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历史时期的一些历史事实。同时，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并不希望就当时对新南斯拉夫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一些问题重新挑起争论。他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醒人们注意不应忘记的某些历史事实。

卡德尔在自己的《回忆》中事实上所写的是哪一个时期呢？他所写的是这样一个时期：反对占领者和卖国贼的战场上的武装斗争在南斯拉夫尚未结束，却又不得不在其他战场上继续进行一场并不轻松些、并不简单些的斗争。卡德尔1945年初写道：“今天正在我国发生的也是一场战争，在一种新的基础上的，在一个特殊含义上的一场战争”。这就是为消除占领的

全部后果，使大批老百姓免于饥饿，清除残余的敌人，恢复和建设几乎遭到彻底破坏的国土而斗争，特别是为维护在四年的战争和革命中赢得的主要成果——国家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在这个时期，各个方面的压力、威胁和讹诈交替出现，而到1948年，南斯拉夫可以说是陷于彻底的孤立，经济上遭受封锁，有人公开以武力相威胁，试图分裂南斯拉夫的领导，斯大林采用各种形式，从心理上、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对南斯拉夫和铁托施加了骇人听闻、令人震惊的压力。

可见，正如卡德尔本人所说，这确实是生死搏斗时期，在斯大林发起攻击之前就是如此，在斯大林发起攻击之后，则尤其如此。那个时期的过来人对这一点是很清楚的。而在此以后才开始自己的生活的后代，应当为没有经历过那一时期而感到庆幸。同时，他们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将会了解到那个时期的一代人和革命运动——在它的队伍和领导中，站在铁托身边的是卡德尔和其他许多人——是凭着什么样的力量和决心，承受了多大的牺牲，才顶住了这场征伐，才顶住了这样的图谋：不仅仅扼杀一个主权国家的自由和取消它的独立，而且还想践踏它的各族人民的尊严。事实上，他们将了解到卡德尔在这里如此令人信服地强有力地叙述的真相。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本《回忆》包含着关于新南斯拉夫进行特别艰巨斗争的一个历史时期的宝贵历史资料，是这个历史时期的见证。在这个时期，新南斯拉夫需要接二连三地在各个领域内取得胜利，才能在刚刚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世界上占有自己应得的一席之地，争取到彻底的独立，维护住本国各族人民的自由、团结，国家的领土完整以及人民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其他成果，而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人民

的、民主的和自治的革命。卡德尔曾多次强调，不进行这样一场革命，“南斯拉夫在战后的发展中所产生的那样一些自治民主关系的形式就不可能出现”。而且不仅如此。假如南斯拉夫的革命不是这样一场革命的话，斯大林也就不会攻击它。如果南斯拉夫的革命不是一场人民的和自治的革命，如果南斯拉夫不是统一的、各民族彼此友爱并团结在党和铁托周围的这样一个国家，它也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也就经受不住斯大林的攻击。

开诚布公和客观持平，对人物和事件的评价细针密缕，持批判态度，对自己和自己所作所为同样持批判态度，同时不回避在某些情况下曾无所措手足的境遇，而这一切的目的在于尽可能翔实地尽可能充分地表述所写的那个时代，那个历史时期。这就是卡德尔在这本书中所作的记述的主要特点及其价值之所在。

卡德尔毫不迟疑地承认，他一度持宗派主义态度，批评过意大利共产党，他在谈到斯大林的时候，并不贬低斯大林对维护十月革命的成果所建树的功勋，他并没有无视苏联代表团在战后和谈中对维护南斯拉夫的要求和利益所作的贡献和所提供的援助，他并不否定西方国家政府战时向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提供的和后来在经济封锁时期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其他援助，但是同时他又不能不谈到斯大林的强横霸道，指出斯大林不仅在国际工人运动中，而且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奉行与伟大十月革命的传统断然格格不入的霸权主义；他不能不指出，斯大林属于给世界带来的弊甚于利的那些人的行列。他还不能不对丘吉尔，不能不对他所会晤过、交谈过的一些政治家和人士的行为作出回答，他们从大国的立场出发，在反希特勒同盟内部玩弄

计谋，试图让南斯拉夫重新实行某种形式的，哪怕是过渡性的君主制，或者在与斯大林的谋商下试图把南斯拉夫变成按对半划分的势力范围。

正如卡德尔自己有一次所说，他总是有心于史科学。他没有研究这门学问，是因为他活动于其他领域。今天，当我们看到他对他所打算写的1927—1957年整个这一历史时期的回忆的内容和构思的设想时，我们看到，他正是希望以这种方式，采用这一形式对于他以前在史科学方面所未能做的研究弥补一二。然而，就连这一计划，他也没有来得及实现。

但是，尽管如此，《为新南斯拉夫得到承认和独立而斗争（1944—1957）》这本书，仍然使南斯拉夫公众和世界公众得到了对一个历史时期最重要的一些事件的一个概述、分析和综合，这个时期对于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而言在许多方面确实是生命攸关的，这不只是指他们为使人民解放运动和他们所进行的斗争得到承认并在反希特勒同盟中保证得到一个平等的地位而作了努力，作了奋斗，而且也是指他们为维护新南斯拉夫的自由和独立，确保在人民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取得的成果，在国际工人运动以及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当代世界各国人民之间建立起民主、平等的合作关系，相互尊重、相互信任、自由对话、自由选择内部社会发展道路的关系而作了努力，作了奋斗。同时，本书也是在这个时期生活和工作过并是所写的事件的直接参与者的一个人的见证，因而使二十世纪的史科学得到了充实。

在整个拟议的计划中，卡德尔只来得及完成第三部分，也就是说他写了战后时期。这一时期的基本课题是为新南斯拉夫

得到承认和独立而斗争。他对材料的记述方式是，涉及这一时期所有最重要的历史事变和主要事件；当然，是联系主要课题，即联系为使新南斯拉夫得到承认，独立得到维护而作的努力，而作的奋斗来写的。当然，在这一范围内，他也谈到自己的活动，谈到他在党的领导和国家机关中所担负的职务。

1975年和1976年，卡德尔安排了收集和整理资料和文献的工作，安排了整理大事记和其他的工作，但是由于他忙于其他工作，也由于生病，他还是未能开始写回忆录。1976年6月，他动了两次手术。

众所周知，1977年，卡德尔十分繁忙，他紧张地从事其他的工作。他写了《社会主义自治政治制度的发展方向》这一专题报告，访问了美国，开始写《自由的联合劳动》这本书和另外几篇东西，为南共联盟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作了准备，等等。因此1977年和1978年初，他没有写回忆录。在此期间，他的健康状况日趋恶化，而在他觉得身体稍好时，他又搞别的工作，仍然不是写回忆录。

1978年下半年，他写了，也就是口授录音了自己的部分回忆，涉及的时期是从1944年起，即从最高统帅部抵达维斯岛起，直到他1957年在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和世界各国共产党会议为止。

在口授过程中及其以后，卡德尔曾多次特别提醒，要求核查一些事件的日期和地点，要求补全有关人的姓名并加以核实，要求进行补充，更加详细地来阐明某些事件的经过，查验某些事实，等等。

鉴于他没有来得及对于根据他的这些要求所作的全部补充材料亲自加以修改和予以认可，编辑委员会决定，对这些补充

材料加以整理并作为回忆录的特别附件加以发表。因此，《为新南斯拉夫得到承认和独立而斗争（1941—1957）》一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包含卡德尔口授录音的回忆，只作了文字上的改动。书的第二部分由根据他的意见和要求而编写的附件组成。

每一个附件都是同《回忆》的相应部分相关联的，也就是同《回忆》中有关段落相关联的，卡德尔在口授到这些段落时，说过要准备作某些补充或者解释，要列举出更加充分的事实，列出大事记等等。同时，在每一个附件的开头部分逐字逐句援引了卡德尔的要求，也就是援引了他的意见。此外，在个别附件的说明中列举了卡德尔在同编辑人员谈话中提到的一些想法，他所作的说明，他指示他们如何工作，哪些问题要特别加以阐述，哪些事情要予以注意等等。在这方面，富有特色的是两个最长的附件，即《战后时期国家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经济条件》和《自治》。①

事实上，卡德尔在有关整理自己的回忆录的所有谈话中，都特别谈到了自治，谈到了整个社会共同体在战后不久的条件以及社会经济和政治情况，国家的物质状况，经济恢复工作，新的人民政权的措施，以及为使国家摆脱落后，为社会主义建设，为进一步的物质和社会进步创造条件所作的总的努力。为此他一再强调，特别需要阐述南斯拉夫由于先是来自西方国家，尔后是来自东欧国家的压力和经济封锁而遇到的困难。

除了上面提到的两个附件外，卡德尔要求单独发表《切特

---

① 这里提到的两个附件的篇名与原书附件的篇名略有出入，下面也有类似情况，现一律照原文译出。——译者注

尼克勾结占领者的开始和形式》，要求比较详细地阐述对意大利和保加利亚的和约的内容，提供有关我们要求德国赔偿的事实和材料，提供联共（布）中央和南共中央之间来往信件的内容以及共产党情报局1948年两个决议的内容以及详细摘录他1949年在联合国的发言。

除了这几个附件外，编辑委员会和编辑部准备了有关1945年立宪议会选举，有关临时政府工作，有关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南人解委员会）的扩大，以及有关1946年宪法通过前立宪议会的工作的一个简短的附件。此外，还加了大批脚注，这些脚注回答了卡德尔的这样一些意见和要求，诸如：“请核实日期并写上”，“请核实材料”，“我记不得职务了，请补充上”，等等。

因此，附件是这样一个事实的反映和结果，那就是卡德尔没有来得及照他希望的那样，照他事实上计划的那样写完回忆录。因此，这里所发表的全部附件只是说明和证实卡德尔在回忆录中所说的事情。尤其是因为这些附件中的多数首先包含的是他的文章，即摘引的他的著作和某些文件。例如，《自治》这个附件就是这样，其他附件或多或少也是如此。换言之，附件不涉及回忆录的内容。附件不补充，不改动回忆录。附件只是加以论证，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加以解释，而且援引的是官方统计刊物和其他来源经过核实的材料，或者援引的是国家和党的正式文件，或者援引已经众所周知的和得到证实的历史事实，或者援引《回忆》的作者本人的文章。

虽说写作《回忆》这项工作没有充分、彻底完成，然而，这决不减少已经写了的那部分的价值和意义，因为卡德尔所干完的那部分也仍然是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整体，提供了一个从内



容和题材都是相关连的文本。因此，附在《回忆》之后的，所有的附件、脚注和人名录，都是为卡德尔口授，即书写这一部分回忆录时所希望达到的目的服务的，那就是尽量客观地，尽量充分地描绘他所谈到的那个时代，尽量如实地反映他所谈到的那个历史时期。

编辑委员会谨向以各种方式对本书的编纂和出版作出了贡献的各方人士，谨向学术研究机构、历史档案馆、学术工作者、其他个人以及《劳动报》印刷厂，表示谢意。

编辑委员会

1980年1月于贝尔格莱德

# 目 录

## 序 言

**在维斯岛**..... (1)

**为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得到承认而斗争**..... (7)

盟国对我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政策

为使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得到承认而斗争

南人解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为新南斯拉夫的独立

奠定基础

同陶里亚蒂谈话

军事使团以及与盟国的合作

**筹组临时政府和召开立宪议会**..... (54)

铁托—舒巴希奇协议

与斯大林的第一次谈话

新南斯拉夫的第一部宪法

**和 谈**..... (85)

决定是如何作出的

对意大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和约

莫洛托夫和苏联代表团

对奥国家条约

为了使这样的战争永不重演

**准备惩罚南斯拉夫..... ( 105 )**

1947年与斯大林谈话

关于与保加利亚建立联邦

情报局第一次会议

与斯大林最艰巨的一次会晤

关于斯大林

**共产党情报局与1948年..... ( 139 )**

坚定地说“不行”

自治——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外政策舞台上的斗争..... (154)**

我们的对外政策主张——不结盟

贝尔格莱德宣言

1957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

在会上的会晤以及与毛泽东的谈话

**附 件**

**关于切特尼克与占领者的勾结..... ( 177 )**

**选举立宪议会和共和国宣告成立..... ( 194 )**

**战后初期国家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经济**

**条件..... (198)**

接收时的状况和战争的破坏

国家恢复的条件和成果

与饥荒和普遍匮乏作斗争

|                             |                |
|-----------------------------|----------------|
| 新政权的革命的社会经济措施               |                |
| 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的工业化和电气化         |                |
| 关于合作化运动和个人劳动的地位             |                |
| <b>关于几个和约</b> .....         | <b>( 255 )</b> |
| <b>联共（布）中央和南共中央 之间的来往信件</b> |                |
| <b>以及共产党情报局决议</b> .....     | <b>( 272 )</b> |
| <b>自治</b> .....             | <b>( 285 )</b> |
| <b>爱德华·卡德尔 1949年在第四届</b>    |                |
| <b>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b> .....      | <b>( 327 )</b> |

## 在 维 斯 岛

维斯。这是亚得里亚海上离海岸颇远，怪石嶙峋同时又奇峰突兀的一个海岛。到处是峻峭的嶙岩，只有高山四周是相对平缓的平原。岛上的这个地区当时是当地居民的主要生息之地，他们辛勤地劳动，生产的东<sub>西</sub>，挣得的钱很少，过着穷困的生活。生活是艰难的。主要产品是葡萄，有一点水果，还有人们日常生活所必需的其他一些产品，他们还养点羊。

在德国人用空降部队袭击设在德尔瓦尔的最高统帅部<sup>①</sup>之后，我们于1944年6月初来到维斯。在那里设有最高统帅部，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南人解委员会和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sup>②</sup>，以及多少是中央一级的其他机关和社会政治组织（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团——南共青团，南斯拉夫反法西斯青年联合会——南反法西斯青联，反法西斯妇女阵线——反法西斯妇阵，南通社等等），这些机关和团体在整个人民解放斗争时期，一直跟随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南人解委员会，也就是跟随南斯拉夫人民解放阵线<sup>③</sup>。在维斯还集

中了我们的大批军队，同时还有一个英国旅<sup>④</sup>，经最高统帅部同意也来到这个岛上。当然，他们不能只靠该岛所生产的和所能向游击队提供的东西，尽管它把自己所能提供的全提供出来了。

---

① 空降德尔瓦尔发生于1944年5月25日。空降的目的在于消灭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部。

② 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南人解委员会）于1942年11月26日和27日在比哈奇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宣告成立，作为人民解放斗争在南斯拉夫的全国性的一般政治代表机构。会议还组成了南人解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作为它的执行机关。

1943年11月29日和30日在亚伊采召开的南人解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曾决定，南人解委员会“是南斯拉夫最高立法和执行代表机构，是作为整体的南斯拉夫的各族人民和国家享有主权的最高代表”。会议成立并选举了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南全解委员会），作为具有人民政府全部特点的执行机关，南人解委员会经由它履行自己的执行职能。南全解委员会履行这一职能一直到1945年3月7日，当时根据铁托—舒巴希奇协议组成了统一的民主联邦南斯拉夫临时政府。

南人解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于1945年8月7日至10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在这次会议上，南人解委员会被宣布为民主联邦南斯拉夫临时国民议会。

③ 南斯拉夫人民解放阵线是新南斯拉夫的一个群众性反法西斯人民政治组织，是在1941—1945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创建的。这个组织是在南共的纲领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南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1936—1940）组织了人民阵线，在民主和反法西斯的基础上团结了广大阶层的人民，同法西

从人民解放战争一开始起，这个岛就是属于游击队的，也就是说从人民解放斗争一开始起，岛上就出现了游击队。因此，我们1944年来到维斯得到居民的充分支持。

---

斯侵略的危险进行了斗争。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整个人民解放战争期间，正是通过南斯拉夫人民解放阵线并在南斯拉夫人民解放阵线的范围内继续执行人民阵线的政策，即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一切进步和民主的力量同占领者作斗争。例如，根据斯洛文尼亚共产党的倡议，早在1941年就组成了解放阵线，而在南斯拉夫其他地区，不论是在解放区还是在敌占区，都建立了人民解放阵线的地方委员会，而在南人解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之后，1944年上半年，出现了一个大力建立和组织上加强人民解放阵线各地总委员会的过程。

1945年8月5日至7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成立代表大会上，各地的组织联合成一个统一的组织，称为南斯拉夫人民阵线。这个有数百万成员的政治组织在国家的恢复和建设，在国家战后整个物质和社会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通过国家的开发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关系，人民阵线成长为群众性的政治论坛和整个社会主义自治民主制度的政治基础。因此，它在1953年2月举行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就改名为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

- ④ 人民解放军的部队于1943年9月12日解放了维斯。1944年2月初，在维斯岛上大约有6,000名南斯拉夫战士，即第26师和部分海军。8月初，第8海外旅从意大利调到维斯。

从1943年12月至1944年2月26日，经最高统帅部同意之后，还从意大利调了一个英国旅的部分队伍到维斯，总共大约有1,600人。

我们在岛上的各地安顿了下来，大多是在维斯和科米扎这两个镇上。

我当时担任两个职务。我是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我以这一身份首先帮助铁托从事这一方面的日常工作。这实际上是我的主要工作。此外，我是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副主席，我担任这一职务主要是替代铁托，辅助他从事这一机构的工作。我得说，全国委员会当时没有多少事情，因此，我担任这一职务负担很轻。因为当地的事务是由维斯人民解放委员会自行处置的，而克罗地亚地区其他所有问题的解决则由克罗地亚地区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sup>①</sup>负责，克罗地亚当时表面上还不是共和国，但是事实上已经起着共和国的作用。全国委员会所要做的仅仅是同各“共和国”的类似机关保持联系而已，我前面已经说过，这些“共和国”事实上已经是共和国。但是这些工作也不多，因为

---

① 克罗地亚地区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于1943年7月13—14日在普利特维策湖建立，是克罗地亚人民政权最高立法和执行代表机关。

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从1941年至1943年11月底，南斯拉夫各地区和各省，也就是说南斯拉夫各民族都建立了人民解放总委员会或者地区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作为人民政权最高立法和执行代表机关。（在塞尔维亚，是人民解放总委员会，在斯洛文尼亚，是斯洛文尼亚人民解放委员会，而在其他各地，则是地区反法西斯委员会。）



当时很难建立和保持相互的联系。因此我很少去设在维斯镇上的办公室。

铁托当然忙得不可开交，要领导作战和处理跟他担任的最高统帅这一职务相关联的其他问题。因此我协助他在南共中央和各“共和国”中央之间保持联系，协助他从事总的政治工作，包括外交方面的事务，当时这方面的工作日益开展，日益重要。

由于这些原因，我们住在一起，住在“女人头”。<sup>①</sup>这是高山脚下的一个小山头，它象一颗开裂的牙齿。在裂隙的两边，大自然已经造就了一些浅浅的山洞。我们的工兵又把这些山洞挖深了，把它们变成了可防空袭的安全场所。一边我们用来开大会和其他各种会议，铁托和我在另一个山洞里工作和睡觉。我们基本上在山洞前工作，那里我们安排了一个绿荫如盖的舒适的工作场所。

整个这片地方都用沙袋围起来。这样，我们就不怕机枪扫射和投炸弹。此外，在整个“女人头”上布满了机枪阵地，因此事实上不可能对铁托所在的地方进行任何突然袭击。德国人一次也没有尝试向维斯发动比较大规模的袭击，哪怕是从空中也罢。他们当时已经十分虚

---

① “女人头”这个称呼是指维斯岛上的一个山头 and 村庄，南人解委员会主席团和南全解委员会的某些成员安顿在那里。据约西普·斯莫德拉卡博士解释，这个称呼来源于当地的一个叫法。

弱，即便是尝试在维斯登陆，他们也需要十分强大的海军。我们在岛上有足够的军队，我们的军队在悬崖峭壁上筑有坚固的工事，此外，这里还有一个旅的英国士兵。

英国人很快就清理出一大片葡萄园，在上面铺上厚厚的钢丝网，建起了一座临时机场。当然，这就使维斯和巴里<sup>①</sup>之间的交通大为改善，这样一来，我们可以说每天都同巴里有联系，既同驻巴里的英军指挥部有联系，也同设在巴里的苏联代表机构有联系。对于我们来说，这一联系极其重要，我想说是宝贵的，不仅是从武器、粮食和装备的供给来说，而且从伤员的转送来说，当然还有从同西方国家政府和苏联政府交换必不可少的情报来说，都是如此。维斯和南意大利，也就是和巴里之间的交通联系是由盟国的飞机和苏联的飞机保持的。就我所记得的情形来说，这一合作进行得很得体，没有发生过任何大的误会，不论是在他们之间，还是在他们和我们之间。

---

<sup>①</sup> 指意大利的巴里岛，当时英军驻守该岛。——译者注

# 为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得到承认而斗争

## 盟国对我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政策

最初，当我们来到维斯时，我们并不打算在这个岛上长期呆下去。我们打算尽早回到大陆去。但是当时新南斯拉夫的未来的问题，尽快地争取西方国家承认它以及巩固全国委员会的地位的问题，已经作为十分重要和现实的问题提了出来。当然，我们以前，特别是从1943年以来就重视这个问题。然而，现在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成了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与盟国的联系以前首先是政治性的，因此也是正式的。虽说例如苏联政府没有发表过任何声明，谈到承认新南斯拉夫政府，即承认全国委员会，但是它做得好象它是承认似的。

然而，西方盟国的情况不同。诚然，他们给了我们或多或少慷慨大方的援助——武器、食品和其他装备，但是只在军事代表机构一级，即联络官和他们的军事总部一级保持同我们的所有联系。我们当然很关心在全国委员会和英美两国政府之间建立起正式的联系。我们还在亚伊采时，在南人解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开始举行之

前，就曾打算把我们的官方代表——但是还只是作为人民解放军的代表——洛拉·里巴尔<sup>①</sup>和弗拉特科·韦莱比特<sup>②</sup>派到伦敦去。表面上，他们那时只代表我们的军队，但是英国政府同意，这可以成为建立正式联系的开始，即两国政府建立正式关系的开始。然而，对于建立这样的关系，英国政府当时就已多少是明确地提出了一个条件：在新南斯拉夫政府即全国委员会和国王以及国王的伦敦政府<sup>③</sup>之间建立起相应的从属关系，即南全解委员会承认自己臣服于国王和国王的政府。这一要求事实上只是英国一方面对我们，另一方面对国王和伦敦王国政府所奉行的政策的一个发展阶段。

西方国家政府对我们，即对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

---

① 伊沃·洛拉·里巴尔（1916—1943），南著名青年领导人，1936年加入南共，1937年任南共青团中央书记，1940年10月当选为南共中央委员，1941年为南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成员，1942年任南共中央负责未解放区事务的书记，1943年11月27日牺牲，荣获人民英雄称号。——译者注

② 弗拉迪米尔·韦莱比特（1907—□）1943年任南人民解放军派驻开罗的第一个军事使团团长，后任最高统帅部驻伦敦使团团长。解放后，任联邦政府旅游业委员会主席，外贸部副部长，外交部副部长等职。弗拉特科是弗拉迪米尔的昵称。——译者注

③ 这是指南斯拉夫王国流亡政府，南斯拉夫1941年被占领后，该政府最初设在开罗，后来设在伦敦。在文件和书刊中，这个政府还叫做：“设在国外的南斯拉夫政府”、“流亡的王国政府”、“伦敦王国政府”、“伦敦政府”，等等。

动，对国王、伦敦王国政府和切特尼克<sup>①</sup>的这种政策和关系的发展过程是特别有意思的。丘吉尔和英国政府1941年时的基本立场和他们对切特尼克的主要要求是：消灭南斯拉夫境内的游击队，即解除他们的武装，使游击队从属于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指挥，也就是说不让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运动得到发展，从而确保切特尼克和他们的盟友在全国的统治地位。当时英国的联络官多少是偶然地同我们建立了接触，一个简单的原因是，我们游击队几乎遍布南斯拉夫全境，而他们很难到达切特尼克那里。在这种接触中，他们答应向我们提供援助，但是有一个条件：我们得完全服从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最高指挥部，我们得把自己的部队同他的队伍合并。

这一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极其复杂和困难，因为另一方面斯大林也在向我们施加压力，不断地要求我们无论如何同切特尼克达成协议，建立由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指挥的共同的军队。尽管我们向斯大林提供了十分具体的材料，说明切特尼克在向我们发动进攻，他们在勾

---

① “切特尼克”原为“参加队伍的人”的意思，最初出现于十九世纪后半叶，系非正规志愿武装人员，为摆脱土耳其奴役而斗争。后为南王室利用，变成了反动组织。二次大战时站在德意占领者一边，反对南共领导的武装，其首领为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

——译者注

结德国人，他还是不改变自己的看法。显然，跟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一样，斯大林不相信我们的材料。然而，主要原因不在这里。我认为，斯大林奉行这样的政策，是想要在战后时期在巴尔干同西方列强达成妥协，尽管这是有损于我们的革命的。显然，也正是这个原因促使他甚至在1945年还要求我们承认彼得二世国王。

但是，总的来说，我们关于对西方列强以及对它们的政策的态度的看法，同苏联的看法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清楚，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巴尔干奉行反共政策，它们一直在设法采取某种方式把我们排挤出政治舞台。同样，我们也明白，斯大林不可能把南斯拉夫问题看成是一个单独的问题，而是联系整个事态，在反希特勒联盟内部关系范围内来看待的。因此，我们是准备谅解他的，我们把他的要求看成是某种策略行动，连他自己也不当真相信的一种策略行动。因此我们没有作出反应就接受了他的这些要求，同时按照南斯拉夫国内具体形势的要求奉行自己的政策。

在这样的双重压力下，我们一再设法——当然，如果是取决于我们的话——竭尽所能来既满足西方国家政府的要求，又满足斯大林的要求。换言之，我们向切特尼克提议共同作战，当然我们不同意切特尼克有什么最高指挥权，而是经常商量合作。我们走得很远，甚至冒了风险，让铁托前往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司令部，尽管当时并没有任何真正的保证，可确保他从那里回

来。①此外，我们还承担义务，向切特尼克提供大批武器，即提供我们设在乌日采的兵工厂生产的几千枝步枪，并且我们马上就给了。但是这一切的效果很差，为时也很短。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表面上同铁托达成了协议，协议只生效了几天时间。原来，铁托从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司令部回来不久，切特尼克就突然在整个乌日采及其四周地区向我们发动进攻，试图解除我们的武装和消灭我们。游击队没有料到他们会有这一手，甚

---

① 铁托同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第一次会见于1941年9月19日在塞尔维亚西部米奥尼察（瓦列沃附近的一个小镇）附近的斯特鲁加尼克村里举行。会见时，德·米哈伊洛维奇表示赞成相互容让，但是他拒绝让切特尼克的队伍参加反占领者的斗争，理由是进行这样的斗争的条件还不存在，说“等到局势比较有利时”，他的部队再参加同占领者的斗争。

铁托同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第二次会见于1941年10月27日在苏沃博尔山区的拉夫纳戈拉附近的布拉伊齐村举行。在这次会见时，铁托提出了十二点建议。（见附件第177页）。德·米哈伊洛维奇对于以下各点均予拒绝：保证各族人民团结和解放斗争统一，即共同对敌人展开作战，共同指挥，供应武器和粮食，禁止强迫动员，承认各地人民解放委员会有权处理临时政权的各项事务。

1941年7月人民解放游击队瓦列沃支队的代表，1941年8月塞尔维亚人民解放游击队总司令部的代表，曾同切特尼克，同切特尼克最高指挥部的代表，就反对占领者的共同斗争问题进行过最初的几次会谈。

至连猜想都没有猜想过。

但是切特尼克在作战中运气欠佳。他们的军队是由基本上组织不善的部队，动摇的并非彻底觉悟的农民组成的，他们不准备替他们很了解的南斯拉夫旧军队的军官们去卖命送死。然而，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却是由有觉悟的工人、进步的知识分子和最觉悟的农民组成的。游击队一天之内就粉碎了切特尼克的攻势，把他们打得抱头鼠窜，使他们再也没有象在乌日采那样集中过。切特尼克在乌日采对游击队发动的这第一次攻势就这样彻底地失败了。从那时起，切特尼克和德国人就开始公开勾结。以前就存在的彼此容让这时就变成了他们相互间的协议了。

切特尼克在乌日采的失败，当然使西方国家政府不好受。尽管它们确知切特尼克同德国人勾结，因为它们掌握关于这一勾结的确切而具体的材料，西方国家政府还是在切特尼克的指挥部派驻自己的代表——联络官，并且不改变自己的政策。显然，西方国家政府当时认为，切特尼克勾结占领者反对共产党人不会损害他们在巴尔干的利益，也就是说认为这种勾结所造成的损害比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运动的扩展所造成的损害要小些。看来，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也有同样的想法。

耐人寻味的是，甚至在伦敦和华盛顿以及莫斯科完全清楚切特尼克对游击队的攻势之后，斯大林还坚持要



我们同切特尼克合作。

1941年全年和1942年的大部分时间，西方国家政府把切特尼克当成自己在南斯拉夫的盟友，一再要求他们把粉碎人民解放军，也就是阻挠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运动的发展作为他们的主要任务。正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抱有这样的目的，战争开始时切特尼克同占领者的勾结并没有使它们“感到震惊”。相反，在这同一个时期，世界报界，首先是西方的报界把人民解放军对德国人、意大利人和其他占领者进行的一切战斗，取得的一切胜利，全归之于切特尼克，说成是切特尼克的胜利。只有少数个人，而且主要是到了1942年，才得到真实的情报，了解到同德国人作战的是游击队，而不是切特尼克。西方最反动的人士这么做实际上是试图为自己那种明显反共的政策求得广泛的政治支持，而这种政策同西方国家政府战时的真正利益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但是，到了1942年下半年，局势表明这一反共主张，即消灭南斯拉夫的人民解放运动的主张是不现实的。切特尼克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实力日益消退，而游击队则相反，政治影响日益迅速扩大，自己的武装力量也在加强。南斯拉夫的很大一部分地区获得解放，在人民政权机关的领导下，而切特尼克在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的保护下困守自己的营地。此外，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各种方式得到真正的、确实的情报，了解到是谁在

南斯拉夫同德国人作战，而谁又在同他们勾结。

就这样出现了一种政策主张，我可以把它称做中立的政策，或者表面中立的政策。西方国家政府开始也要求同游击队保持接触，当然，它们并不因此而放弃自己同切特尼克的联系。<sup>①</sup>显然，这是后面的一种主张的雏型。这一主张目的在于在战争结束阶段迫使游击队同战前南斯拉夫的资产阶级旧政治结构妥协，从而让旧的统治阶级事实上即使不能保证享有充分的权力，也至少在新政府中享有相当的影响，不让共产党人充分地掌权。为了奉行这样的政策，丘吉尔当然需要同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首先是同铁托建立起特殊的接触。于是丘吉尔开始向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部，向各“共和国”的总司令部派遣正式军事代表团，即军事联络使团，甚至把自己的儿子派来<sup>②</sup>。这些使团，诚然，没有任何政治权力，没有受权代表政府讲话，只是代表自己的军事指挥部，首先是开罗的指挥部。但是同时，它们十分关心我们的政治目的和意图，关心力量对比以及各种力量在国内的影

---

① 1943年初，开罗的盟军指挥部作出决定，今后将只向塞尔维亚派遣驻切特尼克的军事使团，而同时向南斯拉夫西部地区，首先是向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派遣专门的使团，目的在于“同游击队保持试验性接触”。参看第45页脚注①、②和第46页脚注①、②。

② 丘吉尔首相的儿子鲁道夫·丘吉尔作为菲茨罗伊·麦克莱恩使团的成员，于1944年1月抵达南斯拉夫，驻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统帅部。

响。

我要说，当丘吉尔明白，游击队占有绝对的优势，他不可能命令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干任何事情，而只能与它会谈、谈判的时候，西方国家政府对南斯拉夫的人民解放运动的关系就进入了第三阶段。迪金<sup>①</sup>后来告诉我，丘吉尔有一天派他去彼得二世国王那里，开诚布公地告诉他，除非接受南人解委员会1943年第二次会议宣言所包含的提法，否则他没有别的任何可能返回南斯拉夫，君主制的问题，也就是维持君主制还是建立共和制的问题，将在战争结束后由人民按民主方式作出决定。彼得二世国王回国的唯一的，而且是理论上的可能性是达成以下意义上的协议：伦敦王国政府和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建立联合政府。

丘吉尔很可能当时就已经意识到，南人解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宣言中的那个提法意味着南斯拉夫君主制的最终消灭，但是一直到战争结束，他始终向我们施加压

---

① F·V·迪金少校是斯图尔特上尉死后派驻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统帅部的第一个英国军事使团的团长，该使团于1943年5月27至28日的那个夜晚降落在杜尔米托尔山区扎布利亚克附近的解放区。从官方来说，迪金是英军中东总司令部派驻我最高统帅部的联络官。在这个使团里跟迪金少校在一起的还有F·V·斯图尔特上尉、两名无线电报务员和南斯拉夫裔的加拿大人伊万·斯塔尔切维奇。斯图尔特上尉几天之后在德军第五次攻势中牺牲。参看第45页脚注②。

力，要我们同彼得国王一起找出某种解决办法。在这件事情上，很可能斯大林的态度也怂恿了他。斯大林从另一方面向我们施加压力，要我们同彼得国王和伦敦流亡政府签订任何协议，哪怕是临时的协议。斯大林在施加压力这件事情上有几分是出于真心，又有几分是为了报答反希特勒联盟中的西方盟友，这一点现在很难说。我相信，他是考虑过在他看来是很现实的罗马尼亚的那种解决办法。<sup>①</sup>然而，他不明白，南斯拉夫的局势跟罗马尼亚的局势完全不同。

另一方面，我们当然也有兴趣于找到某种折衷办法，至少在表面上满足西方国家的要求，如果不是在内容上满足这些要求的话。我们的印象是，当时丘吉尔本人也有这样的想法，从上面提到的丘吉尔同迪金的谈话中可以猜到这一点。

我觉得，正是在这个时候，对游击队，即对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的态度第三种主张形成了，主要有如

---

<sup>①</sup> 1944年夏天，红军打进罗马尼亚。安东内斯库的法西斯政府被推翻，8月23日，米哈伊洛国王接管国内政权。罗马尼亚于8月25日向德国宣战，尔后于9月12日在莫斯科同苏联订立停战协定。到1945年3月，更换了两届政府，3月组成了人民民主阵线政府，1946年11月，由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组成的民主联盟在大选中获得令人信服的多数。1947年底（12月30日），米哈伊洛国王让位，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参看辞书局编纂的《百科全书》第六卷，萨格勒布1962年版，第534页）。

下内容：

——第一，找到一种方式，使伦敦王国政府和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联合起来，在铁托领导下也罢；

——第二，游击队应当承认彼得国王，直到人民通过民主的途径，对南斯拉夫将成为共和国还是实行君主制作出决定为止；

——第三，西方列强的作战战略，将从意大利出发，经由所谓的卢布尔雅那大门<sup>①</sup>，进一步指向北方，即经由斯洛文尼亚，指向奥地利和匈牙利的部分地区。

为了实现这一想法，丘吉尔手上只有两张王牌：第一，斯大林在对伦敦流亡政府和国王的处置问题上支持他，但是并不支持他通过卢布尔雅那大门。出于苏联显而易见的军事和政治战略的需要和利益，斯大林决不愿意把这一通道让给西方列强。而当时，这也是我们的利益所在。丘吉尔的第二张王牌是，斯大林对奥地利比较起来不那么关心。因此斯大林毫不阻难地允许西方列强

---

① 卢布尔雅那大门——地理战略概念，指的里雅斯特和卢布尔雅那之间的地区。占据经由波斯托伊纳高原的通道以及（的里雅斯特——卢布尔雅那方向的）克里姆山——洛加特茨——多洛米蒂一线，就可以进入卢布尔雅那盆地，从那里出发又可走向以下方向：卢布尔雅那——诺沃梅斯托——萨格勒布；卢布尔雅那——特罗亚奈——策列——奥地利；卢布尔雅那——特罗亚奈——马里博尔——匈牙利；卢布尔雅那——克拉尼——柳贝利——奥地利。

的部队穿过特尔比扎和科鲁什卡进入奥地利。今天很难说清楚，斯大林，即苏联为什么对奥地利战后的命运漠不关心。在我看来，最为可能的是，斯大林当时战略上和政治上的主要目标是针对东德的，当然，也是针对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因此，他把奥地利留给了西方盟国，免得把关系搞得过份紧张。事实上，斯大林后来对斯洛文尼亚的科鲁什卡采取的态度表明，他从来没有把奥地利视为苏联“轨道”的一部分。或许正因为如此，新南斯拉夫在盟国各次部长级会议以及巴黎和会上，在涉及科鲁什卡问题的时候，得到苏联的支持最少。

当亚历山大元帅<sup>①</sup>同我军最高统帅铁托一起视察我军前线时，他再一次试图把所谓卢布尔雅那大门的问题提上议程。表面上，铁托和亚历山大会谈的主要题目是盟国政府在我军极其需要的武器和其他装备方面提供援助的问题。南斯拉夫军队当时已经扼守一条绵亘的战线。从匈牙利一直通到亚得里亚海。然而，铁托当时坚决地说“不行”，这使得以为通过提供军事援助就有可能让旧南斯拉夫反动的政治和军事势力上台的一切幻想

---

① 哈罗德·亚历山大（1891—1969），英国陆军元帅和国防大臣。1944年11月，任中东盟军司令。1945年2月，曾访问贝尔格莱德，以确定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同意大利北部的盟军协同作战事宜。当时，他曾同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铁托一起巡视了斯雷姆前线。

全告破灭。而尝试使用武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当时会在反法西斯联盟主要强国之间造成剑拔弩张的局面，这无论如何是丘吉尔不能允许的。但是这一政策的实质还是没有改变。

我本人确信，斯大林对丘吉尔的支持，更多的是一种考虑到南斯拉夫革命进一步发展的手腕，而在当时，以及后来在围绕伦敦王国政府和我们的革命政府达成协议所进行的谈判过程中，对我们并没有直接的损害。对丘吉尔的这种支持，同时也反映了斯大林和丘吉尔已就在南斯拉夫“对半”划分势力范围达成了协议，这是1944年10月在莫斯科达成的，而在1945年初的雅尔达会议上得到了确认。<sup>①</sup>

当时南斯拉夫的全部政权事实上都掌握在我们手中，因而所有这样的和类似的协议都是可笑的。因此1944年底<sup>②</sup>在莫斯科同斯大林谈话时，我没有对这样的协议提什么抗议。我觉得，超越时间和空间，根据两国政府、两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前的、多次发生的冲突，苏联政府也必然清楚，革命的南斯拉夫是不会怎么理会这样的协议的。我们当时事实上已经是一支完全独立的革命力量，如果我们有时接受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或者苏联政府就这个或那个政治问题提出的一些建议，这

---

① 参看第48页脚注。

② 1944年11月22日。

不是反映了我们屈从于苏联政府，而是反映了在一些问题上立场相似或相近，反映了南斯拉夫对于在未来的和会上取得苏联的支持的极大依附感。如果说存在误会和争论的话，而这在战前和战时都是有的，这些误会和争论主要涉及相互间的关系和对邻国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容我下面再予详述。

然而，当时苏联极大地帮助了新南斯拉夫在欧洲站住脚，帮助了它得到反希特勒联盟的盟国的承认，没有这种支持，我们在和会上取得的所有结果都会无可比拟地逊色。对于这一点是不能有任何怀疑的。实际上，在争取国际上承认南斯拉夫和签订和约的斗争中，我们唯有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盟友。当然，也有若干例外的情况。

可见，我要说，丘吉尔，也就是盟国对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的整个政策和关系从1941年起，直到战争结束，大致是在这一范围内演变的。下面，我将比较详细地来探讨这一政策的各个阶段。

### 为使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得到承认而斗争

在希特勒进攻南斯拉夫之初，就出现了切特尼克。他们所反映的是旧南斯拉夫君主主义大塞尔维亚上层集团的意志。他们的政策是：在森林里坐等，最低限度地



动员农民，只动员为保护他们自己所需要的那么些农民，等待盟国取得最后的胜利，使他们能够冲出森林，把自己说成是南斯拉夫和彼得二世国王的军队。黑塞哥维那、波斯尼亚和利卡的塞尔维亚人民受到乌斯塔什<sup>①</sup>的血腥恐怖和杀戮，他们自发的起义开始时推动了切特尼克的出现。严酷的恐怖使得塞尔维亚人民不得不采取自发的武装行动，为求生存而奋斗。共产党当时就参加了这些自发的起义，一再设法使起义尽量严密地组织起来。

但是一俟反对德国人的武装行动中出现了以共产党为首的人民解放运动，局势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切特尼克不再能在德国人的默许下在森林里坐等，对于德国人来说，切特尼克这种隐蔽藏身的做法是帮了忙，因为切特尼克这样的政策事实上阻挠了发动居民和他们对德国人的抵抗。他们突然面临一个难题：要么同德国人作战，这如果不意味着同人民解放军进行正式的合作，也至少是事实上的合作，或者要么勾结德国人。切特尼克所代表的阶层和政治势力的阶级利益事先就已作出了回

---

<sup>①</sup> 乌斯塔什，又译乌斯塔沙，是宣扬极端沙文主义，带有法西斯性质的反动民族主义运动，其代表人物为安特·帕韦利奇，其纲领是把克罗地亚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斯雷姆组成一个独立国，消灭塞尔维亚居民。第二次大战爆发后，乌斯塔什投靠德意法西斯，与南共领导的人民武装为敌，并在德国支持下宣布成立“克罗地亚独立国”。——译者注

答。他们抓紧时间；他们开始公开地勾结德国人。他们对乌日采游击队的进攻本应意味着最终消灭人民解放运动的开始，但是在进攻失利之后，他们立即同德国人接触，如果说以前还没有这样的接触的话。<sup>①</sup>

可见，切特尼克扮演这样的角色，即公开勾结占领者，从一开始起就反映了他们的政策：他们是间谍、“别动队”、刽子手和凶手，他们恐吓和杀戮对他们持保留态度而未必是游击队的和平居民。正是在这样的局面下，西方列强政府把自己的联络官派到这样的切特尼克那里，好象派到自己的盟友那里似的。这一事实本身如果不说明别的，至少说明，在西方各国政府看来，当时消灭人民解放运动和共产党在南斯拉夫的影响，比同德国人作战更为重要。

差不多在这时，英国派驻切特尼克司令部，即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司令部的联络官赫德森<sup>②</sup>来到我们

---

① 参看第177页为本页收录的附件。

② 杜安·赫德森是英国在被占领的南斯拉夫的第一个军事使团团团长，他是派驻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司令部的，是在1941年9月20日在滨海佩特罗瓦茨登岸的。跟赫德森一起的有王国军队两名少校扎哈里耶·奥斯托伊奇和米尔科·拉拉托维奇，他们后来成了切特尼克的指挥官，还有无线电报务员韦利科·德拉吉切维奇，他在这批人抵达乌日采之后投向游击队，在1944年德军空降袭击德尔瓦尔时牺牲。洛夫钦游击队接待了赫德森，他经由游击队所控制的地区抵达乌日采，抵达人民解放游击队最高统帅部。他于1941年10月25日跟德·米哈伊洛维奇司令部接上头。

这里，来到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部<sup>①</sup>。可以说，他完全是偶然地来到我们这里的。他们用潜水艇把他送到黑山沿海某地，以为切特尼克会在那里迎接他。显然，切特尼克通过吹嘘自己的作战和胜利的报告欺骗了盟国，也欺骗了全世界。赫德森走过一大片地区，从黑山沿岸，经由桑贾克和塞尔维亚，直到乌日采的最高统帅部。因此，他很容易看到并使自己认识清，切特尼克到底算是什么样的力量，因为在整个此行途中，他哪里也没有遇到切特尼克，而是到处都是游击队。

我们在最高统帅部接待了他，当然是得体地接待了他，使他能够同他希望谈话的所有的人谈了话。当然，最重要和时间最长的谈话是同铁托进行的，他还同我们其他领导同志进行了交谈，而且不仅同共产党人谈话，还同人民解放阵线的领导成员谈话。通过这些谈话，赫德森对于国内和前线的状况，特别是在游击队、切特尼克和占领者之间的关系方面，有了一个清晰的概念。我们还向他解释了解放区政权的自治民主性质，寄希望于

---

① 南共中央政治局于1941年6月27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会议上组成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总司令部。1941年9月26日在斯托利察举行的会议决定，总司令部称为：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最高统帅部。从1942年1月起，最高统帅部称为：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和志愿军最高统帅部。而从1942年11月起，改称为：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统帅部。1945年3月南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统帅部改组为南斯拉夫军队总参谋部。

他多多少少向伦敦转达一些情况。我们特别揭露了伦敦王国政府的无线电广播把人民解放军同德国人的全部作战和胜利归功于切特尼克。他可以亲眼目睹，乌日采是由游击队，而不是象整个西方报界所报道的那样是由切特尼克解放的。他公开地承认了这一点。然而，他未能同我们就人民解放军领导和英国政府之间建立合作事宜进行政治性讨论，因为要知道，他来南斯拉夫是负有具体的任务的：同切特尼克商谈合作，以便消灭人民解放运动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他是个军人，他执行他受领的命令，完成军人的任务。

然而，根据某些材料说，他向自己的指挥部提交的报告是相当具体的。这只是证明，西方国家政府当时就很了解在南斯拉夫参加反占领者战争的武装力量的真实状况，它们的关系的性质，它们的实力和活动，特别是很清楚地了解了切特尼克同德国人的勾结，而且我还确信，正是这些报告使得切特尼克同德国人的勾结合法化了，这不仅是符合切特尼克最高指挥部的心愿的，而且也是在伦敦的王国政府的压力下进行的，伦敦政府知悉了这些报告和西方国家政府了解到的情况，即不得到德国人的直接支持，不同德国人勾结，切特尼克是没有能力来消灭人民解放运动的，从而名副其实地一片惊慌。诚然，这可能只是我个人武断的看法，并没有足够明确的证据和扎实的根据。当时，对于西方国家政府来说，阻挠巴尔干和多瑙河流域的左翼革命运动，免得以后在

他们同苏联处理关系时给他们制造严重“困难”，这要比切特尼克采取一些小的游击队行动重要得多，这些行动当时是切特尼克唯一能采取的行动，当然，条件是他们真的愿意同德国人作战。

因此，西方后来一再想证明，西方国家政府之所以支持切特尼克，是由于他们不了解切特尼克同德国人勾结，这不仅是徒劳的，而且也是可笑的。诚然，丘吉尔后来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大大改变了自己对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的态度。态度的这种改变不是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而是在借以同这个运动以及同这个运动所产生的政权建立接触的方法方面。然而，我所谈到的事件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发生的，当时西方国家政府确信，有可能消灭南斯拉夫的人民解放运动，如果不是靠切特尼克本身的力量，那么在德国人、意大利人和乌斯塔什的援助下是有可能办到的。这种局面，我们是完全意识到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估计到，争取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被承认为反希特勒联盟的一部分的斗争，尤其是争取新南斯拉夫得到承认的斗争，将是格外艰巨的。我们确信，光靠宣传和提供情报是打赢不了这场战斗的，尽管我们并不低估这些手段，但是首先要靠壮大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扩大解放区，在反对占领者和国内各民族卖国贼的各条战线上尽可能广泛地展开活动。

对于我上面所说的情况的一个雄辩的证明是这样一个事实：在赫德森对他在南斯拉夫所看到的状况作了报

告之后，西方国家政府急急忙忙地把自己的军事使团派往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司令部和切特尼克的其他形形色色的司令部<sup>①</sup>，但却连一个联络官也不打算向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部派出。换言之，当时，西方国家政府决定加强对正同游击队作战的切特尼克的全面援助，而不是加强真正同德国人和南斯拉夫国土上的别的占领者作战的武装力量。

赫德森当然不进行任何范围比较广泛的讨论，他也不敢谈西方国家军队同人民解放军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

---

① 英国人鉴于失去了同赫德森使团的直接联系——这部分地是由于赫德森和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之间关系紧张所致——遂于1941年底决定向切特尼克派遣若干个军事使团。

这些使团中的一个是由特伦斯·艾瑟顿少校率领的。他们于1942年2月4日乘潜艇在滨海佩特罗瓦茨登陆。为了去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司令部，跟赫德森一样，他们穿越了游击队占据的地区，从海岸一直走到福查。艾瑟顿，跟赫德森一样，受到铁托的接见。为了向他证明，切特尼克同占领者勾结，从最高统帅部又把他送到罗加蒂察附近的前线。在前往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司令部的途中，艾瑟顿于1942年4月被切特尼克打死。然而，令人感兴趣的是，迪金在自己的《博约夫纳山》一书的第203页上援引了切特尼克的指挥官奥斯托伊奇致德·米哈伊洛维奇的一封信，奥斯托伊奇在这封信里提醒他说，艾瑟顿“比赫德森还坏。他从自己的指挥部得到指示，要竭尽全力把水搅混并支持反对占领者的斗争”。

在乘同一艘潜艇抵达的第二个使团中有南斯拉夫王国军队中尉斯塔尼斯拉夫·拉波特茨，他于1942年1月27日在姆列特登

合作，因为他领受的是完全相反的指示。他只是不断地重申，伦敦政府是“南斯拉夫的合法政府”，国王是“南斯拉夫的合法国王”，因此所有武装力量都必须服从于最高统帅——彼得国王以及伦敦政府，而这个政府在国内的代表就是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因此，从一开始起只向我们提出一个要求：让我们服从南斯拉夫这些反动的政治力量和其他力量的军事指挥部，但是正是这些力量使南斯拉夫陷于大战前夕所处的地位；西方的这种要求同时又意味着要我们放弃人民解放武装斗争。

---

陆，任务是同达尔马提亚的切特尼克建立联系。拉波特茨除同达尔马提亚的切特尼克联系外，还同萨格勒布的斯特皮纳茨和德拉扎驻斯洛文尼亚的全权代表K·诺瓦克接触，而在离开南斯拉夫前往伊斯坦布尔时，在贝尔格莱德同德拉扎的代表有过接触。

第三个使团是在1942年2月5日乘飞机前往罗马尼亚的，但是在降落时被义勇军所俘虏。

在派遣了这几个使团之后，英国人在1942年底（12月25日）派遣了一个以S·W·贝利为首的新的军事使团，他是在科拉辛附近德·米哈伊洛维奇司令部不远处降落的。1943年9月23日，英国人又派遣了一个以阿姆斯特朗将军为首的级别很高的使团，也是派往德·米哈伊洛维奇的司令部的。这个使团在切梅尔诺降落。

此外，1943年内，英国人还向塞尔维亚境内切特尼克的各个军派遣了好几个军事使团。

美国人也向切特尼克派遣了自己的特别使团，不过时间稍晚些。以沃尔特·曼斯菲尔德中尉为首的第一个使团于1943年8月18日抵达。1943年9月23日，同英国阿姆斯特朗将军一起抵达的，还有美国的艾伯特·塞茨中校。

当然，赫德森这样的要求，或者说“建议”，使我们感到好笑，因为我们得到我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得到军队的支持，我们的军队不仅组织良好，而且决心斗争到最后一滴血。

赫德森要求我们同意他经过我们的解放区同切特尼克建立接触。这一点，我们当然没有禁止他，他不久就到了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司令部。

然而，西方指挥部同切特尼克司令部的大多数联络官都得经过解放区，即经过游击队控制下的地区。我们不阻难他们前往他们的政府派他们前往的地方。但是切特尼克杀害了他们中的一位<sup>①</sup>，并偷走了英国政府给他的、藏在腰带中一个小口袋中的个人备用的黄金。切特尼克在外国报刊上立即掀起一场疯狂的运动，硬说这个英国军官是游击队杀害的，目的在于根据这一谎言，让西方世界相信，游击队作为共产党人杀害前来南斯拉夫同切特尼克一起与德国人作战的西方军官。但是，当时关于南斯拉夫的真实情况的报道已经在世界舆论中占据一定的位置，此外，众所周知，在发生这次事件之前，盟国有不少军官没有遇到任何阻难，经由游击队地区，在游击队的帮助下，前往切特尼克的司令部。

当时，在这些问题上，在西方盟国对切特尼克，或者对人民解放运动的态度上，铁托奉行十分英明的政策，尽管做起来并不容易。因为在游击队前线的战士的

---

<sup>①</sup> 指的是英国艾瑟顿少校。



全家往往遭到屠杀，切特尼克公开勾结德国人，从而实际上——尽管就形式而言是间接的——盟国军官也在勾结德国人，这使得许多游击队员义愤填膺，反对同切特尼克联络的盟国军官，我们不得不一再向我们的战士们解释，铁托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它考虑的是新南斯拉夫未来的利益。此外，我们还向战士们指出这样一个他们自己也看到并意识到的事实：军事和政治上的优势在人民解放运动方面，这几个西方军官决不可能改变实际状况：最后，西方的这些联络点至少会违背自己的心愿，可把一部分真相传回去，而这归根结蒂会迫使西方国家政府和反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的主要头目丘吉尔改变自己的政策。

在这样的局势下，对于我们来说，莫斯科成了十分重要的政治支柱。苏联的新闻机构和苏联外交机构支持我们的论点，从而间接地对世界舆论施加了压力。对于我们来说，“自由南斯拉夫电台”<sup>①</sup>具有格外的价值，

---

① “自由南斯拉夫”电台于1941年11月11日在苏联的乌法建立。它在共产国际的无线电台系统中广播消息。从1942年4月起至1945年1月停止工作时为止，该台一直设在莫斯科。该台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和斯洛文尼亚语广播消息，而从1944年年中起，还用马其顿语广播。从1943年起，用多种语言为被占领的欧洲各国人民广播消息。从1942年4月起，该台同最高统帅部有直接定期的无线电联系，稍后，同斯洛文尼亚总司令部也建立了这样的联系。电台编辑部在准备广播节目时参考各通讯社的消息，盟国报刊上的消息和新闻以及其他的来源。从1943年11月起，一部分节目是根据南通社的消息播发的，而从1944年起，“自由南斯拉夫”电台的节目的材料全部由南通社提供。

它虽说是以南斯拉夫的语言进行广播的，还是间接地促进了把我们斗争的真相扩散到其他语言地区去。尤其是因为领导“自由南斯拉夫”电台并在其中工作的有象维尔科·弗拉霍维奇<sup>①</sup>和久罗·萨拉伊<sup>②</sup>这样一些人，他们努力使这家无线电台的广播，在当时的条件下，尽可能地摆脱苏联的外交。因为当我们从南斯拉夫揭露那些把游击队的胜利和人民解放军进行的战斗都归功于切特尼克的谎言时，苏联的外交是支持我们的，但是当我们断言切特尼克勾结德国人，特别是在涉及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本人的时候，苏联的外交是极其谨慎的。苏联政府当时继续奉行要我们同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达成协议的政策；对于国内外熟悉真实情况的人来说，这一要求不仅是荒唐的，而且也是可笑的。因为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和他所谓的南斯拉夫军队在祖国斗争的主要目

---

① 维尔科·弗拉霍维奇（1914—1975），1933年参加南共青团，1935年加入南共，参加过西班牙内战。1939年任南共青团中央驻少共国际代表，1942年起任少共国际书记，直至1943年少共国际解散。1941—1943年为南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兼设在苏联的自由南斯拉夫电台负责人。战后曾任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副外长、《战斗报》主编。在南共联盟七大当选为南共联盟中央执委，八大当选为南共联盟中央书记，九大当选为南共联盟主席团成员，后为南共联盟主席团执行局成员。——译者注

② 久罗·萨拉伊（1889—1957），1919年加入南共，从事工会运动。三十年代任南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死前任南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南共联盟中央执委。——译者注

的是消灭游击队和人民解放运动，而不是同德国人作战。在铁托和莫斯科之间，就这个问题交换过一系列很令人不愉快的电报，彼此有所指责。维尔科·弗拉霍维奇和久罗·萨拉伊当然努力给国内人民解放运动的军政领导以尽可能多的支持，因此他们往往在“自由南斯拉夫”电台的节目中自行广播一些消息揭露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和切特尼克扮演的角色的真相，这使他们两人常常处境很不愉快。

这个问题始终贯穿我们同莫斯科的全部关系，直到战争结束，甚至在战后也是如此。如果撇开这个问题不谈，我们同莫斯科的合作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友好和真诚的，我们从苏联得到的武器和其他装备方面的援助为数也是不小的。当然，苏联政府在所有这些事情上是考虑到自己同盟国的关系中的全盘利益的。因此，苏联是向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部派驻军事联络使团<sup>①</sup>的最后

---

① 从战争开始一直到战争结束，最高统帅部同莫斯科一直保持无线电联系。然而，表面上这是同共产国际联系，而不是同苏联政府联系。苏联政府向伦敦的南斯拉夫王国政府派有自己的大使，同时南斯拉夫王国在古比雪夫派有大使。

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的德黑兰会议决定，苏联政府向南斯拉夫派遣自己的军事使团。以科尔涅耶夫将军为首的这个使团通过英国的渠道，绕道开罗和德黑兰，于1944年2月23日抵达南斯拉夫。科尔涅耶夫将军与戈尔什科夫将军和另外几名军官乘滑翔机在波斯尼亚佩特罗瓦茨降落。

在苏联使团抵达后，最高统帅部立即决定向莫斯科派遣自己

一个盟国，是向南斯拉夫提供武器的最后一个盟国，就不是偶然的了。当然，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感到痛心，但是我们把这样的一些举动看成是苏联在自己对反希特勒联盟中的西方盟国政策中不得不采取的做法。

我们知道，斯大林在某些情况下是极其谨慎的，他对于自己的实际力量没有充分的把握，是决不轻易下决心采取某个冒险的行动的。因此，他对南斯拉夫和南斯拉夫政府的政策是尽量不去创造条件和机会，避免同西方列强发生冲突。既然我们了解这种情况，我们也就相机行事。我们常常默认从莫斯科得到的某些论点，但是具体到国内，我们就按别的方式行事。

---

的使团，该使团称为：“全国委员会军事使团”，参加这一使团的有密洛凡·吉拉斯\*、韦利米尔·德尔齐奇、韦利米尔·斯托伊尼奇等人。最高统帅部使团经由开罗和德黑兰于1944年4月12日抵达莫斯科。

- \* 密洛凡·吉拉斯(1912—□)，南政论家、文学家，1935—1954年间为南共中央委员，曾任南共政治局委员、联邦国民议会主席。南共六大后，特别是1953年以后，陷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1954年1月，南共中央全会斥其为修正主义分子，免去其党内外职务，后曾两次被判刑。吉拉斯曾被误译为德热拉斯。——译者注

## 南人解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为新南斯拉夫的独立奠定基础

我们的对外政策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斯大林在这方面的做法和反应也过份谨慎。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对我们准备在亚伊采召开的南人解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反应上。关于这次会议，我们事先没有报告莫斯科，因为我们确信斯大林是会反对召开这次会议的。他显然过高地估计了西方国家政府对南人解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议的反应，因为他几乎确有把握地以为会发生比实际情况尖锐得多的冲突。

因此，我们在几天之内收到了两封电报。第一封电报是莫洛托夫发来的，大意是说，我们在南人解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的决议是给苏联背后捅了一刀。我们本来就估计到斯大林会作出尖锐的反应，不过还是没有料到他作出了这样的反应。但是几乎在同时，在相隔很短的时间内，我们收到了丘吉尔发来的一封长电报。他当然不赞成南人解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各项决议，但是他并不拒绝在这一基础上会谈。换言之，他显然认为，这些决议中有些东西可以成为实现他解决南斯拉夫问题的最终主张的出发点。在我看来，他所指的就是南人解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宣言中的一个提法，即南斯拉夫是保持君主制还是建立共和制的问题，要到战后由人民按照

民主的方式作出决定，才予最终解决。

丘吉尔是现实主义者，他当时已经明白，要强行对付人民解放军和南斯拉夫人民解放阵线，已经办不到，在他看来，这个提法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来挽救尚能挽救的东西。我们在起草这一决议时，也考虑到会有这样的反应。因此，没有发生“悲观派”预料会出现的情况，即丘吉尔通过对南人解委员会的决议作出尖锐的反应而在反希特勒联盟中制造新的严重冲突。发生的却是“乐观派”原先预料的情况：丘吉尔考虑到对力量对比进行现实的估量，考虑到他们在南斯拉夫的实力，试图通过运用政治手段和施加压力来打进南斯拉夫。他这一政策即这一政治策略中的主要王牌，是国际对新南斯拉夫的承认，以及战后在和会上马上就会出现的一系列始终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不仅是指南斯拉夫和西方盟国之间的关系中的问题，而且也是指苏联和西方盟国之间的关系中的问题。

丘吉尔对南人解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议相对平静的反应以及很大一部分世界报刊对这些决议作出的十分积极的评价，这两点肯定是产生了影响，起了作用，使得我们因这些决议而同苏联政府猛然发生的冲突很快就平息下去了。我要说，在此之后，我们相互间政治上的信任甚至还得到了加强（我们两党相互关系中从前的一些现象一度破坏过这种信任）。两国政府之间的军事和政治合作也加强了。从我们方面来说，我愿特别强调，我

们对于第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国家的信任大大加强了。当然，有些因素没有发生变化，尽管是掩盖起来了，这就是我们感觉到我们在列强全球政治中不过是“零钱”而已，关于这一点我下面还要谈到。

然而，如果我们把一切积极的東西，共同的利益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的东西放在天平的一端，把由于政治上的误会而使我们分开的东西放在另一端，我们要说，积极的方面还是要比消极的方面重得多。这一事实是我们抵制西方国家政府的图谋的重要支柱，西方国家政府想迫使我们承认伦敦政府，或者至少同这个政府和彼得国王达成实质性妥协，对于我们来说，这当然是无法接受的。此外，几乎是在战争临近结束时，苏联给南斯拉夫的军事援助大大增加，这种援助在以前很长的时间内曾大大落后于西方盟国给我们的援助。我们的军队用从苏联和西方盟国那里得到的武器装备起来，充分现代化了，成了从匈牙利直到亚得里亚海的东方战场上一个独立、强大和平等的军事伙伴。

当然，我们同时也意识到，我们必须接受某种妥协。尤其是因为我们不断地受到双方——来自西方和东方的压力。当然，这两种压力也有差别。我们觉得斯大林的压力更多的是各大强国全球考虑范围内的一种策略。然而，在同西方盟国的关系中，则涉及我国民族生存的实质性问题，涉及能否消除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领土一百年来被瓜分和分割的问题。此外，还涉及我国革

命进一步发展的一些决定性问题。因此，我们不得不接受妥协这个主张，但是又明确地规定这一妥协的终极界限，不让压力使我们沦于依附各大强国的地位。我们掌握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在南斯拉夫人民中间的政治影响占压倒的优势。除了通过有形的攻击，即通过外来的武装进攻，谁都不可能改变我们这样的地位，不可能把我们排挤到政治事件的外围。因此，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我们能够承受某些冒很大风险的妥协。

是独立自主地对涉及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和我国革命的命运的重大问题作出决定，还是承认依附于苏联或西方国家政府的立场和意见，在要作出这样的抉择的时候，我们是毫不动摇的。决心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命运，这始终是唯一可能的选择，因为我们始终认为，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首先要对本国人民负责，然后在其他一切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共同利益的范围内对他们负责。我们的出发点是，我们党要在一切必要的情报和磋商的基础上确定这些共同的利益真正地体现在什么地方。因为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有机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看到，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有些人试图把本国的利益当成共同的利益，不论是当成民主的利益，还是当成社会主义的利益，或是人民解放的利益和类似的利益。

关于这一点，我在这里谈得详细一点，是因为我在下面要谈到的各种关系的发展，首先是关于同伦敦的王



国政府，同反希特勒同盟的西方成员国政府以及同苏联政府的协议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

我愿对当时为了让我们同伦敦的王国政府和彼得国王达成协议而向我们施加的压力，如果不是从数量上，至少也是从质量上加以区别，这是指，要让旧南斯拉夫的反动势力至少得到最低限度的政治实力和政治活动可能性，以便他们能够逐步地重新获得他们战前所拥有的国内政治和军事地位中的不那么重要的一部分。当斯大林说服我们接受这样的解决办法时，他的主要论点大致如下：彼得国王到底对你们有什么妨碍？你们掌握着大权，他只是一个象征性人物。此外，你们低估了君主制在南斯拉夫的影响。君主制的政治影响还很强。我同意，不能让旧资产阶级和它的军界人士占据关键性的掌权职位。你们表面上让国王回去，让一部分老政治家在国内外占据不那么重要的地位，时间一到，你们很容易把国王和这些大臣排除掉。

1944年底，我同舒巴希奇一起访问了莫斯科，我在同斯大林谈话时，他坦率和明白地向我谈到上面这一番话。我回答他说，首先有两个理由使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解决办法。首先，我们的全体人民会感到莫名其妙，他们不会理解我们这样的行动，甚至会认为是背叛，从而我们自己在自己的队伍里造成严重的政治危机。第二，从伦敦的王国政府作为妥协的基础而提出的要求来看，

正如我们的人民所说，“他们并不傻”，完全知道他们要的是什么。以为它会满足于扮演注定要失败的那种角色，那是幻想。我代表南共中央——中央授权我这么做——向斯大林表示，我们将确实尽最大的努力，争取求得某种妥协，而且我们这么做，不是出于自身的需要，而是由于我们觉得我们对保持反希特勒联盟的团结负有责任。

铁托在我的访问之前两、三个月曾访问了斯大林<sup>①</sup>，从他对访问的回忆中清楚地看出，铁托对斯大林也说了同样的话。但是斯大林没有被说服。

我们当时没有听他的话，这一点无疑是他对我们总是不信任，对南斯拉夫感到不满的根源之一。1948年及以后，我们同斯大林的关系最终发生了危机，这一点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我们是否同意进行谈判？是否下决心寻求达成某种协议，特别是就伦敦政府和斯大林最坚持的最重要的问题即彼得二世国王的命运问题达成协议？当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就此作出决定的时候，我们是考虑到了——但是只在一定的程度上，并不过份——各大强国的利益的，尽管我们并不打算为了各大强国的利益和它们间的相互

---

① 铁托于1944年9月21日从维斯机场出发前往莫斯科，在那里，他同斯大林就两国军队在南斯拉夫部分领土上共同作战问题达成了协议。

协议而牺牲我国各族人民的利益。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和谈，即五强部长会议，要由他们为和会拟订出一个条约文稿以及筹备会议本身。

在西方，我们为赢得政治上的承认可以说是“结下了仇”的，我已经谈到一系列的误会和冲突，还发生了我没有谈到的，其重要性决不稍次的另一些误会和冲突。我们使斯大林对南斯拉夫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信任感，这并非是我们所愿意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指望在涉及南斯拉夫的生存和独立的重大问题上以及在和会的决议的某些重大问题上得到东方的支持。然而，在我们当时已经感觉到苏联政府和我国革命政府的立场存在差异和分歧的那些问题上，我们拿不准东方是否一定给予支援。因此当时我们实际上可以指望和依靠的只有两个“盟友”：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支持和坚强团结以及世界大部分民主舆论的支持。

### 同陶里亚蒂谈话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即为了争取世界民主舆论的支持，我们曾尝试把洛拉·里巴尔派到伦敦去，后来又曾尝试把弗拉特科·韦莱比特作为我们的正式军事代表派驻开罗的盟军指挥部，并向我们认为在达到我们的目的斗争中有可能取得一些支持的世界各地，派去我们其

他一系列军事代表和文职人员代表<sup>①</sup>。

为了同一目的，我们还同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建立了直接的接触和联系，并设法得到它们的支持。我要说，总的来说，我们也得到了这些共产党的支

- 
- ① 伊沃·洛拉·里巴尔曾被确定为我们派驻设在开罗的盟军地中海指挥部第一个军事使团的团长。他在动身前往开罗时，于1943年11月27日在格拉莫奇波列牺牲。同时牺牲的还有两名英国军官。在洛拉·里巴尔牺牲之后，弗拉特科·韦莱比特被任命为团长，他于11月30日，也是从格拉莫奇波列出发，前往开罗。该使团在开罗的两周逗留期间，在同盟军指挥部的谈判中没有取得特别的成果，就回到了南斯拉夫。

在同英国政府进行了长时间谈判后，他们同意把我们的军事使团当作最高统帅部派驻地中海盟军总司令亨利·梅特兰·威尔逊将军的司令部的常驻使团。于是该使团前往威尔逊将军的司令部所在地阿尔及尔。使团同威尔逊将军开了几次会，但我们所提出的要求没有得到顺利的解决，我们要求归还（交回）当时在马耳他和亚历山大港的南斯拉夫海军，以及要求盟国增加对我军的援助。威尔逊提出了盟军可能在达尔马提亚登陆的问题，对此弗拉特科·韦莱比特代表最高统帅部回答说，我们有足够的军队，无需盟军在我国登陆，需要的是增加武器和装备方面的援助。

我们的这个使团在阿尔及尔同法兰西全国委员会的成员有过接触。

在去了阿尔及尔之后，弗·韦莱比特和德·沃格尔尼克被任命为全国委员会派驻伦敦的舒巴希奇政府的代表。

除了这个使团外，还向巴里派遣了由米伦蒂耶·波波维奇率领的全国委员会使团。

持，尽管有些共产党在政治上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自己国内的盟友和他们的立场，因此未能突出地给予支持，而不得不考虑自己在本国的盟友的立场。

我于1944年底经由巴里前往罗马，同陶里亚蒂会晤<sup>①</sup>。会晤是严格保密的，就我所知，当时没有一个情报机构发现这次会晤。英国驻我们最高统帅部的军事使团成员迪金教授战后对我说，当时我使他们很头痛，因为我突然从巴里消失，他们闹不清楚我在哪里。当我今天回顾整个这一行动时，我觉得这一行动完全不必要，甚至有点可笑。但是当时我们就是这样，我们避免不了这种当时习以为常的做法。

我同陶里亚蒂的谈话主要只涉及两个问题。第一，我向他通报了南斯拉夫的局势，特别是谈到西方和东方向我们施加压力，要我们与伦敦的王国政府达成协议。我还向他通报，丘吉尔保证组成以舒巴希奇为首的伦敦王国新政府，它几乎连一个大臣也没有，只是为了使这个政府能同我们达成协议。我还向他通报了苏联政府和斯大林的态度。陶里亚蒂不愿多谈这些问题，不愿表明自己的态度。我们本来也没有指望他表明态度。我们只是希望向他通报情况。

同陶里亚蒂的谈话中的另一个题目是意大利国内局势的发展，即它国内局势发展的前景。在这方面，他的

---

<sup>①</sup> 1944年10月16日或17日。

方针是完全清楚的。他认为，当时意大利奉行采取武装行动的任何方针势必会以危险的冒险告终，在这种冒险活动中，意大利工人阶级会遭到失败，政治上处于无能为力的地步。他所阐述的正是今天被称为“历史性妥协”的论点，尽管他没有这么说。但是他认为，共产党只有同其他力量，不仅同社会主义力量，而且同其他民主的社会力量在一起来维护民主制度和扩大这一民主制度，才能真正巩固意大利工人阶级的地位，使它成为国内真正的政治因素。在他看来，其他一切问题都应当留待未来去解决，未来将根据未来的事态发展所创造的条件去解决这些问题。当我今天回想起陶里亚蒂这些话时，我可以说，事实上是他第一个明确地用一清二楚的措辞陈述了后来得到了“欧洲共产主义”这个称呼的那些论点。

当然，对于陶里亚蒂的讲话，我没有插话，我只把它看成是向我们党通报。我们当时是一个年轻的党，行将在国内接管全部政权，是掌握强大的武装力量的唯一的党。我们这样的地位当然是一个原因，使我们不能够与意大利同志们始终求得彻底的谅解。然而，我们彼此间没有吵过架，尤其是因为陶里亚蒂在自己的这番讲话中所提出的基本论点在我们看来是可以理解的。鉴于西方国家在意大利集中了军事力量，不可能出现一支主观力量来权威性地宣布：革命行动在哪里结束，而无政府主义冒险主义又在哪里开始。这次谈话是我难于忘怀

的，我向铁托和我们其他领导同志报告了同陶里亚蒂谈话的经过，谈话也给他们留下强烈的印象。

我们不完全相信没有可能比较成功地利用北意大利游击队的武装力量，至少是用来向西方盟国施加压力，来加强和巩固意大利共产党在新意大利政治制度中的政治地位。但是，一直到在波兰召开共产党情报局第一次会议<sup>①</sup>之前，我们一直没有干预，也不打算干预意大利共产党的政策，因为意大利共产党是在与我们完全不同的条件下活动的。而在那次会议上，我们是在日丹诺夫直接授意下才干预的。

在同别国共产党、其他进步和民主的政党建立接触的时候，我们的目的决不是要以某种方式来干预这些政党和运动的内政，因为根据自身的经验，我们已经看清楚了这样的干预所能带来的损害。我们进行这些接触的主要目的确实只在于对这些党和其他民主政治力量施加影响，使它们在我们争取新南斯拉夫获得承认和独立的斗争中，在我们就行将举行的和会提出的要求上，最大限度地支持我们。

---

<sup>①</sup> 官方称为若干国家共产党情报局，又称共产党情报局。见第 116 页脚注<sup>③</sup>。

## 军事使团以及与盟国合作

我前面已经说过，我们人民解放军同英军某些指挥部和最高指挥部，以及通过它们，同英国政府的直接和正式的联系，开始得比较早，也就是开始于铁托和丘吉尔之间举行会晤<sup>①</sup>之前。丘吉尔对于把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部与英国军队和其他盟军之间派遣军事使团和合作看成是英国政府和南斯拉夫革命政府之间政治合作的一种形式这件事，是十分敏感的。当然，他反对这样的合作，首先是由于他考虑到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和彼得国王，尽管我们当时已经知道，丘吉尔事实上亲自掌握通过军事使团保持的所有这些联系，身为英国首相，亲自就这些联系作出决定，后来的材料也证实了这一点。以这种方式来区分合作的形式，完全是形式主义，正如斯大林一再试图把自己担任的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同苏联国家元首的职务分开一样。

当丘吉尔最终明白，他必须同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人谈判时，他决定同我们的最高统帅部建立直接的正式联系。开罗的盟军指挥部组织了派往游击队地

---

<sup>①</sup> 铁托和丘吉尔的会晤于1944年8月12日在那不勒斯举行。



区的好几个小组，以及某种先遣队。①

根据开罗的盟军指挥部收到的这些小组的报告，英国向南斯拉夫派遣了第一个军事使团，任务是同人民解放军建立直接的联系。② 克罗地亚总司令部接待了琼斯，特别是弗拉迪米尔·巴卡里奇同他进行多次谈话，巴卡里

---

① 第一个这样的小组是由克罗地亚裔的加拿大人组成的，是在不让伦敦的王国政府知悉的情况下被派到南斯拉夫来的。这个小组于1943年4月20日至21日的那个夜晚在解放区降落。这个小组的一部分人在东波斯尼亚的舍科维奇降落，另一部分在利卡的德雷日尼察附近的茨尔纳茨波列降落。当时在这一地区工作的阿尔索·约万诺维奇\*和洛拉·里巴尔向最高统帅部和铁托报告了他们的到来。铁托回答，让他们仔细查核一下，他们是否是“真诚地、善意地愿把我们当作盟友进行合作，还是又是一些偶然闯入我方的‘德拉扎分子’”。（见《人民解放斗争文件集》，第2卷第9册第162页）。

\* 阿尔索·约万诺维奇，战时曾任南游击队最高统帅部参谋长，解放后任南人民军总参谋长。1948年共产党情报局宣布开除南共后，他拥护情报局决议，阴谋逃往国外组织流亡政府，在南罗边境被击毙。——译者注

② 这个使团于1943年5月18日至19日之间的那个夜晚在克罗地亚总司令部附近的利卡解放区降落。参加这个使团的有威廉·琼斯少校和安东尼·亨特上尉。在琼斯于1943年5月27日至28日之间的那个夜晚抵达之后不久，以迪金少校为首的英国驻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统帅部的第一个军事使团就抵达了。在迪金抵达之后，1943年7月和8月，英国向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人民解放军各个指挥部分别派遣了六个使团。

奇当时是克罗地亚总司令部政委。琼斯向他通报了自己受权的内容和范围，当然，这没有超出他所得到的指示。

此外，通过巴卡里奇同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部的联络，琼斯安排了①派驻最高统帅部的盟军主要代表菲茨罗伊·麦克莱恩②抵达的事宜。随同麦克莱恩一起前来以及在他之后前来的还有英国和美国的 其他一些 联络官，先是来到最高统帅部，随后是来到南斯拉夫各地区的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和其他司令部。

几周以后，派驻最高统帅部的苏联军事使团也降落了，随后，跟英美使团一样，派驻南斯拉夫其他各司令部的苏联军事使团也相继抵达。

在比较短的时间内降落到我们解放区的这一批身穿不同制服，为数颇多的不同的军人，当然有不同的利益，而且就个人而言也是形形色色的。我要说，从意识形态和军事的角度而言，苏联军官具有无可比拟的有利条件，与我们的游击队员和我军部队指挥员建立起直接和友好的联系。然而，西方盟国在武器和装备方面提供

---

① 事实上，正如卡德尔所叙述的那样，迪金使团降落后，克罗地亚总司令部起了中间人的作用，迪金使团后来又安排了麦克莱恩使团的到来。

② 菲茨罗伊·麦克莱恩于1943年9月17日在姆尔科尼奇—格拉德附近的解放区降落。过了一段时间，他前往开罗汇报，在那里他受到丘吉尔首相的接见，丘吉尔当时开完德黑兰会议途经开罗。麦克莱恩于1944年1月重新返回南斯拉夫，与他一起前来的有鲁道夫·丘吉尔（丘吉尔首相的儿子）。

的具体援助要慷慨些，而且来得也要早一些<sup>①</sup>，这使得这些使团和我军得以建立起得体的，特别是彼此十分容让的关系，尽管我们与西方国家政府存在深刻的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差异。因此至少就我所记得，在我们的军人和西方国家军事使团的军官之间没有发生过什么比较重大的冲突。当然，在各级，从游击队的连队一直到最高统帅部，政治性的讨论、争吵和纠纷则有的是，在游击队的文艺演出和游击队的剧院里，对西方，特别是对于西方列强怎么也不愿开辟“第二战场”进行了大量的意识形态性的和政治性的讽刺。<sup>②</sup>但是这一切与其说是粗暴的政治冲突的形式，不如说是对西方列强施加政治压力的一种形式。

当然，我们十分坦率地向西方强国代表谈了自己的意见，不仅谈到第二战场，而且也谈及他们在武器和装

---

① 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在1943年10月15日至1945年5月这段时期内，从西方盟国得到：388门火炮，2,660门迫击炮，107辆坦克，13,447挺轻机枪以及137,000支步枪；而在1944至1945年期间，从苏联得到：895门火炮，3,364门迫击炮，65辆坦克，68,000挺轻机枪和重机枪以及96,000支步枪。（见《军事百科全书》，第4卷，第139页。）

② 英美军队于1944年6月6日在诺曼底登陆，这一战役开辟了第二战场。开辟第二战场的准备工作早在1942年春天就开始了。而在1943年1月丘吉尔和罗斯福举行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根据所宣布的要轴心国无条件投降的政策，决定在1944年内开辟第二战场。这次战役中的盟军最高统帅是后来的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各方面支持和援助人民解放军的可能性。我们的要求是客气的，因为我们无法强迫他们提供武器，对这一切，我们也得到了客气的回答。同时，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当时苏联大大增加了对我们军队的武器和装备方面的援助。我们以前对于他们在提供援助方面落后一事，不仅看成是我们在物质方面同苏联的合作不够，而且看成是一个反面的政治因素，因为我们的游击队员曾经以为，同苏军领导机关建立直接的联系，就意味着苏联的军事仓库向我们敞开了大门。

就这样，在进行了所有这一切谈话、讨论和争吵之后，我们最后还是不得不回到铁托经常援引的一句古老的民间谚语：“凡事要靠自己。”因为我们不能不把西方经常拖延运送武器——东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样——同我前面谈到的问题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在莫斯科会议上以及稍后在雅尔达会议上按“对半开”的原则划分在南斯拉夫的势力范围，即使不是从官方被接受和承认，起码也是被默认了。<sup>①</sup>

---

① 斯大林和丘吉尔之间的莫斯科会议是于1944年10月9日至17日举行的，而雅尔达会议则是在1945年2月4日至12日举行的。正是在莫斯科会议上，丘吉尔和斯大林就划分巴尔干的利益范围达成了协议。关于这件事，丘吉尔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当时的时机适于商谈问题，所以我说：‘我们来解决巴尔干地区的事情吧……不要为了枝节问题致使我们意见相左。就英国和俄国而论，怎样做才能使你们在罗马尼亚占百分之九十的优势，我们在希腊也有百分之九十的发言权，而在南斯拉夫方面则平分秋色呢？’”

西方国家政府当时向人民解放军提供多少武器，要解开这个谜，下面这个问题无论如何占据关键的位置：提供武器将在多大的程度上影响游击队和切特尼克之间军事和政治力量对比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他们的武器援助始终保持这样一个水平，那就是，正如我们当时所说的“使嘴巴正好在水线之上”。当然，苏联方面并没有同样的利益，并不抱有同样的意图，也不奉行这样的政策。但是存在一个对在南斯拉夫的影响实行“对半开”的协议，斯大林无论如何想在西方盟国面前显得是一个忠诚的伙伴，以便在其他某个问题上可以同样要求别人对他显示忠诚。

鉴于盟国的使团前来时其受权事先就受到限制，即只负有解决向人民解放军提供武器、装备和食品方面的援助的任务，对于我们来说，这些问题是同西方国家军事使团以及同苏联使团的一切谈话和谈判的中心话题，在苏联方面不那么存在善意或者恶意的问題，更多的是

---

丘吉尔从莫斯科回去后，1944年10月27日在下院说，他同斯大林“就棘手的巴尔干问题达成了圆满的协议”。丘吉尔当时说，“我们就所有这些国家，即就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分别地以及就所有这些国家整个地达成了很好的工作协议，以便集中力量对付敌人，以便确保战后的协议，如果可能的话。”

莫斯科《真理报》1944年10月21日发表文章说，“苏联和英国一致同意在南斯拉夫奉行共同的政策”。

存在某种依存性，即某种估计，看苏联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用武器、装备和其他物资支持南斯拉夫，而同时又不会大大削弱反希特勒联盟内部的团结。

在战争的结束阶段，我军从苏联政府得到的武器和装备方面的援助，无论就其质量还是数量而言，都是十分重大的。很难设想，没有这一援助，我军能完成它所完成的任务，从斯雷姆战场起一直进军到的里雅斯特和科鲁什卡。

与此同时，西方列强对南斯拉夫的不信任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因此，事实上，南斯拉夫不断地受到两种政策的压力：西方的政策，其主要目的是要为在伦敦的王国政府和国内的南斯拉夫革命政府之间达成某种不论是什么样的协议创造条件；以及苏联的政策，其主要担心是我们对待西方列强过份独立，致使西方列强出于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同苏联的利益发生冲突。如果考虑到震撼反希特勒联盟的矛盾，今天是不难理解各大强国之间的这种利益冲突的。但是，大国之间的关系中的这种状况却使南斯拉夫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

当两支军队在索查河和的里雅斯特相遇时，产生了极其紧张、极其危险的局势。我军先于西方国家的军队到达索查河。我们当时的考虑是，炸毁索查河上的桥梁，固守河岸，或许是英明的。然而，丘吉尔以前对于的里雅斯特问题的全部观点，他和亚历山大在敞开所谓卢布尔雅那大门方面的言论等等，而特别是这样一个事

实：苏联政府对于索查河和的里雅斯特问题没有说过一句话，没有表明站在我们一边或站在英国一边，这种情况使我们进退两难。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可能指望得到苏联的坚决支持，而考虑到以前的协议，我们在琢磨，即便得到了支持，这种援助会走多远，也就是说这种支持会有多强大，多坚决。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丘吉尔在索查河上挑起冲突，并使之扩大，从而提出敞开卢布尔雅那大门的问题，这对于我们，特别是对于斯洛文尼亚来说，将会是灾难性的。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可能性是完全现实的。

当然，对于丘吉尔来说，从政治角度来看，采取这样的行动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他十拿九稳，在当时，正当苏军向中欧和德国挺进的时候，不论苏联向南斯拉夫提供什么样的援助，都不会越过保持反希特勒力量的基本团结的界线。在这样的形势下，既然我们不想冒十分巨大的风险，我们就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决定接管的里雅斯特和其他新解放区的政权，一直到蒙法尔科内（特尔日奇）地区，因此我们未能阻止盟军越过索查河。稍后，丘吉尔给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发来了一份粗暴的最后通牒<sup>①</sup>，它证明我们的做法是正确的，丘吉尔

---

① 关于这份最后通牒以及随之而来的事件，卡德尔曾在电视台的《我们这五十年》这个节目里说过：“1945年5月，英美给了我们一份最后通牒……我们明白，他们不只是为了的里雅斯特而威胁我们，这种威胁还意味着对南斯拉夫革命进行武装干涉的危险性。”

要求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不仅从的里雅斯特地区，而且从他自己确定的从普拉到索查河这个广阔的地区撤退。

---

与1945年的的里雅斯特危机有关的事件的简要经过如下：

- 1945年5月1日，南斯拉夫军队解放的里雅斯特、戈里察和特尔日奇。同一天，意大利政府照会盟国，要求对尤利亚地区享有行政管辖权。亚历山大元帅声称，南斯拉夫政府企图通过占领的里雅斯特“使国际大家庭面临既成事实”。5月2日，南斯拉夫军队在索查河与盟军会师。部分盟军开进的里雅斯特。
- 5月12日，杜鲁门给斯大林一份照会，就“铁托在尤利亚地区的行动”表示不安。丘吉尔同意杜鲁门的意见，认为“我们应当准备考虑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来促使铁托撤退”。丘吉尔在致亚历山大的信中说：“你可以指靠有关的全部18个师。”
- 5月15日，英国和美国政府给民主联邦南斯拉夫一份最后通牒式照会，要求南斯拉夫军队在48小时以内撤退到摩根一线以东。5月16日，杜鲁门声称：“应当等待关于我们致贝尔格莱德的信件的消息，然后再决定，如果我们的军队遭到攻击，我们使用什么样的兵力。”
- 5月19日，铁托向南通社发表谈话，说“南斯拉夫准备在作为盟国的南斯拉夫不受侮辱和不失体面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和达成谅解”，而民主联邦南斯拉夫政府的声明说，“南斯拉夫军队有权留在自己解放的国土上”。
- 5月21日，杜鲁门就此发表声明，说“我们应当拒绝铁托的回答，并立即加强我们的军队，以免南斯拉夫对我们的意图产生怀疑”。
- 5月22日，卡德尔从贝尔格莱德写信到萨格勒布给铁托，谈到与西方盟国关系紧张，西方盟国在准备撤退它们的大使馆和军事



对于这份最后通牒，苏联政府保持缄默，我们别无他途，只好接受，因为不然的话，我们的损失会更大。

---

使团成员以及出现了名副其实的战争气氛等情况。他向铁托报告了他所提出的谈判建议。同一天，我们第4集团军与英军在戈里察（即奥地利的克拉根福——译者注）以东发生了武装冲突。

- 5月23日，经铁托同意，卡德尔打电报给第4集团军司令部：“坚守阵地……同时避开一切挑衅。”
- 5月27日，铁托在卢布尔雅那发表讲话，说“我国各族人民想在各个方面保持独立，为什么就说他们有罪呢？为什么要对这种独立加以限制或者提出异议呢？我们不想依附于任何人……对于这个南斯拉夫，休想从中谋利，休想做交易。”几天之后，苏联大使萨奇科夫就铁托的讲话在贝尔格莱德向卡德尔提出了尖锐的抗议。
- 5月28日，卡德尔写信向铁托报告，对于南斯拉夫的照会没有收到任何答复，局势趋于平静。
- 6月2日，英美两国政府在致民主联邦南斯拉夫政府的照会中要求南斯拉夫军队从的里雅斯特地区和斯洛文尼亚部分沿海地区（摩根线）撤退。
- 6月9日，南斯拉夫、英国和美国就尤利亚地区的占领和临时行政管辖权以及南斯拉夫军队撤至摩根线以东一线签署了条约，6月12日，南斯拉夫政府就签署这一条约一事发表声明。同一天，卡德尔在卢布尔雅那发表谈话说：“人数不多的斯洛文尼亚人民在欧洲第一个放弃成为自己土地上的主人。”
- 6月20日，签订德温协定，补充解决了与6月9日协定有关的某些问题。

## 筹组临时政府和召开立宪议会

### 铁托—舒巴希奇协议

但是，与首先是在军事和政治方面发生所有这些事件的同时，在南斯拉夫政治领导、西方列强和苏联政府之间展开了紧张的政治活动。我已经说过，盟国的那些联络官没有得到任何特别的授权来同我们进行谈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事实上没有转达盟国政府以及我国政府的政治立场。他们是带着与我前面谈到过的主张没有多少区别的精心考虑的基本政治主张来到南斯拉夫的。

换言之，盟国政府始终要求以彼得国王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为一方、以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为另一方两者之间达成协议。协议的基础则应是承认彼德国王的权力，承认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为军队的最高统帅，同时他们还要求承认伦敦流亡政府为南斯拉夫合法政府。他们并未提出，但却可以从他们的建议中猜到的让步是，由流亡政府的成员和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的成员，即由南人解委员会提名的人士组成联合政府。在是否让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享有最高指挥权方面，他

们也没有把门完全关死。

当然，对于我们来说，所有这些建议，从原则上说，整个地来看，是可以接受的。我们认为这些建议不包含，不提供在这一基础上进行谈判的任何可能性。首先，我们堵死了彼得国王回国和承认流亡政府为目前的南斯拉夫合法政府的任何可能性。

就这些问题进行的谈判的整个过程，我还记忆犹新，不论是与盟国军官们的谈判，还是与南斯拉夫王国政府首相舒巴希奇的谈判都是如此。因为当琼斯少校作为盟军派驻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第一任正式代表在利卡降落时，我正在克罗地亚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后来，我几乎一直在最高统帅部，或多或少参加了所有的谈判，有几次谈判还是我主持进行的。在设在解放区，后来设在维斯岛的最高统帅部进行了谈判，与此同时，我们的代表，特别是弗拉特科·韦莱比特还同伦敦的王国政府代表就同一些问题或类似的问题进行了谈判。

就紧张程度而言，我们在维斯的时候，谈判达到了高潮。舒巴希奇于1944年6月初抵达维斯，他在全国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一项协议草案，未被采纳，因此全国委员会建立了一个小范围的工作小组，其成员有弗拉迪斯拉夫·里布尼卡尔、约西普·斯莫德拉卡和我。这个工作小组起草了一项新的协议草案，后来作了不大的补充和修改，铁托和舒巴希奇于1944年6月16日在维斯签

署了这项协议。①

在此期间，舒巴希奇本人还曾多次造访铁托，同铁托谈了话。很可能他向铁托提出了在小范围的工作小组中已经提过的同一些建议和同一些论据。然而，他从铁托那里听到了，得到了与在工作小组里一模一样的答复。但是他同铁托的这些谈话对于工作小组工作的进展是很有益的。因为当舒巴希奇确信铁托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革命的南斯拉夫的政治领导是团结的之后，就变得越来越退让了。

开始时，舒巴希奇和与他一起来到维斯的英国大使

---

① 通过铁托—舒巴希奇的这个第一个协议，双方一致同意“尽快建立国家统一的代表机构”，“关于解决国家体制的最终决定将在全国解放之后由人民作出”。协议还确定，舒巴希奇政府将发表宣言，宣布承认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三年斗争中所取得的民族民主成果，承认南人解委员会和南全解委员会的临时行政管辖权，而铁托作为南全解委员会主席将发表声明，宣布同舒巴希奇政府合作。

铁托—舒巴希奇的第二个协议（1944年11月1日）规定，为了保持国家的连续性，在未来的民主联邦南斯拉夫经由人民自由的决定获得最终的治理形式之前，在全世界面前以及在所有对外政策文件中，南斯拉夫继续以原来的形式出现。另外还规定，新政府在组成之后将发表一项宣言，这项宣言根据南人解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决议将包含并保障民主权利、财产权、各族人民的主权和平等权利，排除一个民族对别的民族的优势地位。协议还规定了未来政府的组成，即规定了政府各部的数目。

史蒂文森一再坚持，史蒂文森要参加所有的谈判。我们坚决拒绝了这一要求。我们说，伦敦王国政府和南斯拉夫革命政府之间的谈判完全是南斯拉夫的内政，任何外界力量都不得干预南斯拉夫的内政。就这样，在我们的坚持下，丘吉尔、史蒂文森和舒巴希奇终于作了让步。

谈判开始时最困难的一个问题是彼得国王，即君主制未来的地位问题。西方国家政府也意识到实际上不存在彼得国王回国的任何可能性，这不只是由于共产党人，而且也是由于绝大多数人民的情绪，看来它们最后也认清了，南人解委员会在第二次会议上确定的方案，即彼得国王、君主制的问题留待战后在人民作出民主决定的基础上来解决，对于它们来说，也是最能接受的方案。我们共产党人当时从官方来说既没有表示拥护君主制，也没有表示赞成共和制，尽管谁都明白，我们将为实行共和制而斗争。

第二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就是建立由流亡政府成员和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成员组成的联合政府，尽管有种种障碍，这还是比较容易解决。我想，至少在原则上是这样。那时就清楚，主要问题将产生于讨论临时联合政府的组成和南人解委员会的组成的时候，根据协议，南人解委员会将予扩大，办法是吸收逃往伦敦的战前政权的代表人物参加。①

---

① 参看附件第194页。

当时来到维斯的还有伦敦政府的其他几位成员——萨瓦·科萨诺维奇等人。伦敦政府的另一批成员是后来在已经解放的贝尔格莱德同第一批人会合的。在所有这些人中间，萨瓦·科萨诺维奇的立场最明确最正直。实际上，他从会谈一开始起一直到结束，始终支持我们，他事实上不断地同舒巴希奇发生冲突。一个难办的人物是米兰·格罗尔博士。他是法学家，是一个享有巨大声望而又很有主见的人，但却是一名反动的右翼政治家，他与我们几乎可以说在任何一个问题上的意见都不一致。

谈判在维斯岛继续进行，而结束于解放了的贝尔格莱德，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和伦敦王国政府于1944年11月1日签署了第二个协议。这个协议决定，在由人民通过民主的决定解决南斯拉夫成为共和国或者重新实行君主制之前，国王的某些特权暂由专门的摄政委员会，即三名成员组成的王国摄政委员会行使。<sup>①</sup>

与谈判第一个协议时一样，这一次的谈判开始时是由铁托主持的，他也经常参加，常常同舒巴希奇接触。但是我们的政治领导机构指定我与我们的其他几位同志一起，负责日常的会谈和讨价还价，负责会谈事宜。

关于摄政委员会的组成，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我

---

<sup>①</sup> 彼得国王根据1944年11月1日的协议，于1945年1月29日作出了将国王的权力转交摄政委员会的决定，并于1945年3月2日作出了关于任命摄政委员会成员的决定。

记不起我们方面或者伦敦方面提出的为数众多的摄政委员会成员候选人的名字了。我们决意不让摄政委员会成为能够干预政府重大政治决策的一个重要政治因素，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不让步的。也就是说，我们坚持，摄政委员会首先是一个代表机构，而不是一个制定重大政治决策的机构。我们坚持认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它有什么样的组成就不那么重要。然而，我们认为，摄政委员会的组成必须是能为我们人民解放区的公众所接受的，要是突然由一个反动的摄政委员会出来领导国家，我们人民解放区的公众会感到极其失望。

谈判很艰苦。最后，我们总算取得了一致意见，总的来说，双方都对作出的决定感到满意。我认为，促使伦敦王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对国王摄政委员会这样的组成表示同意的是他们存有一定的幻想，他们的出发点是，摄政委员会的这些成员过去在政治上同左派的活动没有什么关系，他们过去也不倾向于共产主义。

成员之一是安特·曼迪奇博士<sup>①</sup>。他是一名律师，

---

① 安特·曼迪奇在旧南斯拉夫的政治生活中没有起过什么作用，因为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他住在当时属于意大利的奥帕蒂亚。在意大利投降之后，才去解放区，在此之前，他参加了奥帕蒂亚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工作。1943年10月，他当选为克罗地亚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参加了该委员会在普拉什科举行的第二次会议。1943年11月，他作为代表出席了南人解委员会在亚伊采举行的第二次会议，并被选进南人解委员会主席团。然而，游击队一直都把他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代表”。

在旧南斯拉夫是主张成立以一个民族为主的政府和实行中央集权制而出名的人物，同时，他又是坚定的反共分子。在战争爆发前的几年里，他对于贝尔格莱德政权感到失望，脱离了政界的活动，但是谁都不能说他对共产主义有什么好感。

摄政委员会的另一名成员是杜尚·塞尔奈茨工程师<sup>①</sup>，他同样曾是反动政治团体的成员，顽固地主张成立以一个民族为主的政府和实行中央集权制，一度曾在亚历山大国王“一月六日专政”时期的政府里任大臣。他曾当了几年的王国“德拉瓦巴昂辖区”的“巴昂”<sup>②</sup>，而当时对共产党人和其他民主力量进行了特别残酷的迫害。

这个委员会的第三名成员是斯尔詹·布迪萨夫列维

---

① 杜尚·塞尔奈茨是斯洛文尼亚平民党国民议员，从1927年起任建筑大臣。1929年任“德拉瓦巴昂辖区”的“巴昂”，1930—1931年任森林矿产大臣，后为建筑大臣。1941年4月战争爆发后，加入解放阵线，曾为解放阵线最高全体会议的成员。1943年夏天转到解放区。在科切夫耶大会上当选为斯洛文尼亚人民解放委员会委员和出席南人解委员会会议的代表，于1943年11月30日被任命为南全解委员会财政委员。

② “巴昂”为南历史上某些地区行政长官的称呼，相当于总督或省长。——译者注



奇博士<sup>①</sup>，他是以前的大臣，也是以属于右翼集团和主张成立以一个民族为主的政府的政界集团而闻名。

请看，这些人在战争爆发前担任的是些什么样的职务。然而，南斯拉夫被占领后，爱国主义的感情在他们身上占了上风，他们加入到唯一有能力进行反占领者的斗争、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这一斗争的力量，也就是加入了人民解放运动中来了。前两位（曼迪奇和塞尔奈茨）在战争一开始就参加了人民解放阵线。我们之间以前存在过的一些误会被忘却了。尤其是他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竟然还有勇气在后来——我想是在1943年——来到游击队的地区。我们一起坐在游击队控制的森林里，开了许多玩笑，谈到在他们两人手中有权的时候，在他们的警察手下，在他们的监狱里我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他们当年的一些同僚，这时多数都已侨居国外，或者站在占领者一边，有些人则聚集在舒巴希奇的伦敦政府周围，是无法想象在人民解放斗争的岁月中，这些人的思想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变化的。我觉得，伦敦的王国

---

<sup>①</sup> 斯尔詹·布迪萨夫列维奇是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族资产阶级政治家。在茨韦特科维奇—马切克政府里，曾担任内务大臣，1941年3月22日辞去这一职务，以使南斯拉夫拖延签署“三国条约”。后来，一直到1942年1月19日，在西莫维奇将军的政府里任内务大臣，以后又在斯洛博丹·约万诺维奇的政府里任大臣职务，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在这一届政府里任国内陆海军大臣职务。

政府以及英国政府之所以同意对摄政委员会这样的组成表示认可，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此。很可能对他们抱有很大的希望，结果却一无所得。尤其是，我可以这样说，这几位摄政者与其说当真地看待自己的角色，不如说把这看成是开玩笑，因为他们本身都是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成员。

例如，安特·曼迪奇博士有一天走进我的办公室，对我说：

“你知道，那些捣蛋鬼给我干了些什么事？”

“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问他，因为我担心当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对我说：“他们在我的门上钉了块‘国王的雇员’的牌子，而不是钉‘国王摄政者’的牌子”，说完了，他由衷地哈哈大笑起来。<sup>①</sup>

围绕临时政府的组成的谈判也是按照类似的方式进行的。这里的问题并不主要在于人选上，因为很清楚，舒巴希奇将提名自己的大臣参加临时政府，而我们没有站得住脚的理由来拒绝他们中的任何人。比较艰巨的是围绕如何分配各部的问题而展开的斗争，不过我们终于也就这一点达成了协议。在新的临时政府里<sup>②</sup>，我被任命为副总理和负责立宪议会的部长。

所有这些努力和会谈的最后阶段是南人解委员会的

---

① “雇员”原文为NAMEŠTENIK，“摄政者”原文为NAMESNIK，很相近。——译者注

② 临时政府于1945年3月7日组成。参看第80页脚注。

扩大。我们就吸收侨居国外的和国内并不拥护人民解放运动的部分人士的问题达成了协议，以扩大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使南人解委员会在新的大选之前起到议会权力机关的作用。同时还决定尽早着手制订新宪法。

我无须特别强调指出，英国政府，与它在一起的还有美国政府，以及苏联政府，都参与了所有这些谈判的过程，而且不只是在表面上参与。它们的活动首先是着眼于加速所有这些谈判，尽快建立临时联合政府。

### 与斯大林的第一次谈话

有一天，大概是在11月份，铁托突然把我叫去，他说：

“你明天就与舒巴希奇一起去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和斯大林会谈。”我感到这完全出乎意料。再说我也没有准备。我身上只有一身从军队里穿来的游击队服装和一双缝补过的笨重的军靴；我没有别的服装，不论是便服还是军服，都没有。我说，我至少得有几天时间，为此行作准备。但是铁托向我解释说，出于他所不了解的原因，斯大林要求刻不容缓地对莫斯科进行这样一次访问，因此邀请铁托和舒巴希奇一起去见他。鉴于铁托在前线的事太多，还要处理国家内部发展的其他种种问题，他不愿作此行，指定由我代替他参加会谈。

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听凭命运摆布了。就这样，舒巴希奇和我第二天登上一节客厅式车厢，经由罗马尼亚前往苏联。舒巴希奇漂漂亮亮地穿了一身社交场合穿的服装，而我脚蹬一双军靴，身穿一套肮脏的游击队制服。我们走了很长时间，走走停停，因为有大批苏军沿着同一条铁路开往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只是方向相反罢了。

在莫斯科，我们受到了隆重的接待；无须我说，站在穿戴雅致的舒巴希奇旁边，我是什么滋味。

当时，在我们访问莫斯科期间，临时政府还没有组成，舒巴希奇代表伦敦的王国政府，而我则代表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

斯大林开始时与莫洛托夫以及苏联其他一些官员在一起十分客气地接待了我们，但是我很快就看清楚，他与舒巴希奇谈话是一种态度，而与我谈话则又是另一种态度。总的来说，我得到的印象是，整个谈话的目的是使舒巴希奇尽可能地喜欢斯大林的观点，以便让他把这些观点转告丘吉尔。

我们首先向斯大林通报了两个政府之间的谈判的情况；我们向他解释了双方的态度之后，他很快就转而对我们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对人民解放运动领导的政策进行直接而公开的攻击。开始时他提出了关于彼得国王的问题。他比较客气地，但还是公开地对我们说，我们心胸狭窄，我们是宗派分子，因为我们不同意彼得国王回

南斯拉夫。斯大林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国王们毫不足道。他们在社会上不起任何特别的作用，仅仅充当代表而已。接着他详细地向我们解释了罗马尼亚国王米哈伊洛的例子，他说，他们同米哈伊洛国王达成了很好的协议。

我回答他说，米哈伊洛国王与彼得国王完全是两码事。米哈伊洛国王只对罗马尼亚在战争中站在希特勒德国和轴心国一边承担部分的责任，而彼得国王则是与切特尼克的活动，切特尼克的暴行，与我国哪一个民族也都不愿意接受的塞尔维亚资产阶级霸权联系在一起的，他要对勾结占领者的行径，要对最恶劣的卖国活动负责。此外，他的回国不会只是某个表面的代表性行动。他的回国同时意味着南斯拉夫绝大多数各族人民四年来流血斗争并牺牲了一百五十多万人所反对的一切行将复辟。如果我们这么做，如果我们允许彼得国王回国，我国各族人民就会把我们看成是欺骗了他们，使他们的期望落空的叛徒。

正如我在同斯大林的所有谈话中所看到的那样，对于我所提出的异议，斯大林变得局促不安，他又对我们提出了多少是相同的批评，只不过形式更尖锐罢了。我想舒巴希奇听到对我们游击队的批评，一定是很高兴的。

斯大林接着转向另一个领域提出批评。他问我，我们有多少游击队，也就是有多少武装的军人，因为当时

他们已不再是游击队，而是正规的、组织良好的军队，这支军队独立地据守着从伏伊伏丁那到达尔马提亚的整个战线。我回答说，我们大约有30万士兵。斯大林挥了挥手，笑了笑，大致说了这么一番话：

“什么30万呀？我知道你们这些游击队的数字。我们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当我们问那里的游击队指挥员，他们有多少人手执武器，他们回答说，有3,000人，而当我们派军官到那里去领导这些游击队的时候，结果是他们最多才几百人或者还要少一些。”斯大林接着说：“此外，你们的游击队打得不好。他们还没有闻够火药味。看看保加利亚人吧，那才是名副其实的军队。”

对于这一点，我回答他说，对于我们来说，保加利亚人无论如何不是榜样，因为据我们所知，他们是斯雷姆—伏伊伏丁那战线上的主要包袱。至于说南斯拉夫的游击队，我说，他们四年来有足够的机会来闻火药味；这支军队是斯大林能够依靠的，它牢牢地据守着自己的阵地。它之所以没有取得更大的胜利，这主要是由于它没有相应地武装起来。因此我顺便对他说，铁托请求他根据以前达成的协议提供更多的武器。

斯大林又回到先前的问题，重申关于与南斯拉夫流亡政府达成协议和彼得国王的地位，我们必须考虑到反希特勒联盟的团结。他大致说了这样一番话：“你们不光是你们自己，因此你们不能象光有你们自己那样行

事。”他又说了下面这样一番话作为解释，他说，他和丘吉尔就西方国家在安排巴尔干国家的内部关系和国际地位方面的影响，也就是就苏联和西方国家政府关心的是哪些国家达成了协议。对于南斯拉夫，他们商定，各方所占的影响的比例是一半对一半，这时他做了一个两个手指交叉的动作。

当然，对于我在这里所援引的每一句话，我无法保证没有差错。因为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外交部和中央委员会的文件在1948年至1950年期间部分地“丢失”了，当时我们把档案材料从贝尔格莱德转移到其他地区，以免毁于可能爆发的战争，因为当时斯大林用战争来威胁我们。但是谈话的实质内容如上所述。

斯大林的所有这些批评，特别是斯大林关于他与丘吉尔就按照“对半开”原则划分在南斯拉夫的影响一事达成协议的话，开始时使我震惊不已。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以免使情况变得更糟。我当然相信斯大林所说的不是指对南斯拉夫国内的情况划分影响，而是指在安排巴尔干国家的国际地位方面划分影响，尽管如此，对于这一切，特别是对于他批评我们对彼得国王和伦敦的王国政府的最初几句话，我觉得那个“对半开”还是不那么干净。我本想说，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决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来划分影响，不论是对他们的对内政策的影响，还是对他们的对外政策的影响，而是将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我觉得使这场讨论和这个问题激化的任何做

法，都只会使我们的处境变得更糟。因此我只是比较平静地回答说，南斯拉夫准备为了维护反希特勒联盟的团结而承受一定的牺牲，它与联盟的其他成员一样，对联盟的团结是关心的，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它的限度。我们不能作我国人民无法理解无法接受的让步。

听了我这番话，斯大林挥了挥手，大致说了这样一番话：“当然应当听从人民的意见，但是也应当懂得说服人民。如果你们做了努力来说服人民，你们的人民就会理解你们想干什么，就会支持你们。”

在整个这段时间内，舒巴希奇对谈话没有插多少嘴，只是不时说一两句话，支持斯大林的论点。不过，他也没有必要说话，斯大林维护舒巴希奇的论点比舒巴希奇本人做得还要出色。为了最后中断这场令人不愉快的谈话，我说，我没有受权在这里就任何问题进行商谈，我将忠实地向我们的政治领导汇报谈话的情况，特别是斯大林的建议，然后由我们的政治领导来决定，在这些问题上将采取什么样的立场。

我不知道我是否想错了，不过我觉得，斯大林对我们采取这样一种咄咄逼人的态度，一大部分原因在于铁托没有与舒巴希奇一起前来与他会谈。那时他的计划或许会是另一副样子：他会倾全力迫使铁托投降，接受他的要求。当然，铁托完全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根本就不去莫斯科。

斯大林还指责我们，说什么我们，甚至我们的最高



领导人诋毁红军。实际上这指的是，我们最初把与苏军，特别是保加利亚军队的一些军人的行为有关的令人不愉快的事情通报了苏联大使，这些事情影响了红军在南斯拉夫土地上所受到的十分殷勤的接待。这里指的是这两支军队在南斯拉夫挺进时奸污妇女。后来，吉拉斯在与苏联某个官员谈话时提出了这个问题。关于这一点，斯大林说，苏联军人不干这种事，要是有什么地方发生这种事的话，那也是很自然的，军人们也没有给哪个“婆娘”干下什么坏事。我说，这种事对于苏军在南斯拉夫所受到的兴高采烈的接待所造成的影响很坏。此外，我又说，大家都在说，保加利亚军队整卡车整卡车地把缝纫机和其他家具运回国，这不能使人对保加利亚军队产生好感。斯大林突然中断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谈话，又回到别的问题上去了。

谈话于是进行得比较平静了。我们简短地谈到战场上的情况，随后斯大林比较仔细地询问了南斯拉夫的局势，包括政权系统的建设。他一再提醒，应当特别重视保卫人民解放运动和军队的领导机关，特别是保卫铁托和其他领导人。我说，我们自己也十分注意这一点，我们是考虑到这一点的，到目前为止，敌人还没有打进我们哪一个总司令部或者打进政治领导中心。我还告诉他，在这方面，我们还利用别的国家，特别是苏联的知识，我们自己也积累了许多经验，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对自己是没有什么好责怪的。我补充了这一番话首先

是因为我觉得斯大林的意见是不应当对我们讲的，是一种责难。

整个谈话进行了大约两个小时，或许更长一些。谈话还涉及其他一系列问题，我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斯大林几乎完全冲着我讲话，与我辩论，对于舒巴希奇，他只是不时提一两个礼节性问题。舒巴希奇只是当作谈话的见证人坐在那里。

斯大林对我们的人民解放斗争和我军的看法，使我感到极其不满，我认为他的看法是完全估计不足的和不公正的，这是我那时从斯大林那里最没有料想到的。因为在欧洲唯有我们的人民解放运动达到了这样的规模，大大帮助了反希特勒联盟，特别是苏联。

顺便我考虑了，斯大林出于什么、为了什么得出了这样的评价？这样的评价是从哪里来的？我得出结论，斯大林这样讲话是为了使舒巴希奇和丘吉尔感到满意。不过，我丝毫不喜欢这种背信弃义、这种不忠诚的态度，不喜欢以这样的方式来搞政治。当时我并不感到奇怪，斯大林出于什么原因，要采用这样的方法，对任何人都不信任，甚至连我们也不信任。我可以这样说，从那时起，以至以后，对我来说，斯大林已经不是以前的斯大林了。

舒巴希奇和我除了与斯大林会晤外，还同莫洛托夫单独会晤。同他的会晤是例行公事式的，因为要讲的一切在与斯大林会晤时都说了，对于我们与斯大林会谈过的问题，莫洛托夫没有什么好补充的。

这次邀请我们去莫斯科，目的显然只在于向丘吉尔表明，斯大林在竭力说服南斯拉夫人，尽可能充分地实现铁托和舒巴希奇的协议。同时，斯大林心里所想的、所希望达到的恰恰相反；而他在谈话时的粗暴态度，他对人民解放运动及其领导采取贬低的态度所冒的风险是不大的，因为斯大林完全明白，南斯拉夫共产党和人民解放运动不会为了别人的利益而去牺牲在艰巨的人民解放斗争中用许多最优秀的战士以及全国人民的鲜血换来的一切。正因为如此，在舒巴希奇不在场的时候，斯大林显得是顺便说说的样子说：“对于这个问题，你们为什么感到那么不安？以后你们想怎么处置这个国王就可以处置他。”我对他说，解决这个问题的这样一种方式会使我国人民很反感，我们这么做的话，无疑会在政治上受到沉重的打击，同时又会使反革命的反对立场得到加强。

斯大林十分担心西方国家的军队驻守在南斯拉夫领土上。他担心地问我，铁托允许西方盟国的一些兵力在杜布罗夫尼克登陆<sup>①</sup>一事是否属实？我对他说，涉及到

---

① “经最高统帅部同意，1944年10月底和11月初，英国第43突击队、一个野战炮兵营、一个海军炮兵连和一部分工程兵在杜布罗夫尼克附近的格鲁日登陆。在杜布罗夫尼克开设了一家军医院。英国的所有部队和机关于1945年1月离开南斯拉夫领土。”（见《军事百科全书》，第2卷，第571页。）约西普·斯莫德拉卡在自己的《游击队日记》一书中说：“英国人在杜布罗夫尼克保持5,000名（无所事事的）炮兵，（铁托）元帅只允许他们登陆3,000人”。

的是携带我们从西方国家政府得到的武器登陆的几百人。他平静下来了，但是并没有完全平静下来。他问及铁托，总的来说表示他是关心铁托的，尽管考虑到他在谈话开始时所谈的内容和谈话的方式，看上去并不是这样。

斯大林不时转而谈到与谈话本身没有什么关系的一些问题。例如，他突然问我：“你是斯洛文尼亚人，不是吗？”

我说是。

斯大林就说：“你们的知识分子很糟糕。”

我对他说，我不能同意这一看法，因为大部分斯洛文尼亚的知识分子参加了游击队或者以其他某种方式帮助游击队。例如，我们游击队里有足够的医生，可以满足我们游击队的全部需要。我们有最优秀的画家、作曲家等等，他们都武装了起来，在人民解放军的连队和营里战斗。

斯大林又挥了挥手，大致说了下面这样一番话：“是的，是的，我知道，我知道，但是这是爱国主义战争的状况，如果局势改变了，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变化。我了解小国人民的知识分子，他们全都彼此相似，我们格鲁吉亚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

我没有与斯大林进一步讨论知识分子问题，但是后来，在战后，我曾多次问自己，多次考虑一个问题：就部分斯洛文尼亚知识分子而言，斯大林或许是对的？

谈话之后，那天晚上，莫洛托夫在“斯皮里多诺夫”官举行了宴会。这次宴会十分隆重。我在莫斯科逗留和在共产国际学校工作时期所认识的许多人都出席了。<sup>①</sup>有意思的是，在宴会进行过程中，前红色工会国际主席、苏联共产党领导人之一洛佐夫斯基担惊受怕地几乎是跑着走到我身边，对我说：

“我读了你写的《国际局势笔记》。这确实是一篇有意思的文章。你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论点。只是我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我不知道‘老头子’（斯大林）会对这篇文章说些什么，因为他还始终认为英国是世界帝国主义中心，是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而美国只起次要的作用。你却断言，世界帝国主义中心已从英国转移到美利坚合众国，英国已不再是世界帝国主义实力的中心。”

我们两人在交谈的时候，马伊斯基大使走到我们身边，他听了一会儿我们的谈话，接着说：“卡德尔同

---

<sup>①</sup> 爱德华·卡德尔1934年11月至1936年底曾在莫斯科逗留。他在国际列宁学校学习，在共产国际南共部工作。在同一所学校里以及在西方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大学里，他讲授过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史和共产国际史以及南斯拉夫工人运动史。

作为在莫斯科的南共积极分子，他参加了1936年8月的党的会议，这次会议作出决定：南共领导转回国内。根据铁托向南共中央提出的让卡德尔尽早回到国内工作的要求，他于1937年初从莫斯科回到国内。

志，你说得对”，并转身走开了。从马伊斯基的这话中可以看出，他对于斯大林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

在我们离开莫斯科的时候，在月台上又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整个仪式包括检阅仪仗队，乐队奏乐，但是也显得可笑，因为这是为穿戴漂亮的舒巴希奇和身穿游击队制服的我举行的，我穿着这一身制服刚离开森林不久。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教训。我一回到贝尔格莱德，就做了一套新衣服，定做了一双新皮鞋，以备诸如此类的场合穿用。

我回来后向铁托和其他同志叙述了与斯大林的谈话是一次什么样的谈话，谈话的内容使他们感到伤心，但是也使他们感到不安。事情很清楚，在国内为实现铁托—舒巴希奇协议而进行的斗争将是一场十分艰巨的斗争，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不会得到苏联的巨大援助，而对苏联的援助，我们本来是寄予最大的希望的。

我们分析了斯大林的态度，大家得出一种看法，认为斯大林不过是在玩弄手腕而已，不值得为了这件事而专门与他吵架，我们得出结论：就目前而论，我们最好是保持沉默。我们当时认为，斯大林使用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手腕同西方列强较量，还是为了帮助我们。当然，我们得出这一结论，不仅是根据我同斯大林的这次谈话，也是根据铁托以前与他的谈话。再说，我们的关系，包括经济关系在内，发展得比较正常，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给这样的事态制造任何麻烦。

## 新南斯拉夫的第一部宪法

随后的几个月里，有四大任务压在我身上：第一，有关澄清铁托—舒巴希奇协议的工作；第二，组织国家行政机构；第三，草拟宪法以及第四，为和会，也就是为和谈作准备。根据我们当时在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里的内部分工，我还负责贯彻执行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即负责我们的对外政策机关的工作。因此，日常的对外政策事务也使我很忙。鉴于当时的外交部长不是党的领导成员——当时由不是党的领导成员的人担任这样的职务是司空见惯的——铁托曾多次任命我为与外交部长一起到国外进行会谈的南斯拉夫代表团团长<sup>①</sup>，关于这一点我下面还要谈到。

---

① 1944年底和1945年初，约西普·斯莫德拉卡博士在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中任外交委员。民主联邦南斯拉夫临时政府于1945年3月7日成立，伊万·舒巴希奇博士被任命为外交部长，他担任这个职务一直到1945年10月8日辞去临时政府中的职务为止。在舒巴希奇辞职后，外交部长一职由铁托担任，一直到1946年2月1日，当时根据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宪法组成了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这一政府中，斯塔诺耶·西米奇被任命为外交部长。

西米奇担任外交部长一直到1948年8月31日，这时爱德华·卡德尔当选这一职务。卡德尔担任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职务一直到1953年1月14日为止。

当讨论宪法问题提上日程时，在临时政府中，前伦敦王国政府成员和前南全解委员会成员之间就产生了最初的争执。实质上只有两点是有争论的，但这两点却是根本的和决定性的。第一，国王彼得·卡拉乔尔杰维奇二世返回南斯拉夫的问题，也就是就实行君主制还是建立共和国的问题举行公民投票。我们担心的不是举行这样的公民投票的结果，而是这样的公民投票本身。<sup>①</sup> 我们确信，人民解放运动取得胜利之后所笼罩的那种和平气氛和团结气氛不丧失殆尽，也会遭到破坏，而围绕这次公民投票展开斗争的话，在君主制的拥护者——同时意味着反解放运动的拥护者以及占领者和西方列强的其他所有盟友——和共和制的拥护者之间又要展开激烈的冲突。此外，在战争期间，我们一再谈到建立共和国，以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哪怕只在妥协上迈出一步，拥护人民解放运动的人就会把我们看成是叛徒。

第二个有争论的问题，简言之，涉及建立在自治民主的人民委员会基础上的民主人民政权或议会。反对派一再要求解散人民解放委员会和一切类似的机构，要求建立多少是老式的国家机构，而这意味着建立以县和县长为整个制度基础的行政机关。只有整个战争时期是在国外度过的人，只有不了解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觉悟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变化的人，才会提出这样的建议。

---

<sup>①</sup> 参看本页的附件，见第194页。



反对派在口头上是接受联邦制的，一部分人多些，一部分人少些，实质上反对派一再试图在各共和国的权利和自主性上尽量缩小联邦制的范围。

在讨论这些问题的同时，有人开始辞职。

率先辞职的是有影响的米兰·格罗尔博士、教授，他的职业是法学家，他以前写过几本法律方面的书。他被公认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尽管塞尔维亚的上层人士并不怎么看重他。他对自己的辞职的解释很简短。他说，他看清楚了，与共产党人是以任何方式都无法合作的，他不相信有任何可能来创造条件，建立他能够与团结在人民解放运动中的力量合作的那样的新社会。据我记得，除了这一番话，他还提出了一些法律上的提法，就这样，他退出了新南斯拉夫政府。我得为他说句好话，他辞职以后，没有在政治上制造什么特别的困难，尽管他在政治上也不是不活跃；但是他是可以说“脱离政治生活”的方式离开了。我与他谈过话，想说服他留在政府里，但是这次谈话很不妥当，可以说完全失败了。

伊万·舒巴希奇最后一个辞职，他在伦敦的王国政府里还算是一个人物，如果不算萨瓦·科萨诺维奇的话。舒巴希奇实际上是克罗地亚农民党<sup>①</sup>的副党魁。战

---

<sup>①</sup> 克罗地亚农民党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中是克罗地亚最强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唯一的资产阶级政党。它团结了中农和富裕农民，而从二十年代中起，资产阶级阶层接管了该党的领导，只不过表面上还保留了一块农民政治团体的招牌。该党的领

前，他在该党中被认为是比较开明的一翼，他们在战时也暴露无遗。在旧南斯拉夫投降的时候，舒巴希奇本人曾直接地以及受制于他的党的领导人和政府官员，把克罗地亚巴昂辖区拱手交给德国人，不仅把辖区内的全部权力交出去了，而且把塞满几个监狱的被捕者也交出去了，其中有它的政权在战前逮捕的共产党人。<sup>①</sup>南斯拉夫任何一个所谓的“巴昂辖区”，甚至在塞尔维亚，也都没有干出类似的事情来。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这就更多了一个理由，使我们竭力反对同舒巴希奇的伦敦政府达成协议。

舒巴希奇在向铁托提出辞职时，列举了使他不能留

---

导人在争取上台的斗争中玩弄策略手腕，常常改变自己的政治方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在克罗地亚农民党内出现了两派：法兰克派和亲西方派，前者主张克罗地亚追随罗马和柏林，后者主张在南斯拉夫的范围内来解决所谓的“克罗地亚问题”，这一派的领导人是伊·舒巴希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克罗地亚农民党中的亲西方的那部分人亡命国外，而以弗拉特科·马切克为首的法兰克派，或者叫亲德派，则给予乌斯塔什的克罗地亚独立国以道义上的支持，并向它提供干部。（参看《政治百科全书》，贝尔格莱德当代行政出版社，1975年版，第318—319页。）

① 这里指的是博日达尔·阿吉亚、奥格宁·普里察和奥托卡尔·凯尔绍瓦尼伊，他们是在1941年3月30日至31日的那个夜晚被捕的，十天以后被转交给乌斯塔什。乌斯塔什于1941年7月9日把他们与其他许多共产党人和反法西斯分子一起枪杀于萨格勒布的马克西米尔森林中。

在这一职位上的各种可能的理由；他说，他这么做不只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别人。同时他一直强调，他是尊重铁托的。但是铁托没有能够说服他继续留在政府里，就让我再试试，看能不能说服舒巴希奇。

我到舒巴希奇家里拜访他。我向他列举了许多理由，大致说了这样一番话：“当我们同意达成协议的时候，我们之所以同意，首先是为了在国内保持和平、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和维持新的局面。的确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实行议会制，但是事实是，革命新政府也为市民反对派敞开了大门，当然是以它自身的制度所允许的方式敞开的，并使南斯拉夫得以和平地进一步发展。现在，在人民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重要的不再是讨论由多数派或少数派来掌握政权，因为政权是在为人民解放而斗争的群众的手中，而是讨论使市民少数派也能得到体现，哪怕只是作为少数派也罢。这样一来，那些既不是共产党人也不是左派的公民也有条件，保证能过上公民的平等生活。”

但是说什么也无济于事。舒巴希奇最后伤心地哭得象个小孩子。他对我说，作为个人，他尊重我，但是他既不能接受我的理由，也不能接受人民解放运动所采取的方针，因此他必须辞职。他哭着把手伸给我，然后上楼了。

短命的混合临时政府事实上就这样可悲地结束了，它是根据铁托—舒巴希奇协议建立和组成的，随着临时

政府的完蛋，产生于这一协议的其他一切困难也不再存在了。

在旧伦敦王国政府中，只留下了萨瓦·科萨诺维奇、瓦萨·丘布里洛维奇和塞尔维亚的几个农民政治家，他们在新政府中也没有呆几年。唯有萨瓦·科萨诺维奇一直到去世都表现得正直而积极。

临时政府<sup>①</sup>在这样一种“残缺不全的组成”下，继续制订宪法，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我在临时政府里担任副总理兼负责立宪议会事务的部长。资产阶级反对派离开政府之后，工作要容易做得多。我们遇到一些反对，但是不是很强大。

当然，在制订宪法的同时，需要在全国组织并更好地协调国家行政机关系统，因为在解放区已经出现了各

---

① 民主联邦南斯拉夫临时政府从1945年3月7日组成起一直工作到同年11月30日，在此期间格罗尔、舒巴希奇、舒德伊等人提出了辞职。鉴于临时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准备和进行立宪议会的选举，因此，在立宪议会于1945年11月30日通过了关于宣告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宣言以后，铁托作为临时政府总理遂提出临时政府辞职。然而，立宪议会没有接受所提出的辞职，以此表示对以铁托为首的政府的信任和赞赏。以铁托为首的政府作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继续工作到1946年1月底。根据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宪法，于1946年2月1日选出了新政府。在这一届政府里，爱德华·卡德尔仍任副总理，同时兼任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监督委员会主席以及立法和人民政权组织委员会主席。

种各样的自治形式的人民政权。在这一点上并不存在什么重大的差别，但是对于制度和政权机关的运转而言，还是需要协调某些事情，尽管我们并不坚持要使制度划一化，而是相反。但是在国内事态发展的影响下，尤其是在苏联制度的影响下，在我们的区和其他地区的人民政权机关中也开始产生政权的某些官僚主义形式。我们一直坚决追求这样一个目标，就是在游击队的人民政权的自治传统和现在在新的革命条件下产生和组织起来的政权之间保持尽可能牢固的联系。我记得，正是在那时，在反对这些官僚主义倾向的斗争中，我写了《人民群众的力量》这篇文章<sup>①</sup>，在这篇文章中我强调，国家要同在基层按照自治原则组织起来的人民保持这种自治的联系。当然，用的词不是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词，但是意思是一样的。

人民解放斗争中的经验对于我们来说，在这个问题上是十分可靠的向导，不仅是在组织行政管理机构方面，而且在宪法的基本条文方面，都是向导。诚然，这不是制订我们宪法的唯一源泉。另一个源泉是苏联的宪法和苏联的制度。

苏联制度的这一影响，当然是很强大的。十月革命及其整个进一步发展的传统，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而展开的斗争，以及我们当时所处的国际局

---

<sup>①</sup> 这篇文章第一次刊登在1945年5月13日的《战斗报》上。参看第285页附件。

势，这些都是因素，促使我们的宪法在很大程度上，至少就形式而言，是苏联宪法的翻版。但是我说就形式而言，因为它的内容与苏联宪法的内容并不完全一样。尽管采用了这样的法律形式，我们的宪法在若干地方，有若干提法还是贯穿了人民解放斗争的经验。我们是战后称为民主人民国家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不是偶然的。

这里我不对我们第一部宪法进行详细的分析，但是严谨的分析家可以发现，在我们的宪法和当时的苏联宪法之间存在整整一系列实质性的区别。正是这一事实，还有我们的实践——如果不是所有的事情，至少也是许多事情——是朝着宪法业已确定的方向发展的这一事实，是促使斯大林攻击南斯拉夫的因素之一。从战争结束起，他就对我们国内的事态发展不满意。有些武断的批评家指责我们，说我们的制度是斯大林主义制度，如果我们果真如此，完全接受苏联宪法的内容和思想，我们是沿着苏联制度发展的道路而发展的话，斯大林就不会对我们不满。

全国隆重地庆祝了宪法的制订，首先是庆祝宣告共和国成立。多少世纪以来受各种压迫制度统治的各族人民自由了，用自己的手，用自己的武器求得了解放。选举产生了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新政府。在这一届政府中我仍任副总理，兼任监督委员会主席。

这时经济问题尖锐地提到日程上来了。我并不想

说，以前从战争结束以来，我们没有解决经济问题。然而，我是想说，在存在一大堆别的有决定意义的问题的时候，是不可能也来很好地解决经济问题的。

仅仅由于我们的干部当时自觉地严守纪律和具有高度的责任感，我们才得以在战争结束以后的短时间内就恢复了遭到彻底破坏的国家，此外，又采取和彻底贯彻执行全面国有化这样的社会经济措施。

我们决定实行全面国有化，而这意味着国有化所涉及的是42个经济部门的全部私营企业以及以前留下的，即在实行没收财产和国家暂行管制之后留下的全部银行。<sup>①</sup>

我们花了三个多月时间来准备实行国有化，因为这项工作特别复杂。需要为大批企业，为当时所有的企业造一张一览表。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尽管有大批人参加，尽管作了这样长时间的准备，但是所有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发挥了高度自觉的纪律性和责任感，使得企业将被没收的那些人对于这些准备工作一无所知。在实行国有化的那天早晨，当国有化委员会来到企业时，厂主们连拿走打字机的时间都没有。

整个这一行动当然必须高度集中地进行，是由一个由我担任主席的中央的委员会负责的。我们试图在当时可能的条件下，尽可能人道地实行国有化，也就是说国

---

<sup>①</sup> 参看本页的附件，第198页。

有化不是无偿的，而是有补偿的。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所确定的这种补偿不可能符合被国有化的财产的实际经济价值，这也是事实。

工人们兴高采烈地接受了国有化，我们设法雇用以前的厂主，担任他们有相应技术的工作。<sup>①</sup>

---

<sup>①</sup> 参看本页和前一页的附件，第198页。



## 和 谈

### 决定是如何作出的

在进行所有这些工作的同时，我们还为在和谈中维护我们的利益进行了斗争。从1945年起，南斯拉夫共产党政治局和我国政府任命我担任参加所有这些谈判的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团长，因此我事实上了解当时在这一领域内发生的全部情况。

实际上，这根本不是什么谈判，各大强国早就彼此就部长理事会的组成达成了协议，而事先没有同其他国家商量。<sup>①</sup> 根据这一协议，只有这几个国家有权作出决定，而参战的其他各国，即反希特勒联盟的其他成员国，只有权向部长理事会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要求。而尤其可笑的是，没有就这件事展开任何讨论。我们象被告似的只能谈谈我们的想法，然后他们以怜悯的态度让我们走开，仅

---

① 由美利坚合众国、苏联、英国、法国和中国的外长组成的五大国部长理事会是在1945年7月17日至25日和7月28日至8月2日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组成的。在这次会议上，五大国商定由该理事会起草对意大利、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芬兰的和约的草案（建议）以及起草对德和约。这些草案应成为国际和会全会讨论的基础。

仅由理事会主席说一声“感谢提供了有益的情报”而已。

在和会之前——至于对奥国家条约，则还包括和会之后——五大国召开了专门的部长会议，我要重申的是，实际上是由他们作出决定。他们在会议上就每一个问题进行无止境的冗长的讨论，寻求达成协议。五位部长象某种元老院高高在上，他们耐心地听取我们的论据，但是很少尊重我们的论据。即便他们考虑我们的论据，例如考虑了我国提出的论据，他们也不是因为我们提出了论据，也不是根据我们的论据，而是在苏联代表团的压力下和坚持下才这么做的，苏联代表团维护了我们的某些利益和要求。我们是作了充分的准备的，我们又掌握着强有力的论据，但是这些论据没有帮我们多少忙。看来，西方强国有一个事先详细拟订好的和约方案，要做的只是把这个方案与苏联的立场相协调而已。

说句老实话，尽管在谈判中有人采取这种傲慢的态度，应当说我们当时并不反对采取这样的方式进行谈判。象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西方强国的其他盟国，甚至美国 and 英国本身，倒是十分坚决地反对采用这样的方式进行谈判的。<sup>①</sup>

---

<sup>①</sup> 有21国，反希特勒联盟的成员国有权参加和会。正如卡德尔在电视台的《我们这五十年》节目里所说的，会议“本应只具有谘询性质”。换言之，除了五大国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其他盟国只能把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带到这次会议上来，和约的最后文本则只由五大国来确定和通过。会议的其他参与者只消在条约上签字就行。随着会议日益临近开幕，西方大国要求改变波茨坦协定，即它们建议，在和会上通过多数票来作出决定。

实际上，是斯大林把这样一种关系与和谈的办法强加于人的。他完全意识到，如果照多数决定的办法做的话，西方国家就会总是能就每一项决议取得多数，而苏联总是败北。我们确信，那样的话，我们也会随同苏联败北，而且很可能的是，我们所丧失的东西会比苏联多得多。因此我们也表示赞成斯大林所要求的那种做决定的办法，指望能得到苏联的充分支持，除在若干问题上外，我们也确实得到了苏联的支持。

令人感兴趣的是，澳大利亚和其他几个国家拚命吹捧南斯拉夫的人民解放斗争，他们说，南斯拉夫居然不在和会实际作决定的国家之列，发生这样的事情简直令人无法理解。然而，在会上，澳大利亚代表团可以说在所有的问题上，从头到尾始终反对我们。坐在会场上的我们南斯拉夫人听着澳大利亚人对我们的赞扬，是感到特别心满意足和欢欣鼓舞的。后来我们才明白，这纯粹是一种计谋，其唯一的目的是支持西方国家为争取在和会上通过多数票作决定而采取的行动。

### 对意大利、匈牙利 和保加利亚的和约

五大国部长理事会第一个也是最长的一个会议是就对意和约草案召开的。<sup>①</sup>当然，在对意和约问题上，我们

---

<sup>①</sup> 参看附件 第255页。

有极大的极重要的利益，我们坚决地为自己的权利和要求进行了斗争。德加斯帕里向我们作答，他口袋里显然已经装着各种保证，因此他的发言是经过推敲的，他对我们的态度甚至是十分平和客气。

接着是五国部长对匈和约会议。会议的程序与对意和约会议时一样。格罗·埃诺发言维护匈牙利的利益。在会议期间，我曾多次亲自与他晤谈。我们曾设法在会议之前协调某些问题上的立场。因此在会上我们之间没有发生什么尖锐的争论，特别是没有发生象在对意和会上发生的那样的尖锐争论。在对意和会上，我们曾有过十分尖锐的冲突，我得说，这些冲突首先是我挑起的。在对匈和约问题上，主要涉及赔偿和让一部分匈牙利人从南斯拉夫迁走的问题。我们要求从伏伊伏丁那迁走一部分匈牙利人首先是为了，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使德国人迁走的工作合法化。我们实际上只要求尽可能少的匈牙利人，仅仅要求40,000人迁走，但是即便是这么些人，也没有人迁走。

匈牙利的赔偿为数不大，但是我得说，匈牙利人非常自觉地偿付了。

第三个会议是对保和会<sup>①</sup>，在这个会议上，我也是我国代表团的团长。由于我们当时正就与保加利亚组成联邦一事进行谈判，而与保加利亚人的关系当时看来又

---

<sup>①</sup> 参看附件第255页。

是最密切最友好，我们在会上对于保加利亚赔偿一事没有提出任何要求。我记不得对保和约里包含我们别的什么要求。

在部长理事会的各次会议上，在1945年的伦敦会议上，1946年的巴黎会议上和194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以及在巴黎举行的和会全体会议上，我同好几个国家的外长，特别是同五大国的外长进行了会谈。<sup>①</sup>例如，我一抵达伦敦（1945年9月17日）参加部长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我就拜会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接着我拜会了参加理事会工作的其他国家的部长：比多、贝尔纳斯、贝文等人。

在巴黎举行的历次部长会议上以及在和会期间，我又同这些部长们举行了会谈。<sup>②</sup>

例如，在和会期间，有一次我拜会了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他代表美国政府用特别粗鲁的语言提出抗议，说我们的空军人员在南斯拉夫和意大利以及奥地利和南

---

① 和会（全体会议）于1946年7月29日至10月15日在巴黎举行，涉及所有的和约，这些和约的草案是由部长理事会在会前准备的。

1946年11月4日至12月15日在纽约举行了部长理事会会议，会议接受了巴黎和会提出的和约并决定开始草拟对奥和约。

1947年2月10日，所有的和约都在巴黎签署。

② 在巴黎，卡德尔于5月3日与贝文进行了会谈，于5月5日与贝尔纳斯和比多进行了会谈，于6月10日与莫洛托夫，7月2日和3日与贝尔纳斯和贝文进行了会谈。

斯拉夫之间的边界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国飞机。当时我们同国内的联系很糟糕，对于这件事我一无所知。我对他说，发生这样的不幸事件，我国政府肯定是感到遗憾的，但是这个问题无论如何不应该使他向我抗议时采取那样的态度。我解释说，关于这件事，我还是第一次从他那里听说，我确信，是由于某种偶然的因素，或者由于美国飞行员飞入南斯拉夫领空过深而造成这一不幸事件的。对于我的回答，他表示不满意，他用更尖锐的形式提出抗议，同时威胁说，美国政府要考虑采取什么样的措施。<sup>①</sup>

在与比多会谈之后<sup>②</sup>，我与当时的法国总统进行了会谈。<sup>③</sup>

戴高乐在那几天曾接见过我。他态度十分亲切，他开始对我们的人民解放斗争大加赞扬，但是没有提到铁托的名字。这样一种态度典型地反映了他个人的虚荣心，因为他无法忍受抵抗运动中有别的什么人与他平起平坐或者比他更出名。然而，他还是承认，他领导的运动和南斯拉夫的人民解放运动是欧洲唯一的两个对反希特勒力量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抵抗运动。

我当然对他所讲的友好的话表示感谢，同时提到法

---

① 这是指1946年8月9日发生的一件事，当时有一架美国飞机在南斯拉夫领空被迫降，另一架被击落。被击落的飞机上的飞行员都死去了。

② 于1946年5月8日。

③ 于1946年5月9日。

南两国友好的传统，接着我开始谈到和会。这时，戴高乐的脖子都似乎变长了；他一声不响地听着我讲，不插话，也不进行任何的争论。然而，等我讲完了话，他说，在许多问题上我很可能是对的，但是法国政府并不完全同意南斯拉夫政府的立场，他将按照自己的看法采取自己的立场。同时，他又说，他将最大限度地考虑南斯拉夫的利益，并将在这一意义上设法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

情况也果真如此，在西方国家政府总的采取消极态度的情况下，我要说，法国的态度比较起来是最积极的。但是连法国政府也拒绝了我们在和谈中提出的一些最重要的要求。然而，归根结蒂，正是法国的建议在西方国家提出的建议中是比较最缓和的一个建议，也正是法国的建议最后被接受了。事实上，这是西方国家政府为与苏联达成妥协而提出的建议，实际上在这件事情上法国提出了自己的多少显得灵活的建议，在西方国家政府和苏联政府之间起了中间人的作用。在对意和约问题上，这在西方的建议中比较起来是最好的建议了——如果能够谈到“最好的”这样的字样的话——不过，距离我国各族人民的权利，首先是斯洛文尼亚人民和克罗地亚人民以及南斯拉夫其他各族人民的权利还很远。

美利坚合众国提出了最不利的条件，美国又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威尔逊线。<sup>①</sup>

---

<sup>①</sup>参看本页附件，第255页。

## 莫洛托夫和苏联代表团

我每天都同莫洛托夫合作，商谈会议议程上某天的所有问题。我每天到莫洛托夫那里按照俄国人的习惯进“早餐”，按照我们的习惯则应是进午餐。由于每天这是在部长们开会之后，莫洛托夫在进“午餐”时，及时地把有关我们的问题告诉我，因此我每天马上就获知五国部长开会的情况。如果无法再坚持以前提出的论点的话，我们就商量作出妥协和让步。我认为，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理应感谢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这一有力的援助。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与苏联代表团始终都站在同一立场上，也就是说苏联代表团并不始终接受和反映我们的立场。在我们看来，有时候是不必要地或者至少是过快地，或者是没有让对方作出让步就妥协了。我特别记得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在我们设法得到的里雅斯特没有成功之后，我们与苏联代表团商定，苏联代表团同意组成的里雅斯特自由区，但是戈里察<sup>①</sup>归属南斯拉夫。当我第二天象往常那样去莫洛托夫那里进“早餐”时，他兴奋地接待了我，并说：“我们得手了。”我问：“我们得

---

<sup>①</sup> 即意大利东北与的里雅斯特接界的戈里齐亚。——译者注



手了什么？”他回答说：“的里雅斯特将成为自由区，西方国家政府同意我们的建议，由的里雅斯特四周的部分领土组成的里雅斯特自由区。”

我问道：“戈里察如何处置？”他露出一副感到奇怪的表情，回答我说：“戈里察怎么啦？戈里察归意大利。”

我当然激动起来，我指责莫洛托夫，我说一天以前我们还曾商定，只有在戈里察归南斯拉夫这个条件下，我们才同意建立的里雅斯特自由区。关于这一点，他回答我说：“你们干吗这么坚持要这个小城市？它对于你们也好，对于意大利也好，都没有多大重要性。主要的问题是里雅斯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得到了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大限度的东西了。”

我当然极其不满意，因为我本来以为能够取得另一种的、更为有利的结果。几天以后，当与意大利的谈判基本告一段落时，英国外交官、外交副大臣尼尔·弗雷德向我证实了这一点。当我向他提到戈里察时，他笑着说，他们与我们的建议是一样的，即建立的里雅斯特自由区，而把戈里察让给南斯拉夫，但是莫洛托夫没有坚持这一点，因此戈里察就成了意大利的了。

诚然，我说不上尼尔对我讲的话是真情还是一种阴谋，但是我更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我自己也认为，莫洛托夫只要再坚持几天，坚持要求采取这样的解决办法，做到这一点是有可能的。

在的里雅斯特自由区和南斯拉夫之间的边界这个问题上，莫洛托夫和我发生了另一次严重的冲突。我们要求从米列起一直往南的海岸以及的里雅斯特以西的一部分海岸。实际上，我们对于得到的里雅斯特以西的海岸不抱多大希望，因为西方几个强国在这一点上是十分坚决的。在这方面它们不大可能让步。但是就从的里雅斯特往南，是有机会把较大一部分海岸划归南斯拉夫的。我们当时认为这是有可能办到的，我们对莫洛托夫施加了压力，让他坚持争取比较有利的解决办法。老实说，莫洛托夫开始时提出了我们对南部海岸和西部海岸的要求，并为我们的要求辩护，但是在讨论中他很快就作了让步，同意了法国提出的边界线。

当然，我根本没有料到这个问题会这么快就处置掉了。当我来到莫洛托夫那里，当他把这样的处置告诉了我时，我简直感到不知所措。我尽我所能责难莫洛托夫；我还对他谈到，这样一来，一个小国人民，斯洛文尼亚人民，由于这个新条约又同自己的海洋分开了，根据凡尔赛公约划定的边界，他们在整个这一地区本来就只有几公里的地方濒临亚得里亚海，而他们原本是在亚得里亚海海岸生活的。

对于我这一番话，莫洛托夫大为恼火，他对我说：“难道你们认为每一个县都要有自己的海？”

类似的冲突还有几次，但是不是这么尖锐，也不具有这样的实质性意义。撇开这些不谈，我得重申，合作

是正常地进行的，苏联政府作了很大的努力来帮助我们。然而，在进行迅速的妥协和让步的那些问题上，显然是与整个和约问题有关的，而不仅仅与对意、对德和对其他某一个国家的和约有关，因为这里所涉及的是各大强国相互间的妥协和彼此间的交易。

在莫洛托夫那里进“早餐”时的谈话是很发人兴味的，因为我们常常在那时讨论并不直接关系到和谈的问题，而是讨论与社会主义和世界局势有关的问题。

莫洛托夫、维辛斯基和葛罗米柯三人组成苏联代表团的核心。莫洛托夫是代表团无可争议的团长，至少我的印象是这样，有时候他对代表团的成员很粗暴，不论牵涉到的是谁。在他严厉地呵斥别人的时候，有几次我在场，这种场面在我们这里是无法想象的。撇开这一点不谈，莫洛托夫是一个聪明人，是听取对话者的意见的。例如，我与他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困难，除了我上面提到过的几件事之外。

维辛斯基喜欢卖弄小聪明。他维护的是最保守的教条主义论点。我记得有一次他对什么是当代的苏维埃政权，什么是苏维埃统治形式的实质作了解释。他力图证明，这实际上是某种柏拉图的贤人统治、哲人统治，他们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领导政治和社会实践。

对于他这番话，莫洛托夫厉声呵斥，在此以前我很少听到他这样讲话。他大致说了这样一番话：“……你说些什么？哪来的贤人统治和哲人统治？无产阶级专政是

工人阶级的统治，而不是什么贤人和哲人的统治。根据你的理论，苏维埃政权很快就会与工人阶级发生冲突。”

他的这番话表明，莫洛托夫尽管是斯大林式的教条主义者，还是同十月革命的基本论点联系在一起，而维辛斯基则代表最官僚化、最专断的官僚阶层。

我们还就另外两个问题展开了相当激烈的讨论。第一，我有一次提到，我觉得，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更多地考虑到一些殖民地、半附属于人的小国，说实在的，它们表面上依附于人，是美国在联合国的表决机器的成员，但是它们还是追求独立和加速经济的发展。我说，我认为在政治上不一定把当代世界只分成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对小国人民和半殖民地国家奉行相应的政策，有可能分离资本主义世界。对于这样的观点，莫洛托夫丝毫不理解，苏联代表团其他成员就更谈不上了。莫洛托夫对我说，如果我认为通过奉行某种政策，就有可能粉碎美国在联合国的表决大军，那是幻想。我为自己辩护说，问题恰好不在于粉碎美国的表决大军，而是使各国人民能够独立地表明立场，如果这样的立场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话。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和我的理论完全没有成功。

第二个十分“热闹”的话题是集体化。南斯拉夫共产党当时采取的态度是，不在集体化的基础上，不通过集体化来发展农业，而是通过各种类型的合作社来发展农业，让农民自由地组织进最合他们心意的那一类合作

社，在这些合作社里由他们自己进行管理。莫洛托夫、维辛斯基等人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于他们来说，集体化是通往共产主义的唯一正确道路。他们指责我们说，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在南斯拉夫助长资本主义，同时我们的农业生产将经常会落后。我回答说，我们的实践表明情况不是这样，只要我们还没有得到更好的样板，取得更好的结果，我们就继续奉行这样的政策。

我们讨论过的这样一些和类似的问题，有相当多，因为开了几次部长级会议，还有巴黎和会，加起来整整六个月时间，足够我们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尽管这种讨论有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是尖锐的，不过我还得说，这种讨论是同志式的和彼此友好的。当时丝毫看不出后来在1948年以后以及1948年前夕所出现的那种众所周知的辱骂。

### 对奥国家条约

五大国部长理事会于1947年3月10日至1947年4月24日在莫斯科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也就是说，在巴黎和会之后，举行了讨论对奥国家条约会议。西方国家政府终于使人接受了举行这个会议的决定。<sup>①</sup>奥地利没有参加希特勒联盟，因此各大强国没有与它签署和约，而

---

<sup>①</sup> 参看附件第255页。

是签署国家条约，不过这个条约还是包含和约的某些成分。

在这次会议上我仍然担任南斯拉夫代表团团长，只是铁托和南斯拉夫共产党政治局授权我，在与斯大林谈话时澄清一下南斯拉夫和苏联之间的某些问题，首先是经济关系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以后还要详细述及。

英国方面出席的是外交大臣贝文，美国方面是马歇尔，苏联方面是莫洛托夫，当然还有中国的外长，他与其说是参与决定，不如说是到到场罢了。当然，这还是蒋介石时代的中国。

这次会议从一开始起就明显地对我们不利。我事先拜会了各国部长，包括中国部长，他还邀请我共进午餐。我向他们详细地解释了我们在科鲁什卡问题上的立场。然而，我的意见到处都没被听取。说句老实话，中国外长倒是客气地面带笑容对我们的立场表示赞许，但是在部长会议上表决时却与西方国家政府一样地投票。莫洛托夫为我们的论点和要求辩护了，但是并不很坚决，为时也不长。

在参加这次会议期间，我一到莫斯科就会见了斯大林。在场的有莫洛托夫和苏联其他领导人。鉴于与斯大林的谈话气氛很好，我就乘机向他谈了谈判对奥国家条约的情况，向他提出了科鲁什卡问题，并请求他们给予充分支持。斯大林听我讲，不发表意见，点了点头，最后说：“你们的要求肯定是正当的，我们要支持你们的

要求。”他接着转身对莫洛托夫说：“维亚切斯拉夫<sup>①</sup>，你尽你所能支持南斯拉夫人。”对于这件事，他再也没有讲话。

我的印象是，苏联政府支持南斯拉夫的兴趣在科鲁什卡问题上远不如在和约上，例如对意和约的其他任何问题上对南斯拉夫的支持。看来，科鲁什卡是各大强国进行讨价还价的一个问题，而西方国家政府从一开始起在围绕科鲁什卡的所有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即在对奥国家条约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

同一天或者第二天，我单独会见了莫洛托夫。<sup>②</sup>我向他详细地解释了我们的全部要求，并提出了论据。我觉得他是很有兴趣地听我讲话的。他问到许多细节，因此我的印象是，他将在会上对西方国家政府施加很大的压力，至少使南斯拉夫政府的某些主要要求得到满足。说句老实话，我并没有寄很大的希望，不过，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允诺还是使我感到鼓舞。

---

① 莫洛托夫的名字。——译者注

② 卡德尔于1947年4月2日抵达莫斯科，参加讨论对奥国家条约的部长理事会会议。同一天就与莫洛托夫进行了谈话，在场的有南斯拉夫当时的外交部长斯塔诺耶·西米奇。

4月17日，卡德尔在部长理事会会上发了言，4月19日与斯大林进行了谈话。部长理事会会议于4月24日结束，4月25日，卡德尔再次与莫洛托夫进行了谈话。参加这次会议的南斯拉夫代表团于1947年4月30日返回贝尔格莱德。

我还拜会了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和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贝文的态度明显地冷淡，是排斥性的，他毫不客气地公开地对我说，英国政府持不同的态度，从整个来说，英国政府无法支持南斯拉夫的要求，只能接受其中的某些要求。他还具体地说，英国政府始终为维护少数民族的权利而斗争，现在仍将致力于在对奥国家条约中使少数民族的特殊权利得到保障。

马歇尔显得友好、客气。他甚至一直把我送到大门口。然而，他只限于说，美国政府研究过整个这个问题，他将考虑我们在五国部长会议上提出的论据，但是眼下他对于美国的态度无法再说什么。他唯一特别强调的是，美国政府反对改变南斯拉夫和奥地利之间的边界。就我所记得，英、美两位部长都提起了1920年的公民投票，那次公民投票反映了当地人民的意志。<sup>①</sup>

当然，我还拜会了中国外长，我还同比多进行了谈话。

---

<sup>①</sup> 根据1919年签署的对奥和约条款，在斯洛文尼亚科鲁什卡（所谓的A公民投票区）的部分领土上（于1920年10月10日）举行了一次公民投票，以决定这个地区的归宿。众所周知，公民投票的结果有利于奥地利，即投票赞成把这一部分科鲁什卡归并南斯拉夫的有15,279名选民（占全部票数的40.1%），赞成归并奥地利的为25,025名选民（占59%）。对于这次公民投票的结果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民族问题，而是社会经济问题，因为大多数选民宁愿选择进步的奥地利共和国，而不愿选择落后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



所有这些会前的谈话都清楚地表明，会议将朝哪个方向发展。我们唯一的希望是寄于苏联政府的。据我后来获悉，莫洛托夫在会上确实为我们的立场进行了辩护，从而使有关少数民族以及其他一些不大重要的条款写进了条约。至于我们其他一些最重要的要求，莫洛托夫比较快就作了让步，会议很快就结束了。因此会议的结果比我原来料想的要糟。此外，这一结果证明，苏联在奥地利问题上，尤其是在对南斯拉夫具有根本利益的问题上，是不那么真正感兴趣的，尽管无视苏联政府在这些问题上在某种程度上向我们提供的支持也是不正确的。然而，苏联作为一个大的强国，出于他们的全球战略，显然把对我们可能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某些这样的问题看成是比较次要的问题。

不过，在和会上，我们只从苏联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当然，战时曾同希特勒合作，维护自己的某些特殊利益而置我们的要求于不顾的那些社

---

爱德华·卡德尔 1939 年在他所写的《斯洛文尼亚民族问题的发展》一书中，分析过科鲁什卡问题。他强调指出奥地利当时是一个比较进步，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有比较稳定的民主制度，而南斯拉夫则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它的政治制度从任何一个方面来说，也都不能为斯洛文尼亚人民的未来揭示比较有利的前景。他强调指出，投票赞成归并南斯拉夫的是民族意识压倒其他利益的那些人。据爱德华·卡德尔认为，公民投票的失败，并不表明斯洛文尼亚人民缺少民族觉悟，而是反映了斯洛文尼亚资产阶级政策的失败。

会主义国家是例外。至于说到这一点，我们自己把要求局限于最必要的，即把要求限于最低限度。我们基本上，在多数重大问题上得到了支持。莫洛托夫常常长时间地坚持我们的要求。达成了一系列比较令人满意的妥协。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没有苏联这样的帮助，南斯拉夫是不会达成它所达成的那样的和约的。

### 为了使这样的战争永不重演

巴黎和会是进行各式各样的交易，进行各种各样的讨价还价的一个机会。例如，有一天卡尔达里斯来拜会我，他当时是希腊政府首相或者是外交大臣。他没有迟疑，一开始就立即明确地提出自己的建议：由南斯拉夫和希腊来瓜分阿尔巴尼亚。据他认为，阿尔巴尼亚根本不算什么国家，而是各大国出于它们相互关系的需要而制造出来的。他甚至是慷慨的，他提出给我们的那部分阿尔巴尼亚领土比他要求给希腊的那一部分还要大。<sup>①</sup>

---

① 卡尔达里斯当时是政府首相兼外交大臣，是参加会谈的希腊代表团团长。

据另外的说法，卡尔达里斯是向南斯拉夫代表团成员莫沙·皮雅杰和阿莱什·贝勃勒提出这一建议的，而他們又向卡德尔汇报了此事。莫沙·皮雅杰曾就卡尔达里斯提出瓜分阿尔巴尼亚的建议一事写信给和会主席并公开抨击了卡尔达里斯。（参看《莫沙·皮雅杰言论文章选集，1941—1947年》，贝尔格莱德文化出版社1948年版，第445—446页。）

这一建议本身可以说使我震惊不已。我无法设想竟然有人当真在策划有关阿尔巴尼亚的这样的计划。我尖锐地、直截了当地回答了他。我说，我们来参加和会不是来作这样的交易的，我们要求的只是本来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阿尔巴尼亚人民有权享有独立，我们准备支持他们的独立，我们将反对瓜分阿尔巴尼亚的任何企图。换言之，我对他说，我们不仅不准备参与瓜分阿尔巴尼亚的讨价还价，而且我们将维护它的完整。谈话结束时，卡尔达里斯大致说了这样一番话：“悉听尊便。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尽管阿尔巴尼亚人现在装做是你们的朋友，可是他们在历史上出卖过所有的人，最后也会出卖你们的。”我回答说，这是阿尔巴尼亚的反动当局干的，而不是阿尔巴尼亚人干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现在有一个不同的政府了，不能说这个政府会干出这样的事情来。令人遗憾的是，历史后来并没有完全证实我对于阿尔巴尼亚政府的这番断言，但是我们在阿尔巴尼亚保持完整问题上的态度始终如一，不论阿尔巴尼亚政府对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就这样，在已经形成集团的情况下，和会实际上变成了一出喜剧，发表了足够的议论，进行了不少的讨价还价，会议结束时，真正的和约会是什么样的，这一点谁都不知道。

如果要我从我所叙述的和谈的情况中得出一个总的结论，我能说的只有一点：正如历史上多次发生过的那

样，一个不公正的和平强加于南斯拉夫的头上。

我谈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在经过了那么许多年之后，重新提出当时对新南斯拉夫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一些问题上的争论。我谈到所有这些事实，仅仅是作为不应忘记的历史事实而已。今天我们必须相信，这样的战争再也不会重演了，各国人民之间的边界问题和其他争端，不会通过战争，而是通过各国人民的和平积极共处和合作，即通过各国人民间的关系的普遍民主化来解决。各国人民间的关系的普遍民主化定将废除他们之间的边界。

# 准备惩罚南斯拉夫

1947年与斯大林谈话

这次<sup>①</sup>谈话与1944年秋天那次谈话迥然不同。斯大林客气地接待了我，谈话是友好的，没有使人感到任何局促。我们谈了我按照铁托和我党政治局的指示提上议程的所有问题，尽管我向斯大林提出的这些问题是非常敏感的。

这就是说，我们谈了战后立即在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建立的经济关系的某些形式，这种经济关系已成为我国政府和苏联政府之间发生冲突和某些动感情的事情的根源。确切地说，战后我们同苏联一起建立了几个联合经济企业，所谓的合营公司。在这些合营公司中只有两个公司，即航空公司和多瑙河航运公司<sup>②</sup> 多少在营业。

---

① 1947年4月19日。

② 这是指南苏民航公司——尤斯塔和南苏航运股份公司——尤斯帕德，这两家公司是在1947年2月4日建立的。

尽管战后我们与苏联就建立开采石油、煤、铅和锌以及黑色冶金等合营公司进行过谈判，但除上述两家公司外，没有建立其他公司。

的确，在这个问题上经常发生摩擦，但是，在我们分析了实际状况，分析了在同斯大林谈话时应当开诚布公提出的最严重的问题和误会何在时，我们决定，建议让这两家公司继续营业。然而，在其他所有联合企业和合办事业中，苏联专家，即居领导地位的苏联人独揽大权，而我们的人甚至连认真查阅这些公司的账目的权利都没有，更谈不上审查这些公司的技术和经济方针了。于是，在这些公司中的苏联成员和我们的人之间，乃至与南斯拉夫政府的负责官员之间便经常发生争吵。尤其是因为我们在这些公司里有优秀的专家和干部，说实在的，尽管他们经常受到排挤，但是，他们毕竟知道，这些公司在朝哪个方向走，究竟在干些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感到我们不仅被排挤到一边，处于依赖苏联伙伴的地位，而且在经济上受到剥削。

在南共政治局会议上，我们详细地分析了上述情况，并得出结论：我们向苏联政府，向斯大林建议，全部解散这些合营公司，我在上面提到的航空公司和多瑙河航运公司除外。我去见斯大林，就负有这项任务。

鉴于上次我同斯大林谈话的经验，我得承认，我料到这次谈话将是棘手的，而且是非常折磨人的。我事先构想了作这次谈话的整个战略，以便在我提出南斯拉夫的建议时，使斯大林尽量少感到意外。可是，事情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斯大林不仅接见我时客气，友好，而且在开始谈到这个问题时，也是如此。

谈话之初，我的举止就好比一只围着一碗热粥转的猫，不知如何是好。我尚未提出解散这些合营公司的最后建议，斯大林就打断我的话说：“铁托和你们的中央委员会在这件事上是正确的。对我们来说，合营公司不仅不必要，而且经常只会成为绊脚石。南斯拉夫不是罗马尼亚，我们与罗马尼亚开办了一系列合营公司。罗马尼亚没有参加反希特勒联盟，而南斯拉夫曾是我们的盟国。因此，最好是解散这些公司。”

斯大林的建议使我感到意外，原因有二。第一，他接受了我们的建议而没有任何反对的表示，也没有提出其他任何批评意见。第二，我得到的印象是，他事先已知道我来莫斯科的真实原因。换句话说，我想到，在南斯拉夫虽然有某个身居非常负责岗位的人在向苏联政府报告南斯拉夫政府以及南共政治局的工作情况，这种想法后来果真得到了证实。不过，当时关于第二点，我没有去多想。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斯大林接受了我们解散合营公司的建议。

为了表明我们的善意，我对斯大林说，我们的意思不是要解散所有的公司。我还说，我们认为，航空公司和多瑙河航运公司可以继续营业，不过应当重新对这两家公司的状况进行分析。对此斯大林回答说，他认为，这两家公司也应当解散。对于他的这一建议，我没有作出任何直接的答复，而只是补充说，既然我们已决定解散一些公司，最好是对整个问题加以通盘研究。斯大林

重申，他主张把这两个公司也解散。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苏联方面在具体会谈如何解散合营公司时却再也不提航空公司和多瑙河航运公司了。我们也不再坚持这一点，所以这两家公司又办了一年，直到1948年与斯大林发生冲突时才停办。<sup>①</sup>

我在同斯大林谈话中只是顺便提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在南斯拉夫的苏联专家的地位和行为问题。我说，我们的专家和苏联专家之间发生了摩擦和误会，我们认为，双方应当采取某种措施，以消除这些分歧。唯有对于我的这一建议，斯大林有点生气地回答说：

“专家们到那里去，就是要别人听他们的，而不是干坐在你们那里。”

我向他解释，对于这一点我们并没有异议，但是，就是在这方面我们那里的情况跟苏联的情况也有很大不同。此外，我们也有相当多的高度熟练的专家，因此，我们觉得，苏联专家和我们的专家在解决各种问题时相互间得多商量，多交换意见。我们对苏联专家的作用感到十分满意，并对苏联政府派出专家表示感谢；到现在为止，我们已得益匪浅。因此，这一点没有争议，问题只是我们的专家和苏联专家相互合作中存在某些误会。

我不记得斯大林对这一点还说了些什么，如果他说了什么的话。不管怎么说，对这个问题未作进一步的具

---

① 关于停业清理尤斯塔公司和尤斯帕德公司的议定书于1949年8月31日在贝尔格莱德签署。



体阐述，他便很快转到别的题目上去了。

谈话的第二部分涉及国际关系中的各种问题以及南斯拉夫的情况。① 整个这次谈话是本着格外友好的精神

- 
- ① 参加爱德华·卡德尔1947年4月19日在莫斯科与斯大林谈话的，苏联方面还有莫洛托夫，而南斯拉夫方面有斯塔诺耶·西米奇和弗拉迪米尔·波波维奇。波波维奇就这次谈话作了专门记录。

根据记录，除了卡德尔所谈的问题外，还谈到：铁托的健康，南斯拉夫的工业发展，特别是钢和石油的生产，军事工业，南斯拉夫海军的发展，签订一项新贸易条约的某些问题以及南斯拉夫的各个民族——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黑山人和马其顿人。

关于南斯拉夫的各个民族，斯大林一度问道：“……南斯拉夫有多少马其顿人？”卡德尔回答说：“大约150万人。”斯大林感到有点意外，他问道：“在南斯拉夫境内难道真有150万马其顿人？”卡德尔回答说：“真有。”斯大林说：“这是个很大的数字。马其顿人讲什么语言？”卡德尔回答说：“马其顿人有自己的语言。”斯大林问：“他们有用本民族文字出版的文艺作品以及其他著作吗？”卡德尔回答说：“有用马其顿文出版的民间诗歌和文学作品。现在出版马其顿文的报纸、杂志以及小部头著作。他们的语言正在完善过程中。”斯大林说：“看来，马其顿人接受了希腊人的文化。”卡德尔说：“有这样的迹象。”斯大林问：“在与保加利亚人的关系上你们打算采取什么行动吗？”卡德尔回答说：“是的，我们想在和约批准后与他们缔结类似我们与阿尔巴尼亚缔结的那种条约。”斯大林说：“那好。”卡德尔说：“我们与保加利亚同志在马其顿问题上有一些小小的争执。”波波维奇说：“他们把关于马其顿人的一条文字从宪法里删掉了。”莫洛托夫笑着说：“是的，他们在这方面过分谨慎。”

此后，又谈到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南斯拉夫的宗教问题，反动势力的活动，马切克和格罗尔等等。

进行的。最后，斯大林建议我在莫斯科再延长几天访问，因为他这几天没有空，他邀请我过几天吃晚饭。我对他说，遗憾的是，我在莫斯科的停留不能超过原计划，因为在南斯拉夫我还有一些必须做的刻不容缓的工作。

我讲过这番话之后，发现坐在我对面的莫洛托夫露出十分吃惊的神态。显然，他吃惊的是，我竟然拒绝同斯大林共进晚餐。他这副神态，使我马上感到后悔莫及，我不该不同意斯大林的建议，但是，既然话已出口，我就不再想改变已说出的话。我得承认，我之所以回避这顿晚餐，还因为我知道，斯大林喜欢把客人灌醉，而我不愿处于这样的境地。

### 关于与保加利亚建立联邦

在发生这一切事件的期间，我们与保加利亚人就建立保南联邦的问题反复地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会谈。关于建立联邦的主张，是1944年秋天铁托与斯大林初次见面时，斯大林亲自向铁托提出的。然而，正式会谈是在新的一年，1945年才开始的。我作为南斯拉夫政府的代表，被派往索非亚，与保加利亚人讨论这个问题。<sup>①</sup>

---

<sup>①</sup> 爱德华·卡德尔直接参加了讨论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建立联邦的谈判。在卡德尔于1944年12月22日至24日去索非亚会谈前，双方已交换了几个条约草案。在索非亚会谈时，特·科斯托夫另外提出了一个关于建立联邦的条约草案，作为对卡德尔提出的草案

我们接受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主张，尽管并不高兴。但是1944年保加利亚刚解放不久，国内局势尚激烈动荡不定，我们估计，这样的联邦不可能对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和国家建设产生消极影响。相反，我们估计，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

---

的反建议，该草案是以在此期间季米特洛夫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为依据的。

卡德尔在1944年12月23日自索非亚写给铁托的一封信中说，保加利亚的建议实际上是要签订“某个互助条约”，而签订这个条约，只会使南斯拉夫承认保加利亚为盟国，“鉴于保加利亚是战败国，缔结这样一个条约，就会贬低南斯拉夫作为战胜国的作用”，由于国内的政治原因，这也是不符合南斯拉夫的利益。卡德尔得出结论说：“一句话，这项协定的内容非常不具体，因此，从该协定到实现联合，还很遥远。这样的协定会使保加利亚人得益，而在对外政策上给我们造成损失。”

本来应当在1945年新年前夕签订建立联邦的条约。然而，在卡德尔在索非亚进行会谈之后，条约没有签成。双方后来还提出过几个关于建立联邦的条约草案，但是，基本问题并未解决（是建立两国的联邦，还是建立有七个成员国的联邦，马其顿问题等等）。

1945年1月中，莫洛托夫从莫斯科来电，要求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各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而事先已宣布的保加利亚代表团来贝尔格莱德签订条约的行期则予推迟。在此期间，莫沙·皮雅杰和维尔科·弗拉霍维奇在索非亚进行会谈。1945年1月底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谈（南斯拉夫代表团由莫沙·皮雅杰率领）认为：时机尚不宜建立联邦，因此不签订关于建立联邦的条约，而

对保加利亚的影响肯定会更大。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谨慎行事。我们的打算是，经过一系列准备阶段，逐步地建立联邦。

可是，在索非亚我碰到了两种观点，这使我感到惊讶，因为我原来以为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在保加利亚的

---

是起草一个关于政治、军事和经济合作的条约草案。

1945年2月间，卡德尔与保加利亚代表还进行了几次会晤和会谈。2月中，保加利亚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向卡德尔通报了英国就联邦问题提出的抗议书。

应苏联政府的要求，建立联邦的谈判中断了。1948年2月才恢复谈判，在莫斯科举行三方会谈，爱德华·卡德尔也参加了会谈（这是卡德尔与斯大林的最后一次会谈）。季米特洛夫关于建立巴尔干和欧洲几国联邦的讲话为斯大林提供了举行这次莫斯科会谈（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和卡德尔会谈）的直接理由。季米特洛夫1948年1月18日访问罗马尼亚时在记者招待会上阐述了这一想法。他当时说，“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和希腊……”的人民“在时机成熟时将解决建立联邦的问题……而用不着询问帝国主义者，也用不着顾及他们的反应”。

莫斯科《真理报》首先发表了季米特洛夫的这一讲话，然后于1月28日作了“批判性的说明”，说“这些国家不需要不大可靠的，人为制造的联邦”。季米特洛夫本人于1948年2月2日在保加利亚祖国阵线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真理报》的批评意见是有道理的，对于防止可能出现的和有害的想入非非，是及时的，有益的和宝贵的”。

建立南保联邦的问题在共产党情报局决议之后便完全放弃了。

威望很高，决不会有人对他们所主张建立的联邦提出任何原则上的反对意见。然而，当我阐述了南斯拉夫政府的立场及其建议后，当时的保加利亚共产党政治局书记特拉伊乔·科斯托夫非常坚决地反对这一立场和这样的建议，后来，在斯大林搞的众所周知的审讯案时期，他被绞死，罪名恰恰是所谓想同南斯拉夫建立联邦，从而想使保加利亚隶属于南斯拉夫。特拉伊乔·科斯托夫谈到保加利亚国家的长期传统以及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在结构和精神方面逐渐形成的差别，因此他认为，建立这样的联邦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我得说，这些论点，我们南斯拉夫人私下也是意识到的。尽管我们同特拉伊乔·科斯托夫的关系，不仅在这个问题上，而且在一系列有关相互关系的其他问题上，从来都不好，尽管我们向来认为科斯托夫是南斯拉夫的敌人，但是，当时他的观点并未使我失望，而是，我首先想说，这些观点使我高兴万分。

但是，契尔文科夫却以同样坚定的态度维护相反的观点。他极其坚决地主张建立联邦，甚至坚持应当尽快进行，说什么任何拖延都会是有害的，等等。后来正是契尔文科夫说了决定性的话，以假罪名把特拉伊乔·科斯托夫绞死，说他企图与南斯拉夫建立联邦，来使保加利亚隶属于南斯拉夫。

参加会谈的其他政治局委员，其中有科拉罗夫以及保加利亚其他一些著名老共产党员，虽然原则上赞成建

立联邦，但是大有保留，因此非常清楚，他们并不喜欢这样的解决，也就是说，他们之所以原则上赞成建立联邦，只是由于莫斯科是主张建立联邦的。会谈结束时双方得出结论：目前尚需一段时期不采取任何明确的立场，而是进一步会谈，即继续会谈。

就我所记得，在我进行的这次会谈后不久，莫沙·皮雅杰也在索非亚就同一问题进行过会谈，无论是正式地谈，还是他率领议会代表团访问保加利亚时与对方谈，总之是谈了。然而，结果都一样，稍后，我又去了保加利亚。那次我们的立场有些接近了，但是，仍旧限于原则协议，限于我们在建立联邦的过程中将采用的某些方法的范围内。

然而，在我从保加利亚返回后不久，莫斯科就来了电报，斯大林在电报中要求我们停止与保加利亚建立联邦的一切会谈，因为，据说这样的解决办法，西方国家政府不会接受，我们建立这样的联邦只会使国际关系复杂化。建立南保联邦的第一阶段会谈就这样结束了。我必须说，我们并未因此而感到不快。

与此相反，斯大林却在这种情况下有一次竟对吉拉斯说，我们应当与阿尔巴尼亚建立联邦。吉拉斯回答他说：阿尔巴尼亚人对自己的独立非常敏感，我们不想在这方面对他们施加任何压力。对此，斯大林对他说：“没关系，应当吞并阿尔巴尼亚。”吉拉斯说：我们没有这样的打算，相反，如果阿尔巴尼亚的独立处于危险

之中，我们将支持阿尔巴尼亚。1948年2月，我去见斯大林，他又主张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建立联邦，当时他的说法又同他对吉拉斯讲的话自相矛盾，因为他几次对我强调：我们无论如何不可把阿尔巴尼亚包括在这个联邦内。那时我们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还是非常友好的，也许斯大林害怕，吸收阿尔巴尼亚参加南保联邦会加强那些主张独立、既不依附西方又不依附东方的国家的力量。

自然，斯大林也必须考虑国际局势和西方国家政府的态度，西方国家对建立南保联邦无疑是不悦的，尤其是因为当时世界已处于冷战的边缘。我们以前也奇怪：斯大林为什么非要建立南保联邦不可，因为在战争中和战争刚结束时，他在处理凡是可能导致苏联和西方关系激化的事情上，向来是非常谨慎的。显然，他此时十分关心的是，如何调整新建立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和地位，好让这些国家听命于他。而使他感到不安的首先是南斯拉夫，南斯拉夫进行了广泛的人民解放的人民民主革命，自己解放了自己，因而独立和自信的精神异常强烈。

### 情报局第一次会议

斯大林企图扑灭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立精神，使它们屈从于他的政策，他的这一愿望的新的表现和形式就是他建议：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西欧最大的共

产党，即当时已有机会进入政府，或者已在政府中的各国共产党的某个共同中心。

于是，我们在1947年秋得到邀请，出席在波兰的耶累尼亚古拉召开的会议。然而，没有通知我们这次会议的议程和要达到的目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政治局委派吉拉斯和我为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率领苏联代表团的是日丹诺夫。苏共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我不记得了。<sup>①</sup>波兰党的代表是哥穆尔卡以及另一个政治局委员（H·明茨）；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是斯兰斯基和来自斯洛伐克的一位政治局委员S·巴什托万斯基；匈牙利的代表是法尔卡和J·雷瓦伊；保加利亚的代表是V·契尔文科夫和V·波普—托莫夫；罗马尼亚的代表是G·乔治乌—德治和安娜·波克；法共的代表是之·杜克洛和E·法戎，意大利党的代表是L·隆哥和E·雷阿勒。会议议程为两项<sup>②</sup>：第一，从国内外形势来审查各党的状况；第二，协调各国共产党的行动。<sup>③</sup>

---

① 除日丹诺夫外，苏共代表团的另一个成员是格·马林科夫。

② 此处语法不通，疑原文有脱漏，系揣译。——译者注

③ 从会议公报可看出：与会各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提出了《关于与会各党中央委员会工作的情况通报》。

公报接着说：“与会者就各党的通报交换了意见，并决定讨论国际形势问题，以及与会各国共产党交流经验和协调活动的问题。

……

关于各国共产党交流经验和协调活动的报告是由V·哥穆尔卡作的。



就在通过议程时，哥穆尔卡提出了一个问题：协调指何而言？由此可见，他反对建立任何有组织的共产党国际中心。这也是我们的立场。我们一致同意：我们将就此问题作出决定，即在讨论到这一议程时，我们将作出决定。

我要说，会议有两种工作形式：正式的形式——在会上，和非正式的形式——在会外，特别是苏联代表团会外非常活跃，对一些共产党代表团做工作。每个代表团团长都讲了话，作了报告，阐述了各党的观点，接着讨论报告。但是，在两个报告之间，有许多时间来进行各种事先的会外交谈。

我作了报告，阐明了南共中央政治局的观点和立场。当时，我国革命在国内取得胜利还不久，我们在许多方面尚相当僵化，宗派思想也颇为严重，而且我们觉得，国际工人运动，特别是欧洲工人运动可以比原来更

---

会议考虑到与会各党之间由于缺乏接触而引起的消极现象，鉴于需要交流经验，就这个问题决定建立情报局。”

会上通过了关于与会各党交流经验和协调活动的特别决议。决议说：

“……尤其是在今天，在战后国际局势变得复杂的情况下，各党有必要交流经验和自愿协调行动，因为共产党互不往来会给工人阶级造成损失。

从这一点出发，与会者同意：

- 1、建立南斯拉夫共产党、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人）、罗马尼亚共产党、匈牙利共产党、波兰工人党、联共（布）、法国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组成的情报局；

积极些，更革命些。自然，我们表示了对苏联的忠诚和感谢，感谢它在战争期间对我们斗争的援助。同时，报告明确地表明了我们的独立立场和我们反对建立某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心的立场，我们希望在奉行内外政策时不受约束。

除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意大利三个党外，其他国家共产党也作了类似的报告。以上这三个党的报告着力强调需要同其他民主力量建立联系。特别是意大利党的报告所依据的观念是：任何操之过急的革命行动都是地地道道的冒险主义，势必使工人阶级归于失败。

在休息时，吉拉斯和我与日丹诺夫交谈起来，日丹诺夫问我们对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的处境和政策有何看法。我们对他讲了我们当时的看法，我们当时的看法在颇大程度上是持批评态度的。正如一个年轻的革命一样，我们也认为，凡是我們能够做到的，任何人也

- 
- 2、责成情报局组织交流经验，必要时，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协调各国共产党的活动；
  - 3、情报局由各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组成，即各党中央委员会各派两名代表，各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应由各党中央委员会确定和替换；
  - 4、情报局出版自己的两周一期，以后为每周一期的机关刊物，该刊用法文和俄文出版，可能的话，也用其它文字出版；
  - 5、情报局设在贝尔格莱德市。”

情报局刊物名为《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在贝尔格莱德出版，一直到1948年7月。

应做得到。因此，在我们看来，意大利党和法国党的政策是机会主义的，即过分片面地强调通过议会道路来解决社会问题。日丹诺夫点点头，没有对我们的看法提出具体意见，可是，事后不久，同一天，或者是第二天，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向我建议：由吉拉斯和我在会上公开批评意大利共产党，批评法共，就照我们在私下对他讲的那样讲。这个任务对于我来说十分不愉快，尤其是连我自己对我们的立场是否正确也没有完全把握，除此之外，我们当时已表明了态度：各党的事情应当由各党自己处理。然而，苏联的权威在我们身上的威力仍然很大，吉拉斯和我还是同意了。就这样，我们在会上批评了这两个党。我批评意大利共产党，吉拉斯批评法共，主要是指责它们革命的积极性太低。自然，其他所有共产党的代表马上依次表态（这些党与我们一样，很可能事先就被人做了工作），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代表和哥穆尔卡除外。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由于自己所处的国内地位，比我们更能理解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处境，而哥穆尔卡则认为，各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它自己的事情，不是其他党的事。

隆哥和杜克洛为各自的党的政策辩护，但是态度很不坚定，因为他们显然没有想到他们的政策会遭到这样的攻击。

我们与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的关系自那时开始，自然变得十分冷淡，而且逐渐恶化了。我想，这就

是斯大林和日丹诺夫把我和吉拉斯推进这场讨论所要达到的主要目的。我可以肯定，斯大林当时已打算借助情报局来破坏南斯拉夫的独立，指望由于南共与意共和法共之间关系冷淡而得到意共和法共的支持，这样的事果真发生了，因为仅仅过了四个月，斯大林就开始向南斯拉夫发动攻势。因此，估计斯大林在情报局第一次会议上就考虑过给南斯拉夫以打击，这样的估计不能完全排除。

然而，耶累尼亚古拉会议主要讨论了议程的第二点，即协调各国共产党的行动问题。日丹诺夫建议，为了协调各国共产党的具体行动，建立各国共产党的某个常设委员会，以便定期开会并就采取共同行动取得一致意见。同时他又特别强调，这决不是建立某个共产国际式的新国际中心，该常设委员会不会有任何决定权，即无权作出各国党都必须执行的决定，但是，它会成为一个协调各国共产党行动的有益机构。

第一个坚决反对这一建议的是哥穆尔卡。他驳斥了关于建立某个新的共产党中心的任何设想，他说，尽管日丹诺夫同志强调这个委员会没有决定权，但是实践表明，有人乐意而且很容易把这样的机构恰恰变成这样的中心。国际工人运动迄今的实践表明，这样的中心弊多利少。哥穆尔卡主张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同时，如果有必要，各国共产党将与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的苏联进行磋商。

我们支持哥穆尔卡的意见。我们反对建立任何形式的共产党国际中心，哪怕是以谘询形式出现的国际中心，因为，任何这样的中心都会限制各国共产党的独立行动。我们说，各国党可能犯错误，但是，它们自己会纠正。同时，它们肯定也会利用其他共产党的经验。为了说明这一论断，我又补充说了一些话，与哥穆尔卡讲的话差不多。我说，苏联已拥有强大的实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如果各国党认为有必要，就可以征求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苏联共产党的意见。日丹诺夫的建议也遭到法国人、意大利人和捷克人的类似反对。假若我没有记错的话，只有匈牙利人和保加利亚人支持日丹诺夫的建议。

日丹诺夫发现，他完全处于少数，他的建议没有任何希望为大家所接受。于是他开始往后缩，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他这样做时表现得异常固执，尽管大多数与会的共产党显然都不愿建立任何形式的国际共产主义中心，哪怕是只具有磋商性质的中心，在这样的压力下，日丹诺夫的建议终于被采纳了：根据需要不定期地召开联席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各国党应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我要提醒的一点是，对日丹诺夫的建议的抵制相当强烈，以致斯兰斯基中断参加会议，乘专机飞回布拉格，以取得捷克党的领导对最后的，即最温和的建议的赞同。自然，我在同意上述建议之前也向铁托发了电报，

向他详细地汇报了真情实况。铁托同意在这样的建议书上签字，即不定期地召开会议，但只是在有必要时才召开。

情报局第一次会议就这样结束了，情报局后来的活动给人造成的印象是：这个机构是专为反对南斯拉夫而建立的，因为情报局后来开的所有会议都用来专门对付南斯拉夫。除了这些会议之外，共产党情报局再也没有开过别的会。

### 与斯大林最艰巨的一次会晤

耶累尼亚古拉情报局会议向斯大林表明，他用这种办法还不能使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听命于他。几乎所有东欧国家都反对听命于莫斯科。斯大林认为这有双重危险。第一，这是一个迹象，表明这些国家希望独立自主，希望巩固本国的独立，希望根据本国独立的利益奉行自己的政策。第二，他认为这些党的这样一种表现是一种危险，表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将开始奉行越来越与苏联的内外政策不同的政策，苏联将失去对它们的政策的影响。南斯拉夫顽强地为自己的独立而斗争，这对于他来说很可能就是一个实例。于是，斯大林便诉诸激烈的手段。

季米特洛夫给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季米特洛夫在一次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把新兴社会主义国家——保加

利亚、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组成统一的、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联邦的设想。

我们南斯拉夫人一开始就反对这种主张。第一，我们认为，这种主张是不现实的，而且简单地把国家的形成千差万别，历史迥然不同，从而结构、习俗、精神等等也完全不同的几个国家组成联邦，是办不到的。我们确信，这样的联邦很快就会成为内部发生严重的争执和冲突的根源，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第二，我们确信，这样的建议对于斯大林来说，是名副其实的挑衅，因为情报局第一次会议表明：斯大林最害怕的恰恰是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立自主。因此，我们认为，对待所有这样的建议和类似的问题，应当十分审慎。

我们的看法果然没有错。斯大林很快作出了激烈的反应。我们首先收到了一封电报，斯大林严厉地指责季米特洛夫讲的那番话，紧接着又接到第二封电报，斯大林要求召开三个党，即苏共、南共和保共的总书记率领的政治局代表团会议<sup>①</sup>。这就是说，铁托也得出席这次会议。但是，铁托预感到，斯大林打算通过这次会议还搞点什么名堂，而不光是批评季米特洛夫的建议。也就是说，不清楚，为什么斯大林除了要保加利亚人去莫斯科外，还要我们去莫斯科，尽管他知道，我们一开始就反对季米特洛夫的建议。换句话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在

---

<sup>①</sup> 这次会议于1948年2月10日在莫斯科举行。

莫斯科无所求。因此，铁托拒绝去莫斯科。

南共政治局确定了代表团，决定我为代表团团长。我们的代表团成员还有巴卡里奇、吉拉斯和弗拉多·波波维奇。保加利亚方面与会的有：季米特洛夫、科拉罗夫、特拉伊乔·科斯托夫等人。同斯大林一起与会的是苏共政治局核心领导。

我预感到，我们此行任务极其艰巨，不过，我未能料到整个这件事结果竟然会是这样。

斯大林粗暴地斥责季米特洛夫，其恶劣的程度是我没有料到的。斯大林说，季米特洛夫的建议是愚蠢的，简直是可笑的：一个老共产党人竟然会有这样的想法。不仅如此，他还认为，这个建议原则上是不正确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因为，没有苏联参加，就不可能建立任何广泛的联邦。接着他又说：“要是有一天建立联邦的话，我想，是会建立的，那么，我们就把俄罗斯联邦与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合并，把乌克兰与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合并，把白俄罗斯与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合并。”时至今日我也弄不明白：斯大林当时真的是这么想呢？还是在挖苦人？他还指责季米特洛夫，对如此重大的问题，竟未与任何人商量，也没有征求过任何人的意见。

我代表我们代表团简短地讲了讲。我们一开始就反对季米特洛夫的建议，首先，因为我们认为这个建议不现实。为此，我列举了我在前面已提到过的几个论点。我不想进行冗长的讨论，因为斯大林对季米特洛夫进行



了粗暴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愿再去攻击季米特洛夫。

接着便开始了极不愉快的那部分谈话。季米特洛夫尽管在革命斗争中是一位勇敢的人，但是，在斯大林面前，却显得象是一个在老师面前的学生。他连一句话也不敢反驳斯大林。可以说，他作了真心实意的自我批评，他最后说：“斯大林同志，我们大家都向您学习。”斯大林粗暴地回答他说：“您说什么，老家伙，您还要向我学什么。您就象一个去赶集的老太婆，逢人便唠叨，想到什么就说。”谈话就这样进行下去，进行了很长时间，因为保加利亚共产党其他几位政治局委员也都跟着季米特洛夫这么说，他们认为，除了季米特洛夫的自我批评，还得补充点内容。季米特洛夫低头不语，而我不知所措，不知道往哪儿看才好。我想象不到，国际工人运动中竟有这样的事。

接着斯大林换了话题。他说：“不错，联邦我们要建立，但是，季米特洛夫同志，不是您设想的那种联邦，而是另外一种联邦。我们要建立的第一个联邦是保加利亚—南斯拉夫联邦，而且要尽快建立。你们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同时，斯大林看了看我和我们代表团。换句话说，他叫我们来，是要我们首先对他的这一建议表态。斯大林的建议对于我们所有南斯拉夫人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关于这样的建议，事先没有向我们打过任何招呼。况且，这已是斯大林的第三个建议，与他在这一

前有关这一问题的建议是背道而驰的。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以便尽快作出适当的答复。然而，在我们过去几年有了种种令人不愉快的经历之后，在我们目睹，并经历了这次会议上发生的一切之后，我们深刻意识到：保加利亚共产党政治局是完全依附于斯大林的，当然，我们根本就不愿建立联邦。我们感到，斯大林想把某种特洛伊木马强加于我们，如果他得逞，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人民解放的南斯拉夫的独立将会完蛋。此外，经过几年之后，在我们现在看来，建立这样的联邦是完全不现实的，因为我们确信，在这样的联邦里，必然会产生导致严重冲突的内部矛盾，而只有靠苏联施加压力，这种冲突才有可能得以平息。因此，我立即作了否定的答复。我本来估计，斯大林会大发雷霆，就象他对待季米特洛夫那样。可是，他没有这么做。他很清楚，南斯拉夫是真正独立的国家，不能随心所欲地对待南斯拉夫，所以他对待我们小心谨慎。显然，他当时对我们代表团怒不可遏，不过，还是强忍住没有发作。

然后，斯大林问保加利亚人对建立联邦有什么想法。季米特洛夫兴高采烈地立即表示赞成，他说，这是巴尔干无产阶级多年的梦想，建立这样的联邦必然会加强巴尔干的社会主义，必然使邻国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保共政治局的其他委员也以类似的方式表示赞成斯大林的建议。

我再次打断了他们的话，据理力争，我说，南斯拉

夫和保加利亚是各有自己不同的历史的两个国家，因此，无论如何，需要时间为建立联邦创造条件。此外，为了把讨论引向另一个方向，我说，根据保加利亚同志的上述观点，我的理解是：他们认为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之间的联邦是两个成员，即保加利亚作为一个整体和南斯拉夫作为一个整体的联邦。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如果决定同意与保加利亚建立联邦，是决不会同意这样的解决办法的。也就是说，假如建立联邦，那么，只能是七个平等成员的联邦，而不能是两个国家的联邦。

保加利亚人变得不安起来，当即开始解释：这么做是完全行不通的，保加利亚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不可能同意与南斯拉夫那些过去根本不是国家的各个地区建立联邦。我回答说，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过去或多或少都建立过国家，即便他们没有建立过国家，他们也肯定不会同意建立只有两个成员的某种联邦。我还说，如果建立这样的联邦，那就与我们早在战争时期，在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确立的国内制度完全背道而驰，因此，这就会事先使得有关建立联邦的任何讨论无法进行。

斯大林平心静气地听着我们之间的争论，他突然打断了我们的争论，说：“南斯拉夫人是对的。联邦必须是七个成员，而不是两个成员。”斯大林的回答使我感到意外，但又感到不怎么舒服，因为我原以为他会支持保加利亚人，从而便于我们抵制建立联邦的压力。我对

他的这一回答沉默不语。但是，保加利亚人也照例默不作声。他们一声不吭地接受了斯大林的决定。

接着，我继续往下说，我说，问题并不在于是建立两个成员的联邦，还是建立七个成员的联邦，而在于联邦本身，因此，应当坐下来，就建立联邦的速度、方式和形式问题进行彻底的讨论，这些问题在准备如此重大的政治决策时都要加以考虑。我们必须考虑到，应当使我国各族人民满意地接受这样的决定。有鉴于此，我认为，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斯大林厉声地打断了我的话，他说：“不行，不能拖延，联邦应当建立，最好明天就建立。”

当然，我对此无法再作出任何回答和提出论据，而只是说：“斯大林同志，我们的代表团没有受权就这个问题作出决定，因为代表团没有得到通知说这次会议要谈这个问题。代表团将把会议情况报告我们的政治局，然后由政治局就南斯拉夫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作出最后决定。”

斯大林当时气极了，不过他再也不谈联邦了，而是批评起我们的对外政策来了。首先他猛烈地攻击我们在采取对外政策行动时不与苏联磋商，对此我回答说，凡是比较重大的问题，事实上我们都与他们磋商了，我想不起有哪一个问题没有通报苏联。接着，斯大林首先尖锐地指责我们，说什么我们想派我军的一个师到阿尔巴尼亚去。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阿尔巴尼亚人一度——不管有无道理——感到受到希腊人的威胁，因此向

我们求援。我们答应他们，如果有必要，我们将派我军的一个师去帮助他们。这一点，我们的确没有告诉苏联，因为我们相信，阿尔巴尼亚人肯定会告诉苏联的，因为这是他们的事情。他们也这么做了。然而，莫斯科当时就马上进行了干预，反对采取任何这样的步骤，所以我们也撤销了自己的决定。但是，斯大林认为有必要现在把早已了结的事再次归咎于我们。

斯大林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希腊问题。他直言不讳地问我：“难道你们真的认为希腊的起义有可能成功？”我答道，不是我们在组织希腊的起义，而是希腊人自己组织了起义。我们同他们相邻，因此，我们不能回避而不向他们提供每一个革命运动都应当向其他革命运动提供的那种援助。至于说希腊起义能否成功，这取决于各种因素：如果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得到发展，如果国际局势适合，如果起义得到必要的援助等等。斯大林马上打断我的话：“如果……如果……如果……你们的全部期望的出发点都是‘如果’。以为西方国家会把希腊让给共产党人，那是纯粹的幻想。你们与希腊共产党人一起都耽迷于幻想，而且你们使我们大家都处于政治上困难的地位。”

我对他说：“斯大林同志，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如果在希腊，在我们的边界上爆发了起义，他们要求我们援助，如果他们把伤员运到我们的边界上等等，我们要不要封锁边界，把这一运动拒之门外？我们该怎么办？”斯大林厉声回答说：“上帝保佑！但愿你们是对

的，也许我错了。我已经在了一件这样的事情上做错了。这就是中国。当时我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会取胜。我那时认为美国人将全力以赴扑灭中国的起义。我曾劝说毛泽东，最好是与蒋介石和解，与蒋介石建立某种联合政府。我甚至把中国代表团召到莫斯科来。代表团来了，听取了我对他们讲的一切，照中国的习惯，他们都面带笑容，直点头。然后走了。他们回去后，毛便开始发动一场革命大攻势，最后取得了胜利。你们看，我也会犯错误。上帝保佑，但愿在希腊问题上也是这样。但是，我得说，我不相信这一点。希腊不是中国。”

在斯大林陈述了这样的态度以后，我才明白：为什么苏联对希腊起义的援助只是在口头上，而在物资方面的援助实际上只是象征性的。一旦斯大林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之间发生了冲突，他马上可以说一夜之间，就把希腊起义扼杀了，而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

顺便补充一点，斯大林经常用“上帝保佑”这句话，不了解他的人，可能还以为他是信教的呢。

我记得，最后斯大林指责我们对他们的顾问态度不好，不给他们正经的事干，我们的人不听他们的，而是自行其是。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回答他的，不过，很可能同1947年回答的差不多。然而，斯大林直摇头，表示不同意，于是沉默不语了。我们与斯大林的最艰巨的，也是决定性的一次会晤就这样结束了。

当我们离开克里姆林宫，还在克里姆林宫院子里

时，我们都默不作声。我们商定在莫斯科散散步。我们一走出克里姆林宫院墙，相信谁也偷听不到我们的谈话时——至少我们是这样想的——，吉拉斯就说：“现在我们必须不得不尽快与保加利亚建立联邦。”我回答他说：“恰恰是现在，不能这么干。”因为很清楚，斯大林之所以再次改变了对建立联邦的态度，只是因为他认为，现在他把保加利亚牢牢地控制在手里，实际上，他通过使季米特洛夫信誉扫地更加牢固地控制了保加利亚；现在，他可以同身居保加利亚国家最高层的一班教条主义分子一起“推动”保加利亚与南斯拉夫建立联邦，从而挖去欧洲唯一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根基。

说实在的，吉拉斯并不赞成与保加利亚建立联邦，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想法与我们所有人的想法一样。但是，他大概不相信我们的力量和能力，也不敢想象我们敢于坚决顶住斯大林的压力，如果斯大林坚持要建立联邦的话；其次，他显然没有意识到，建立这样的联邦随之会产生的种种后果。因为如果建立这样的联邦，就意味着人民解放的、社会主义的和铁托的南斯拉夫就会垮台，南斯拉夫会完全依附于苏联的政策。我们在莫斯科的经历就已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还在克里姆林宫时，季米特洛夫就邀我们下午到他的别墅里去，他的别墅座落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处森林里。季米特洛夫在别墅里招待了我们，没有谈任何政治问题，之后，他邀我们在林间散步。他握着我的手，

开始详尽地向我解释，如果我们建立保加利亚—南斯拉夫联邦，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好处。他提出的论点是这样动听，我们都乐意听他的，而他知道我们乐意听他提出的论点。他说，“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加起来有两千多万人。这会是一个强大的国家，用不着看他人的脸色行事。我们会独立自主地执行自己的政策。我们要走自己的路去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必要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看来完全与苏联的一个样。苏联是在困难的条件下发展的，而我们没有这样的困难。我们的社会主义将具有更加民主的形式。我们在巴尔干和世界上都会是活跃的。从前只能设想：将来会产生巴尔干联邦。因此，不要怕联邦。相反，我们将共同建设一种更加民主的社会主义。”

季米特洛夫所讲的这一切——独立、自主和走自己的路去建设民主形式的社会主义——以及对苏联的实践和斯大林的虽然隐晦、但却一目了然的保留态度，都是符合我们的观点的。直到今天我仍不清楚，季米特洛夫的这番解释有几分真意，又有几分是想帮斯大林的忙，因为他猜想到是什么原因使我们反对建立保加利亚—南斯拉夫联邦。我认为，第一种成分居多，第二种成分少。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季米特洛夫是犯了大错了，因为尽管他有这种愿望，当时的保加利亚纯粹是斯大林的代言人，即便季米特洛夫反对，恐怕在这个问题上也抵挡不住。而季米特洛夫在与斯大林会晤时的表现，以及对斯大林的训斥所采取的态度，使我们不相信他顶得住斯大



林的压力。因此，无论是我，还是我们参加讨论的其他同志，回答时都很简短，而且不明确。我主要推说：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表态，我们要把在莫斯科发生的一切报告贝尔格莱德，报告铁托和南共政治局，我们将向他们通报贝尔格莱德作出的决定。不过我还是说，尽管他提出了有力的论据，但是，我认为我们党的政治局在目前情况下不会决定与保加利亚建立联邦。

在莫斯科我们又呆了一两天。第一，因为我们想观光一下莫斯科；第二，因为我们原来估计还要与莫洛托夫会谈，以及就经济合作问题进行会谈。

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与莫洛托夫会谈。第二天夜里，凌晨三点钟，我被叫醒，接到通知说，莫洛托夫叫我去克里姆林宫。我以为我们很可能要谈某些对外政策问题。但是，当我抵达那里后，莫洛托夫把一份文件扔到我面前，对我说：“请签字。”我拿起文件，见上面写着：苏联和南斯拉夫两国商定，将就所有对外政策问题进行磋商。

我全身的血液沸腾起来。我感到，不仅我个人受到凌辱和伤害，而且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南斯拉夫也因此而受到凌辱和伤害。同时我感到茫然，不知如何是好。对于这样一个文件，我实际上几乎没有思想准备，就象在斯大林那里讨论与保加利亚建立联邦没有思想准备一样。我想站起来，一走了事。但是，我同时又害怕，冲突一下子积得太多，以后难于消除。我还想到国内可能会有意见，国内可能不把整个这一问题看得那么重要，

因为确实到那时为止，所有重大问题，我们一直是与苏联磋商的，因此，这样签个字，决不是什么新鲜事，于是最后我决定签字。然而，盛怒之下，我把名字签错了地方，签在了莫洛托夫应当签字的地方。这样一来，整个这份文件暂时就报废了，但是，遗憾的是，他们很快又送来了一份。我只好在上面签了字。

第二天，我拜访了负责经济的一位副部长，我记得是帕托利切夫，我又一次感到失望，并再次得到证实：这一切是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次会谈降级了，是在苏联政府部门一级进行的，这一事实本身是一个不祥的信号。实际上，在我说明我们关于进一步进行经济合作的建议时，这位副部长就断然地拒绝了任何建议，并说这个问题将由更高一级领导作出决定。我们的会谈就这样结束了。显然，现在他们从各个方面，从政治上、对外政策上以及经济上，所有的炮口都是针对我们的。

这就是为所谓的“1948年情报局会议”作的准备。我们感到了一股冷风袭来，当然，我们没有料到，仅仅一个月之后这股冷风竟变成了强大的暴风雪。

当然，铁托和南共政治局同意了我们代表团的立场，并通知莫斯科和索非亚：南斯拉夫共产党政治局认为，目前建立联邦为时过早，应当就这个问题进一步研究，并为今后建立联邦创造条件。

敏感的斯大林当然认为，抵制建立联邦，意味着不顺从，是向他挑战。我们料到他会作出某种反应。事实

上，也用不着久等他的答复。

一个月以后，1948年3月就来了第一封信，这封信是某种序幕，接着一封封信便接踵而至，这些信猛烈地批评和攻击铁托，攻击我们党的领导及其整个政策，这一切以苏南国家关系以及党的关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彻底决裂而告终。

### 关于斯大林

上面谈了我与斯大林的最后一次会晤，现在是时候了，让我从与斯大林几次会晤的角度，谈谈对他的总的看法。我的印象是，斯大林是个有才干，聪明的人。他知道他想干什么，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不择手段。十月革命之后不久经受的痛苦经历迫使他实行恐怖和暴力，以保持十月革命的基本原则，而这种经历变成了他的生活实质。他极为粗暴，专横，同时又灵活善变。他善于迎合与他谈话的人的口味，善于随机应变和适应谈话的目的。1944年秋天，他的那次谈话实际上从头至尾是把注意力放在舒巴希奇和丘吉尔身上的，至于在我们方面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对于他来说是无所谓的。另一方面，我们要求解散合营公司，他接受了，而没有露出任何不安，甚至还予以肯定，表示赞同。那次会谈自始至终是在极为客气和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但是，尽管如此，我相信，斯大林那时就对我们有一个很坏的印象。

战争期间以及战争结束后不久，他使整个政策从属于反希特勒同盟内部关系的政策。这一点，我们不能责怪他，因为战争的胜负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关系的。但是，同时，他却以寡廉鲜耻的态度来对待革命运动，准备为维护自己在反希特勒同盟中的利益而轻易地牺牲这些革命运动。对待我们的态度就是如此；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与德国人一起在南斯拉夫全境向我们发动进攻，因此，当时要与他达成合作协议的任何想法都是无稽之谈，正当这时，斯大林却强迫我们与米哈伊洛维奇合作。他对待革命的中国的态度也是如此，他“鼓动”毛泽东与蒋介石达成协议，而当时蒋介石正准备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彻底打垮革命中国的红军。战后的情况也是如此，当时尽管并不存在共产国际，但是斯大林却企图使欧洲所有共产党服从于他的政策，特别是使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外政策服从于他的政策。斯大林千方百计使社会主义国家成为执行他的政策的驯服工具。几乎可以说，他害怕革命，害怕革命运动。在他看来，新条件下的革命思想意味着社会主义阵营的扩大。他对待任何自主的革命现象都是抱着一种嫉妒的，不信任的态度。

虽然如此，十月革命后，他维护了十月革命的基本原则，采用极端粗暴的手段，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并在这一基础上创立了世界上最强大的，装备最好的军队之一。他的这一切成就都与极端粗暴和专横的手段联系在一起。然而，这一切发生在一个到昨天为止还

是十分落后的国家里。人们常问：难道在这样的国度里就不可能换一种方式行事，每当提出这样的问题时，总是感到难于回答。毋庸置疑，是有可能换一种方式行事的。然而，另一种方式是什么样的，却很难回答。事实是，“另一种方式”没有出现。如果阅读斯大林的反对者的著作，同样看不到出路。

依我看来，斯大林之所以成为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斯大林，其原因并不是象某些不了解苏联革命真正进程的人所说的那样在于斯大林的粗暴、狭隘，而是在于他的目标和他的方法，而首先是在于他的目标。斯大林的头脑里没有社会主义——尽管实际上他是真心诚意地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他有的则是社会主义帝国。他想统治各国人民，主宰国际工人运动。而方法则继承于世界这一地区的旧时代，这些方法是从旧时代条件下过来的一代人中的大部分人的精神状态的一部分。因此斯大林是不难为他的政策找到市场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斯大林面临两个主要问题：第一，如何控制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使这些国家从属于他自己的政策；第二，尽管不存在共产国际，如何使国际工人运动的政策从属于他的这一政策。于是便产生了共产党情报局，于是便对南斯拉夫发动攻击，并且把这一攻击扩大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遗憾的是，斯大林在这些国家获胜了。一度，他也战胜了西欧共产党。这便是从1948年，或者甚至从1947年开始，直到斯大林去

世为止持续了多年的专横跋扈的由来，斯大林满以为将建立起一个社会主义大帝国，他能够与资本主义世界进行平起平坐的对话。

然而，斯大林的计划没有完全实现。首先，这一计划遭到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成功的抵制。而且，还不止于此。社会主义自治以其全部力量再次出现在议事日程上，社会主义自治作为一种思想对社会主义国家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表面上，斯大林与新中国保持正常的关系，但是，实际上两国之间关系经常是尖锐而紧张的。在一些共产党里开始出现了最初的动摇和分裂，这些共产党很难在本国人民面前为斯大林搞的那些诉讼案及其整个恐怖统治辩解。

此外，斯大林是个贪权的人。他把整个制度建立在运用警察和行政当局的力量基础上。因此，我本人总是有这样的印象：斯大林对权力的这一欲望并非完全出于这种欲望本身，而是出于害怕，担心他所建立的制度作任何变动都可能意味着整个制度崩溃，意味着革命遭殃。

因此，在斯大林去世的当天，他在国际上的威望，他的声誉就开始跌落，这就不是偶然的了。而在他死后仅仅几个月，苏联人民，或者说苏联人民的领导人就把他放在适合于他的地方——置于历史上的暴君之列，这些暴君自以为是在为美好的事业而奋斗，然而给人类带来的害却多于利。

## 共产党情报局与1948年

### 坚定地说“不行”

如果观察一下南苏两党关系发展的全部过程，从南人解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以及日丹诺夫在耶累尼亚古拉会议上开始玩弄的阴谋，直到与斯大林的冲突达到高潮，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斯大林的脑子里有一个如何搞掉铁托的南斯拉夫的自主和独立的计划。甚至在他让步的时候，他也决不宽恕。1941年在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问题上发生过冲突；在南人解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问题上发生过非常尖锐的冲突，这次会议是在莫斯科不知情的情况下召开的，莫斯科对此作出了十分尖锐的予以否定的反应；在专家和合营公司问题上发生过冲突，说实在的，这次冲突是顺顺当当地解决的，因为斯大林认为要揭开反对南斯拉夫之战为时尚早，因此他很快就接受了南斯拉夫的要求；最后，还发生过斯大林与我们的其它一系列类似的冲突，因为别人是没有胆量采取这样的步骤的。所有这一切，在斯大林看来是眼中钉，肉中刺，为发动最后的攻势，他足足做了四年的准备。

1948年3月底的一天，莫斯科的一位特使，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名军官来到铁托那里，交给铁托一封封得严严实实的信。信是写给铁托和我的，当时的抬头还用“致铁托和卡德尔同志”。说实在的，这封信还是用比较客气的语调写的，但信中却罗列了我们在内外政策中的所谓错误，以及表达了苏联领导对此感到的严重忧虑。<sup>①</sup>

在南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我们认为这些非难是诽谤并决定予以驳斥。在与斯大林的冲突展开的这一阶段里，唯有斯雷滕·茹约维奇持相反的意见，他建议我们承认斯大林指责我们所犯下的错误。同时，茹约维奇竭力想证明我们确实是犯了这些错误。然而，他成了只身一人，后来和他结伙的赫布兰在这时还保持沉默，因为他很可能在等待着事态的结果，或者是莫斯科给了他这样的指示。政治局的其他所有成员都坚决支持铁托，即支持他提出的驳斥这封信的建议。

铁托对莫斯科的这第一封信写了复信，并向政治局全体成员征求意见。我们每个人都补充了一些东西或者删去了一些东西，但主要内容还是铁托原来的复信。<sup>②</sup>

---

① 指联共（布）中央委员会1948年3月27日的第一封信。信的开头写着：“致铁托同志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们。”参看本页附件，第272页。

② 南共中央1948年4月13日对莫斯科第一封信的复信，是由铁托和卡德尔签名的。



不久，莫斯科接着又发来了第二封信。<sup>①</sup>信还是写给铁托和卡德尔的，但是我记得，已不带“同志”了。信写得很粗鲁，咄咄逼人，而且把第一封信里提出的非难扩大到一切可能的领域。信的结尾要求我们承认错误并加以纠正，说为了使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南斯拉夫共产党就必须选出更好的领导，知道怎样去领导党的领导。

我们对这封信还是坚定地回答说“不行”。我们同时指责那些批评我们的人对我们的情况不够了解，因为否则他们是不可能写出这些明显不符合事实的东西来的。<sup>②</sup>

对于我们的复信，莫斯科紧接着又来了第三封信，这封信的抬头已不再是写给铁托和卡德尔的，而是写给铁托和赫布兰的了。<sup>③</sup>由此显然可以得出结论，赫布兰应该接替铁托。同时这也是在提醒南共政治局，谁将是南斯拉夫共产党未来的头面人物。在这前不久，赫布兰曾给政治局写过一封信，信中详细阐述了他的立场，尖刻地批评了我党在各方面的政策，当然，都是根据斯大

---

① 莫斯科1948年5月4日的这封信抬头写着：“致铁托同志、卡德尔同志和南共中央委员会。”见附件第272页。

② 南共中央1948年5月17日对第二封信的复信，是由铁托和卡德尔签名的。

③ 莫斯科1948年5月22日的第三封信的抬头写着：“致南共中央委员会。”见附件第272页

林的信写的。这是南斯拉夫共产党未来首脑的某种学术论文。

第三封信还同时通知我们，在布加勒斯特召开共产党情报局第二次会议，日程是南斯拉夫问题。他们邀请我们参加这次会议，同时又指责我们不让我们的人民了解整个争端，说我们不敢公开斯大林的信，因为公开了的话，人民会马上消灭我们，等等。事实则相反，是斯大林，而不是我们，派特使，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送来了盖着九个印章的信。然而，面对这种挑战，我们决定向全体公众公布全部信件。信公布了，当然，引起了同斯大林的预料截然相反的反应。<sup>①</sup>

他以为，只要提一下他的名字，一切就会畅行无阻，但是他忘了，他只在苏联造成了这种状况，在苏联境外并不是这样。忠实于自己的独立的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本能地感到，这些信件对他们的独立来说是致命的危险。因此，出现了反对斯大林和反对苏联政府的强烈反应，而我们的党则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最广泛的支持。这期间我们拘捕了赫布兰和茹约维奇，这并不是由于他们所持的立场，而是由于我们担心苏联会把他们弄过境搞到罗马尼亚去，让他们出现在情报局会议上。说实在的，对

---

<sup>①</sup> 联共（布）中央的几封信，情报局1948年6月28日的决议，南共中央的复信和南共中央6月29日就情报局决议发表的声明，一起发表在南斯拉夫1948年6月30日的日报上。见附件第272页。

我们，对我们的党来说，发生这样的事的话，也不会是什么灾难，但却会给我们增加很大的困难。此外，他们已开始采取公开的政治行动和破坏党的团结的行动，这是我们必须阻止的。

一场生死搏斗开始了。我们不仅动员了军队，而且还动员了大部分人民。沿着与东欧国家接壤的所有边界，我们都挖了战壕，筑起了工事。国家用一切手段筑起了防御工事。如果重新出现类似事件，我们还得照此行事。我们毫不留情地对待国内的共产党情报局特务。但是我们又不能有别的做法，否则我们就将直接为斯大林打开大门。

斯大林组织了一场持久的名副其实的斗争。我们每天都有个把共产党员、军官、机关干部、外交官、大使等等逃走。说实在的，这些逃跑的人总的来说为数不多，但是这种情况却不断制造了不安定的气氛。我当时被任命为外交部长。<sup>①</sup>清早，我来到办公室，第一件事是看看桌子上的文件，看能否了解到，是否又有哪个外交官从国内或从国外逃跑了。值得庆幸的是，不论是外交机构还是国家行政机构和军队，都表现得坚定不移。斯大林分子只勾引去了一小部分军官，并且这些人逃到另一边去，完全是出于野心，而不是出于什么意识形态信念。

---

<sup>①</sup> 1948年8月31日。

然而，最困难的问题还是在于我们自己。我从十六岁起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一直毫无保留地相信苏联和斯大林。1934年我作为流亡者第一次来到苏联时，曾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我是一个从许多训练班和学校毕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所相信的东西不是一种简单的信念，而是一种理论信仰。第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对我们来说从来都是一种榜样和支柱。但是我们现在恰恰是与这个国家和与它的领导人斯大林发生了冲突，不仅如此，而且还互相指责对方犯有各种各样变节行为。<sup>①</sup>

开始时我们还希望在这场斗争中至少会有几个别的国家的共产党帮我们说话。然而，它们竟一个接一个地屈服于斯大林的独裁。例如，我们指望过阿尔巴尼亚，但是阿尔巴尼亚却参加了第一批起来反对我们的行列。我们指望过匈牙利，因为我们与匈牙利有着很好的关系，但是拉科西却在给我们的复信中说：“不是每一只公鸡都能在它的垃圾堆里充当主人的。”接着，法国共产党

---

① 当时，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给我们党，给南斯拉夫党政领导人扣了这样一些帽子，例如“铁托法西斯集团”；“帝国主义的雇佣军”；“受雇的杀人凶手和间谍”；“资产阶级复辟的间谍集团”；“有法西斯意识形态、奉行法西斯对内政策和卖国的对外政策的铁托集团”，等等。

这些帽子首先出现在情报局的第二个决议里，这个决议是1949年11月在匈牙利作出的，题目是：《南斯拉夫共产党掌握在杀人凶手和间谍手中》。

和意大利共产党以及全世界各国的党也都跟着过去了。只有一些小组试图帮助我们，它们意识到这场斗争意味着什么，于是脱离了上述共产党。但是这只不过是无人听见的荒漠孤声。

开始时，季米特洛夫在这场运动中显得是有保留意见的。在冲突刚开始的时候，他途经贝尔格莱德，甚至对吉拉斯说：“坚持下去！”然而，在返回索非亚之后，他也很快屈服了，并开始发表讲话反对我们。

西方的立场很不一致。一部分人认为铁托的南斯拉夫的末日到了，它绝对不可能顶住斯大林的压力；而另一部分人可以说是少数，他们相信南斯拉夫能在这场反抗中顶住并取得胜利，并开始以扩大贸易等形式给了我们初步的经济和物质援助。还有第三部分人，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反共分子，他们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共产党人之间安排好了的，目的是为了较容易对西方施加影响。

斗争从政治领域转入经济领域。逐渐地，但却非常快地关闭了边界；撕毁了与南斯拉夫签订的所有经济协定；中断了铁路和邮政联系；在边界的另一面拉起了高高的铁丝网，筑起了了望台；沿铁丝网重新翻耕土地，以便发现可能偷越国境的人的踪迹，等等。简言之，从匈牙利西部地区一直到保加利亚南部，以及沿阿尔巴尼亚边界，我国与这些邻国的各种联系都中断了，好象我们都不存在了一样。所剩下的一切就只有不断发生的边

界事件、冲突、打死人、打伤人等等了。

当然，我们除了在我们的边界上部署防御以外，还在其它各个方面展开活动。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打开与西方国家进行经济合作和贸易的渠道。因为与斯大林发生冲突后，我们在一段时间里完全或几乎完全被封锁了。我们与西方的经济合作相对地很少，远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而与东方又一夜之间停止了一切经济联系，南斯拉夫经济发展的全部援助来源均告中断。

向西方开放的过程进展缓慢，但是毕竟在进行。最初我们的过渡性政策也妨碍了这一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想立刻就对苏联“全线反击”，我们不想为武装干涉南斯拉夫提供借口。我记得，1948年我在联合国大会的会议上发言时，仿佛南苏关系中没发生任何变化一样，尽管当时同苏联的冲突已达到顶点。<sup>①</sup>

---

① 指1948年9月21日到12月12日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三次会议。

然而，有意思的是卡德尔1948年10月4日写给铁托的信。信中描述了我代表团成员在关于南共与情报局的冲突的谈话中所看到的气氛和情绪。卡德尔写道：

“在围绕我们与情报局的争执的某些比较重要的问题方面没有什么新闻。就我们与各种左派知识分子的接触而言，可以说，这一争执现在变得比过去更不能令人相信了。从站在情报局

## 自治——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我们自己也属于其中的那种意识形态的主要体现者的信任，可以说一夜之间破灭了。我经历了一场内心的痛苦的危机，几个月后才恢复过来。这并不是在对整个这件事作出选择上出现了动摇。对这个选择的决定，我第一天就作出了。因为真理始终是我的指导原则，而斯大林对我们的所作所为充满了如此露骨的谎言和诽谤，以至于如果你支持这种谎言和诽谤的话，那你就使自己沦于卑鄙无耻之徒的境地。

这一内心的危机在下述问题上确实有它自己的真正的根源，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所有这些事情？它们是怎样发生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出现这些骇人听闻的变化的原因在哪里？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前景怎样？怎

---

立场上的那些人那里所能听到的通常回答是，我们错了，因为我们促成了整个争吵的发生。然而，相信指责本身的只是少数人。可以肯定，随着时间的消逝，对我们提出的指责将越来越表明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和虚假的……

看来，正直的人们头脑中的每天的事实，在日益打破充满各种诽谤的情报局决议的断言。维尔凡曾同一些美国共产党人知识分子谈过话。他们说，他们之所以站在情报局的立场上，只是出于遵守国际纪律和担心国际反帝运动的命运，因为如果事实表明我们是对的，联共（布）中央的威信就会动摇，他们认为是会发

样做才能使我们自己避免犯这样一些严重的历史性错误和走上歧途？

我记得，我有时在我的房间里几小时地踱步，在唱机放送的贝多芬交响乐和其他类似音乐的伴随下思考这些问题。我想的是将来，而不是过去。在到那时为止我的一生当中，我进过许多马克思主义训练班和学校，也花了不少时间来自学。我回忆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著作中所有能找到的、提醒社会主义会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的观点。我们在青年时代读到这个问题时，以为这不过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是决不会发生的。而现在，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种论点却偏偏被我们亲身证实了。当然，政治局的每个委员都以类似的方式在思考。我们经常到铁托那里聚会或者互相谈论。我和基德里奇讨论得特别多，他当时正领导着我国社会生活的一个最困难的部门——经济。尽管他夜以继日地

---

生这种情况的。同时，他们谴责情报局对我们采取这种做法。这些人说，我们的事件对国际工人运动之所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也站在同样的立场上。他们说，中国共产党的这样的态度早就是众所周知的‘令人忧虑的现象’了，他们把这种态度叫作‘毛主义’。

在巴黎这里，人们进一步得到这样的印象：联共（布）中央与我们的冲突不是偶然的，实际上，它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场危机的第一个征兆，这场危机将必然促使它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做着经济工作，但还是非常积极地参加了我们的其他所有的讨论。

对我们大家来说，主要问题是社会主义社会里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并不天真，我们并没有以为社会主义没有矛盾，因为我们自己早在以前就曾与斯大林发生过冲突。然而，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至少是我，都没有能想到，冲突竟能达到如此骇人听闻的规模，采取如此骇人听闻的形式。

因此，在经过这些长时间的共同讨论以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即在这个问题上起着主要作用的，并且将来也会起这种作用或更坏的作用的，是两个因素，两个原因：第一，共产党的变态，变得与国家机器，甚至与警察机器等同。这样一来，无产阶级国家的原则变成了一个人独裁或者围绕他的机关的独裁的原则。

我们认为，第二个原因在于工人阶级群众脱离政权，而且是脱离了所有的执政形式，甚至连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最初形式所赋予工人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工人变成了国家的某种雇佣工人。

此外，第三个也是非常有影响的一个因素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十月革命是在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里进行的。这个国家不仅经济落后，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落后，他们仍处于旧俄罗斯的精神状态的影响之下，或者说，大部分人都受到这种精神状态的影响。

我们明白，我们必须集中解决我国社会中首先与前

两个因素有关的那些问题。自治的思想就这样再次活跃起来。这并不困难，也不是新的，因为这种思想早在人民解放斗争中就产生了，也就是说，人民解放斗争时期的所有人民政权，实际上都是自治。战后我们也一再警告，党不能丢掉与群众的联系。铁托对这个问题讲过多次，而我本人，正如我已说过的，也曾就这个问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人民群众的力量》。<sup>①</sup>

全党都朝着这一方向，我们很重视发展人民解放阵线，竭力不失去任何一个爱国者——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同盟者，我们努力在工厂里创造尽可能民主的气氛等等。然而，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流逝，首先是在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做法的影响下，官僚主义在我们这里也日益扎下根。此外，官僚主义在我们这里之所以滋长，还因为有一个客观因素，这就是经济困难极大，人们所必需的各类用品到处都极度缺乏，所有这一切都要求对我们所拥有的不多的物资实行中央集权的管理。但是，尽管有这种情况，我们还是可以说，在人民解放斗争中产生的自治，在战后的头几年并没有停滞不前，这一点恰恰是斯大林攻击我们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外，战后我们这里还自发地产生了实行自治的一些新形式。在我们被东方完全封锁，与西方保持的经济

---

<sup>①</sup> 见附件第285页。

合作极为有限——这种合作同样差不多等于是封锁——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向我们的工人讲了全部真实情况，还讲了我们必须自力更生，也就是说，我们对他们说：你们生产出什么，我们就会有什么。工人非常明白当时的形势，自觉地在各方面进行紧张的工作。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们就恢复了我們极其需要的东西，并建设了一批新项目，同时我们与西方的经济合作逐步得到了改善，这有助于我们加速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但是，要是没有我国劳动者当时所表现出来的主动性和努力，我们就不能达到我们已经达到的那种发展速度。

我记得，1948年我就写过关于我国工厂里自发产生的工人委员会的问题，认为我们必须研究这些自发的现象。当然，这是工人的自由集会，没有组织，也没有某些专门的权利，仅仅是讨论劳动、生产等方面出现的紧迫问题。但是，我可以这样说，这些工人委员会是自动地产生的，用了这个名称或者另一个名称，并且真正给我们指出了我们必须走的道路和方向。

第二个问题是党的问题，就是：党与国家，甚至与国家的资本以及通过国家的资本与国家专家和治国主义的行政机关等同起来，还是党仍然是已成为国内统治力量、从而也就成了国家政权的统治力量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党必须率领工人阶级，而不是统治工人阶级。自治的工人阶级必须对国家权力和经济权力的所有杠杆施加决定性的影响，而

党必须成为这样一个因素：它将把针对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敌人的那些行动和斗争的知识、理论、经验和方法带到工人阶级这种活动中去。我们明白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但是，如果我们想避免我们在与斯大林的冲突中所遇到的那种变态，这又是唯一一条可行的道路。

这便是我们从所有那些长期的讨论中得出的两个主要结论，这些讨论逐渐获得了有组织的形式了。我要说，这也是我们内部危机的终结，因为这时我们已经知道了，我国社会应该向哪个方向发展，我们将为什么而奋斗。铁托始终关注着这一过程和这些讨论，并直接参与讨论。南斯拉夫在发展中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和我们全国遭受了那种激烈的攻击以后，这个新阶段是任何人都不曾料到的。

1949年春天，我们南共政治局的几名委员到斯普利特去探望铁托，他正在那儿休息。我们建议铁托把自治定为社会制度，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章程的某些部分加以修改，党的名称本身改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

在第一个问题上，即自治问题上，铁托不仅同意建议，而且还认为，自治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可行的道路，因为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自治是他在实践中极为关注的。同时，他的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之前工人所提出的一个老的口号：“土地归农民，工厂归工人。”他对这些问题考虑得非常多，并提出了一整套组织形式和措施来着手实现这一建议。

我们决定起草工人委员会法，作为整个自治制度的基础。这一制度将逐步得到发展，因为一夜之间是不可能进行如此深刻的社会改革的。

至于另一个建议——把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名称改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铁托在斯普利特开始时有某些保留意见。他列举的理由是我们党的名称有本身的传统，而首先是存在这样的危险：经过改名，党在社会上的作用可能削弱。然而，经过短时间的讨论以后，他也接受了这个建议。后来，这项建议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被通过了。<sup>①</sup>铁托之所以接受了关于我党改名的建议，首先是因为要使南斯拉夫共产党可以说从外部区别于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党（这个党对南斯拉夫共产党进行了如此激烈的攻击）。

1950年通过了工人委员会法，铁托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历史性讲话，这个讲话今天仍然是发展工人自治的基础。1953年我们通过了宪法性法律，即新宪法，这部宪法固然还不很完善，并包含一部分旧宪法的内容，但是，这部宪法已把自治带进了社会体制的基本社会关系中，不仅在工厂里，而且在整个社会上改变了国家和专家治国主义行政机关和工人的作用。这就不仅在工厂里，而且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中，为自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sup>②</sup>

<sup>①</sup> 南斯拉夫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于1952年11月2日至8日在萨格勒布召开。

<sup>②</sup> 参看本页的附件，见第285页。

## 对外政策舞台上的斗争

### 我们的对外政策主张——不结盟

1949年期间，我们巩固了我们的外交机构。这一机构中有几个人跑到苏联方面去了，有几个人是我们自己把他们开除了，因为在当时的形势下他们不够可靠。换句话说，形势要求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外交机构。在外交机构的国内外一些关键岗位上，我们都委派了可靠而能干的干部，他们大多数是战前或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入党的共产党员。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在一些国家和国际机构及国际组织开展活跃的政治活动。

当然，我们首先要开展反对苏联压力的斗争。但是，我们在这里也有悬而未决的问题，不仅是如何谴责苏联的反南政策，如何维护自己，而且还有我们将来的对外政策应该是什么样的问题。显然，在这种条件下，我们不可能在众多的细节问题上继续追随苏联的政策了，这不仅涉及南斯拉夫对世界的关系，而且也涉及全世界的其它关系。

在这方面，1948年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并不明确的一年。我们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形成我们在新条件

下的新的对外政策主张，尤其是当时我们还有其它许多问题要处理。此外，我们在发展我们的对外政策方面始终是十分小心的，因为我们不想做任何能使苏联以为我们似乎已经背离了他们的立场、以及我们正准备转向北大西洋公约的事情，他们本来就已经在这样指责我们了。

但是不管策略如何（实质上这种策略在当时是正确的），我还是为我作为南斯拉夫代表团团长于1948年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感到羞愧。我只字未提与苏联的冲突，尽管这是在一个国际组织中解决点问题的第一个机会，而苏联代表团的所作所为就象南斯拉夫在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似的，因而连与他们的冲突也不存在一样。然而，这也是一个时机，我们可以在国际上试图向苏联证实，在对待帝国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和苏联是没有区别的。

后来，在1949年举行联合国大会下一次会议以前，我们已经制订了自己的对外政策主张。<sup>①</sup>当时我直接批评了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攻击，并对这一攻击作了相应的必要的评述。我批评存在着集团和把世界划分为集团和势力范围的争斗，我主张和平共处，这不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而且也是各国人民之间的积极合作。我还主张各国人民的独立以及政治和经济的自由，主张各国人民

---

<sup>①</sup> 联合国大会第四次会议于1949年9月20日到12月10日在纽约举行。卡德尔9月26日在一般性辩论中发了言。参看本页附件，见第327页。

有权自己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反对一个国家干涉其他国家的人民的社会制度，等等。实际上，这已经是不结盟政策的基本原则了。当时莫沙·皮雅杰往纽约给我发了如下一封信：

“亲爱的贝夫茨，<sup>①</sup>

首先，对我国代表团的发言、建议和投票表示热烈的祝贺。

第二，为你的发言向你表示格外的祝贺。

自从听不到列宁的声音以来，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还未听到过如此高水平的讲话。

.....

再一次向所有人表示祝贺。

自豪地举起我们美好的旗帜！

你的扬科大叔

1949年10月10日

说实在的，莫沙·皮雅杰总是有点夸大，这一点也表现在这件事情上，但是他的这种激动心情无疑也反映了我国人民所感到的满意，因为我们在对外政策上也开始转入直接回击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独立的攻击了。

同时在国内，我们不仅就所有国内社会问题，而且也就对外政策，与苏联和苏联报纸展开了尖锐的论战。我们摒弃了在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部分还存在的一切防

---

<sup>①</sup> 贝夫茨是爱德华·卡德尔在党内的名字。——译者注



御的方法，并用我们的进攻来回答他们对我们的攻击。当然，这种论战在许多方面是浮浅的和不现实的，但是它只是反击了苏联报刊和苏联的言论对我们的诽谤和无耻攻击。例如，在我与苏联的攻击进行的论战中有过一些讲话和文章，这些东西今天我是不会去写的，但是与他们指责我们和污蔑我们的那些东西相比，我的那些攻击简直是太客气了。①

在采取这一行动的同时，我们还在西方国家积极开展工作。那里的气候开始发生变化。正如我已说过的，多数西方国家政府认为我们的日子屈指可数，也就是说，斯大林将把我们消灭掉，或者我们将向他投降。但是一、二年内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评价就开始改变了，西方也表现出越来越愿意与我们合作。因为西方无疑地对南斯拉夫继续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是深为关心的，他们甚至指望随着时间的消逝，南斯拉夫有可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1949年，或1950年，有一次我与英国外交大臣贝文一道乘英国轮船“伊丽莎白女王”号旅行。贝文在和会上凌辱过我，当时对我的态度是那样粗暴；现在他却请我共进午餐，与那时相比完全是另一副样子。当然，我明白他为什么现在这个样，但是我们在这一时期也需要与西方国家进行更紧密的合作，不论是经济方面，还是

---

① 参看第144页脚注①

政治方面，因为斯大林还在以采取断然措施相威胁。与贝文的谈话是本着这样一种精神进行的，即英国政府将考虑与南斯拉夫加快经济合作的方式。因为正如我前面说过的，经济问题对我们来说是最严重的问题。

在华盛顿，我拜访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场的有他当时的助手杜勒斯。他们两人非常客气地接待了我，并答应，美利坚合众国将考虑帮助南斯拉夫摆脱当时的经济困难。欧洲一些小国，例如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比利时等，表示特别愿与我们合作。说实在的，与它们的经济往来的数额不是很大，但是它们的政治影响对我们却十分有益。逐渐地与美利坚合众国签订了军事和经济援助协定，这帮了我们很大的忙。这一援助使我们首先得以摆脱东方的经济封锁的后果。同时，我们的军队也武装起来了，如果斯大林决定采取任何军事冒险行动的话，我们的军队就会是一颗坚果；说实在的，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斯大林不可能那么干。

然而，随着美利坚合众国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随着与西欧国家的经济合作的日益加强，南斯拉夫又开始受到直接的和间接的压力，要它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当然，既出于原则性的理由也出于实际的理由，我们对所有这些建议都坚决予以拒绝。我们说，我们主张解散集团，我们反对把世界划分为集团，此外，我们的社会政策目标也不相同。有一个时候这种压力特别强硬，连我们这里也有个别人倾向于加入北约组织，因为

斯大林的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有威胁性。我们非常坚决地抵制了这种压力和企图，而他们也慢慢地软下来了。

我们建议签订巴尔干公约，它同北约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在其他巴尔干国家履行北约组织的义务的时候，南斯拉夫不对他们承担任何义务。在这些国家在巴尔干公约内部承担的义务方面，北约也不对巴尔干国家负有任何义务。这样的公约并不很重要，但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也不是没有政治意义和影响的。<sup>①</sup>

与西欧国家的经济交流以及美国的经济援助，使我们得以加速经济的发展，而且已经是在自治的基础上这么做。

说实在的，当时的自治在工厂和机关里，与其说是社会经济关系，还不如说是政治民主的一种形式，而社会资本还始终部分地掌握在国家手里，部分地掌握在企业的管理中心手里。然而，当我们在以后的几年中深入实行工人自治并把它首先贯彻到社会经济领域的时候，就是说，当工人即便还没有完全掌握社会资本，但是至少能监督社会资本的时候，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更快了。我们可以说，从1954年到1959年这一时期，南斯拉夫的经济发展速度有了一个真正的跃进。同样我们还可以说，

---

① 南斯拉夫、希腊和土耳其于1954年8月9日在布莱德签署了巴尔干公约。

在五十年代的前半期，南斯拉夫在各个方面都坚决实行自力更生，加强了自己经济和政治上的独立，并且越来越不受东方的经济封锁的伤害。东方压力的作用越来越小，也就是说越来越失去意义。

### 贝尔格莱德宣言

这个时候，斯大林死了。<sup>①</sup>苏联出现的变化也影响了我们。苏联领导向我党和我国建议关系正常化。提出这一建议的借口是，我们已经把密洛凡·吉拉斯从南共政治局开除了，尽管他在与斯大林的冲突中并没有起很大作用。但是，我们不在乎这一点。这个建议对我们来说不仅是接受的，而且非常合乎心意，因为它巩固了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此外，我们还估计到与苏联的经济关系将得到逐步发展，再说，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这项建议，它实际上是对巴尔干和平和世界和平的贡献。

苏联国家和党的代表团前来贝尔格莱德，成员有：N·S·赫鲁晓夫，N·A·布尔加宁，A·I·米高扬，D·T·谢皮洛夫，A·A·葛罗米柯。<sup>②</sup>

苏联代表团承认了1948年的错误，虽然很不干脆，

---

① 1953年3月5日。

② 苏联国家和党的代表团于1955年5月26日到6月2日访问了南斯拉夫。

但毕竟是承认了。他们把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即加到了斯大林的一长串错误的单子上。那时他们就已经开始把这些错误都归咎于他了。

但是他们也要求我们作各种让步和自我批评。他们还要求我们承认过去对我们提出的一些批评，此外还要我对在奥斯陆作的题为《南斯拉夫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民主》<sup>①</sup>的报告作自我批评。当然，我们对这两点都坚决予以拒绝。我们明确告诉他们，我们同意与苏联各方面的关系正常化，但是，我们对过去发生的事情也一概不否定，我们对他们也不要求别的，只要求他们象这次会晤开始时所作的那样宣布，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的决议是错误的。此外，我们还说，我们认为苏南之间的关系应该建立在崭新的基础之上，这样就决不会重蹈过去的覆辙了。

会谈结束时，铁托和赫鲁晓夫在宣言上签了字。<sup>②</sup>这个宣言的文稿主要是由维尔科·弗拉霍维奇、莫沙·

---

① 指1954年10月8日给挪威工人党积极分子作的报告（见爱德华·卡德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第4卷，贝尔格莱德文化出版社，1960年版，第193—236页）。

② 南苏政府宣言，即著名的贝尔格莱德宣言，是1955年6月2日由铁托和布尔加宁签字的。第二年，即1956年，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代表团（其中有爱德华·卡德尔）于6月1日到23日在莫斯科正式访问期间签署了莫斯科声明（6月20日），铁托和赫鲁晓夫在上面签了字。

皮雅杰和我密切配合铁托起草的。我们党的政治局仔细地研究了宣言，因而它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乃至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真正的大宪章。我们知道苏联代表团是带来了准备好的宣言文稿的。当我们交换了准备好的宣言草案时，事实表明两个草案之间竟有极大的不同，致使赫鲁晓夫很快就收回了他们的草案，而同意以我们的草案为基础来起草宣言。我们在与苏联代表团讨论时，态度非常坚定，毫不让步，因为我们想要得到并在上面签字的宣言，不仅涉及我们与苏联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涉及整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当时苏联代表团的处境是，他们愿在很多方面让步，甚至在他们并不真正相信的方面也让步。以后，除了我们在各种联合声明中提到贝尔格莱德宣言外，苏联就再也不大愿意谈及它了。

然而，除了讨论宣言以外，还进行了一些私下和半私下性质的讨论。这种讨论在那时就已经引起了我们的不安。我们得到的一个印象是，作为达成这样一个协议的报答，苏联代表团期待着我们迟早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代表团全体成员，特别是赫鲁晓夫向我们一再申明，没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精神，就谈不上社会主义，并且既然我们已经解决了主要问题，我们就必须也准备解决党的关系以及南斯拉夫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态度问题。他们说：“每个‘连队’必须有自己的连长。要是没有连长，也就不成其为连队。应该以苏联为首，

组织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只有它才能抵御帝国主义。”

然而，我们当时已经坚定不移地站在不结盟政策的立场上了。我们拒绝了任何一种新形式的国际工人运动中心、阵营、“连队”等诸如此类的想法。我们说，我们完全根据宣言制定的原则来考虑与苏联的合作。

就这样，苏联代表团对贝尔格莱德的访问表面上以达成圆满的协议而告结束，但实际上，我们之间仍然存在着深刻的实质性分歧。赫鲁晓夫从未放弃过南斯拉夫迟早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和放弃不结盟政策的想法。他的理想无疑是，南斯拉夫总有一天会把自己的军队置于华沙条约的支配之下。

天晓得出于什么样的理由和原因，赫鲁晓夫认为我是最反对南斯拉夫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人，是不结盟政策的最起劲的鼓吹者。而实际上，我们整个领导都是如此，我们之间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分歧。不过，赫鲁晓夫依然不断冲着我来，他走得如此之远，以致于企图在我们的领导里制造分裂。说实在的，他并没有得逞，但是他仍然继续奉行他的全盘政策。

然而，与斯大林不同，赫鲁晓夫并不是顽固不化地死盯着他所想获得的东西。他先试探一下，如果未得逞，便缩回去，暂时接受多少能够保持正常合作的政策。因此，尽管围绕着南斯拉夫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一事搞得很紧张，但是，一直到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以

前，我们互相之间相对来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关于这两个事件本身我就不想说了，因为有关这两个事件已经讲得很多，写得也不少了。应该讲一讲的或许就是纳吉·伊姆雷的命运问题了。他要求在我国大使馆避难。在我国领导对这个要求最后表态之前，纳吉·伊姆雷已来到我国大使馆，我们的大使接待了他，也就是说同意他避难。坦率地说，我们的这个决定使我有点害怕，因为我当时确信，在匈牙利，军队是说了算的，他们不会在外交避难惯例面前让步。卡达尔·亚诺什很可能想阻止血腥的较量，所以建议把纳吉·伊姆雷扣押在罗马尼亚。但是，根据种种情况来判断，卡达尔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建议。<sup>①</sup>

不过，我们在匈牙利和纳吉·伊姆雷问题上与苏联政府的争执比较快地解决了。我们再也不能做更多的事了，再说，继续与苏联争吵也没有什么益处。同样，无论是由于争执本身的性质，还是由于要继续与南斯拉夫发展关系，苏联领导也没有什么兴趣在这个问题上继续与南斯拉夫争论下去了。

## 1957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

经过几个月时间进行多少是正常的合作和保持友好

---

① 根据匈牙利 1958 年 6 月 16 日发表的公报，纳吉·伊姆雷及其政府几个成员均被判处死刑。



之后，关系又重新冷却下来，这一次是非常严重的了。苏联领导决定，要大张旗鼓地来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苏联共产党领导想用这个机会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会议。<sup>①</sup>当然，他们也邀请我们参加这次会议。我们对这一想法有很多疑问，所以我们在莫斯科问及，这个会议的宗旨是什么。他们回答我们说，实际上这只是对行动的形式和经验进行磋商，如果说要起草和通过什么公开文件的话，那么文件是谈和平与共处的。

然而，我们在10月份得到了与这一立场完全相反的文件草案。文件主要是强调教条主义者所理解的那种社会主义的相互声援，强调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当然，如果我们在这个宣言上签字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们也参加阵营。除此之外，宣言里还有一系列我们不能接受的观点。实际上，宣言否定了不结盟政策，如果我们接受了宣言，那么我们就是自绝于不结盟运动。

但是，对我们施加的压力是极其强大的。预备会议是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事情很快就清楚了，预备会议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向我们施加最大限度的压力，要粉

---

<sup>①</sup> 指1957年11月16日到19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会上通过了《和平宣言》，64个党签了字。我党也在这个文件上签了字。

然而，在11月14日到16日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通过了有12个党的代表签字的宣言。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没有在这个文件上签字。

碎我们的抵制。当然，进入阵营还意味着加入华沙条约。除此之外，文件中又重新强调了那种陈旧的公式：

“以苏联为首……。”而有关国际关系的政治论点则是根据苏联当时的国家政策的方针制定的。

斗争极为艰苦。赫鲁晓夫不是斯大林。斯大林喜欢把自己关在自己的象牙塔里，把他要见的人召到他那里，不论是出于恶意还是出于好意。赫鲁晓夫则与斯大林截然不同。就行为方式而言，他是一个民主派，我要说他是一个来自民间的人；但是就他的言行而言，他是个粗鲁的人，不拘任何礼节，不注意在某些场合里的举止。因此，与他的谈话不仅仅是一本正经地在正式会议上进行——这样的谈话为数最少——而且还在会议以外，首先以半私下的方式进行。比如，我们坐下吃饭，突然赫鲁晓夫来了，坐在我边上，开始解释为什么南斯拉夫一定要接受宣言。当然，我回答了他。讨论越是激烈，赫鲁晓夫也越是蛮硬，最后也不排除用拳头敲桌子来“充实”自己的论据。要是他看到毫无结果，便起身走了。

或者再举一个例子。两次会议间歇期间，我们代表团成员在走廊里散步，突然听到身后有脚步声，是赫鲁晓夫走来了。他与我们在一起，又开始解释他和其他人曾经给我们解释过无数次的那一套来了。当然，这次谈话也是以赫鲁晓夫生气地离去而告终的。

我们并不是以被动的态度来对待宣言的。我们提出过对宣言作重大修改的一系列建议，以便创造让我们也

能在宣言上签字的条件。但是，对这些建议我们并未得到答复。他们只告诉我们，不管南斯拉夫签字与否，宣言都将通过并予发表。这倒是符合我们的心意的。

看来，苏联领导人在与我们进行了这些长时间的讨论之后认为，对我们施加压力再也没有什么意思了，应该寻求某种出路来摆脱这种局面，不堵塞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今后的合作。

其实，在所有这些讨论中，赫鲁晓夫主要的证据是美国援助的小麦和武器。他无数次地对我说：“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我不反对你们拿美国人的小麦。然而，你们必须承认，你们所做的这一切和你们的政策只不过是一种策略而已，你们为的是要得到美国的小麦和武器。”我也同样无数次地回答他，“要是我们从这样的论点出发，那我们将永远不会达成谅解。除了确定某些历史事件以外，美国的援助在这里不起任何作用。我国政策的主要宗旨是，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允许过去的事情重演。所以我们的整个政策旨在维护我们的独立，以及自主地选择社会发展道路和对内对外政策。简言之，不论从哪种意义上说，我们不想依赖任何人。这不是什么策略，而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长期的和根本的战略。至于美国的援助，我们自己也乐意摆脱它，我们也将摆脱它。”我还顺便告诉赫鲁晓夫，最近几天，南斯拉夫政府决定不要美国的军事援助。当我说到这点的时候，赫鲁晓夫满腹狐疑地看着我，好象从所有这一切看出我们

又在玩弄什么新花样了。至于农业，我补充说，最近我们在这一部门投入大量资金，而今后这笔资金将会更大，这样我们估计，几年之内我们就将消灭小麦的缺额，我们将拥有足够的本国小麦。

最艰苦最折磨人的是1957年11月6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会晤。<sup>①</sup>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参加了这次会晤。赫鲁晓夫要求我们谈谈我们最终的想法。我们谈了。内容同以前在布加勒斯特和在莫斯科的会谈中说的一样。

他们的答复格外尖锐，并变成了粗暴的压力，气氛自始至终十分紧张。赫鲁晓夫责备我们，说我们找一些原则性借口来为接受美国援助辩护；说我们不奉行阶级政策，而是周旋于两个集团之间；说不需要我们在不结盟国家中发挥作用，因为他们在那里的作用更大；说没有阵营便没有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又是个“连队”，它必须有自己的连长；说我们违背了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精神；说我们违背了布加勒斯特协议等等。在提及布加勒斯特协议时，他指的并不是起草莫斯科世界会议文件的最近那次会议，而是指以前也是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我党领导和苏共领导的一次会晤，<sup>②</sup>此次会晤也是在赫

---

① 南共联盟代表团有爱德华·卡德尔、亚历山大·兰科维奇、维尔科·弗拉霍维奇和乌格列沙·达尼洛维奇。代表团于1957年11月5日抵达莫斯科。代表团成员中还包括驻苏联大使韦利科·米丘诺维奇。

② 这里指的是以铁托和赫鲁晓夫为首的两党领导人1957年8月1日至2日在布加勒斯特的斯纳戈夫举行的两天会晤。爱德华·卡德尔也参加了南斯拉夫代表团。

鲁晓夫的强大压力下以某种妥协而告终的。

我们不想使这一争吵更趋尖锐化，尽管它有时竟成了人身侮辱和指责。这样，在一段时间里赫鲁晓夫攻击我，并通过我来攻击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他攻击的方式使维尔科·弗拉霍维奇无法忍受，便插进我们的谈话，用一些粗鲁的语言非常坚决地驳斥了赫鲁晓夫，特别是驳斥了他说我们“周旋于”两个阵营之间的这种论调。当时赫鲁晓夫无言以对，因为在这以前，他显然以为我是反苏的主要煽动者，而现在连在我们中间以最心平气和和最客气而出名的维尔科·弗拉霍维奇也向他进攻了。

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心平气和地和简单扼要地讲明了我们奉行什么样的政策，并说明这里涉及的是政策，而不是策略，所以无论谁也不能指望我们会背离我们的政策。我们在布加勒斯特奉行的是同样的政策，如果有人谁改变了对布加勒斯特协议的态度，那不是我们，而是他们。我们还谈到，我们认为把世界划分成集团是人类的很大不幸，它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主张解散集团，主张裁军，主张取缔作为政治的手段战争，主张各国人民实行积极和平共处，主张各国人民有权为自己选择社会发展的道路，等等。这都是一些众所周知的论点，我们曾无数次地提出过，把这叫作策略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强调指出，我们不知道通过这样的策略能得到什么。南斯拉夫得到美利坚合众国的援助，并

不是因为美国奉行这样的有原则的政策，美国离这样的政策十分遥远，而是因为，鉴于当时冷战的状况和与苏联的关系，这样做对他们有利。但是应当对此承担责任的不是我们，而是在1948年攻击南斯拉夫的那些人。南斯拉夫将以一切手段捍卫自己的独立。对这一切，赫鲁晓夫只是简单地说，他将建议布尔加宁进行自我批评，因为在某次会议上布尔加宁把铁托叫作列宁主义者，同时他赫鲁晓夫也将批评自己，因为他受了南斯拉夫人的骗。

我们告诉赫鲁晓夫，这种宣言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签署，但是我们将予发表，我们将指出其中积极的地方，余下的由我国人民自己去作出判断。

为了使这次世界性会议不至于以彻底决裂而告终，一些代表团建议发表一个共同的和平呼吁，这个呼吁是我们能够接受和签署的。在这以后，俄国人对我们的态度变得较客气，因此，与赫鲁晓夫的那些不愉快的旧的争执也随之停止了。

### 在会上的会晤以及与毛泽东的谈话

当时，在进行与会议有关的全部活动的同时，一些党相互间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接触。我们也同很多共产党进行了接触，其中多数党，尤其是非欧洲国家的党，支持苏联僵硬的立场，有些党则持批评态度，甚至拒绝签

署联合宣言的某些部分。①

对我个人来说，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书记苏蒂斯曼的会晤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他是一位知识渊博的人，但是宗派情绪极其严重。当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有一切可能性来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保持联系，但是它却因为自己的政策而疏远了群众。我提醒他说，印度尼西亚的现状有可能轻易地发生消极和极为反动的意义上的变化，这将会使党作出很大牺牲；但是也有积极发展的可能

---

① 卡德尔在这句话后面曾注上：“你们查一下，是不是意大利共产党？”

关于这一点，卡德尔在1957年12月7日召开的南共联盟中央会议上以南共联盟中央代表团的名义所作的报告中谈到这个问题时说：

“通过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宣言的会议，是在我们没有参加的情况下举行的。意大利人和法国人也没有参加。苏联同志对我们说，中国人也建议把会议局限于社会主义国家。而从另一方面我们听说，意大利人，甚至法国人自己也反对参加会议，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共产党中只有他们两家单独参加是不合适的。据说他们的论点是，要么所有的党都参加，要么只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参加，这种看法肯定是有它自己的逻辑的。

.....

围绕着莫斯科共产党会议的公报进行了相当多的讨论。本来应该在公报里写上这样一个提法，即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一致支持这个宣言。陶里亚蒂表示反对。他要求各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全会上对此作出决定。其他一些党表示同意这一点。”

性，在这种情况下，党将得到劳动群众一切必要的支持。我请他注意我们的经验和成绩。但是这次谈话就象聋子对话一样，他听不进去。这位印度尼西亚人对我党和我们的观点持极端的保留态度，我们冷淡地分了手。遗憾的是，虽然我不想当一个不祥的预言家，但是我还是不幸而言中了。因为没过多久，印度尼西亚就朝着消极的方向发生了转折。

庆祝活动结束时，在克里姆林宫的一个大厅里举行了盛大的午宴。我想那是格奥尔基大厅。午宴结束时，毛泽东站了起来，手持酒杯，挨个走向每个代表团，向代表团团长祝酒。就这样，他也来到我们身边。他向我祝酒时说：“你们和我们的区别只是在于，你们长胡子，我们不长胡子。”

毛泽东还在当时就通过这一番话以某种方式表明，他愿意使两国关系正常化。在我们到他那里去时，他证实了这一点。

毛泽东在会上大约还讲了下面这样一番话，我在这里甚至还稍稍缓和了他的措词：

“有些党对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提出异议。但是每个活的东西都得有个头。连蛇都有头。如果没有个人的领导，那么有集体的领导同样也是好的。我国民间有句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虽然，毛泽东可能首先想以此来批评我们对苏共领导作用的态度，但是看起来，苏联领导人也以某种方式



感到受到了打击。赫鲁晓夫低着头，满脸通红，米高扬却站起身来，气呼呼地在赫鲁晓夫身后走来走去。

我们请求毛泽东接见并与他谈话，他立刻接见了我们。谈话时间很长，我估计可能有两小时左右。首先他由于我们对苏联的政策而责备我们。他说，“奉行与苏联争吵的政策，这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在很多方面也不同意宣言中的一些东西。但是为什么要在那些并不重要的事情上制造麻烦呢？你们经常断言，你们不承认苏联的领导作用。为什么不承认？事实上，我们也不承认这种作用，但是我们的政策仍然是宣布承认。因为他们喜欢这样做，而这样做对我们有好处。”

他接着说，“另外，你们还经常攻击斯大林。我们不攻击他。可是我要告诉你们，斯大林给我们造成的损失，所做的坏事，要比给你们的多得多。然而，他今天在世界上是一个有分量的人物，为什么要惹这样一个人物来反对自己呢？”

接着我们转到中国的国内问题。毛泽东说，当前主要问题是如何使辩证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自由地发挥作用。

“社会主义不是一潭死水。必须要有领导来指引，但是人民也必须要有可能性来直接地对社会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作出反应。”然而，毛泽东没有进一步发挥这个思想。当中国开始所谓的文化革命时，我想起了他的这些思想。那时我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

白，文化革命是作为人民运动，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自由辩证法”自上而下地发动的。

我和代表团的其他同志都没有回答这些论点，但是我们都很清楚，这些论点是不现实的和勉强的。但是我们向他作了详细的解释，说明我们关于苏联领导作用的问题的立场与他们的立场区别在哪里；尽管我们的立场与中国目前的和战后的立场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毕竟是不一样的。

接着毛泽东讲了中国国内的经济问题。他奇怪地表现出既是一个持怀疑态度的人，同时又是一位乐观主义者。他说，他们“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人民的穿着问题。”他还列举了很多数字，说明要在很长时间里实现这些方面的目标，以致在我们看来，这一切与其说是现实的，不如说是象征性的。而这些数字和这些年限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不可变更的。例如，他说，“在200年内，或者，也许在40年内。”又例如，他说：“俄国人想在某年（我记不得是指哪一年）在小麦产量上赶上美国人；我们将在几十年内赶上英国，而你们则在12年内赶上意大利。”

对此，我回答说，我们相信我们将在2至3年内满足本国对小麦的需要，这对我们来说是最主要的。至于同意大利竞赛，我们根本就没有考虑过。<sup>①</sup>

---

<sup>①</sup> 据参加莫斯科会议的我国代表团的一些成员说，毛泽东在会议发言中说，南斯拉夫有某些理由不在宣言上签字，即有某些理由不

在听毛泽东谈所有这些论点时，我从中所看到的只是哲学，而且是忍耐的哲学，自力更生方针的哲学，尤其是当我们完全明白，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援

---

承认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他补充说，中国也认为，所有的党都是平等的，但是“连蛇都有个头，为什么我们（共产党人）就不能有个头呢？”他接着说，南共联盟代表团不在宣言上签字的原因之一可能是进口小麦。并说，10年以后，南斯拉夫可能会同意某个宣言，并在上面签字。从这些说法来看，毛泽东并不是以责备或不同意南共联盟代表团观点的方式说这些话的，后来在同代表团的谈话中他又一次证实了这一点。

在与毛泽东会晤时，卡德尔解释了我们不在宣言上签字的原因，他说问题不在于小麦，而在于我们对一些基本的原则立场有异议，因此毛说，他们也不接受任何一个国家以至苏共的领导作用。但是，由于“俄国人现在喜欢，而对我们也无害”，因此他们不反对这一点。接着卡德尔解释说，进口小麦对南斯拉夫来说是个战略性问题，是同它的独立紧密相连的。他强调，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使我国在几年之内摆脱小麦和其它主要食品的进口。在这方面，毛完全赞同这一解释。卡德尔接着还谈到南斯拉夫的发展成就，并列举了我国的钢产量数字。毛对南斯拉夫生产钢的材料很惊讶，便说：“如果俄国人的钢产量赶上美国，中国人赶上英国，南斯拉夫人赶上意大利的话，那就是社会主义的胜利。”

在同我国代表团会晤时，毛还谈到向苏联订货和中国供应方面的困难，以及原子能问题。谈话结束时，他说他要回中国了，但很多事情还没有弄清楚。

有意思的是，当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讲话时，卡德尔在传给南共联盟代表团成员的一张字条上写道：“俄国人同中国人在国际工运中争当意识形态首领的斗争开始了。”

助，特别是粮食供应方面的援助，不可能全部满足象中国这样大的国家的巨大需要时，就更是如此了。为了生存，中国需要自己的内部哲学，许多人认为这一哲学不仅不现实，而且是可笑的。但是它却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都积极行动起来，用自己的力量来为自己的生活创造尽可能好的条件。

最后我们的谈话转到了对外政策。毛泽东向我们阐述了他的众所周知的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理论。他讲到，战争中可能牺牲5亿中国人，但还会剩下3亿；大多数国家将坐在山上观看老虎和社会主义斗，等等。在这方面，尽管他一句话也没有提到苏联，但是却很清楚，毛泽东希望美利坚合众国和苏联打仗，并认为这是唯一能导致中国人民强大和进步的政策。

世界关系的新结构在五十年代中期就这样终于形成了，我谈的那些事件也确实为此做好了准备。

## 附 件

### 关于切特尼克与占领者的勾结

(第11页的附件)

关于切特尼克与德国人的勾结，卡德尔曾提及：“请收集德国人与切特尼克开始勾结和勾结方式的材料。”编辑部按照这一要求，使用了某些文献资料，准备了关于战争期间切特尼克与占领者和其他卖国贼开始勾结及其勾结形式的这份附件。附件引用了铁托与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第二次会晤时提出的关于共同开展反对占领者斗争的谈判建议（信件）的要点。此外，附件在有关地方还引用了爱德华·卡德尔在其著作中谈到这一勾结时所阐述的观点。

切特尼克与占领者和国内其他反动势力和通敌势力的勾结，实际上在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战争初期就已开始。从1941年8月29日至9月5日，切特尼克最高指挥部的代表同米兰·奈迪奇的代表就曾在贝尔格莱德秘密会晤，讨论了共同反对游击队、即在塞尔维亚共同镇压

起义和消灭游击队的问题。这次会谈所达成的协议曾报告德国的丹克尔曼将军，当然，他也表示赞同。

1941年秋天，切特尼克继续加强与占领者和反对人民解放斗争的势力的联系。9月中旬，游击队在利格附近俘虏了宪兵中校M·奥卢耶维奇以及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一名通信员，从他们身上搜出了德国人、切特尼克和米兰·奈迪奇部队制定的反对游击队的联合作战计划。

另一方面，1941年初秋，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同设在伦敦的南斯拉夫流亡政府以及西方盟国建立了联系。英国军队的中东情报处于9月9日同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建立了无线电联系，并于10月份把英国联络官赫德森上尉派到了他的司令部。正当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与占领军公开勾结、并派切特尼克部队同占领军一起去消灭游击队的时候，南斯拉夫流亡政府于1941年底承认这支部队是留在祖国的南斯拉夫军队，任命他为该军队最高指挥部的参谋长，1942年1月又任命他为军事大臣。

尽管切特尼克与占领者和其他卖国贼的勾结证据确凿，但是，反希特勒同盟国仍要求铁托与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进行合作。因此，在铁托的倡议下，他们举行了两次会晤。

在1941年9月19日第一次会晤时，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表示同意互相忍让，但拒绝派切特尼克部队同占

领者作战，其理由是进行这种斗争的条件尚未具备。他表示，“一旦形势好转”，他的部队将同占领者作战。

1941年10月初，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最高统帅部要求游击队和切特尼克的指挥部举行第二次会晤。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迟迟不来参加谈判，要求先向他提出供谈判的建议。10月20日，最高统帅部和铁托写信提出了12点建议，作为谈判的基础。

在1941年10月27日第二次会晤时，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没有接受协议草案中有关保证共同对敌作战和联合指挥（第1点）、供应武器和粮食（第2点）、成立人民解放委员会并承认其从事临时政权事务的权利（第6点）以及禁止强制动员（第7点）等项。

协议草案，即建议的要点如下：

“1、对敌人、包括对德国人和奈迪奇集团进行联合作战。为此目的，我们认为有必要成立联合作战司令部。

2、通过联合作战司令部共同为你我双方的战士供应装备和粮食。为此目的，联合作战司令部可确定专人负责或者成立某种后勤部。

3、根据前线需要共同分配战利品，严格遵循‘一切为前线，一切为斗争’的原则。

4、在地方上成立联合指挥部，或者象在查查克那样，在你我两个指挥部间进行最密切的合作。

.....

6、组织临时政权，以负责解决居民的粮食问题，组织经济，筹措作战所需的经费，成立维持秩序和安全的机构等等。我们认为，在当前的人民解放斗争中，把县政府、旧的区公所、宪兵队等当作这样的政权是绝对错误的。为了团结全体人民进行这场抗击占领者的艰苦斗争，必须建立最适合当前形势、最接近人民、而且最能代表人民负起全部责任的机构。过去的宪兵、警察以及县和区的机构今天已不再适用，‘因为这些机构里钻进了许多敌对分子’，因为迄今为止，这些机构一直在为占领者效劳，而且敌人仍在通过其代理人对这些机构施加强烈的影响。此外，这些得不到人民特别信任的机构在当前生命攸关的日子里是不合适的。我们认为，人民自己成立的人民解放委员会目前是我们可以依靠的最合适的机构。这些人民解放委员会应由人民自愿选举产生，而不论其政治信仰如何。在由于技术原因无法举行选举的地方，则由站在人民解放斗争一边的各政治党派的代表任命。除成立地方人民解放委员会外，我们认为应在整个解放区成立一个中央人民解放委员会。为了维持秩序和安全，在各村镇成立民卫队以取代宪兵。

7、关于强制动员，我们原则上反对。动员应该是自愿的，要通过说服来进行，要让每一个人自愿地选择是否参加切特尼克部队或者游击队。强制动员只有在局部的范围内，在面临敌人进攻的十分危急的某些具体情况下才能进行，而且必须得到联合作战司令部的批准。



通过自愿动员征集的志愿人员有这样一个优越性：由这样的战士组成的部队比由强制动员起来的人组成的部队在质量上要好得多。我们还没有那么多的武器和军事装备，不能冒险地把武器发给各种不可靠的人。”<sup>①</sup>

对于切特尼克来说，同铁托的谈判只是他们（即使是暂时地）加强自己地位、准备向游击队发动进攻并同人民解放起义力量进行最后决战的幌子。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在1941年11月1日就命令其部队撤离克拉列沃的面对德国人的阵地。同时，切特尼克部队开始向乌日采、查查克、上米拉诺瓦茨、伊瓦尼察以及塞尔维亚这一地区的其他地方的游击队发动进攻。

关于这一情况，爱德华·卡德尔1941年11月8日写道：

“今天领导反塞尔维亚活动的是由少数几个反动军官组成的一个肮脏集团，这个集团原先就是1929年1月6日以后出现的历届反动政权的主要维护者和体现者。他们都是一样地反人民的，都是一样地残暴和沾满鲜血。在南斯拉夫的最近几年里，这一集团在奈迪奇的领导下，对反法西斯运动进行了围剿。早在那个时候，就同廖蒂奇和科罗沙茨勾结在一起。今年4月，这一集团终于带领南斯拉夫军队投降。

---

<sup>①</sup> 1941年11月11日，在乌日采解放区出版的《战斗报》就铁托和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会晤发表了短评，并全文公布了铁托的信件，即协议草案。

投降以后，这个集团完全背叛了人民，变成了一个司空见惯的、由被收买的走狗组成的匪帮。他们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奈迪奇公开加入了占领者扶植的政府，而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则跑到拉夫纳戈拉去武装自己的由宪兵、警探和税警等组成的匪帮，并在适当的时候把它当作一把刀插到为自由而斗争的人民的背上……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四个月来在人民面前装模作样，似乎他也是个反对占领者的战士，而现在，在11月份，他居然能从德国人和奈迪奇手里领取火炮和迫击炮去进攻游击队，还有什么能比这个事实更令人作呕呢？”<sup>①</sup>

11月13日至14日的那个夜晚，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同德国驻塞尔维亚军事司令部的代表在瓦列沃附近的迪夫齐村秘密会晤。双方各有数名高级军官出席。这次会晤情况通过无线电报告了设在伦敦的流亡政府。同天夜间，切特尼克的指挥官约万·什卡瓦在距离这次会晤地点不远的斯洛瓦茨村，把300多名被俘的游击队员交给了德国人，这些游击队员后来被枪毙了。

关于切特尼克公开与占领者勾结的情况，爱德华·卡德尔在1941年11月22日写道：

“事实证明，在瓦列沃、米奥尼察、拉伊科维奇、

---

<sup>①</sup> 爱德华·卡德尔文章《又一次背叛》，发表在战争期间在乌日采出版的《战斗报》上，见《新南斯拉夫的道路（1941年—1945年）》，1946年贝尔格莱德文化出版社出版，第256页。

贝拉诺维察、拉什卡和伊巴尔河谷，切特尼克的军队与德国人、奈迪奇分子以及科斯塔·佩查纳茨的切特尼克分子一起袭击了游击队。应该毫不含糊地查明谁该对这一背叛性的勾结负责，应该象对待为塞尔维亚人民公敌效劳的人那样对待这些负有责任的人。

事实和文件证明，切特尼克军队的领导人自己也通过某些人与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定期进行接触。

事实是，切特尼克的军队把在上米拉诺瓦茨等地俘虏的 360 名游击队员交给了驻在瓦列沃的德国人。

.....

事实证明，切特尼克的军队已从所有的抗德前线撤了下来，而游击队仍然留在这些前线，击退了占领者的一切进犯企图，并捍卫了解放区，使它免受敌人占领.....”<sup>①</sup>

切特尼克同占领者的联系和勾结还特别表现在切特尼克的所谓“合法化”上。1941年11月30日，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在拉夫纳戈拉召开的切特尼克指挥官会议上发出了关于切特尼克部队“合法化”的指示。“合法化”是这样来实现的：一些切特尼克部队就地加入了米兰·奈迪奇的武装力量。所有这些“合法化”了的切特

---

<sup>①</sup> 爱德华·卡德尔文章《评又一个协议》，发表在战争期间在乌日采出版的《战斗报》上，见《新南斯拉夫的道路（1941年—1945年）》，贝尔格莱德文化出版社1946年版，第264至265页。

尼克部队，如在查查克、波热加、洛兹尼察、贝尔格莱德、科谢里奇等地，都获得了德国的武器和装备。紧接着就采取了首次联合行动。在查查克，切特尼克同德国人一起打死了80名游击队员。在波热加县成立了德国一切特尼克联合法院，该法院审讯了被俘的游击队员和人民解放起义的合作者和积极分子。

整个战争期间，切特尼克与占领军的公开勾结还表现为——在塞尔维亚、黑山、波斯尼亚和达尔马提亚——签订了一系列协议，这些协议调节了他们的相互关系和反对游击队的行动的具体形式。例如，1943年11月27日，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最高指挥部的全权代表尼古拉·卡拉比奇与德国东南前线指挥官的全权代表弗鲁尔斯特·弗雷德在瓦列沃附近的布亚契奇地方签订了一项协议。黑山早在1942年3月就已签订协议，而东波斯尼亚在1941年11月也签订了协议，等等。

爱德华·卡德尔在1942年5月20日写道：

“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是按照同德国人的协议跑进‘森林’的。其证据是去年9月奈迪奇的军事部长给宪兵司令们的机密文件的原件，此件已掌握在游击队最高统帅部的手里。这份机密文件提出了德国人一奈迪奇围剿塞尔维亚游击队的基本方针。这个文件明确指出，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部队将从背后打击游击队，然后加入奈迪奇的部队。

.....

从原件——其中有些是德拉扎亲笔书写和签署的——可以清楚地看出：

甲) 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把消灭游击队运动看作是自己的主要任务，因为他认为这一运动是塞尔维亚霸权主义集团实现其大塞尔维亚目标的主要敌人。因此，他命令其军官要始终执行这样的政策，即在要求斗争的人民面前不败坏自己的名誉，但又要不惜任何代价消灭游击队。同时还要谨慎地与德国人和奈迪奇合作。

乙) 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与伦敦政府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所以伦敦政府是同意他与占领者勾结起来反对游击队的……

从奈迪奇的内务部的机密报告——这些报告已掌握在最高统帅部的手中——可以看出：

甲) 奈迪奇的使者同伦敦政府驻贝尔格莱德的某些代表于9月份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极为秘密的会议，奈迪奇的代表在会上建议采取共同对付游击队的武装行动……”<sup>①</sup>

在国内其他地方，尽管切特尼克运动最初的组织形式有所不同，但这一运动也起了同样的卖国和反革命的作用，从而也具有同样的社会政治实质。

---

<sup>①</sup> 爱德华·卡德尔文章《弥天大谎》，发表在《斯洛文尼亚信使报》上，见《新南斯拉夫的道路（1941年—1945年）》，贝尔格莱德文化出版社1946年版。第272至273页。

在黑山成立第一批切特尼克部队时，便出现了切特尼克与意大利人勾结的初步形式。意大利占领政权自己也在建立切特尼克部队。如在普列夫利亚，1941年12月7日成立了布雷兹尼克的切特尼克支队。意大利人为这支部队提供了金钱、粮食和武器。此外，早在1941年夏天，意大利占领政权就已建立了所谓反共志愿警察，这支反共志愿警察积极参加了意大利的军事行动。1942年2月，切特尼克直截了当地参加了意大利反对游击队的战役。<sup>①</sup>

黑山的卖国反动势力与占领者的勾结在1942年3月6日得到了充分表现。这一天，巴亚·斯塔尼希奇代表黑山民族主义者总委员会，而吉·博利奥尼代表驻黑山意军总指挥部，签订了调节切特尼克和意大利占领者关系的协定。

此协定的条文如下：

“驻黑山意军指挥部，注意到波德戈里察和泽塔河谷的黑山民族主义者总委员会所发表的声明和决定，按照总督阁下的授权，为了同黑山的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将从自己方面：

1、与黑山民族主义者合作，进行不妥协的反共斗争。波德戈里察和泽塔河谷的黑山民族主义者的领袖将亲自或者通过代表与驻黑山意军总指挥部经常保持联

---

<sup>①</sup> 《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卖国活动文件集》，贝尔格莱德1945年版，第1卷，第39号文件，第73页。

系，以便采取联合行动。

2、在武器、弹药、食品、鞋类和服装方面提供援助，其数量将临时商定。

3、按照与黑山民族主义者部队指挥官达成的协议，派遣自己的兵力兵器与波德戈里察和泽塔河谷的民族主义者部队一起作战。

4、意军将维持城镇的秩序，而在农村，这一任务由黑山民族主义者担当。至于交通干线的安全，将通过协商共同分担任务。

在互相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我们将严格履行所承担的义务。”<sup>①</sup>

与占领者的勾结在这以前早已开始，而在此协定签订之后更是继续进行。除采取联合军事行动外，勾结的形式还有：切特尼克把共产党人交给意大利人枪毙，共同逮捕，等等。同样，有些切特尼克支队及其指挥官与意大利部队达成了协议。按照这些协议，他们负责保障一些公路、铁路和桥梁的安全，而从意大利人那里获得金钱、武器和装备等等作为报酬。

关于黑山的切特尼克与占领者开始勾结的情况，爱德华·卡德尔于1942年5月20日写道：

“3月份，他们甚至在黑山——迄今为止这里的民族团结一直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榜样——试了试自己

---

<sup>①</sup> 《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卖国活动文件集》，贝尔格莱德1945年版，第1卷，第39号文件，第73页。

的运气，从而使得这个阴谋卖国集团的罪行暴露无遗。在斯塔尼希奇上校的指挥下，他们搜罗了残存的‘变节者’，即大塞尔维亚政策的追随者（他们过去经常投靠各个执政党，如南斯拉夫民族党和南斯拉夫激进会），并且突如其来地从背后袭击游击队。当时，游击队包围了尼克希奇，完全切断了那里的意大利人同意军的联系。对游击队的这次偷袭竟然成了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对意大利师的那次‘光辉’胜利，伦敦电台竟为此向全世界大肆宣传……”<sup>①</sup>

1941年11月，切特尼克与游击队在东波斯尼亚发生了冲突。同时，意大利人和切特尼克却在维舍格勒签订了协议。协议规定，“……互不侵犯，塞尔维亚的切特尼克和意大利人合作反共，由塞尔维亚的切特尼克保障从鲁多（利姆河上的桥梁）到维舍格勒的铁路和从乌瓦茨（多布伦）到维舍格勒的公路的安全，并反对游击队”，等等。11月底，意大利人和切特尼克在戈拉日德签订了协议，为切断东波斯尼亚游击队和黑山游击队的联系而配合作战。

这一地区与意大利人的勾结比同德国占领军的勾结更直接些。但是，并不是没有同德国人勾结，尤其是在1942年初。例如，1942年1月，这个地区的切特尼克部

---

<sup>①</sup> 爱德华·卡德尔文章《弥天大谎》，发表在《斯洛文尼亚信使报》上，见《新南斯拉夫的道路（1941年—1945年）》，贝尔格莱德文化出版社1946年版。第279页，



队接到命令,对德国军队、即对讨伐队不要抵抗,因为他们去“消灭游击队”的。

关于这些情况,爱德华·卡德尔1942年5月20日在《弥天大谎》一文中写道:

“直到今天,宪兵少校耶兹迪米尔·丹吉奇和他的副官博什科·托多罗维奇上尉,仍然是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在波斯尼亚的得力助手……

丹吉奇少校经常与德国人勾结。奈迪奇给他派去军官,送去武器和弹药。丹吉奇每月至少一次乘坐自己的小汽车从波斯尼亚直奔贝尔格莱德,去同丹克尔曼和奈迪奇接头。波斯尼亚的切特尼克从来没有与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作过战。

……

当德国人在波斯尼亚对游击队进行一月围剿时,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军官,即耶兹迪米尔·丹吉奇的军官,亲自带领德国人和乌斯塔什到解放区,耶兹迪米尔·丹吉奇的司令部还发布命令说,谁向‘友好’的德国或意大利部队开枪,就枪毙谁。切特尼克军官在汉一皮耶萨克直接帮助德国人包围舒马迪亚游击队营。该营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60多名战士,其中15名是斯洛文尼亚连的斯洛文尼亚人。丹吉奇和托多罗维奇勾结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反对游击队的全部责任可以从博什科·托多罗维奇的档案中看出,该档案连同托多罗维奇本人已在不久前落到了游击队的手中。档案清楚地表明,德拉扎的

军官们在波斯尼亚的主要任务是消灭游击队……”<sup>①</sup>

切特尼克与占领军的勾结必然导致它们同国内其他卖国势力进行联系。因此，1942年中，乌斯塔什和切特尼克在东波斯尼亚建立了联系并达成了协议。按照协议，切特尼克承担了不让游击队通过自己地盘的义务。同样，1942年4—5月份，波斯尼亚西部和中部的切特尼克部队也开始同乌斯塔什进行有组织的勾结。1942年4月4日，切特尼克的指挥官拉德·拉迪奇同乌斯塔什的将军布罗佐维奇签署了关于合作和共同反对游击队的协议。切特尼克其他的支队也同乌斯塔什签订了相应的协议，如在姆尔科尼奇—格拉德和巴尼亚卢卡等地。克罗地亚独立国<sup>②</sup>政府1942年7月24日作出决定，向自己

<sup>①</sup> 爱德华·卡德尔的同一篇文章，第277—279页。

<sup>②</sup> 克罗地亚独立国作为内奸的产物，是在德国占领军开进萨格勒布后不久于1941年4月10日成立的。1941年4月18日很快就成立了以安特·帕韦利奇为首的克罗地亚独立国第一届政府。

克罗地亚独立国的成立，局部地实现了破坏南斯拉夫领土完整的计划。克罗地亚独立国得到了三国条约成员国和少数国家、主要是中立国家的正式承认。1941年6月15日它加入了三国条约，1941年11月25日加入了反共产国际条约。

克罗地亚独立国的政权是按照法西斯极权主义政权的模式组织起来的。最高权力的执掌者是乌斯塔什头目安·帕韦利奇。按照法西斯制度的榜样，把乌斯塔什运动的追随者编成乌斯塔什军队，这些军队成了政权的主要支柱。被强制动员起来的居民则被编成了义勇军。

在乌斯塔什—法西斯恐怖笼罩下的克罗地亚独立国，有数十万名反抗法西斯政权的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和克罗地亚人惨死在大屠杀和集中营中。

的部队发出了关于与切特尼克部队指挥官签订协议的指示。切特尼克最高指挥部也对此表示赞同。

在斯洛文尼亚，切特尼克又称之为米哈伊洛维奇分子、军团、斯洛文尼亚民团，蓝卫军以及留在祖国的王国军队等等。在这一地区，他们人数寥寥无几，整个战争期间只不过几百人而已。从人民解放起义一开始起，解放阵线就团结了斯洛文尼亚人民最广大的群众投入反抗占领者和卖国贼的斗争，而鼓吹成立以一个民族为主的政府和主张恢复旧政权的切特尼克运动未能得到广泛的发展。

从战争一开始，斯洛文尼亚的切特尼克部队便与意大利和德国占领者进行勾结，后来更是变本加厉，虽然他们有时声称自己是“地下”的，即没有与占领者勾结，而是在为反对占领者而斗争。他们从占领者那里领取武器，占领者还给他们规定，哪些地方可以去活动，什么地方该建筑工事，等等。与国内其他地方一样，切特尼克在这里也扮演了两面派的角色：既与占领者勾结，同时又与西方盟国以及设在伦敦的王国流亡政府保持联系。

斯洛文尼亚切特尼克部队的成立曾受到亚卡·阿夫希奇上校的阻拦。他是斯洛文尼亚的米哈伊洛维奇部队的指挥官，而实际上是解放阵线的合作者。当切特尼克发现他是解放阵线的合作者时，他就转入地下，并成为

斯洛文尼亚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总司令部的副司令。

一方面，王国军队的一些军官是切特尼克部队、军团和蓝卫军等反革命武装集团的最活跃的组织者；另一方面，在多莱尼斯卡的某些农村，天主教神父则是白卫军的最活跃的组织者。

关于白卫军和切特尼克在斯洛文尼亚的情况，爱德华·卡德尔1942年写道：

“解放阵线经常提醒斯洛文尼亚人民要警惕一小撮卖国贼，这些人是从可恶的统治阶层里最反动和最反人民的人士中产生的，他们在南斯拉夫早已成了国内外法西斯主义的据点。尽管这个统治阶层已分裂为‘教权’派和‘民族’派，但在反对人民群众的权利和要求方面仍然是一致的。今天也是如此，虽然他们分成‘教权主义—白卫军’和‘米哈伊洛维奇’军团，他们的目标仍然是一致的：消灭斯洛文尼亚人民的解放运动，帮助占领者，巩固占领者对斯洛文尼亚人民的统治，以便他们自己可以不受阻碍地剥削斯洛文尼亚劳动人民。他们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向占领者出卖了斯洛文尼亚人民的民族利益，在斯洛文尼亚人中间煽动自相残杀的内战，并从背后打击全世界爱好自由的人民反抗法西斯帝国主义的正义战争。”<sup>①</sup>

---

<sup>①</sup> 爱德华·卡德尔文章《攻势以后》，首次发表在《斯洛文尼亚信使报》上，见《新南斯拉夫的道路（1941年—1945年）》，贝尔格莱德文化出版社1946年版，第302页。

同年，卡德尔又写道：“这一小撮卖国贼在斯洛文尼亚的所作所为，斯洛文尼亚人多少是了解的。谎言和诽谤也是他们的主要武器。他们在斯洛文尼亚也重复伦敦政府的谎言，向世界大肆宣传斯洛文尼亚游击队的成绩是他们的成绩。最后他们甚至与白卫军完全勾结在一起，彻底为意大利人效劳，充当告发者和破坏斯洛文尼亚人民团结的分裂者……”

……就这样，占领者和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站到了同一立场上。他们互有需要，因为双方有共同的敌人：民主的人民群众，南斯拉夫各族人民……”<sup>①</sup>

意大利的投降在斯洛文尼亚反革命势力的队伍中引起了很大混乱。1943年9月初，切特尼克的主力曾驻扎在格尔查里采一带。人民解放军打垮了这批切特尼克，实际上也就消灭了斯洛文尼亚蓝卫军的最强大的部队。1943年9月19日，700名白卫军和切特尼克残余也不得不在图里亚克投降。在这以后，白卫军的其他一些部队和切特尼克的小部队就要求德国人保护。德国占领者把这些部队编为斯洛文尼亚义勇军团。

在国内其他地区（斯拉沃尼亚、伏伊伏丁那、马其顿、科索沃），可以说切特尼克根本没有自己的力量。

---

<sup>①</sup> 爱德华·卡德尔文章《弥天大谎》，见《新南斯拉夫的道路（1941年—1945年）》，贝尔格莱德文化出版社1946年版。第279—280页。

## 选举立宪议会和共和国宣告成立

(第76页的附件)

编辑部认为，为了了解卡德尔在《回忆》第76页上所说的事件，必须简要地介绍一下立宪议会的筹备工作和选举情况。所以，编辑部准备了这个附件，说明了这件事的经过、选举结果、共和国宣告成立以及在颁布新南斯拉夫第一部宪法以前立宪议会的工作情况。

1943年11月29日，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南人解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禁止国王彼得·卡拉乔尔杰维奇二世回国，而“国王和君主制问题留待全国解放后由人民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解决”。

1944年6月16日和11月1日达成的铁托—舒巴希奇协议规定，南斯拉夫政权的最终形式将由人民自由地作出决定。协议规定，在作出决定前，国王彼得二世不得回国，在国王缺席的情况下，国王的权力由国王摄政委员会行使。铁托—舒巴希奇第二个协议的补充协议(1944年12月7日)规定，最晚应在全国解放后三个月内宣布立宪议会的选举，而在选出立宪议会前，立法权由南人

解委员会行使。

在1945年2月11日举行的克里米亚会议上，同盟国要求立即实施铁托—舒巴希奇协议，并在此协议的基础上成立统一的政府。此外，他们“建议”扩大南人解委员会，“让南斯拉夫最后一届国民议会中那些没有因为同敌人勾结而声名狼藉的议员参加，以便建立一个称之为临时国民议会的机构”。

临时政府于1945年3月7日成立，南人解委员会扩大了，即在同年8月7日至10日举行的会议上宣布改称为民主联邦南斯拉夫临时国民议会。根据负责扩大南人解委员会的特别委员会收集的关于1938年当选的、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议员（包括一些旧政党成员和无党派社会知名人士）的情况和材料，临时政府在1945年8月4日提出了扩大南人解委员会的建议，共增加新委员118名。南人解委员会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第三次会议上通过了这项建议，并宣布改称为民主联邦南斯拉夫临时国民议会。

1945年9月1日，临时国民议会主席团发布命令，宣布将在同年11月11日举行民主联邦南斯拉夫的最高代表机构——立宪议会的选举。在此以前，已制订了立宪议会法、立宪议会国民议员选举法和选民名单法，以及这方面的其他一些必要的法律。

按照选举法规定，选举权是普遍的、平等的和直接的，选举以无记名投票进行。凡年满18周岁的南斯拉夫公民，不分性别、种族、宗教信仰、文化程度和居住地点，

均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只有因为同占领者勾结而声名狼藉的人才被排除在选民名单之外，而且要在选民大会上宣布除名。这样被除名的人占公民的2.3%。选举机构统计共有800多万选民，比在旧南斯拉夫时增加一倍。参加投票的选民比战前选举时多得无法比拟，绝大多数选民投票赞成以铁托为代表的人民阵线的候选人名单。

当反对派看到没有任何现实的希望能同人民阵线的候选人名单进行竞争时，他们决定不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即不参加选举。他们指望以后可以把所有那些没有参加选举（即没有投票）的人都算作自己的支持者，而据反对派估计和预料，这样的人一定很多。为了使这一计谋不能得逞，立法机构对选举法作了补充，规定在选举地点必须设立所谓无名单票箱，使每一个不同意候选人的选民都能表达自己的意志。

选民参加投票的情况，尤其是选举的结果表明，反对派的期望完全是幻想，而他们不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是又一次企图阻止新的革命的人民民主政权的最终建立，是又一次企图阻止南斯拉夫社会在人民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的基础上进行革命改造。实际上，这是反革命势力所施加的一系列压力中的一种压力，其目的是阻挠南人解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议的实施，当然，这种压力是得到外国的帮助和支持的。

然而，选举结果只是又一次表达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意志，有力地 and 毫不含糊地证实了他们对君主制命



运所作出的决定。因为在登记的 8,383,455 名选民中，有 7,432,469 人参加了选举，占 88.66%。在全国各选区的总选票中，南斯拉夫人民阵线提出的联邦议会候选人名单获得了 6,725,045 票，占 90.48%，而无名单票箱获得了 707,422 票，占 9.52%。

参加民族议会议员选举的有 7,413,214 名选民，占 88.43%。在各联邦单位和自治区的总选票中，人民阵线提出的各地区候选人名单获得了 6,574,975 票，占 88.69%，而无名单票箱获得了 838,239 票，占 11.31%。

选出了立宪议会的两院：联邦议会和民族议会，两院在权利和权限上完全平等。为联邦议会选出了 349 名国民议员，即全国平均每 4 万人选出一名议员。民族议会的议员由每个联邦单位各选出 25 名，由伏伊伏丁那选出 15 名，科索沃和梅托希亚选出 10 名，总共 175 名议员。

立宪议会法规定，由立宪议会通过新南斯拉夫宪法以及与宪法有关的法律，并就南人解委员会及其主席团、临时国民议会及其主席团通过的所有法令通过决议。

立宪议会在 1945 年 11 月 29 日举行的首次会议上，正当南人解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两周年之际，通过了共和国成立宣言，从而正式废除了君主制。

立宪议会继续讨论了新南斯拉夫第一部宪法的提案，在 1946 年 1 月 30 日通过了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宪法。然后，根据所通过的宪法，立宪议会作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继续工作。

# 战后初期国家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 的社会经济条件

(第83和84页的附件)

卡德尔在口授自己的回忆录，谈到有关1948年国有化问题时，特别提到，需要列举确定为国有化最低标准的生产能力的资料。接着，他又口授说：

“请阐述1945年后我国的经济形势，包括一切困难和问题——废墟，西方的封锁，东方的有限援助，等等。”编辑部在本附件中列举了有关国有化的资料和其他事实，以及其他的革命的社会经济措施和这一时期国内的整个经济形势。

除了口授在录音带上的这些意见以外，爱德华·卡德尔在与同事的多次交谈中，特别是在1978年9月20日，曾提醒说，在确定《回忆》的最后文本时，特别重要的是，通过解放后的政治事件和南斯拉夫所处的整个社会形势这个棱镜，比较详尽地和比较透彻地阐述经济部分。他强调首先要阐述1948年和1949年初的情况。他说，这里必须仔细地 and 透彻地阐述征购问题，征购有时是粗暴的。但目的是使我们能拯救国家免遭饥荒。然后必须阐述我们在农民劳动合作社问题上的考虑和摇摆，即在苏联

模式的压力下成立合作社和后来又解散合作社的情况。此外，还必须介绍和阐述解放后人民政权采取的其他革命措施——土地改革、国有化等。

他在这次谈话中接着说：“应该按年代来说明战后初期南斯拉夫发展的各个阶段；美国提供了多少经济援助，是什么样的援助。这一援助肯定是有益的，对我国的恢复曾有很大贡献，然而，对于克服当时的一切困难来说，我国人民的斗争、劳动和努力毕竟是决定性的。与此相关，还应该说明在情报局时期我们从美国购买武器的情况，我们必须到可以买到武器的地方去购买武器，这对当时加强我国军队是个宝贵的援助，但是，我们的根本方针是建立自己的武器装备，即依靠自己的力量。应该提供有关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材料，介绍国家的物质状况——国家在战争中受到巨大损失，经济遭到破坏——并用以说明国家本已处于困境而斯大林还骑在脖子上。实际上，对回忆录的这一部分要好好加工，以便能清楚地看出我们为渡过国家当时所陷入的危机作出了多大的努力。”

### 接收时的状况和战争的破坏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南斯拉夫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不发达而且规模很小。按经济发达程度而言，南斯

拉夫在欧洲是倒数第几名。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收入约为112美元。从1926年至1939年期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为2.1%，比人口增长率（1.5%）略高一点。当时，南斯拉夫人口增长率是欧洲最高的人口增长率之一。<sup>①</sup> 投资总额仅占国民收入的4—5%。这样的条件是不可能改变国家的不利的经济结构的。

据1931年普查，总人口的76.6%都以农业为主要职业。农业的技术装备很差。1939年只有2,500台拖拉机。在1930年至1939年期间，小麦的平均产量为每公顷11.4公担，玉米的平均产量为每公顷16.4公担。<sup>②</sup>

在1929年至1939年期间，工业生产的平均增长率只有1.8%。某些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生产率水平的二十分之一。1939年，整个南斯拉夫工业只有30万工人，即平均每100人中只有两名工人。<sup>③</sup> 1938年，工业和采矿业在国家创造的国民收入中占18%左右。<sup>④</sup> 外国资本在工业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它控制了77.9%的采掘工业；60.3%的电力工业；90.9%

① 《南斯拉夫——解放和战胜法西斯30年（1945年—1975年）》，联邦统计局贝尔格莱德1975年版，第11页。

② 《南斯拉夫（1945年—1964年）》，统计资料，联邦统计局贝尔格莱德1965年版，第100页。

③ 《南斯拉夫——解放和战胜法西斯30年（1945年—1975年）》，第62—63页。

④ 《新南斯拉夫10年》，合作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75年版，第156页。

的冶金工业；55.8%的金属加工工业；55.8%的褐煤生产；73.6%的化学工业；76.1%的食糖生产；全部铝矾土、铜矿和铅锌矿的生产以及黄铁矿和火柴的生产；92.5%的棉纱生产。在全国的资本总额中，外国资本约占49.5%。<sup>①</sup>

当时居民的生活水平非常低。在1939年，职工人数约占总人口的6%。平均每人消耗电力5.1度。每450人才有1台收音机。每3,236人有一名医生，每500人有1张病床。平均每人消费纺织品12.5平方米，工业制鞋半双。<sup>②</sup>

在1937年，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如下：资本家占有46%，各阶层劳动人民占有38%（工人和职员占有14%，农民占有19%，手工业者及其他阶层占有5%），国家占有16%（通过垄断和税收制度）。<sup>③</sup>

南斯拉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按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的数量来算，南斯拉夫在同

---

① 材料引自：鲍里斯·基德里奇的选集《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文化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60年版，第3卷，第353页；塞尔吉耶·迪米特里耶维奇的《旧南斯拉夫经济中的外国资本》，新文学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58年版，第207、208和210页。

② 《南斯拉夫——解放和战胜法西斯30年（1945年—1975年）》，第92和102页。

③ 鲍里斯·基德里奇：《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第358页。

盟国中占第三位，仅次于苏联和波兰。同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同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及其盟国作战的欧洲战场上总共牺牲了2,700万人（据1945年底在巴黎举行的同盟国赔款会议上提供的材料），其中南斯拉夫牺牲了1,706,000人，占全国人口的10.8%。在同敌人及其仆从的武装斗争中牺牲了305,000名战士。除战争的直接后果外，因遭受占领者的恐怖统治而不能正常生活的约有160万人（战俘、被关进集中营者、被强迫迁移者、从事临时劳役者、被强制动员者），占全国人口的10.2%。<sup>①</sup>

据估计，南斯拉夫国家财富受到的直接损失（按1938年的价格计算）价值91亿美元，占参加战争的18个同盟国损失总额的17%。南斯拉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的物质损失相当于美国损失的7.2倍，希腊的3.6倍，英国的2.4倍，荷兰的2倍，等等。<sup>②</sup>

在南斯拉夫被占领后，它就受到系统的掠夺和经济奴役。人民的财产被宣布为战利品，被拿走，被抢走。战争的破坏使经济部门、公共事业和公民财产都蒙受损失。

---

① 《南斯拉夫——解放和战胜法西斯30年（1945年—1975年）》，第27—28页。

② 鲍里斯·基德里奇：《赔款委员会的材料证明在赔款方面对南斯拉夫是不公正的》，见选集第3卷，文化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60年版，第195页。

农业——战前国家最重要的经济部门——遭受的损失特别惨重。289,000个农户及其全部农机具完全被破坏。43,000幢住房和农用建筑物被焚烧、毁坏或破坏。<sup>①</sup>五分之一的住房被烧毁、倒塌或遭到严重破坏,使330万人无家可归。战前果树总数的24.2%和葡萄园的38%均被毁坏,56%的农机具被毁坏或被拿走,190万车皮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被掠夺,与战前相比,马减少了61.6%,牛减少了55.6%,猪减少了58.7%,绵羊减少了63.3%。295,555公顷森林遭到破坏,185,000公顷喀斯特森林变成了荒山。全部库存的木材被掠夺,还被砍伐了4,870万立方米木材。

工业也受到很大损失。57.2%的化学工业、53.4%的纺织工业、49.8%的五金工业、30.2%的电力工业、22%的食品工业和17.5%的建筑工业都被毁坏了。在工业的固定资产中,36.5%的价值被毁坏。223座矿山被毁坏或遭到破坏。交通事业特别遭受了破坏。52%的普轨铁路和33%的窄轨铁路受到破坏,58%的机车和57%的车厢被毁坏。旧南斯拉夫拥有的13座铁路大桥全部被毁,55.3%的木桥被破坏,有28,380公里公路被毁坏或者受到破坏,61.5%的远洋轮船和66.7%的近海轮船被击沉或被拖走,103个港口受到严重破坏,所有的造船厂

---

<sup>①</sup> 《南斯拉夫——解放和战胜法西斯30年（1945年—1975年）》，第28页。

都被毁坏或受到严重破坏。<sup>①</sup> 三分之二的电话交换台和63%的电线杆都被毁坏。

学校、医院、科研机关、社会福利机关和文化历史古迹也受到很大损失。储备的全部铸币、外汇、珍宝和贵金属（10多吨黄金和82吨白银）都被抢走。<sup>②</sup>

### 国家恢复的条件和成果

在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我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复杂的任务。必须在最短期间把被战争破坏和洗劫一空的国家恢复起来，为人们保证起码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食物、衣服、靴鞋、住房等），并为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为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发展新的社会关系和消灭资本主义关系而创造必要的物质和社会经济前提。所有这些目标又必须在十分不利的国际条件下来实现：西方实行经济封锁，东欧各国提供的援助有限，同它们的贸易条件也不利。

尽管困难很多，但是国家恢复得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来得快，而且几乎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虽然拥有的物质手段很少，但不到两年时间就消除了战争带来

---

① 鲍里斯·基德里奇：《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第194页。

② 《南斯拉夫——解放和战胜法西斯30年（1945年—1975年）》，第11—12页。



的最严重的后果。新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人民群众空前高涨的革命热情和劳动积极性，对迅速而有效的恢复工作起了决定性作用，从而弥补了最起码的物质资料和财政费用的不足。

“人民群众的劳动热情可以说在武装斗争一结束就迸发了出来，这决不是偶然的。这直接反映出劳动人民自觉地体会到，他们确实是在本国历史上第一次为自己和自己的未来而工作。这直接反映出劳动群众体会到，我们的人民政权就是自己的政权，就是劳动人民的政权。这直接反映出劳动群众体会到，人民政权的最后胜利开创了消灭人剥削人的进程。如果劳动群众没有这样的体会，那么谁都无法劝说他们或者迫使他们创造出这种劳动英雄主义的奇迹。”<sup>①</sup>

这样才有可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在战争结束一年半以后，就使经济活动达到战前水平，有些行业甚至超过了战前水平。根据公布的统计材料，在1946年底，工业生产达到了战前生产的79%，农业达到69%，林业达到87%，而建筑业超过了1939年生产水平20%。1946年的整个经济活动（按社会产值计算）相当于1939年水平的72%。1946年的工业产值比1939年低五分之一，到1947年就比1939年超过了近20%。<sup>②</sup>

① 鲍里斯·基德里奇：《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第347—348页。

② 《南斯拉夫——解放和战胜法西斯30年（1945年—1975年）》，第12和52页。

早在1944年，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经济委员部就发出指示，开始国家的恢复工作。<sup>①</sup>在国家的恢复工作中吸取了人民解放战争期间整顿和组织解放区生活的经验。1945年初，尽管全国各地尚未全部解放，就开始了恢复工作。千百万劳动人民，社会各个阶层，所有能劳动的男女老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几乎只靠自己的双手，积极参加了清理废墟和恢复经济设施的义务劳动。1946年竞赛活动在全国各地发展成为许多有组织的义务劳动。在人民阵线中，青年是解放初期义务劳动的主要力量和担当者。

一些最大的工程几乎照例都是青年建设的。1946年有62,268名青年参加修建布尔奇科—巴诺维奇铁路。1947年有217,234名义务劳动队员（其中包括5,683名外国人）参加了沙马茨—萨拉热窝铁路的建设，他们铺设

---

① 1944年12月14日，在解放了的贝尔格莱德成立了南全解委员会的经济委员部，作为南全解委员会的经济委员会，其任务是领导经济和协调各级经济委员部的工作。参加经济委员会的有当时的工商、财政、农业、粮食、林业、矿业、交通和建筑业的委员以及国防委员部的一名代表，而经济委员会主席由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任命。作为经济委员会的机构，成立了国家经济恢复委员会，它在经济委员会主席的领导和监督下工作。南全解委员会的经济委员会，即后来的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经济委员会，发展成了政府的主要经济机构，它执行日常的经济政策，为在社会主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经济创造条件。经济委员会的这个职能一直履行到1953年1月14日颁布宪法性法律为止，那时成立了国民经济事务国务部。

了302公里铁轨，开凿了长达1,534米的弗兰杜克隧道。贝尔格莱德郊区热莱兹尼克的“伊沃·洛拉·里巴尔”机床厂是由15,566名青年在1947年兴建的。同年还有27,700名青年参加修建尼克希奇—铁托格勒铁路。1948年，有210,206名青年参加联邦级义务劳动（“马弗罗沃”水电站、泽尼察钢铁厂等）。同年4月1日开始建设从萨格勒布到贝尔格莱德的“团结友爱”公路，长达382公里。这条公路修建了三年，于1950年7月15日竣工，参加建设的共有32万名来自南斯拉夫各地的青年和1,200名来自32个国家的外国青年。1948年还有502,709名青年参加了地方性的义务劳动。<sup>①</sup>

人民解放军，即南斯拉夫军队的指战员对国家的恢复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例如，南斯拉夫军队的7万名指战员参加了公路建设。首先着手恢复交通，特别是恢复和修筑铁路、公路和桥梁，因为这是把全国各地联系在一起的基本条件。被破坏的矿山和一切比较重要的工业设施迅速地得到了恢复。在为人民保证起码的居住条件方面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新的人民政权在恢复国家生产能力的同时，还为整顿秩序和保证人民生活的基本条件采取了一系列广泛的有组织的社会福利措施和其他措施，例如，安置了236,000名战争孤儿，遣返了335,000名俘虏，在战争尚

---

<sup>①</sup> 《青年义务劳动30年》，青春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76年版，第104—106页。

未结束时，就把粮食从产粮区经过敌占区运送给利卡和达尔马提亚地区的老百姓，等等。

随着国家生产能力的恢复，社会事业和服务行业也恢复了，还采取了其他措施，为整顿秩序、为使这些机构能正常活动而创造条件。实行了教育制度的彻底民主化，学校与教会分开。中小学生和大学生的人数增加了，还开办了新的学校和院系。通过所谓识字班在居民中开展了广泛的扫盲活动。各种各样的文化创作活动极其迅速地开展了起来。1947年底约有3,000个业余文艺团体和小组在开展活动。到1947年底，经过修复旧的设施和建设新的设施，开办了2,216个文化宫和1,000所人民大学。<sup>①</sup>

在1947年，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和少数农民劳动合作社，在国家的大力物质支援下，开始加强合作社之家的建设。这项活动非常重要，因为合作社之家成了当地农村文化生活和整个社会生活的中心。在有些地方，建设合作社之家，已成为在政治上动员农民拥护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纲领的一种形式，成为同反动政治势力的影响作斗争的一种形式。<sup>②</sup>

---

① 布兰科·佩特拉诺维奇和切多米尔·什特尔巴茨：《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史》，工人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77年版，第1卷，第52页。

② 爱德华·卡德尔：《经济建设的弱点和缺点》，摘自1948年4月25日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上的讲话，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文化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60年版，第1卷，第241—242页。

人民广泛地参加国家的恢复工作，是人民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自治性质和民主性质的反映和继续。换句话说，正如在人民解放战争中一样，这里也充分发扬了群众自下而上的自治的主动精神。这对恢复工作取得成果和开始在新的社会基础上建设国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国家的恢复时期，南斯拉夫获得了以下的外国援助。苏联在贝尔格莱德解放后提供了5万吨谷物。美国军人救济当地居民组织（AML）根据1945年1月19日同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部在贝尔格莱德达成的协议，提供了12万吨物资，价值1,030万美元，这些物资主要分配给了沿海解放区的居民。

民主联邦南斯拉夫临时政府1946年3月24日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签订了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到1946年底无偿地向南斯拉夫提供250万吨物资，价值42,500万美元。这批援助物资从1945年6月开始运来，其中包括食品、牲畜、卡车、拖拉机、机车、机器、零件、药品和医疗器材。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还向南斯拉夫派来了医疗小组和技术专家小组。

然而，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就签订这项协定谈判了很久，而且一点也不顺利。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代表为签订协定提出了条件，要求由他们自己通过派到南斯拉夫来的机构分配这些救济物资，因为他们认为南斯拉夫还没有可以分配食品和其他救济物资的相应组织。

南斯拉夫拒绝了这样的要求，从而制止了外国对我国内政的干涉。谈判毕竟圆满地结束了，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代表后来察看了救济物资的分配情况，终于相信，分配工作是有组织地进行的，那些需要救济的人都得到了救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救济，“仅仅是给我们受到破坏的国家的初步救济，是擦在占领者给我们造成的严重创伤上的药膏，而不是可以恢复健康的药品。这一救济使我们比较容易地克服了战后头两、三年的困境，使我们能养活老百姓，因为当时经济已被破坏，我们原有的一点工厂被毁坏了，大部分机器也被运走了，农业情况也是如此……”<sup>①</sup>

### 与饥荒和普遍匮乏作斗争

解放初期，由于战争的洗劫和破坏，我国的经济形势十分严重，它最突出地表现在：为满足人们、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和军队的基本生活所需要的粮食和日用品普遍匮乏，开始恢复和兴建的工厂所需的原料和再生产材料也普遍匮乏。市场一片混乱，黑市和食品的投机活动达到了危险的程度。1945年6月份的生活费用与5月份相比，在贝尔格莱德上涨了11.07%，在诺维萨

---

<sup>①</sup>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在南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为社会主义民主而斗争》，见《铁托选集》，光明出版社萨拉热窝1977年版，第1卷，第196页。

德上涨了32.4%，在卢布尔雅那上涨了25.04%，在斯科普里上涨了11.45%。①

如果把1939年的平均生活水平作为指数100，那么南斯拉夫战后的平均生活水平的发展情况如下：1945年为55，就是说，尽管获得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救济，仍比战前几乎下降一半；1946年为80；1947年为87。

在城市居民食品中消费的主要农产品的指数如下：1939年为100；1945年为60；1946年为71；1947年为71。衣服的指数：1939年为100；1945年为20；1946年为67；1947年为79。

上述指数最清楚地表明，敌人的占领对南斯拉夫居民生活水平的打击有多大。1945年的生活水平总指数比战前（1939年）下降了一半。1945年衣服和靴鞋的总指数相当于战前的20%略高一点。从上述指数还可以看出，尽管困难重重，新南斯拉夫还是逐年地提高了平均生活水平，至少是提高了百分之几。②

在如此困难的经济条件下，人民政权担负了保证和组织居民的粮食供应的责任。一解放，立即颁布了关于制止投机倒把和经济怠工、调节国内商品流通、对商品进行计划分配和消费等条例，从而保证了社会主义国家在供应方面的长期干预。

---

① 布兰科·佩特拉诺维奇：《民主联邦南斯拉夫临时政府时期的政治法律情况》，社会科学研究所贝尔格莱德1964年版，第34页。

② 鲍里斯·基德里奇：《论联系价格》，见选集第3卷，文化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60年版，第285—287页。

为了供给城市人口和军队所需的粮食，为了供给工业所需的农业原料，1945年秋天实行了农产品义务征购制。同时，对拥有的几乎全部农产品和工业品也实行了严格的计划分配的配给制。因为在几乎所有的商品都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市场上的放任自流会导致产品分配的不平衡和不合理，会在农村和部分尚未国有化的城市零售网中使资本主义倾向得以发展。全部配给商品，经过严格登记和检查后，通过各种票证分配给工人、职员和一些贫苦农民（不发达地区）。战争中破坏最严重的地区在供应方面有优先权。按时完成征购任务的农民在购买工业品方面享有优先权。农民按照低于自由定价的价格把自己的产品卖给国家，可以在合作社和国营商业网系统中按照较低的统一价格购买工业品。这就是所谓征购中的联系价格。这种制度是由如下的需要决定的：要使落后的和小私有者的农业能保证生产和交售尽量多的粮食，同时又要对混乱的市场实行有力的控制。此外，还要通过义务征购得到大农业生产者的尽量多的商品粮。因此，联系价格政策也是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倾向的一个工具。尽管联系价格制度也是使积累从农业流入工业的一种形式，但战后时期价格的剪刀差毕竟缩小了，对农民有利。<sup>①</sup>

接着，为了搞好对居民的供应，还实行了所谓商品

---

<sup>①</sup> 1948年初与1939年相比，农产品和工业品价格的剪刀差缩小了12%（鲍里斯·基德里奇：《论联系价格》，第291页）。



限额制。对于那些数量较多、不凭票证也能买到的工农业产品实行商品限额制。为了避免投机倒把，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各共和国政府确定了各地区的商品限额。

卡德尔在谈到义务征购是政府和社会为避免国内出现饥荒而采取的措施、行动和作出的努力时说：“……1946年，我们全国只能消费5万吨糖……肉类情况更糟，面包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我们生活在饥荒的边缘。仅仅是由于实行了纪律严明的征购政策，实行了对粮食投机活动采取严厉措施的政策，我们才避免了真正的饥荒。有时我们只有几天的粮食库存。可以说，我们时刻都在关切地注视着每一艘从世界各地装载着粮食和食品驶向南斯拉夫的轮船。食品运输中的任何一点耽搁都使我们陷入严重的危机。同样，国内征购工作中的任何延误也使我们陷入极大的危机。因此，为征购而斗争就是同饥荒作斗争，同时也是为保住革命而斗争。这也是为反对人剥削人而斗争，因为谁要是能把食品藏起来并拿到黑市上出售，谁就可以获得极高的价格。当然，征购工作也有一些缺点。但这是次要现象，任何这样的社会危机都可能产生这样的现象。实际上，当时搞征购工作的人是在投机活动和利己主义的任何增长都意味着广大群众挨饿的时刻，为公正地分配粮食而进行英勇的斗争。正因为我们成功地执行了这一政策，在同斯大林发生冲突后有一段时间我们甚至不得不更严厉地执行这一政策，

基德里奇有一次才能这样说：‘我们曾经处于饥荒的边缘，但是，我们毕竟没有挨饿’。”<sup>①</sup>

所以，农产品义务征购制，作为一种政策和措施，是迫不得已的，这是我国粮食问题和反饥荒斗争日益尖锐的反映，而并不象反对派当时所解释的那样是针对农民的利益。关于这一点，1947年8月19日卡德尔在卢布尔雅那的集会上说：“……事实是，我国人民的敌人现在同过去一样，仍然首先指望用各种谣言和诽谤来欺骗我们的一部分农民。在这方面，他们特别利用了征购这件事。必须指出，征购一部分我们的农产品，决不仅仅对国家有利，也不仅仅是由于暂时经济困难——今天全欧洲都碰到这样的困难——而不得不采取的某种偶然的措施。当然，这些具体的经济困难更特别要求我们在征购方面充分实现我们给自己提出的计划。

然而，情况并不仅仅如此。我们现在进行的这种征购，也是符合农民本身的利益的。只有当国家在实现五年计划的斗争中，象掌握全部工业品一样地掌握一定数量的农产品，我们才能保证市场上物价稳定，才能消灭市场上的投机倒把，农民才能按照限定的价格获得工业品，而工人和职员才能按限定的价格获得农产品。”<sup>②</sup>

---

① 引自爱德华·卡德尔在卢布尔雅那电视台举办的《我们这50年》的第五次节目中的讲话，1971年5月26日和6月2日。

② 爱德华·卡德尔：《论五年计划，兼论我们的困难和敌人》，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文化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60年版，第1卷，第96页。

1951年上半年，在为实行社会主义自治、使市场规律较自由地发挥作用和实行新的计划制度而采取一系列措施的同时，也着手取消一解放就实行的对农产品的义务征购。首先取消了肉类、牛奶、奶制品、土豆、菜豆、和干草的征购，接着取消了油脂和粮食的征购，最后在1953年1月初放弃了羊毛的征购，从而为农产品比较自由的市场创造了条件。1949年由于实行自治，也取消了食品和工业品的配给制。

### 新政权的革命的社会经济措施

战后需要采取革命措施，为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奠定基础，其形式是，一方面有强大的国营成分，即全民成分；另一方面有以私有资料从事个体劳动为基础的私营成分，尤其是在农业和手工业等部门。

“不言而喻，战争期间不可能在经济领域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方面实行比较重大的变革。我们党在这方面一直坚决同任何冒进作斗争，因为冒进可能缩小人民解放起义的群众基础。然而，重要的事实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问题——推翻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政权，建立由工人阶级无可争议地领导的人民政权——在战争期间就解决了。所以，解放后巩固人民解放战争成果、巩固新的人民政权和准备进行广泛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需的

时间才可能如此之短。”<sup>①</sup>

1945年2月13日卡德尔在贝尔格莱德电台广播时说：

“……虽然在经济生活中——除了对人民的敌人以外——没有采取任何激进的措施，但是显而易见，我们在经济领域中也永远不会复旧了。如果我们复旧，就会出现政权掌握在民主力量手里，而经济阵地却控制在反动派手里这样一种状况。自然，这样的状况不可能维持多久。在这种局面下，就会十分尖锐地出现‘谁战胜谁’的问题。或者是以无产阶级为首的人民民主力量联盟——如果只是依靠政治阵地的话——将遭到反动派在经济方面的全面抵抗，而反动派迟早将在政治上削弱它，使它丧失政权；或者是以无产阶级为首的人民民主力量联盟不得不依靠自己的经济阵地，即依靠强大的国营经济成分，以便能对经济的发展施加影响。”<sup>②</sup>

卡德尔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中谈到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措施和条件时说：

---

① 爱德华·卡德尔：《南共为争取新南斯拉夫、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而斗争》，摘自在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文化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60年版，第1卷，第292—293页。

② 爱德华·卡德尔：《论后方在当前的主要任务》，见《新南斯拉夫的道路（1941年—1945年）》，文化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46年版，第117页。

“……战后决定我们在国内的地位的条件如下：

1、人民政权已在全国巩固，以共产党为首的工人阶级正在政权中无可争议地起着领导作用。

2、在人民阵线内形成了工人阶级与劳动农民、人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的巩固的联盟，这一联盟在各方面决定着人民阵线的政治发展。

3、共产党和铁托同志过去和现在都得到绝大多数劳动群众的充分信任。

4、人民政权依靠经济中强大的国营成分。国营成分是在战争中和战后初期通过没收卖国资本家的大部分财产并将此财产暂归国家管制而建立起来的。

5、多数劳动群众有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的自觉的革命意愿。

然而，资本主义成分还很强大，它妨碍着人民政权为恢复国家所作的努力。不言而喻，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政权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以便能把经济命脉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我们的党在确定自己在这方面的策略时，还不得不考虑到下列因素：

1、我国在战争中遭到了十分严重的破坏和洗劫，这表现在我们全国人民都不得不忍受的惊人的物资匮乏。因此，首要任务是早日把国家恢复起来，把全部生产能力开动起来，以便为我国经济的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奠定基础。

2、反动资产阶级，虽然在国内已被揭露，却仍得到国际反动派的支持。不要忘记，在解放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我们政府里还有舒巴希奇和格罗尔，我们还曾为争取国际上承认新南斯拉夫和巩固其国际地位而斗争。

当时如果急于采取过早的措施，实际上就会意味着阻挠国内的经济改造，并使新南斯拉夫的国际地位恶化。所以，战后头两年是恢复和为我国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改造作准备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党提出了下列主要任务：

1、最广泛地动员人民群众，以便尽快地完成国家的恢复工作。

2、剥夺占领者的帮凶们的财产，以便巩固作为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的国营经济成分。

3、实行土地改革，以便消灭封建残余，削弱和限制农村的资本主义因素，并巩固工农联盟。

4、国家政权采取一系列措施，以限制和排挤资本主义因素。

所有这些任务必须与同时揭露外国反动派在我国的代理人联系起来，与政治上击溃反动派及其在人民阵线中的代理人联系起来。所有这些任务必须与为了反对占领者的帮凶、反对投机倒把分子和发战争财者、反对大剥削者而采取的措施联系起来，因为这些人利用一切投机倒把的鬼蜮伎俩使劳动群众本来已很困难的处境更加恶化了。但同时必须在国内加强法制，人民民主的革命

法制。”<sup>①</sup>

为了实现这些革命的目标，新政权使用了由人民解放斗争的性质、即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手段——没收，土地改革，国有化，国家管制以及其他剥夺形式。

根据南人解委员会主席团1944年11月21日通过的关于把敌人财产收归国有的决定，没收了德意志帝国及其公民在南斯拉夫境内的全部财产，没收了日耳曼族人的财产（但在占领期间未持敌对态度和已参加人民解放斗争者除外），也没收了战犯、占领者的帮凶、卖国贼和在经济上与占领者勾结的人的全部财产。没收是在战争结束前所采取的剥夺剥夺者的特殊形式。1945年底，整个工业的55%已掌握在国家手中。<sup>②</sup>

除没收外，按照1945年颁布的剥夺国难财法，剥夺了那些在整个战争期间利用特殊情况和人民贫困而大发国难财的人的财产。

1946年5月制订了一项法律，对业主已不在或已失踪的财产、最通常是为占领者效劳的外国资本家的财产实行国家管制。根据国家管制条例，国家手里又掌握了整个工业的27%。

---

① 爱德华·卡德尔《南共为争取新南斯拉夫、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第293—295页。

② 这一百分比中包括按照剥夺国难财条例而纳入国营成分的一小部分工业和在旧南斯拉夫时就掌握在国家手里的那部分工业。

基德里奇在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谈到这些措施时说：

“所以，没收一方面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广泛地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又为国家的经济独立、为实现其革命变革——把曾经是帝国主义地盘的、半殖民地的旧南斯拉夫转变为在经济上也真正享有主权的国家——奠定了基础。在进行没收的同时，又对外国的财产实行了国家管制。被管制的企业不仅由国家来管理，而且照例还保证把这些企业创造的积累纳入国库。后来对这些企业实行国有化，只不过是履行手续而已。”<sup>①</sup>

革命的全民性和农民参加革命的广泛性，要求而且促成了在解放后立即开始恢复农业生产，并在新的社会基础上对农村进行改造。民主联邦南斯拉夫临时国民议会，在战争结束三个月后，即1945年8月23日，通过了土地改革和移民法。

土地改革的基本原则是“耕者有其田”——这一原则后来为1946年颁布的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认——它通过地方土改委员会的活动得到了彻底、公开和民主的贯彻。大地产和土地关系中的封建残余被消灭了。土地改革限制了农村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农户的地产被限制为总面积不超过45公顷，而耕地面积不超

---

<sup>①</sup> 鲍里斯·基德里奇：《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第349—350页。



过20—35公顷。法律上不允许任何私有地产超过这个最高限额。非农业劳动者超过3公顷的土地均予没收。根据这一法律没收的土地总额为1,566,000公顷，其中一半以上（797,000公顷，即51%）分给了农民。179,961户只有少量土地的贫农、70,701户无地农民和65,753户移民分得了土地。上述土地总额的其余部分分配如下：国营农场获得288,000公顷；占18.3%；国家机关获得20,357公顷，占1.3%；国营企业获得4万公顷，占2.5%；农业劳动者合作社获得40,700公顷，占2.6%，国营林场获得38万公顷，占24.3%。<sup>①</sup>

还在土地改革法通过以前就已开始移民垦殖。战后在伏伊伏丁那有7万块荒芜的地产。移民垦殖工作是这样进行的，除土地外，移民还无偿地获得住房、农具和其他劳动工具，因此他们可以立即开始耕种土地。

仅用一年时间就坚决地、有组织地完成了土地改革，从而加强了革命政权和农村劳动群众的团结。这一措施和后来在农业方面采取的一系列其他措施<sup>②</sup>铲除了农村半封建和资本主义关系的老根，从而开始了对农村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用地主的土地组成了公有的地产，为发展农业的公有成分创造了条件。

人民政权的所有这些措施和其他一些措施，都遭到

---

① 《南斯拉夫（1945年—1964年）》，统计资料，第109页。

② “彻底免除农民债务法

了各种反对派的抵制。有些政界人士断言，象土地改革这样的重大决策是不能所谓草率从事的，把土地分成小

#### 第 1 条

凡1936年9月26日颁布的关于免除农民债务法令所涉及的农民债务，其数额在依照该法令减免后按债务人计算不超过5,000旧南斯拉夫第纳尔者，全部取消。

#### 第 2 条

1) 凡1936年9月26日颁布的关于免除农民债务法令所涉及的农民债务，如属下列情况者，则不论其数额多少，一律全部取消：

1、若债务人积极参加了人民解放斗争，或者

2、若债务人或其家庭成员：

甲) 死于人民解放斗争，或者

乙) 从敌人进攻之日起至1941年4月18日，作为南斯拉夫军队的战士或作为公民死于战争，或者

丙) 死于占领者或本国帮凶的法西斯恐怖统治，或者

丁) 死于敌人的俘虏营。

2) 第1款第2点所说的家庭成员是指债务人的配偶、双亲、子孙、条件是1941年4月6日前与债务人生活在一个家庭中。

3) 南斯拉夫军队的证件或有关人民政权的证明信可以用作债务人具备第一款条件的证明。

#### 第 3 条

1) 凡不属本法律第1条和第2条规定的农民，若因战争或敌人占领而遭受了使他无力偿还债务的损失，而曾以某种方式帮助过人民解放斗争者，其债务也全部取消。

2) 凡不属本法律第1条和第2条规定的农民，若因战争或敌人占领而遭受了一定损失，但尚能偿还部分债务，而曾以某种方式帮助过人民解放斗争者，其债务可免除一部分。”（《民主联邦南斯拉夫公报》，贝尔格莱德1945年版，第89页）

块将给农业生产能力带来巨大损失。天主教会本来就是土地的最大占有者之一，它把土地改革“革出教门”，宣布土地改革是暴力的和非法的，因为据说土改妨碍了教会的活动。此外，按天主教会解释，只有梵蒂冈才有权对教会的地产作出决定。东正教会也持类似的态度。<sup>①</sup>

根据1946年12月5日颁布的国有化法，所有具有全国意义或共和国意义的企业全被收归国有。<sup>②</sup>在实行国有化的基础上，工业和采矿业的各个部门、建筑设计、银行保险、温泉和医疗用泉、批发商业、陆运、空运、海运和江河湖泊的交通运输等42个经济部门的全部企业都收归国家所有。收归国有的范围包括企业的全部动产和不动产以及全部产权，特别是专利、许可证、开业许可证、地役权、采矿权、样品、商标、模型等等。只有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才能批准在已收归国有的经济部门中开设新的私营企业。

反对派这次又进行了抵制，并千方百计企图阻挠国有化的贯彻执行，抵制的形式之一是散布失败主义和对自身力量的怀疑。

---

① 布兰科·佩特拉诺维奇和切多米尔·什特尔巴茨：《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史》，第58—59页。

② 在颁布国有化法前，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和各人民共和国的国民议会主席团曾发布命令，宣布哪些企业具有全国意义或共和国意义。

1946年12月5日，卡德尔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通过国有化法时，回答某些议员关于所谓草率从事的指责时说：

“当政府起草这一法律并要求紧急通过这一法律时，正如你们大家都知道和可以预料的那样，政府是希望制止一切可能出现的投机活动和其他有害活动。如果把法律长期耽搁在议会中，就众所周知的事情进行长时间的实际上是毫无必要的讨论，这种活动就可能发生。国民议会是人民的代表，是人民利益的维护者。如果议会对这一法律连续讨论好几天，并容许在这段时间内——即在法律尚未通过之前——让人民的财产被弄出企业，各种投机倒把分子在国内外玩弄各种花招和进行有害活动，那么议会就没有维护好人民的利益。如果我们想切实有效地实行国有化而不打乱我国经济的整个发展，如果我们希望实行国有化而不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任何危害，那就必须决心采取这样果断而紧急的行动。

我想向本届议会再说明一个事实。政府不仅把这一法律草案提交了国民议会，而且已准备好了一整套组织机构。这套组织机构今天已在等着接管这些工厂，已准备好制止任何人想破坏按照这一法律将成为国有即人民所有的财产的任何行动。就是说，这项法律并不是‘草率地’制订的……

……

当我国劳动人民投入反对占领者和卖国贼的斗争

时，他们不仅是为了争取民族解放，而且也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为了给自己的未来创造更好的条件。为这样的目标而斗争，同时就意味着准备实行国有化。

当我们在南斯拉夫建立人民政权时，当第一批人民解放委员会在人民解放斗争中诞生时，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使这个不同于旧政权的政权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即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而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同时就意味着为实行国有化而斗争。

当我们为劳动人民的福利而斗争时，当我们提出人民解放斗争的一项主要目标和要求就是要国家不断地致力于提高劳动人民的福利时，我们就认为必须一劳永逸地消灭人压迫人。而消灭人压迫人，也就意味着要使生产资料国有化。

归根结蒂，当我们谈到我国的独立时，当我们说我国再也不能充当帝国主义势力之间讨价还价的零钱、不能成为任何帝国主义的利益范围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我们的经济独立。而考虑经济独立，也就意味着要为实现我国生产资料国有化而斗争。

……这项法律不是我们在解放后的今年才考虑的。我国最优秀的人士以及全世界最先进的人士考虑这项法律已经好几十年了。一切为人类更美好的生活而斗争的人们都考虑过这项法律……”<sup>①</sup>

<sup>①</sup> 爱德华·卡德尔：《要求紧急通过国有化法》，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文化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60年版，第1卷，第63—66页。

卡德尔在谈到1946年12月实行的国有化时还说：

“……国有化的组织准备和贯彻执行都搞得很好，任何消极怠工和任何破坏活动都未能得逞。全国所有的企业都是在同一天、几乎是在同一小时接管的，而这些企业的生产丝毫没有停顿。我国劳动群众欢迎国有化，把它看作是在争取社会主义、消灭人剥削人、为我国劳动人民争取更美好的未来的斗争中前进了一大步。这次国有化百分之百地消灭了具有联邦意义和共和国意义的工业、银行、交通和批发商业中的私有成分，而地方工业的70%也转入了国家的手中。”<sup>①</sup>

1945年和1946年期间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实际上取消了私人银行制度，使国家能把整个信贷系统几乎都控制在自己手里。采取了由国家控制外贸的措施，实际上意味着由国家来垄断对外贸易。还采取了一系列大大限制资本主义因素的其他措施，如：货币改革，有力地打击了大量货币的持有者、战争时期的投机倒把分子和一切资本主义分子；用各种措施限制对不动产（土地）的私有权，直至事先未经国家机关许可不得买卖不动产；以累进税为基础的税收制度。<sup>②</sup>

1948年4月28日颁布了对私营企业国有化法的修改

---

① 爱德华·卡德尔：《南共为争取新南斯拉夫、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第296—297页。

② 爱德华·卡德尔：《南共为争取新南斯拉夫、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第295—296页。

补充法，从而扩大了1946年国有化的范围。手工作坊和小手工业企业仍属私人所有，但已纳入计划经济制度，并置于国家的监督之下，雇用工人的可能性也受到限制。

卡德尔在谈到1948年实行的国有化时说：

“为了保证充分利用国家的全部生产能力，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因素阻挠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引起计划经济的混乱，就必须把私营工业的国有化进行到底。现在有人指责我们说，这一措施采取得太仓促，而且是在受到了关于资本主义因素在我国增长的批评的影响下采取的。当然，这种指责是毫无根据的，我们的许多县级领导人可以作证，他们在去年年底就已接受了为这次国有化作好准备的任务。这项法律本来准备在1月份提交国民议会，只是由于议会推迟到4月份开会，这项法律才没有在1月份提出。

第二个国有化法完成了我国工业国有化的工作，其经济意义特别表现在首先加强了我们的地方经济。这第二次国有化也使生产一刻都没有受到损失。这些事实证明，我们的社会主义成分在组织方面已取得了重大进步。”<sup>①</sup>

这些革命变革的意义和阶级实质也可以从对国民收入的分配、即从这一分配的比例的变化中看出。

---

<sup>①</sup> 爱德华·卡德尔：《南共为争取新南斯拉夫、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第299页。

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劳动阶层占的比例提高了11%，即从1937年的38%提高到1947年的49%，而且这是在物资极度匮乏、为国家的恢复和建设又要作出巨大努力的情况下实现的。工人阶级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的比例提高得最多，即从1937年的14%提高到1947年的25%，国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的比例，从1937年的16%提高到1947年的36%。加上工人阶级增加的百分比（11%），总共是31%。资本所有者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的比例已从1937年的46%下降到1947年的15%，或者，如果只算他们的净收入，下降到8%。<sup>①</sup>

新的人民政权在战争结束前和解放初期为剥夺和限制资本主义因素而采取的一切革命措施的成果是：“人民政权掌握了经济命脉，为进一步与资本主义成分作斗争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人民政权牢固地掌握了这些经济命脉，为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成分奠定了组织基础，这样才能在工业化和电气化的基础上，在五年计划的基础上，为发动广泛的社会主义攻势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

12月份进行的国有化使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成了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主导成分。这就使我们有可能更认真、更周密地开展我国经济的计划工作，更扎实地建立处理日常经济事务的领导机构。

---

<sup>①</sup> 鲍里斯·基德里奇：《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第359页。



这是着手制订五年计划的最重要的条件。如果我们不为我国的工业化、电气化和提高农业生产作出最大努力，也就是说不为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最大努力，就不可能使我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在铁托同志领导下于1946年制订的、从1947年开始执行的五年计划，就是为实现这个目标服务的。”<sup>①</sup>

### 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的工业化和电气化

1947年4月，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通过了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1947年—1951年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法。五年计划是以法律的形式通过的，以便强调计划的强制性。这个计划的目标和社会经济实质是：

“甲）巩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在经济上不依赖外国帝国主义的独立性和加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防御力量；

乙）消除旧南斯拉夫半殖民地历史的后果，首先是消除我们祖国自然资源非常富饶和技术落后之间的矛盾；

丙）发展生产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符合社会

---

<sup>①</sup> 爱德华·卡德尔：《南共为争取新南斯拉夫、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第296—297页。

主义建设需要的；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发达的工农业国家；

丁) 为农业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现代化的技术条件和手段。”<sup>①</sup>

计划的一项特殊任务是消除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马其顿共和国和黑山共和国以及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等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

五年计划规定，与1939年相比，社会产值增长80%；国民收入增长93%（从1939年的1,320亿增至1951年的2,550亿）；投资增长248%；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收入增长85%。

国营工业的发展在计划中占优先地位。国营工业产值应比1939年增长394%，从而使1951年工业生产在总产值中占的比例上升到65%。在工业中应保证加速基础部门的发展。计划规定，煤炭生产增长172%，石油生产增长达450倍，铁矿砂增长154%，生铁从1939年的101,000吨增加到1951年的55万吨，钢增长223%，等等。

对各个不发达共和国的经济发展特别重视。与1939年相比，工业产值在马其顿应增长达26.3倍，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应增长达10.5倍。对这些共和国的投资也应大幅度增加，与1939年相比，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应增长达7.2倍，在马其顿应增长达8倍，在黑山应

---

<sup>①</sup> 鲍里斯·基德里奇：《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第354页。

增长达7.8倍。<sup>①</sup>

反对派对五年计划的制订和执行都在政治上拚命抵制。一些人认为，计划完全不切实际，其唯一目的是充当宣传手段。另一些人看到了新政权拥有的实际可能和力量以及它所得到的支持，就力图诋毁这一计划，断言计划的实现就意味着全国挨饿。正如卡德尔当时所说的那样，应当果断地行动而又坚信胜利。卡德尔强调指出：

“……我们毋庸讳言……实现我们的五年计划是要认真作出努力的。然而，我们并不是初次走这条路。在人民解放斗争时期，各种公开的敌人和所谓的朋友也曾对我们说过，要等待，不要拿起武器，否则牺牲太大，简言之，象我们这样的小国人民要想拿起武器反对象当时的德国和意大利那样的庞然大物，那等于是自杀。当时我们没有听从他们，今天大家都已明白，我们没有听从他们是做对了。今天大家都很清楚，我们为赢得胜利和获得自由而付出的巨大牺牲是值得的。

正因为如此，非常清楚的是，如果我们当时‘等待’了，如果我们选择了表面上比较轻松的道路，即顺从占领者和消极等待同盟国胜利的道路，那么，南斯拉夫劳动人民今天就不可能掌握政权，斯洛文尼亚人民也不可能拥有本民族的自由的共和国。所以，敌人的各种代理人

---

<sup>①</sup>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 1947 年—1951 年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法》，见《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公报》，1947 年第36期。

和那些尚未摆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落后分子现在向我们提出的这类建议也阻挡不了我们。因为正如我已说过的那样，这将意味着使自己注定贫困下去，使自己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外国资本主义的奴役，使南斯拉夫注定永远成为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即西方帝国主义者落后的‘农业附庸’。我们不希望这样。我们再也不愿意勉强度日，因此我们这些计划都着眼于未来。我们的五年计划，尽管其规模很大，但并不象敌人的种种谣言所说的那样，打算降低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是要充分提高生活水平。诚然，特别是在我们五年计划的头二、三年，生活水平将提高得慢一些，但正因为如此，我们将能更快地进入每一个劳动者都不必为自己的明天担忧的时代。最后，五年计划的实现意味着为我国人民开辟新的历史时代。”<sup>①</sup>

为实现五年计划而斗争，被认为是人民解放斗争的继续。此外，这也证明新政权已把国家的经济生活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众所周知，我们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我们通过制订五年计划第一次正式指出了这一事实。”<sup>②</sup>“五年计划对我国不

---

① 爱德华·卡德尔：《论五年计划，兼论我们的困难和敌人》，第87—88页。

② 鲍里斯·基德里奇：1947年6月14日在贝尔格莱德《向文学家们作的关于五年计划的报告》，见选集第3卷，文化出版社 贝尔格莱德1960年版，第219页。

仅具有巨大的经济意义，它不仅是个经济计划。它的实现同时意味着在我国土地上最后铲除资本主义制度、即人剥削人制度的残存的老根。”<sup>①</sup>

南共的所有组织和领导机构、工会、青年和人民阵线的一切组织都直接投身于实现五年计划的目标和任务。绝大多数人自觉遵守纪律，有觉悟以及对国家命运和前途怀有强烈责任感、人民群众发挥出革命热情和创造力，以及在国家恢复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这使得全部生产潜力和人力都能为实现五年计划而充分动员起来。

南斯拉夫没有足够的为完成五年计划全部目标和任务所需要的资金和干部。从西方国家既得不到贷款，也得不到干部。在这样的情况下，与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投资贷款协定，并就建设一些关键项目所必需的设备签订了合同。计划的主要项目是以东欧国家的设备和贷款为基础的。在1948年5月以前，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占南斯拉夫外贸总额的51%。<sup>②</sup>在此期间，南斯拉夫从东欧国家进口了它所需要的86%的焦炭、62%的石油和54%的钢材，等等。

1947年的计划任务完成了101.7%，而1948年完成了

---

① 爱德华·卡德尔：《论五年计划，兼论我们的困难和敌人》，第80页。

②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为社会主义民主而斗争》，见《铁托选集》，光明出版社萨拉热窝1977年版，第1卷，第198页。

100.8%。①例如,1948年,工业和采矿业生产已完成了计划于1951年底完成的产值的70.5%,虽然在1948年初以前,整个五年计划期间计划投资总额只完成了12.5%。1948年底,工业完成了年度计划的102%,采矿业完成了92%,电力完成了103%。在具有联邦意义的企业中,黑色冶金部门完成了1948年年度计划的104%,有色冶金部门完成了104%,五金工业部门完成了80%,电力工业完成了108%,非金属工业完成了73%,等等。②

东方1948年的经济封锁。实现五年计划的最大困难是在1948年情报局决议后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撕毁合同、压缩贸易,即对南斯拉夫实行经济封锁、施加军事和政治压力而造成的。与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商定的投资贷款只实现了6.3%左右,与苏联商定的675,000万旧第纳尔的贷款只实现了0.6%。由于东欧国家经济封锁所造成的直接损失达42,900万美元。

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受到威胁,同时要求增加国防开支。在1948年至1952年期间增加的国防开支为140,800万美元。例如,在情报局决议前,即在1946年和1947年,

---

① 《军事百科全书》,军事百科全书编辑部贝尔格莱德1972年版,第4卷,第90页。

② 鲍里斯·基德里奇:《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上答国民议员问,谈1948年计划执行情况和1949年的任务》,见选集第3卷,文化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60年版,第407—418页。

军费平均每年为31,000万美元, 1948年国防开支增加到43,800万美元, 1949年增加到52,800万美元, 后来几年中平均每年为66,500万美元。如果没有这种政治和军事压力, 那么1946年—1952年期间, 这笔开支可能只需217,400万美元。但却花费了358,100万美元。<sup>①</sup>国防费用在国民收入中占的百分比的增长情况如下: 1949年——10.2%; 1950年——12.3%; 1951年——14.5%; 1952年——21.5%; 1953年——17.2%。<sup>②</sup>

如果除了直接受到的损失和增加了的国防开支以外, 再考虑到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 那么这些意外的开支共达271,700万美元。<sup>③</sup>这就大大影响了完成五年计划的进度和居民的生活水平。在这样的情况下, 唯一的出路是压缩计划投资的规模, 严格地把投资用于优先发展重工业、动力和国防。此外, 计划任务还不得不延长一年完成。<sup>④</sup>

---

①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为社会主义民主而斗争》,第198—203页。

② 爱德华·卡德尔1954年10月8日在奥斯陆向挪威工人党积极分子作的报告《南斯拉夫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民主》,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文化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60年版,第4卷,第207页。

③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为社会主义民主而斗争》,第207页。

④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1950年12月30日通过了关于延长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1947年—1951年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法的法律。

与东欧国家的贸易情况，使得那些依靠从这些国家进口动力燃料、原料和再生产材料的生产部门不得不减产或者完全停产，从而使得国家现有的生产能力也有一部分不能使用。这在很长时期内使居民的生活水平直接受到了威胁，因为个人消费品的生产下降了。居民的个人消费在1952年下降到战后的最低水平，即这一年比1948年降低14%。<sup>①</sup>这个材料证明，这方面的情况是多么严重。从1957年起，个人消费才开始有较大的增长。然而，这是使国家摆脱继承下来的落后状况的唯一解决办法，不仅如此，这也是捍卫经过艰苦斗争才赢得的自由和独立的唯一解决办法。这一方针得到了劳动人民和公民们的支持。

实现1949年的计划是实现整个五年计划的中心问题。尽管在国际贸易中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仍必须把已经顺利地开始的国家工业化继续进行下去。计划规定的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不得不放慢。1949年1月17日，卡德尔在塞尔维亚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

“现在我们正在进入我们五年计划的第三年，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一年，为什么说是我们五年计划的决定性的一年呢？”

首先是因为完成今年的计划同时也能使我们的五年计划基本上得到保证。今年我们将在奠定我们社会主义

---

<sup>①</sup> 《军事百科全书》，第4卷，第90页。



建设的基础——重工业——方面完成最重要的任务，我们将克服摆在我们工业化道路上的最大困难。

其次，今年我们将作出巨大努力，进一步巩固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首先是通过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农业劳动者合作社的事业，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国营农场和经济农场网等等。整个这一活动同时必须与克服粮食困难的决定性斗争结合起来，去年粮食困难是十分严重的。

最后，今年我们必须克服根据情报局决议开展的反对我国的运动所造成的巨大困难。

.....

我们在争取实现1949年计划的斗争中取得的胜利，将最终揭下这一运动披上的一切伪装、一切掩盖其真正实质的外衣，而使整个运动的实质，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应该建立什么关系的问题，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

1949年的计划是规模宏大的，但又是现实的，完全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存在着不仅完成计划而且超额完成计划的一切主观和客观条件。但是，正如以往一样，这次斗争的胜利也取决于我们是否善于动员我党的全部力量来克服所出现的种种缺点，而且要我们一出现缺点就能迅速克服，最后，也取决于我们能否保持和加强我党与我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全面的密切的联系。归根结蒂，成绩取决于劳动者的劳动和自觉地完成任务.....

.....

最后，正如我以前说过的那样，一刻也不应忘记，在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斗争中，胜利的命运归根结蒂要由劳动群众来决定，正是他们在用自己的双手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在这项工作中，劳动群众的觉悟越高，积极性就越大。所以既要发挥人民阵线、工会联合会、人民青年联盟和劳动人民的其他组织的积极性，又要全面地开展一个向广大人民群众解释人民政权所采取的措施和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运动。<sup>①</sup>如果党与有觉悟的劳动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劳动群众又懂得应该做些什么和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担心任务完成不了。”<sup>②</sup>

经济援助和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在执行五年计划的后半期，必须通过与西方国家和美国签订新的贸易和贷款协定来改变南斯拉夫的对外贸易和整个国际经济合作的方针。<sup>③</sup>必须为原来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的产品——烟草、葡萄酒、麻、铁矿砂等——

---

① 仅在1949年，人民阵线就有1,011,353名成员参加了义务劳动。

② 爱德华·卡德尔：《决定性的一年》，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文化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60年版，第1卷，第355—357和359页。

③ 1949年4月美国外交部批准向南斯拉夫出售10套石油钻探设备；同年7月同意由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2,000万美元贷款；8月份同意出售钢铁厂的设备，南斯拉夫获准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取300万美元；10月份南斯拉夫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获得了270万美元贷款，并获准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取600万美元。

找到新的市场。1949年南斯拉夫向东欧国家的出口总额比1948年减少了三分之一，而1950年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几乎中断了。

政治关系以及战后初期与西方的贸易已下降到最低限度这个事实，使得与西欧国家和美国建立正常的经济合作发生了困难。其中有些国家把解决债务—债权关系和赔偿这些国家被收归国有的财产作为经济关系正常化的先决条件。

从1948年到1951年底，南斯拉夫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进出口银行和某些西方国家获得了26,720万美元贷款。其中15,810万美元用于投资。在此期间，我国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美国援外合作社、红十字会等组织获得的援助（不算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援助）达28,660万美元。根据1951年4月美、英、法三国专家举行的所谓伦敦会议的决定和同年7月提出的布莱德备忘录，美、英、法三国于1951年中开始提供经济援助。在此基础上提供的援助总额为49,290万美元，其中美国提供了40,690万美元。从1950年到1952年11月初，“为了维持我国的防御力量”，南斯拉夫从美国和一些西欧国家又获得了24,120万美元。<sup>①</sup>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为提高国家的防御能力所花费的本国资金比从

---

<sup>①</sup>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为社会主义民主而斗争》，第205—206页；布兰科·佩特拉诺维奇和切多米尔·什特尔巴茨：《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史》，第118页。

外国获得的用于同一目的的资金大约多3倍。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间的军事援助协定于1951年11月14日签署，并由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1952年1月9日通过决议加以批准。<sup>①</sup>这项协定的政治意义在于顶住东方的军事压力和冲破东方的封锁。协定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原定美国给南斯拉夫74,650万美元军事援助（按美国援助目录价值计算），到1959年8月25日实现了92.7%。

虽然按照上述协定规定，军事援助计划将在28年内结束，但在南斯拉夫倡议下，1959年8月25日签订了关于结束军事援助的协定，从而中断了军事援助计划。

考虑到1948年后增加的国防开支，外国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虽然为数很大，但在当时显然未能对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决定性的影响。

由经济封锁、自然灾害和增加军费所造成的支出，绝大部分即80%是用本国的资金和靠自己的力量来补偿的。同时，投资总额仍达28,115,000万旧第纳尔（按较低的统一价格计算），或者，按当时的汇率（1美元等于50旧第纳尔）计算，是562,300万美元，其中外国资金占2.8%。<sup>②</sup>当然，外国援助的意义要超出其数额。因为

---

①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1952年2月15日出版的《公报》。

②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为社会主义民主而奋斗》，第205和207页。

新项目的建设是以进口优质劳动资料和再生产材料为基础的。美国是最大的援助者，其援助仅占南斯拉夫国民收入的4%，<sup>①</sup>从这一事实可以看出，整个援助的多少是相对而言的。

由此看来，考虑到南斯拉夫当时所处的形势和条件，外国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是很重要的，而且是在我国最需要的时候得到的。然而，即使在那时候，也象平常一样，新南斯拉夫发展的战略和基本方针仍然是自力更生。

五年计划的成绩。从1948年到1952年期间，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6.4%。这一增长率主要是靠劳动资料生产的增长（19.3%）和再生产材料生产的增长（6.6%）来实现的。在此期间，消费品生产的发展慢得多，年增长率为1.8%。<sup>②</sup>如果知道1951年和1952年的工业生产曾有所下降，如果再考虑到工业化计划的关键性项目是在1953年以后才建成的这一事实，那么上述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可以算是迅速的了。

随着工业的发展，形成了新的经济结构。工业和采矿业在国民收入中占的比重，已由1938年的18%上升到1952年的44.8%。<sup>③</sup>

---

①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共产主义者联盟根据国际形势和南斯拉夫国内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而提出的任务》，见《铁托选集》，光明出版社萨拉热窝1977年版，第1卷，第280页。

② 《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经济发展（1947年—1977年）》，统计资料，联邦统计局贝尔格莱德1978年版，第111页。

③ 《新南斯拉夫10年》，第156页。

农业方面的计划任务没有全部完成，即粮食生产的计划任务没有完成，首先是由于1950年和1952年两年大旱。

鉴于已经建立的经济结构，执行计划的总成绩是不可能仅仅用关于这一时期国家经济发展的数字来全面地和现实地阐明的，因为在冶金、动力和机器制造等部门建成的巨大生产能力要在晚些时候才能发挥其初步效用。

公有成分中职工人数的显著增加无疑也是执行计划的成果之一。据1945年人口普查，战争刚结束时，南斯拉夫共有461,000名职工。1946年职工人数增加到721,000人，1947年增加到1,167,000人，1952年则增加到1,734,000人。<sup>①</sup>

此外，自从国家开始恢复和建设以来，尤其是在完成计划任务的过程中，在企业中产生和发展了某些形式的工人自治，尽管名称各有不同。随着新南斯拉夫工人人数的不断增加，工人阶级通过工人们有组织地或自发地建立的机构对于决策、首先是物质生产方面的决策所施加的影响也在不断增加。1950年，工人委员会在法律上被确立为整个自治制度的基础。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在南共即南共联盟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中谈到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时说：

---

① 《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经济发展（1947年—1977年）》，统计资料，第15页和100页；《南斯拉夫（1945年—1964年）》，统计资料，第142、144和145页。

“五年计划的执行和推迟的情况是这样的：第一，今年，如果不算军事工业，我们建成了五年计划规定的工业生产能力的101%，如果加上军事工业，我们建成了108%；第二，必须强调指出，在下列部门建成的生产能力仍然落后于计划：电力生产、非金属生产、电机工业、建筑业、造纸工业、纺织工业和橡胶工业；第三，在关键性的基本建设全部完成后，如果不算军事工业，我们建成的工业生产能力将达五年计划的122%，如果加上军事工业，则为133%；第四，在关键性的基本建设完成后，电力生产、建筑业、造纸工业、纺织工业和橡胶工业的生产能力仍然落后于计划（这种在关键性基本建设完成后仍然落后于计划的状况，是由于对五年计划的结构作了一些修改而造成的。主要是由于上述困难，部分地也是由于在五年计划中犯了初学者的错误，我们不得不作出这些修改）；第五，已经建成的生产能力中约有30%现在尚未利用，目前的生产约为五年计划的70%，这首先是由于对外收支逆差所造成的。而对外收支逆差本身又是因为这样的事实造成的：在最重要的部门中，我们在完成关键性的基本建设方面仍然落后于计划，首先是因为我们为了从国外购买设备需要进行艰苦的斗争和付出巨大的努力，而在施工方面我们多少能如期完成任务。”<sup>①</sup>

---

<sup>①</sup>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为社会主义民主而奋斗》，第208—209页。

## 关于合作化和个人劳动的地位

在1946年宪法制订之前，尤其是在该宪法通过之后，为了促进农业生产，为了给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关系创造条件，为了消灭农业中的半封建关系和资本主义关系以保护中农和小农的社会经济地位，新的人民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同样，为了尽快地消除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倾向，特别是通过合作社组织来支援和保护手工业劳动者，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sup>①</sup>

1946年的宪法保障了私有财产权和私人在经济方面的主动精神，但此权利不得用来损害社会。新人民政权对农民和手工业者奉行的政策的社会经济实质是，取消对别人劳动的剥削，取消靠剥削别人劳动生活，而不是取消个人用自己的、即私有的资料从事个体的劳动。

1946年3月22日，卡德尔在国民议会中说：

“我国经济中还存在着私有成分。当然，私有成分今后将继续存在下去，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因

---

① 在1945年至1948年期间已没收了与占领者勾结的小业主的手工作坊，并把所有较大的、技术设备较好的、其规模和劳动方式已超出手工业范围的作坊都收归国有。



素。但是，显而易见，在存在着人民政权的国家里，在劳动群众对国家政策起决定性作用的国家里，不能让私有成分完全放任自流地发展，不能让它仅仅按照个人利益来确定自己与社会的关系。所以，在我国存在着国家对整个经济的监督，这是我国社会经济结构中另一个重要的新因素……

然而，在我们的国家里，国家的监督实际上是人民的监督，是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而进行的监督。在不限制个人主动精神的情况下，国家对经济的监督将确定私人利益和全民利益的关系，并通过这种方式使私人经济成分也能有计划地参与社会为发展国家经济、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而作出的努力。”<sup>①</sup>

卡德尔在1947年12月2日强调指出，我们需要手工业，“……正如手工业一样，可以从事个体劳动，提高质量和专门技能，培养干部等等。当然，必须反对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倾向，争取手工业与国营成分有计划地合作，建立各种类型的手工业合作社，建立将能阻止在手工业中进行剥削的组织系统……”<sup>②</sup>

---

① 爱德华·卡德尔：《论我国的政治经济地位》，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文化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60年版，第1卷，第17页。

② 爱德华·卡德尔：《我国地方经济和市政建设的任务》，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文化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60年版，第1卷，第222页。

为了增加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对农业的发展和提高以及对农村关系的改造特别重视。根据1945年颁布的国营农场法，建立了联邦的和共和国的农场，其任务是促进农业生产（培育良种、种畜和树苗，起示范作用，为科研服务，实际培训农业专家，等等）。根据1945年7月颁布的国营农机机构组织法，成立了国营农机机构，在一些地区还成立了机器拖拉机站。<sup>①</sup>

1946年制订了合作社基本法，这是在农业以及手工业和商业中开展合作化运动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措施。按照这一法律，“合作社是劳动人民自愿组成的经济组织，其目的是发展国民经济，通过共同劳动，把农业活动和手工业活动联合起来并加以发展，发扬城乡广大群众在组织商品的生产、供应和分配方面的主动精神”。

该法律规定合作社有以下几个主要类型：农业劳动者供销合作社，职工消费合作社，农业劳动者生产和加工合作社，手工业者生产和加工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住房合作社，保健合作社和农民劳动合作社。

合作社事业具有悠久的传统，因而能为我国农民所了解和接受。所以到1946年底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已有1,816,000名社员，包括930万农村消费者。1947年底这些合作社已有大约220万名社员，包括1,000多万消费

---

① 撤消机器拖拉机站后，农业机器分给了农民劳动合作社（1950年5月24日颁布了关于把拖拉机和农机具分给农民劳动合作社的法令）。

者。①

在农业方面成立和发展多种类型的合作社，包括农民劳动合作社在内，除其他原因外，是由当时农村中社会主义国营成分很不发达所决定的。例如，按1949年的计划，个体农业生产者应生产农业总产值的91.4%。②

合作社的基本形式是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这样的合作社1945年有5,447个，共1,225,575名社员；1946年有8,011个，共1,807,798名社员；1947年有6,632个，共2,545,408名社员；1948年有8,622个，共3,127,464名社员；1949年有9,060个，共3,460,728名社员；1950年有8,004个，共3,540,399名社员。③

1947年9月，卡德尔在表示赞成这种类型的合作社并解释其性质和作用时写道：

“……在我国农村发展统一类型的基层农业劳动者合作社肯定是最正确和最有利的，因为这种合作社可以把农村中各种经济活动结合在一起，可以把今天的供销、信用和加工生产合作社的作用以及与合作社的一般经济地理条件有关的其他一切合作经济活动形式结合在一起。这种统一类型的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在我国已得到了

---

① 爱德华·卡德尔：《我国经济建设的弱点和缺点》，第242页。

② 爱德华·卡德尔：《我们农村政策的任务》，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文化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60年版，第1卷，第366页。

③ 《农业百科全书》，第3卷，第553页。

顺利的发展。其优越性特别表现在，可以在农业采用各种先进措施和技术的同时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完善。”<sup>①</sup>

在手工业部门也实行了合作社的组织原则。成立了手工业合作社、得到国家支援的特种工匠工场、带学徒的手工业作坊等。

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为了开展生产活动，1947年底和1948年还建立了合作社经济农场，在租赁的土地上或者从全民经济农场中获得的土地上组织生产。参加合作社经济农场的农民仍然是土地的主人，他可以因此得到某种租金。1948年就成立了大约2,500个合作社经济农场。后来，由于缺乏组织现代化生产的资金，也由于改组为农民劳动合作社，合作社经济农场的数量减少了，到1952年只剩下918个，到五十年代中期又开始增加。<sup>②</sup>建立合作社经济农场的意义和目的是组织大规模、高效率的农业生产，以便多打粮食，并给个体农民作出具体的榜样。

这就是说，在保持小私有制关系的情况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组织了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参加合作社经济农场的农民已不再仅仅是个体经济的主人了；他

---

① 爱德华·卡德尔：《计划经济中的农业劳动者合作事业》，第135页。

② 韦利米尔·瓦西奇：《南斯拉夫的经济政策》，现代行政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70年版，第289页。

只有一只脚站在自己的个体经济上，而另一只脚已跨进了社会主义经济。”<sup>①</sup>

农民劳动合作社也是对农业和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种形式。早在战争快结束时，就开始成立这样的合作社。在1948年以前，成立农民劳动合作社的进程是逐渐发展的；1948年以后直到1951年，这种合作社的数量突然增多。1945年成立了31个农民劳动合作社。1946年有751个合作社，共75,186名社员和121,518公顷土地。1947年底有779个这种合作社，共40,590户，174,518名社员和210,986公顷土地。在以后几年中，直到1950年底，农民劳动合作社的数量不断增加：1948年有1,318个，1950年共有6,964个。从1951年起，农民劳动合作社的数量开始减少，到1953年减少到1,165个。<sup>②</sup>

在1947年9月，即在只有几百个农民劳动合作社的时候，卡德尔写道：

“我们这里确实有一些这样的好心人，他们认为，用一般的行政措施、法令和简单的命令就可以使农民小私有生产者服从计划了。当然，这种意见是完全错误的。

列宁说：‘再愚蠢不过的是想在经济方面对中农采取暴力。’（《列宁全集》，第3版，第24卷，第168页）

正如我已说过的那样，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要用我们农民的双手，按照他们的意志和依靠他们自觉的努力

---

① 爱德华·卡德尔：《我们农村政策的任务》，第380页。

② 《农业百科全书》，第3卷，第552页。

来完成对我国农业的改造。在这样的条件下，行政措施当然只能起辅助作用，而决不能成为决定性的手段。列宁在反对对小私有农业实行行政强制的倾向时指出：

‘这里没有上层可以拆去，而留下整个基础和整个结构。这里没有城市有过的那种上层，即资本家。’

（《列宁全集》，第3版，第24卷，第168页）

因此，不是要在改造我国农业方面采取行政措施，而是要为我国中小农业生产者寻求这样的经济组织、即合作社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将通过中小农业生产者自己的经验和新的认识，逐步把他们从比较落后、比较简单的农业生产合作形式引导到越来越先进的形式。

……

……我们必须创造条件，使我们的劳动农民能够提高自己的劳动生产率，能够从农业中获得这样的收入，这种收入不仅能保证他自己享有一个人应有的文化生活，而且能使农户和整个农业不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在劳动农民面前展示美好的前景。这就是说，发展我们的农业，使它与工业化相适应，不仅是提高我国劳动农民生活水平的利益所在，而且也是其必要条件，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走上农业合作化的道路。

……我们是否可以说劳动合作社今天是我国广大劳动农民改造我国农业的出发点呢？我认为我们不能这样说。尽管我们的劳动合作社正在顺利发展，尽管合作社

的数量正在不断增加，但是，这种合作社仍然只是我国农民中最先进分子的活动，而没有成为我国大多数农民所能接受和欢迎的事情。因此，如果我们认为，今天只有劳动合作社才是改造我国农业的决定性手段，那就弄错了。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劳动合作社当前的作用，我们就会犯宗派主义的大错误，我们就会冒进，走到我国农民的觉悟跟不上我们的地方，我们就会脱离农民群众。

目前我们要前进一大步——然而，这一步将为我国农民所理解，因而将能吸引全体农民群众而不仅吸引最进步的农民——做到这一点的基本手段是简单得多的合作化形式。以后，随着经验的积累和觉悟的不断提高，随着采用较好的耕作方式和农业技术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我国农民将会自觉地进一步发展这种合作形式。”<sup>①</sup>

在1948年和以后几年中，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成立农民劳动合作社的运动。然而，在那些不具备发展合作社的客观条件<sup>②</sup>和主观条件的地方也成立了这种合作社，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使这些合作社发生危机，后来果真发生了危机。

在1949年1月28日举行的南共二中全会上讨论和确定有关发展农业合作社政策的任务时，卡德尔作了题为《我们农村政策的任务》的报告。后来他在讨论中谈到

---

① 爱德华·卡德尔：《计划经济中的农业劳动者合作事业》，第123—125页，128—129页。

② 例如，当时全国只有4,500台拖拉机。

农民劳动合作社时说：

“我们的个体农民是和自己的土地紧密相联的。今天，当他们受到强烈震动，当他们犹豫不决，当他们日夜讨论要不要加入农民劳动合作社的时候，他们是很不轻松的。要他们把自己的七、八公顷土地一夜之间交给劳动合作社，并声明加入合作社，这是很不容易的。对于我们的农民来说，这是十分艰难的一步。这就是说，我们应该做些工作，使这些中农能比较轻松地加入合作社。同志们，在我们的头脑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头脑里，没有我们必须遵循的、要我们一定走这样的和那样的道路的教条……我们必须避免苏联实践中出现过的、从个体到集体的急转弯所产生的消极后果。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过渡时期，这些过渡形式，在我们这里可以放宽些，农民的这种过渡可以分成几个阶段。为什么我们怕给尚未下定决心加入劳动合作社的中农一些让步呢？”<sup>①</sup>

在这以前，在1948年举行的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卡德尔也曾谈到农民劳动合作社，他说：“……一些同志倾向于作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不需要任何低级合作社，而是干脆要强行推广劳动合作社。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不要忘记，目前劳动合作社是由农村中最进步、最有觉悟的人创办的，它远远没有成为普遍的农民运动。这种状况还要延续很久，直到我们的农民开上拖

---

<sup>①</sup> 引自尚未公开发表的爱德华·卡德尔在上述南共二中全会上的发言。



拉机为止。因此，尽管劳动合作社极其重要，尽管应该大力支援它，但是，我国最广大的劳动农民群众今天愿意接受的那些农业劳动者合作事业的低级形式，在今天毕竟是主要的。”<sup>①</sup>

爱德华·卡德尔认为，成立农民劳动合作社的整个运动并没有收到理想的经济效果。<sup>②</sup>“然而，事实仍然是，由于开展了这个运动，也由于在改组劳动合作社时采取了措施，终于在我国农村彻底铲除了资本主义的老根。”<sup>③</sup>

在1950年过渡到社会主义自治之后，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目的是为加速农业的物质发展以及为农村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保证社会经济条件和其他条件。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1953年1月1日彻底取消了对全部农产品的义务征购；同年3月30日制订了关于农民劳动合作社产权关系和改组农民劳动合作社的法令；1954年1月26日制订了关于农业劳动者合作社的法令；1954年3月15日制订了土地和房屋流通法；同年5月27日制订了全民所有的土地法；1954年底制订了一项关于税收的

---

① 爱德华·卡德尔：《南共为争取新南斯拉夫而斗争》，第303页。

② 从1951年起，农民劳动合作社的数量显著下降：1952年有4,679个；1953年有1,223个；1954年有896个；1964年有16个；1966年有7个。（《农业百科全书》，第8卷，第552—553页）

③ 爱德华·卡德尔：《农村社会主义政策问题》，文化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60年版，第19页。

法令，把地产收入作为征收农业所得税的基础。

这些措施和其他措施以及国家工业化所取得的成绩，使我们能在五十年代后半期（1956年）确定对农村和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整的战略。这一战略是以如下的进程为基础的：在公有成分的农业组织（农工联合体等等）中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和采用现代化工艺，并通过个体生产者与公有成分进行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协作和合作来实现个体农业生产的社会化。社会的这种方针在实践中得到了确认，并已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

对发展手工业，即发展用个人所有的资料进行的个体劳动，也给予了应有的重视。卡德尔在1954年5月7日说：

“我们的方针不能是消灭一切现有的私营手工业。实际上，那会是反社会主义的措施。我们的方针是阻止在手工业中剥削别人的劳动力，而不应该阻止手工业者用自己的资料和自己的工具，在不剥削别人劳动力的情况下从事个体劳动。最重要的是，我们首先要用现代化技术来装备公有的现代化的手工业工场和企业，使它们能代替私营手工业。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限制使用别人的劳动力的措施才不会给我们的社会造成经济损失。”<sup>①</sup>

---

<sup>①</sup> 爱德华·卡德尔在斯普利特举行的城市常设代表会议全会上的发言：《公社制度建设中的几项任务》，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文化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60年版，第4卷，第164页。

## 关于几个和约

(第91页的附件)

关于整个和平谈判，特别是关于对意大利和保加利亚的和约，卡德尔在口授自己的回忆录时提到，要求把“对意和约一切可能有兴趣的材料”补充到适当地方，“看一看对保和约是否谈到少数民族”，“搜集有关对德和会的各方意图以及有关我们的赔款要求和其他利益的资料”。

编辑部根据这些要求准备了本附件。在附件中只是整理了和平谈判和几个和约的某些问题。这里，除了众所周知的事件和历史事实以外，编辑部还摘引了卡德尔著作的有关部分，在这些段落中他对例如历次部长会议的工作方式和作出决定的方式、和会全体会议的工作程序、和约的内容和某些条款等作了评价。这里主要是指卡德尔那些实际上已用《在巴黎会议上的发言》的总标题单独出版了的几次讲话。

根据邀请那些“以大量兵力有效地参与对欧洲敌国作战”的联合国成员国参加会议的原则，有21个国家（澳大利亚、比利时、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巴西、捷克斯洛伐克、埃塞俄比亚、法国、希腊、荷兰、印度、南斯拉夫、南非联邦、加拿大、中国、挪威、新西兰、波兰、美国、苏联、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英国）参加巴黎和会。

按照波茨坦会议（1945年7月至8月）的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和希特勒德国的盟国（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芬兰）之间的和约由五大国的部长会议来筹备和起草。实际上，是部长会议为巴黎和会（1946年7月29日至10月16日）准备了和约的草案。

和会举行全体会议，并设有五个委员会，为每一个需要与之缔结和约的国家各设立一个委员会。

爱德华·卡德尔率领南斯拉夫代表团出席了五大国部长会议的历次会议以及和会本身。南斯拉夫代表团中还有：莫沙·皮雅杰、阿莱什·贝勃勒、约扎·维尔凡、西尼沙·斯坦科维奇、斯雷奇科·马诺拉、米兰·巴尔托什等。

和会一开始——在讨论程序性问题时——卡德尔就十分明确地阐述了南斯拉夫对和平谈判中作出决定的方式的态度。过了很久，卡德尔在题为《我们这五十年》的电视节目里谈到和会上作决定的两种体制——由多数

票决定，这是西方国家建议的；或者，由列强来决定和约，这是列强在波茨坦达成协议时确定的，他说：“……全部历史告诉我们，巴尔干和中欧小国人民的利益，一贯只是欧洲列强互相讨价还价的零钱。过去有许多不公正的和约强加给我国人民，所以我们并不幻想现在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对意和约最早在1945年9月18日至10月2日举行的部长会议伦敦会议上讨论过。在这次部长会议开会后不久，列强的副外长又举行了伦敦会议（1946年2月），会上成立了专家委员会，其任务是提出划定南斯拉夫和意大利边界的建议。按照部长会议事先作出的决定，这条边界应符合“民族界线”。该委员会未能就南意边界的共同建议取得一致意见，因而提出了下列四个建议：

（甲）按照美国的建议，斯洛文尼亚沿海的部分地区，包括的里雅斯特市和伊斯特拉的大部分，应划归意大利（威尔逊线）。

（乙）按照英国的建议，边界线应划在美国所建议的边界线的西边一点，但与美国建议并没有多大差别（摩根线）。

（丙）按照法国的建议，伊斯特拉的大部分应划归南斯拉夫，而卡纳河谷、斯洛文尼亚的贝奈地区、戈里察、的里雅斯特市及其郊区划归意大利。这在实际上意味着斯洛文尼亚不会有出海口了。按照这个建议，还要建立的里雅斯特自由区，其边界线从诺维格勒到德

温，而德温以北和布雷斯托维察以南将成为南斯拉夫、意大利和的里雅斯特自由区三者的交界处。据建议者说，这项建议是以“民族平衡”的原则为基础的。

（丁）苏联的建议最接近于南斯拉夫和意大利之间的民族界线（伊斯特拉、的里雅斯特、戈里察以及斯洛文尼亚人聚居的其他地方划归南斯拉夫）。

1946年在巴黎举行了两次部长会议（4月25日至5月17日和6月15日至7月13日）。部长会议在和会召开前夕采纳了法国的建议，即法国的和约草案，并将它提交给和会全体会议。卡德尔除了在部长会议上发言以外，还与列强的每一个外长进行了个别会谈。例如，1946年7月2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对他说，按照法国划定的界线，南斯拉夫政府得到的要比美国政府认为理应得到的还要多。贝文也说，南斯拉夫得益不少。

在巴黎和会上，不仅对南斯拉夫来说，对意和约是整个会议的关键问题。卡德尔在和会上第一次发言时说：“在近代史上发生过很多次战争，也召开过很多次和会。很多次和会遭到了历史的谴责，因为这些会议不是完全按照战胜国的仇恨或力量盲目行事，就是目光短浅、敷衍了事，没有消除产生战争的根源。这样的错误使新的侵略和新的战争很容易发生。我们现在要缔结的和约不应重犯类似的错误……

……

……和会应该使得被各个昨天的侵略国瓜分的各国

人民能最终统一起来并且获得自由。和会应该为保障各国边境上的和平作出一切努力。和会还应该考虑到，解放了的人民应该真正获得自由，不受任何外来的经济压力和政治压力，其内政不受任何干涉……”

卡德尔在8月5日发言时说，和会要作出的决定将“触及各国人民的命运，它们要决定千百万人可能在数十年内的命运。我们清楚地知道，和会的错误往往要由新的战争来‘纠正’。我认为，我们在这次战争中已为凡尔赛和约的错误付出了太大的代价。”

卡德尔在谈到大小国家间的关系问题时说，这个问题只能具体地提出，把它作为“各国完全自由和独立的问题，其内政不受别国干涉，也不受外部经济扩张的威胁的问题”提出。

9月12日在对意委员会上，卡德尔特别强调指出：“人类要和平，但和平是不能依靠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人或者对小国和小国人民炫耀武力来实现的……如果连这个协议都达不成，那么小国人民除了被迫接受别人的意志以外，对这种会议还能期望什么呢？会议遭到这样的失败，将在道义上给世界留下什么印象呢？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人的做法是南斯拉夫所不能接受的。南斯拉夫人民是小国人民，但他们已学会了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sup>①</sup>

在表决对意和约时，法国所建议的南意边界线被通

---

<sup>①</sup> 爱德华·卡德尔：《在巴黎会议上的发言》，文化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47年版，第5—9页和第98页。

过了。这一条约还规定建立的里雅斯特自由区。

部长会议未能为的里雅斯特自由区的章程通过一个一致同意的草案。因而向和会提交了五个不同的章程草案：苏联的、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和南斯拉夫的。南斯拉夫的草案与前四个草案有原则上的区别，因为南斯拉夫代表团维护的立场是，的里雅斯特必须以一定的方式与南斯拉夫联系在一起。按照南斯拉夫的建议，的里雅斯特应该独立，但要与南斯拉夫结成实际的联合。卡德尔在讨论的里雅斯特章程时说：“是时候了，再也不能把小国人民当作势力范围、当作剥削对象、当作哪一国的基地或者当作哪一国在国际会议上的表决机器了。是时候了，应该懂得小国人民真正希望自由和独立。是时候了，再也不能从这个或那个帝国的角度，即从一个小国人民的权利可能威胁哪一国的‘最高权力’的角度，来看待小国人民的权利和利益了。

.....

南斯拉夫人民过去常常是列强手中的玩具。现在他们不再是任何人的工具了。新南斯拉夫只能执行符合于南斯拉夫人民利益的、符合于加强世界民主、和平和各国人民合作的利益的政策……目前在国际会议上可能还很少听到小国人民坦率的、自由的和勇敢的呼声，但这样的呼声必将增多。”<sup>①</sup>

---

① 爱德华·卡德尔：《在巴黎会议上的发言》，第60—65页和78—79页。



在对意和约辩论结束时，爱德华·卡德尔说：“历史上最有力和最不可战胜的莫过于一个觉醒了的人民为维护自己的权利和生存而进行的反帝解放斗争了。发自人民群众理想深处的力量要比谈判桌上的任何结论都更强大，要比用武力来维护不公正的局面的任何企图都更强大。”

先生们，这些理由说明，如果这个会议或者任何别的会议试图作出决定，把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中的某些部分仍然置于外国统治之下，那将不仅是不公正的，不仅是违背了同盟国在道义上对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所承担的义务，而且也将是无效的和短命的。我国人民世代为争取自由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他们把这种对自由的热爱一代一代传了下来，把争取彻底解放的斗争道路上的历史任务一代一代传了下来。在这一斗争中，我国人民已学会了坚强不屈、不怕牺牲。我国人民知道，自由是各国人民的权利，为正义事业而斗争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sup>①</sup>

1946年11月4日至12月12日，部长会议在纽约开会，会上确定了和约草案的最后文本，不久以后（1947年2月10日）在巴黎签署了和约。在这次会议上还通过了巴黎和会提出的几项建议，并就以前未能达成协议的问题作出了几项决定。会议确定了里雅斯特自由区的

---

<sup>①</sup> 爱德华·卡德尔：《在巴黎会议上的发言》，第105、107和108页。

章程，规定了意大利和保加利亚应付的赔款额，并承认阿尔巴尼亚享有同盟国的权利，等等。

即使在1947年9月对意和约签字和批准以后，的里雅斯特问题和两国边界仍然是影响南意关系的障碍。1948年3月20日，西方列强发表了所谓三方宣言（美国、英国和法国），单方面主张的里雅斯特自由区与意大利合并。西方列强此举修改了对意和约，损害了南斯拉夫。1950年底南意两国签署了意大利支付第一笔赔款的协议（12,500万美元总额中的3,000万美元）。然而，两国关系中最困难的问题（的里雅斯特自由区）仍然悬而未决。

1953年9、10月间，南斯拉夫和意大利的关系急剧恶化。西方列强修改了三方宣言，决定从甲区撤出自己的军队，并把甲区交给意大利管辖。当时南斯拉夫采取的态度是，将用武力阻止意大利人进入甲区。后来，意大利、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南斯拉夫四国政府签订了关于就的里雅斯特自由区问题取得一致意见的所谓伦敦备忘录。按照这一协议，的里雅斯特自由区的乙区全部和甲区一部分划归南斯拉夫管辖，而甲区的其余部分，包括的里雅斯特市在内，划归意大利管辖。少数民族的权利由双方确保。

然而，对伦敦协议的不同解释仍然是影响南意关系的障碍。后来，南斯拉夫和意大利时断时续地本着睦邻精神，并在没有任何外人参与的情况下，进行了直接的

谈判。作为这些谈判的成果，1975年11月10日在安科纳附近的奥齐姆签订了所谓奥齐姆协定。该协定在1977年4月3日得到批准。奥齐姆协定包括：

——南斯拉夫和意大利关于解决某些边界问题的条约。

——发展经济合作的协定。

——规定条约和协定同时生效的最后文件。

——有关国籍、互相承认毕业证书等问题的六封信。

奥齐姆协定本着睦邻精神模范地彻底解决了意大利和南斯拉夫间的边界问题。

对保和约。在巴黎和会前夕举行的部长会议的会议上以及在巴黎和会上都讨论了将与保加利亚缔结的和约。

和约规定，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边界仍与1941年1月1日相同。根据南斯拉夫政府和南共中央1946年5月11日的决定，爱德华·卡德尔和南斯拉夫代表团在和会上把保加利亚不是当作希特勒德国以前的盟国，而是当作应改善它在和谈和整个国际关系中地位的友好国家来对待的。南斯拉夫代表团充分支持保加利亚代表团提出的如下要求：承认保加利亚在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中的参战国地位，把赔款问题留待以后的双边谈判来解决。

南斯拉夫要求保加利亚赔款的问题是由1947年8月1日签订的布莱德协议解决的。布莱德协议包括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关于经济合作、关税优惠和准备建立关税联盟的协议，关于边界和国籍问题的协议。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布莱德协议第7点中承担了宣布放弃对保和约所规定的2,500万美元赔款的义务。后来，它也这样做了。

在反希特勒同盟的成员国事先批准了对保和约以后，1947年11月27日铁托访问保加利亚时，在耶夫克西诺格勒（现名瓦尔纳市）签订了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这个条约的有效期应为20年，但保加利亚政府在情报局决议后单方面宣布这个条约和其他布莱德协议无效。

关于少数民族的权利，对保和约第2条作了总的规定，这种规定是所有的和约都通用的。按此条款，保加利亚承担义务，保证全体公民，“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信仰”，都享有人权和基本自由权，有义务释放一切由于从事支持反希特勒同盟的活动或者对该同盟表示同情或者由于种族原因而被监禁的人，有义务取消在保加利亚国土上颁布的或实行的歧视性的立法和限制。

这些观点曾包含在1947年颁布的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战后第一部宪法中。该宪法规定，“少数民族有权用本民族语言进行教学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不承认以民族、出身、信仰和财产状况为基础的任何特权”。

然而，在1971年颁布的宪法中已没有这样的或类似的条款了。

在和会期间，保南关系发展顺利。祖国阵线执政后（1944年9月9日），保加利亚方面公开保证要与以前的大保加利亚政策决裂。譬如，保加利亚政府和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中央为了实现在皮林马其顿居住的马其顿少数民族的权利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学校和剧院使用马其顿语，报刊上使用马其顿文，人口普查时允许自由选择马其顿民族的属性等）。

在这方面，1946年8月9日举行的保加利亚工人党（共）十中全会的决议具有特殊意义。全会对马其顿问题确定了自己的六点立场（欢迎在南斯拉夫范围内成立马其顿人民共和国，坚持为皮林马其顿和马其顿人民共和国联合创造条件，坚持普及马其顿语言、文学和历史等等）。关于这一点，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在解释十中全会决议时说得更明确。那时他说：

“我们的队伍中有些同志对目前我们在马其顿问题上应执行什么样的政策还没有搞清楚。他们常常看不到，马其顿民族的主要部分已经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范围内组织了起来，成立了马其顿人民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的基础上，将通过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之间签订联邦条约，把马其顿民族的其他部分，特别是现在皮林地区居住的马其顿人统一起来。联邦条约还将规定，把保加利亚的西部省份归还保

加利亚。为了给这件大事作好准备，在选举大国民议会时，皮林地区的祖国阵线必须有自己的马其顿候选人，而当选的代表将在未来的大国民议会里代表马其顿议会党团。瓦尔达尔马其顿、皮林马其顿和爱琴马其顿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并不存在三个马其顿。只有一个马其顿，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境内成立的正在发展中的马其顿人民共和国代表了马其顿的主要部分。我们现在说的是皮林地区的马其顿居民。现在就应该把这些居民看作是马其顿民族的一部分，他们应该与马其顿人民共和国合并。”

与奥地利签订的国家条约。根据五大国部长会议的决定（1946年12月），与奥地利缔结和约的准备工作于1947年1月份开始。南斯拉夫向部长会议提交了备忘录，援引西方列强在进行对意和谈时坚持的“民族平衡”原则，要求收回斯洛文尼亚人占多数的那部分科鲁什卡地区。按照南斯拉夫的建议，边界线几乎与当时德国人聚居的地区和当时斯洛文尼亚人聚居的地区的分界线完全吻合，同时还考虑到双方的小块民族聚居点。

1947年3月10日至4月24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列强部长会议专门讨论了对奥和约。1947年11月25日至12月15日，部长会议在伦敦开会，讨论了对奥和约筹备委员会的报告，但又未能达成协议。

谈判几次中断和推迟，主要是由于苏联对德国在奥

地利的财产提出了要求，也由于存在着赔款问题和科鲁什卡问题。西方列强维护奥地利的利益，坚持奥地利保持战前的边界，反对用赔款来增加奥地利的负担。然而，为了能签订协议，它们不得不满足苏联的某些要求。

1949年5月23日至6月20日部长会议在巴黎开会，达成了如下协议：奥地利的边界保持1938年1月1日的状况，奥地利不赔款，苏联将因德国在奥地利的财产而获得补偿。南斯拉夫的要求遭到了拒绝。南斯拉夫发表正式照会，对这样的决定提出了抗议。同时，还就维护少数民族权利问题提交了备忘录，这个问题，列强根本没有提出讨论。

联合国大会在1952年12月也讨论了对奥和约，并通过决议要求缔结这一条约。在奥地利和苏联谈判后，1955年5月15日签订了关于重建独立和民主的奥地利的国家条约，实际上这就是对奥和约。条约由四大国的代表在维也纳签署，而南斯拉夫在1955年11月批准了这一条约。

国家条约规定，奥地利是个“享有主权、独立和民主的国家”，同盟国将“尊重奥地利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在对德和约中将写上德国承认奥地利的主权和独立的条款”，“禁止奥地利和德国建立任何政治或经济的联盟”。奥地利有义务承认1947年签订的和约。

国家条约的第六、七、九和十条对维护少数民族权

利具有特殊意义。第六条规定，奥地利有义务保障本国全体国民，不分种族、性别、语言和信仰，都享有人权和基本自由权，“包括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政治信仰和公开集会自由”，“奥地利的现行法律不得对奥地利的国民实行种族歧视……无论在对待他们的人格、财产、商业利益、职业利益、财务利益、法律地位、政治权利和公民权方面，还是在其他任何方面，都应如此”。

此外，以《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少数民族的权利》为题的第七条包括下列明确的规定：

“1、居住在科鲁什卡、格拉迪什奇和什塔耶尔斯卡地区属于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少数民族的奥地利国民，与其他所有的奥地利国民一样，在同样的条件下享有同样的权利，包括成立自己的组织、集会和用本民族文字出版报刊的权利。

2、他们有权用斯洛文尼亚语和克罗地亚语进行小学教育，并拥有自己相当数量的中学；与此相关，将修改教学大纲，将在监督学校教育的机关里成立主管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学校的部门。

3、在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聚居或杂居的科鲁什卡、格拉迪什奇和什塔耶尔斯卡地区的行政和司法领域内，将允许把斯洛文尼亚语和克罗地亚语同德语一样作为官方语言。这些地区的地名和招牌将用斯洛文尼亚文和克罗地亚文，以及德文书写。

4、居住在科鲁什卡、格拉迪什奇和什塔耶尔斯卡



地区属于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少数民族的奥地利国民，将与其他奥地利国民一样，在同样的条件下参加所有这些地区的文化、行政和司法机关的活动。

5、禁止以取消克罗地亚或斯洛文尼亚少数民族特征或其少数民族权利为宗旨的组织的活动。”

对德和约问题。与轴心国两个主要国家——德国和日本——的和谈没有能签署条约。由于反希特勒同盟的瓦解，特别是由于德国被分成了两个占领区，部长会议关于对德和约的筹备工作在冷战时期中断了。1948年4月，西方列强制订了占领章程，根据该章程举行了选举，成立了政府，并于1949年9月12日选出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总理和总统。1952年签订的波恩条约结束了西方盟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的战争状态。1954年10月23日法国、美国和英国签订了巴黎条约，解决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国际地位，从而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获得了充分的主权。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于1955年3月9日成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宣告成立后，苏联这方面也于1949年10月7日宣布当时的苏联占领区独立自主，并授权德国人民议院成立自己的国家。这一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1954年9月26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签订了专门的条约，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获得了充分的主权。1956年1月28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了华

沙条约的成员国。

两个德国都与其他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于1973年同时加入了联合国。这样，在没有缔结和约的情况下，停止战争状态的问题以及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关系问题是由反希特勒同盟有关国家的政府分别签订双边协议和其他协议来解决的。

南斯拉夫承认两个德国都是主权国家，并与它们建立了外交关系。虽然没有缔结和约，但建立了正常的国家关系和其他关系并展开了各种形式的合作。

在克里米亚会议（1945年2月4日至11日）上讨论了德国应支付的赔款问题。由于德国给许多国家造成的巨额损失是它客观上无法补偿的，所以确定了一项原则：德国必须尽最大可能用实物来赔偿损失。波茨坦会议确定了德国有义务赔款。东部占领区（后来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应保证给苏联和波兰赔款，西部占领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则保证其他19个国家——美国、英国、法国等国——的赔款。苏联还享有从西部占领区得到一部分赔款的权利（德国和平时期经济所不需要的工业设备的10%，等等）。

1946年1月14日签订的巴黎协议解决了落实西部占领区的赔款问题。规定要成立盟国赔款和金币归还署。协议规定要用拆卸工业设施、没收在国外的德国财产和商船队、没收食品和其他物资以及一部分正在生产的工业品来赔偿战争的损失。所有这一切必须按照规定的比例

和类别分配给有关国家。甲类包括德国在国外的财产、没收的物资和正在生产的产品，乙类包括工业设备、海运和河运船舶。给反希特勒同盟的每一个成员国都规定了在上述各个类别中所占的百分比。

按照规定，南斯拉夫在甲类中占6.6%，在乙类中占9.6%。盟国赔款署的成员国获得了667个工厂，价值70,800万西德马克（按1938年的汇率计算），即大约100万吨拆卸下来的物资。估计赔款总额为13,040亿西德马克，实际上支付了50,900万美元，这与第三帝国军队的巨大破坏和洗劫相比，连象征性的数目也算不上。

尽管德国占领者给南斯拉夫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破坏（3,585,800万美元），直接付给南斯拉夫的赔款大约3,600万美元。

## 联共(布)中央和南共中央之间的来往信件 以及情报局的决议

(第139页至第142页的附件)

在《回忆》中的第139页至第142页，卡德尔多次提到应该扼要地追述一下来自莫斯科的第一封信和其他几封信的内容，然后再扼要地追述一下南共中央复信的内容、情报局两个决议的内容，并列举当时给我国领导人和我们党扣的帽子。除此之外，卡德尔还作了如下提醒：

“请找出刊有共产党情报局的所有决议以及我们所作的答复的小册子，并根据它纠正我写的文章，我的文章肯定有多处错误，因为我已记不清事件的确切过程。”

根据这一要求，编辑部就卡德尔在《回忆》中所讲的事件、事实和文件的内容，撰写了这个篇幅较长的附件。他作的提醒是对的，因为某些事实确有出入。尽管如此，编辑部没有对文章本身作任何修改，而是在脚注中指出了这些事实，并在这个附件中较详细地叙述了事件的全部过程。

在联共（布）中央写第一封信以前，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关系中已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这种分歧在同斯大林就与保加利亚建立联邦问题进行会谈时（1948年2月10日）就有所表现。2月底，苏联外贸部长助理通知说，南斯拉夫不要派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预定的关于延长贸易协定的谈判。

3月1日，南共中央举行会议，日程是：关于莫斯科会谈情况的报告；五年计划；军队和军事工业问题；与保加利亚建立联邦的问题。实际上，所有这些问题都同南苏关系有关。铁托在会上指出，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关系走进了死胡同。苏联关于合营公司的政策和做法受到了批评。会议认为，苏联在以经济谈判为条件对南斯拉夫施加压力，目的是使南斯拉夫处于从属地位。

关于与保加利亚建立联邦的问题，在爱德华·卡德尔作了关于在莫斯科会谈情况的报告后，特别是在铁托讲话以后，会议认为联邦问题还不成熟。中央委员会没有同意保加利亚对皮林马其顿的立场，因为这种立场与以前的会谈不相符合。

苏联政府（1948年3月18日）决定撤回所有的军事顾问和教官，理由是他们“受到了不友好的待遇”；它又决定撤回文职专家（3月19日），理由是他们看不到机密情报。1948年3月20日，铁托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驳斥了撤回军事顾问的理由。他就此写道：“我们希望苏联政府坦率地说明问题所在，希望它向我们指出它认

为不符合我们两国良好关系的一切。我们认为，事态的这种发展对两国都是有害的，影响我们两国友好关系的一切障碍迟早必须消除。”

在联共（布）中央的第一封信（1948年3月27日）中，对撤回苏联军事顾问和文职专家所作的“解释”是，所谓“苏联军事顾问受到了侮辱，苏联军队的名誉遭到诋毁”，而文职专家“受到了南斯拉夫保安机构的控制和监视。”

这封信还说：“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状况使我们感到不安。这种不寻常的印象是由这样一个事实造成的，即作为执政党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仍然没有完全公开，仍然处于半公开状态。党的机构的决议一般不在报上发表。对党的会议也不公开报道。

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生活中感觉不到党内民主。党中央的多数委员不是选举的，而是指定的。在党内没有或者几乎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引人注目的是，党内主管干部的书记是国家安全部长，换句话说，党的干部被置于国家安全部长的监视之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党应该控制全国所有的国家机关，其中也包括国家安全部，而在南斯拉夫恰恰相反，因为国家安全部实际上控制着党。这一点也许可以说明南斯拉夫党员群众的主动性为什么没有达到必要的水平。

不言而喻，我们不能认为这样的共产党组织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布尔什维克的。

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内感觉不到阶级斗争政策的精神。农村和城市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正在迅速增长，但党的领导却没有采取措施来限制资本主义因素。南斯拉夫共产党受到了关于资本主义因素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腐朽的机会主义理论的蒙蔽，而这种理论是从伯恩斯坦、福尔马、布哈林那里抄袭来的。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党被看作是全国的主要领导力量，它有自己的特殊的纲领，不能与非党群众融为一体。在南斯拉夫却相反，人民阵线被看作是主要的领导力量，而且力图使党溶化在人民阵线中。铁托同志在南斯拉夫人民阵线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说：

‘南斯拉夫共产党有没有与人民阵线的纲领不同的另一个纲领呢？没有，共产党没有别的纲领。人民阵线的纲领就是它的纲领。’

事实表明，在南斯拉夫，人们认为党的这种不寻常的理论是一种新的理论。说实在的，这里没有任何新东西。还在40年前的俄国，就有一部分孟什维克建议把马克思主义的党溶化在非党的工人群众组织中，并且用后者取代前者；而另一部分孟什维克则建议把马克思主义的党溶化在非党的工农劳动群众组织中，并且用后者取代前者。众所周知，列宁当时把这些孟什维克看作是恶毒的机会主义者和党的取消主义者。”<sup>①</sup>

<sup>①</sup>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在国际工人运动中（1948年—1968年）》，第七种力量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68年版，第190—191页。

南共中央的第一封复信（1948年4月13日）是在4月12日和13日举行的南共中央会议上讨论通过的。在这个很长很详细的答复（信件）中谈到：“说我们党内没有批评的自由是不对的。我们党内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自由，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在党的日常会议上和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上进行的。因此，这种不真实的情况是一些人捏造出来的，并且把它作为情报向联共（布）中央提供的。

说在南共内感觉不到阶级斗争的政策，资本主义因素正在农村和城市加强，等等，这种情报是完全不确实的。这样的结论是从哪里来的？全世界都知道，十月革命以来，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象南斯拉夫这样进行了这么根本性的和彻底的社会变革。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同我们争辩的事实。因此，不可理解的是，怎么能把我们党与伯恩施坦、福尔马、布哈林和腐朽的机会主义相提并论呢？我们不能对这种谬误和对我们党的这种侮辱不闻不问。

信中还谈到了铁托同志在南斯拉夫人民阵线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援引了报告中的一小段话，并同孟什维克40年前涣散社会民主党的企图进行对比。

第一，那是在40年前沙皇的统治下，而今天我们在南斯拉夫掌握着政权，即南共在政权中起着领导作用。综观社会发展的进程，为了比较容易地达到既定目标，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组织形式，改变工作方法和领导



群众的形式。

第二，南斯拉夫人民阵线，与其他某些把每个想入党的人都吸收到自己队伍里来的共产党相比，从质量上说不仅毫不逊色，而且就其组织性和活动而言还要好些。不是任何人都能参加南斯拉夫人民阵线，尽管今天它已拥有大约 700 万名成员。

第三，南共在人民阵线中拥有完全可靠的领导权，因为南共是人民阵线的核心。因此根本不象信中所说的那样存在着党溶化在人民阵线中的任何危险。南共通过人民阵线逐步地实现自己的纲领，这个纲领是人民阵线自愿接受的，并把它视为自己的纲领。这就是铁托说南共没有别的纲领的依据。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竟然这样来谈论我们。我们要提请注意这样的事实：在某些国家，某些共产党不仅改变了工作形式，而且改变了党的名称，譬如在保加利亚和波兰就是这样，而且这并不是没有征得联共（布）同意的。在这些国家，党走这种道路无疑是必要的。然而，在我们这里，南共内部有坚强的组织，在它周围与人民阵线的数百万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由这样的南共领导的联合阵线已表明是最正确的。可是却没有指责其他这些党将溶化在群众中，虽然这些党采取了适合本国新条件的工作方式和组织形式。

那末，为什么要对我们无可辩驳的和早已人所共知的事实提出异议呢？我们深信，我们党在战争期间和战

后取得的成就本身就说明了问题，说明南共是强有力的，坚如磐石的，是能够领导国家走向社会主义，能够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领导南斯拉夫人民的。”<sup>①</sup>

题为《致铁托同志、卡德尔同志和南共中央》的联共（布）中央的第二封信（1948年5月4日），非常广泛地重复、扩大和加剧了以前对南共提出的指责。对南共中央复信中提出的所有论据都加以拒绝。指责铁托和卡德尔通过自己的信使事情更加复杂化，使冲突更加尖锐化，而且把这封信的语气说成是“太自命不凡”，是“赤裸裸地否认事实的幼稚方法”；再次强调“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状况令人不安”，说“南共领导人狂妄自大，他们对待自己的错误采取不正确的态度。”

信中特别广泛地谈到了苏联和南斯拉夫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分歧。提到了铁托1945年5月在卢布尔雅那的讲话。企图借此在南斯拉夫领导人中间，特别是在铁托和卡德尔之间挑拨离间。这个讲话的部分内容被说成是反苏的，接着声称：“南斯拉夫的整个立场是这样的：看不到苏联对外政策和英美对外政策是有区别的，把苏联的对外政策与英美的对外政策混为一谈，认为南斯拉夫应对苏联奉行和对帝国主义国家——英国和美国——同样的政策。”

在信的末尾，南斯拉夫关于进行双边会谈的建议被拒绝了，说参加情报局的9个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已经

---

<sup>①</sup> 同上，第181—182页。

了解苏南分歧问题，这个问题将在情报局下次会议上讨论。

1948年5月9日，南共中央举行会议，通过了简短的对联共（布）中央第二封信的复信。复信说，南共不同意在情报局讨论，因为这将是不平等的讨论，原因是其他党已经公开表态。南共中央的这封复信于1948年5月17日发出。

由苏斯洛夫签署的联共（布）中央5月19日的信件要求南共出席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情报局会议。第二天，即5月20日，南共中央立即举行会议，并一致决定不参加情报局会议。会上指出，他们“想把我们推向托洛茨基主义”，将对我们实行经济封锁，我们的“日子将很不好过”。在这次会议上，除对苏联的邀请作出答复外，还讨论了筹备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问题。

联共（布）中央5月22日的第三封信，对南共中央5月17日和20日的信件作了答复，强调指出“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通过这两封信在加深自己的原则性错误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在谈到南斯拉夫认为行将在情报局会议上进行的讨论的条件是不平等的这一点时，信件说“这是毫无道理的”，并提到1947年9月在波兰召开的情报局第一次会议，说什么当时正是南斯拉夫同志利用权利“批评了法国同志和意大利同志的错误，而且并不认为这样做破坏了平等原则。”<sup>①</sup>

<sup>①</sup> 见第108—109页。

信中接着坚持这样的论点：“每个共产党有义务向情报局汇报，每个共产党有权批评其他任何共产党”。南斯拉夫的立场被说成是要求特权和取消“情报局内的既定规程”。信件接着说，“南共中央政治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问题非常无知”，“南共中央政治局，特别是铁托同志，应该明白，他们通过近来在日常实践中贯彻执行的反苏和反俄政策，完全破坏了苏共和苏联政府对他们的信任”。

信中接着说，如果铁托和卡德尔最终决定不参加情报局会议，“那末，这就意味着，他们对情报局说不出什么为自己辩护的话，他们这样做就是默认他们是错误的，就是害怕站在各兄弟共产党面前。而且，南共中央拒绝参加情报局会议，就意味着走上从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统一阵线中分裂出去的道路，并正在准备使自己的党和南斯拉夫人民背叛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的统一阵线。由于情报局是统一阵线的党的基础，这种政策必然会导致背叛劳动人民的国际团结，并转变到敌视工人阶级事业的民族主义立场上去。

不管南共中央的代表是否出席情报局会议，联共（布）中央坚持要在情报局的下一次会议上讨论南共情况问题。”<sup>①</sup>

---

<sup>①</sup>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在国际工人运动中（1948年—1968年）》，第七种力量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68年版，第209页。

6月20日，南共中央委员会发表了“致情报局会议”的声明。声明说，南共中央原则上准备参加情报局的工作，但不能派代表参加这次会议，因为不同意这次会议的议程。南共中央认为，对待联共（布）中央和南共中央之间争端的态度一开始就是不正确的，因为联共（布）中央的第一封信就进行指责，而且这种指责是以片面的情报为依据的。此外，联共（布）在上述信件中谴责了南共，并拒绝了南共中央提出的论据。因此，南共中央再次建议举行双边谈判，并呼吁情报局成员党取消讨论南共情况问题的议程。

然而，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情报局会议无视南共中央的这个声明，通过了《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1948年6月28日），决议说，情报局讨论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情况，一致通过了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

决议指出，南共领导“近来在对内对外政策的基本问题上执行了一条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正确的路线”。因此，情报局赞同联共（布）中央揭露南共领导的不正确政策的行动，并指出，南共领导在执行敌视苏联和联共（布）的政策，采取“不是共产党人所应有的”立场，从反革命托洛茨基主义武库中借来反对苏联的诽谤宣传。情报局还谴责南共领导有民族主义。

情报局的这个决议认为，在对内政策方面，南共领导放弃了工人阶级的立场，在农村执行不正确的政策，

走上了民粹主义富农党的道路，断言“农民是南斯拉夫国家最坚实的基础”，还“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说”，重犯俄国孟什维克的错误，在党内建立将导致取消党的官僚主义制度。情报局认为，逮捕茹约维奇和赫布兰是个“可耻的事实”，然后断言，“由于南斯拉夫领导人在联共（布）中央和其他兄弟党中央委员会的批评面前无能为力，他们走上了直接欺骗自己的党和人民的道路，向南斯拉夫共产党隐瞒对中央不正确政策的批评，还向党和人民隐瞒惩治茹约维奇和赫布兰同志的真正原因”。决议还指出，南共中央近来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下令采取一系列新的左的法律措施”，企图用冒险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来消灭富农阶级；这些法令是蛊惑人心的和无法实现的，是不能容忍的政治赌博。

情报局最后认为，民族主义分子在南共内占了上风，“南共领导丧失了南共的国际主义传统，走上了民族主义的道路”，这将“使南斯拉夫堕落为一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使南斯拉夫丧失独立，使南斯拉夫变成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因此，“情报局并不怀疑在南共内部有足够的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忠于南共国际主义传统、忠于统一的社会主义阵线的健康力量”，并号召这些健康力量“迫使今天的领导人公开地、老实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改正这些错误”，或者“撤换这些领导人，并推选出南斯拉夫共产党新的国际主义的领导机构。情

报局相信南斯拉夫共产党将能完成自己的光荣任务”。

由于情报局没有提供决议的文本，南共中央委员会是通过南通社获得这一文本的。1948年6月30日，中央委员会公布了这个决议文本以及南共中央和联共（布）中央以前交换的信件。同时还公布了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所发表的声明。

这个声明是南共中央在1948年6月29日举行的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声明扼要地叙述了南共中央和联共（布）中央的来往信件。声明在谈到情报局决议时说，这个决议是以不确切的和没有根据的断言为基础的，它企图破坏南共。声明指出，说南共领导奉行敌视苏联的政策，在农村执行错误的政策，把南共变成富农党，党内没有民主，使党溶化在人民阵线中，南共不公开活动以及国家安全机关控制着党等等断言，都是不正确的。声明对所有这一切都举出了相应的事实。

对新南斯拉夫最严重的诽谤是断言“南斯拉夫领导人准备向帝国主义者让步，并拿南斯拉夫的独立同帝国主义者讨价还价”。声明接着指出，南共中央并不认为今后有义务对侮辱南斯拉夫人民的行为保持沉默，并不认为它拒绝讨论它未犯的错误就是破坏共产主义阵线的团结。“这个阵线的团结并不是以承认臆想的和编造的错误与诽谤为基础的，而是以一个党的政策是否真正是国际主义的这个事实为基础的。然而，人们不能无视这

样一个事实，即情报局已经破坏了它赖以建立的那些原则，这些原则规定各党自愿地接受结论。然而，情报局不仅强迫南共领导人承认他们没有犯过的错误，而且号召南共党员在党内造反”。声明最后指出，联共（布）中央对南斯拉夫的指控将被敌人的宣传所利用，南共中央“号召党员加强团结，为实现党的路线和进一步巩固党的团结而斗争，号召团结在人民阵线中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更顽强地为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继续工作。这是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上述指控毫无道理的唯一途径和方式。”<sup>①</sup>

1949年11月下半月，情报局在匈牙利作出了又一个决议，即关于南斯拉夫的第二个决议，标题是《南斯拉夫共产党掌握在凶手和间谍手中》。这个决议除了按照标题的精神罗列各种帽子以外，实际上没有任何其他内容。<sup>②</sup>

1956年4月18日，情报局解散了。关于解散情报局的公报说，情报局建立于1947年，它在共产国际解散后，在消除共产党之间的分离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国际局势发生的变化“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工作创造了新的条件。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无论就其组成而言，还是就其工作内容而言，再也不能适应这些新的条件了”。

---

① 同上，第217—222页。

② 见第144页的脚注。



## 自 治

(第153页的附件)

1978年9月20日，爱德华·卡德尔在口授完回忆录后，在与同事们谈到还应该做些什么工作时，他说，有关自治的部分还应该“扩大，即应当详细地阐述有关自治的思想，因为现在正在研究自治的思想是从谁的头脑中产生的，实际上，这种思想早在革命时期就产生了”。

爱德华·卡德尔接着在谈到1945年以来南斯拉夫自治的形式和发展情况时说：“诚然，自治在当时还只是一种论点，但是，它已以各种形式存在了，并采用各种名称，正因为这样，我们与斯大林发生了冲突，并经常受到他的压力。”

他接着又强调说：“应该按照年代和形式，发展地阐述争取自治的斗争，这就是要说明，无论在工厂和工会还是在党内，自治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这方面我们同教条主义的和国家集权主义的思想 and 观点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要说明我们本来就反对

教条主义，反对情报局等等。我们还必须懂得，自治在当时与其说是社会经济关系，不如说是民主的形式”。

编辑部认为，如果从卡德尔发表的著作中寻找对上述问题的答案的话，将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他的这些建议和要求。因此，编辑部决定在本附件中摘录卡德尔1945年以后写的有关自治的学术论文、专题论文、报告、文章和其他著作。

在本附件的第一部分中按时间顺序摘录了卡德尔从1945年至1949年期间的著作，而在后一部分中摘录了他以后的著作。

卡德尔在战争期间就在自己的十来篇著作中谈到了自治，诚然不是现在意义上的自治，而在战后时期几乎没有一篇著作不谈到自治。

“……我们（解放后）在大部分地区遇到的是残存的国家机器，它曾为各种反人民政权效劳，而在战争时期又为占领者效劳。这一国家机器，无论是就其具体人员组成而言，还是就其形式和内容而言，都已不再符合在人民解放战争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人民群众基本民主阶层的民主政权的条件和性质了。应该打碎这一国家机器，并用战争期间在解放区产生的新的形式来替代它，这些形式是在斗争中产生的，经受住了人民起义的严峻考验，已表明是最适宜的和最好的形式，最符合人民群

众的民主愿望。在这方面，我国的恢复与其他许多欧洲国家的恢复有根本区别，那些国家保留了旧的国家机器，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更换了旧国家机器中的人员。

不言而喻，在整顿内部方面的这种特殊道路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困难和更大的责任。那些旁观者甚至可能把这一过程看作是加剧我们在赶走占领者后遇到的混乱状况。然而，这是整顿内部最好的道路，它不是意味着复旧（复旧将是消极的‘整顿’，实际上将是民主在我国的失败），而是意味着建立真正的人民民主，南斯拉夫人民群众正是为争取这种民主多少年来一直在进行斗争。

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人民群众广泛地参加国家的恢复和国家机器的建设，人民群众广泛地参加政权。这个国家机器的一切组织，这一过程的一切形式，必须保证使人民的基本阶层、即劳动群众能尽量广泛地参加……

人民解放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对广大人民群众无穷创造力的深刻信念的基础上的。这一信念也教育了人民解放运动的积极分子。正因为如此，说服一向是人民解放运动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加人民解放斗争的基本方法。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力量认为，自下而上发扬群众的主动精神是取得胜利的首要条件。情况再次表明这一信念是有道理的。真正人民民主的领导、坚强的组织以及能保证和鼓励群众最广泛地参加的这种组织形式

(无论是在斗争中还是在政权建设中)，正是这些因素首先不仅使基本人民群众的意志而且也使他们的无穷创造力得到体现。这一事实赋予人民解放运动以前进的动力和鼓舞，使它在强大得多的敌人面前取得了如此巨大的胜利。今后，这一事实也将是尽快地和尽可能高质量地从事恢复和建设工作的第一个最重要的条件。

因此，很明显，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不仅应该抛弃旧的国家机器以实现‘正常化’，而且应该从人员组成和组织形式上改变这一国家机器，使它确实成为人民群众从事创造性活动的民主工具。

……

……我们的积极分子今天应该努力使劳动群众懂得自己的努力和利益之间的相互联系，另一方面还要懂得自己的利益和作为自己工具的国家的利益之间的相互联系。重要的是，同时应该经常指出今后发展的前景。因为只有在我国人民群众看不到发展前景的情况下，他们才可能成为人民的敌人的俘虏，才可能成为蛊惑人心者的俘虏。蛊惑人心者企图利用当前的经济困难来鼓动群众反对新南斯拉夫的民主政权。反之，如果群众看到了明天的前景，他们就会比较容易忍受今天的许多困难和今天的许多牺牲。

不言而喻，不能光靠言辞、鼓动和宣传向群众展示前景。我们今天所采取的一切措施，不论在多大的程度上是临时性的、初步的和细小的，都必然带有民主的、

人民的烙印，这是新南斯拉夫作为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和中间阶层的国家，一句话，作为基本人民群众的国家的国家的特点。

.....

.....我们现在建立的国家机器，就其形式而言，应该适应基本人民群众政权的民主性质。自然，这种建设是在不断地反对国家机器中旧的残余和官吏习气的斗争中进行的。应该充分地保证我们的国家机器具有民主性，而且不是口头上的民主，而是实际上的民主。这就是说，人民的命运不再由县官来决定，而是由自下而上产生的人民民主代表机构来决定，这种代表机构既建立又监督自己的执行机构。我们的政权是统一的。它是新式的自治，而不是旧意义上的自治。旧意义上的自治是指某些机构只获得部分权力，在这部分权力范围内这些机构或多或少是自主的。我们的人民解放委员会在国家共同利益的范围内拥有充分的权力。人民解放委员会既以自己的名义又以人民政权高级机关的名义，在联邦或全国性的法律和法令的范围内行使权力。这样，我们的人民解放委员会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直接进行领导，同时执行和监督人民政权的所有高级机关的决定和措施。无疑，这是最民主的权力机关形式。对我们来说，自治并不意味着国家向人民让步，而是国家赖以建立的基础。

.....

过去使我们的斗争具有这么大的力量，取得这么多的胜利的，首先是人民群众自愿的广泛参加，是他们自下而上的创造性主动精神。干部是从下边成长起来的，工作方法是接近老百姓的。这就是说，决定直接来自人民。因此，这些决定得到群众每日每时最积极的支持。这就是真正民主的实质，这种民主应该使每个公民能够以各种形式参加国家的管理。当然，现在这种形式在最高领导中比过去来得复杂。任务更多而且更加重大，不可能总是用简单的手段或方法来解决。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的政权机关，特别是地方政权机关，今天仍然有无数可能性来使群众积极参加国家的建设。然而，我们的某些干部今天已经忘记了这些事实。他们认为，不这样也能搞工作。这种人总是用下命令、开条子的方式解决日常问题，或者把工作交给旧职员办。在没有监督和领导不善的情况下，旧职员会带来旧习气和旧作风。应该指出，官僚主义的霉菌已开始侵入我们的国家机器。官僚主义者认为，现在战争结束了，再也不需要有牺牲精神的战士了，再也不需要那种为了共同利益而忘记个人利益的人了，一句话，再也不需要站在人民解放斗争前列的人了。官僚主义的污垢在某些地方已经遮住了为人民更美好的未来而斗争的人民战士的形象。

加入这种官僚主义者行列的还有那些梦想复旧、梦想过去和渴望‘安宁’的人。所谓‘安宁’是指人民群众不‘干预’国家事务、不存在老百姓的监督。他们希

望‘正常化’，希望守‘秩序’，而他们所谓的秩序就是复旧。

人民看到了这种错误，但是他们相信，这只是某些人引起的暂时现象。我国群众的这种高度觉悟往往战胜官僚主义的霉菌。人民群众的意志冲破了官僚主义的压制——如果存在这种压制的话——和庸人的担心。这是新南斯拉夫最强大的力量，是克服一切困难的保证。但这是不够的。如果我们认为事情会自然而然地办好，那我们就会成为自满的空谈者。有害的现象会妨碍迅速的建设，会使群众迷失方向，使他们的认识变得模糊。因此，应该不断地和坚决地同这些错误和缺点作斗争。

那些沾染了官僚主义的人或许认为现在再也不需要群众的主动精神，再也不需要他们参加建设了，是这样吗？实际上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群众的主动精神。今天在我国发生的事情也是一场战争，是在一个新的基础上的战争，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战争。消除被占领的后果、克服在恢复和建设中的巨大困难的战争正在继续，反对企图以新形式出现的国内敌人残余的战争正在继续……他们害怕群众，害怕群众的积极性。群众的积极性触及他们的痛处。他们也要到官僚主义者那里去寻求藏身之地。正因为如此，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今天也是捍卫人民解放斗争成果的斗争的组成部分。

……在这方面有一部分责任也落到了我们（积极分子）身上。难道能够容许官僚主义和其他类似现象来削

弱、贬低和玷污我国人民、我国人民群众所创造的事业的伟大意义吗……

既然如此，就应该宣布与所有这些弱点展开激烈的斗争。应该重申：自我批评是我们最强大的武器。我们必须最严格地对待自己，如果需要的话，还必须严厉地对待自己。我们自己的觉悟和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必须成为我们积极分子开展活动的真正指南。执行真正的人民的政策，并不意味着蛊惑人心地仅仅重复人民群众中出现的一切。真正民主的领导，在体现人民普遍利益的同时，必须依靠进步的理论，经常给人民群众指出前进的道路。我们的政策在各方面都必须是有原则的，这就是说任何时候都不能看不到前途。但是，在实现这一路线时，必须与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的提高相适应，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既不冒进，也不掉队。这两种错误都会使我们脱离人民群众，而这意味着会不可避免地遭到失败……

……

一方面，我们继承了旧的国家机器，并且——在人事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使他们参加了我们新的国家机器的建设。这样做就带来了官僚主义。不言而喻，即使旧职员对新南斯拉夫采取最积极的态度，即使他们真诚地全力赞成新的现实，他们也还是按照旧的习惯、按照惰性工作。

另一方面，某些干部存在着坐在办公室里进行领导



的倾向。他们被埋在无数的日常事务中，以致同基层丧失了任何联系。实际上，如果我们的领导人同基层保持活生生的联系，就不可能取得重大的成绩。只靠纸上的决定和命令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当然，另一个极端也是不正确的。我们某些地方的领导人经常到处跑，到处谈话，而忘记了应该组织起坚强的领导中心。应该把我们每个县和每个州的人民解放委员会建成组织严密的领导中心，他们每日每时都能给基层以各种帮助；但在同时，我们的积极分子不要变成官吏，而应该继续是人民的领导者，人民群众的代言人，他们的真正的代表，理解并想着他们的需要和愿望，同时又经常考虑到全国的需要和利益。

纸上谈兵，压制自下而上的健康的批评和倡议，干巴巴的一般性的宣传鼓动，对人采取不正确的、往往是冷冰冰的态度——所有这一切是我们某些积极分子身上存在的现象。应该一开始就给这些现象以沉重的打击，以免使这些现象变成严重的危险……”<sup>①</sup>

“……现在应该用我们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和经济建设的实践来证明，工人阶级和我国各族人民的劳动群众

---

<sup>①</sup> 爱德华·卡德尔：《人民群众的力量》（1945年5月撰写的文章），见《新南斯拉夫的道路（1941年—1945年）》，文化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46年版，第127—128页、129页、136页、139页、145—146页、147—148页、149—150页。

不仅能够掌握政权，而且能够管理国家，建设国家的经济，并为每个公民创造应有的生活条件。现在，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外国都出现了卑鄙的怀疑论者和敌人，他们认为我们工作中的弱点和缺点足以证明，如果认为工人和农民能够管理国家，尤其是管理国家复杂的经济机器，那是可笑的……

……

……工人必须充分认识到，今天工厂是他们的，即是全体人民的财产，最自觉地工作和最自觉地对待人民的财产，是尽快地改善我国劳动群众经济地位的先决条件……”<sup>①</sup>

“列宁的关于人民群众最广泛地参与国家管理的原则，是我国人民政权的基本原则之一。所有的人民委员会在自己的工作中都要依靠各种人民团体，依靠帮助地方政权机构工作的专门的公民集体。必须定期召开选民大会，选民大会通过提出批评、各种建议和动员公民在某些管理部门进行合作，来帮助人民委员会。”<sup>②</sup>

“采用官僚主义方法的领导人的特点是，不相信劳

---

① 爱德华·卡德尔：《庆祝五一节》（1946年4月25日撰写的一篇文章），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第1卷，文化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60年版，第33—34页、35—36页。

② 爱德华·卡德尔：《南共为新南斯拉夫而斗争》（1947年9月），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第1卷，第164页。

动群众的创造性的主动精神，不愿意吸引或者不善于吸引劳动群众参加制定和贯彻某些措施。我们同工厂、机关和农业方面的工人和职员一起讨论经济问题和专业问题太少了。我们的领导人与工人和农民商量得太少了，而工人和农民在自己的长期劳动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许多领导人轻视说服和解释的力量，他们更多地相信死板的文件或命令的力量……

我们的人应该懂得工人积极参加研究生产问题或者农民积极参加研究农业问题的必要性……”<sup>①</sup>

“……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工作实践已多次向我们证明——不容许下边发扬任何主动精神的死板的官僚主义领导所造成的后果，要比那些由下而上广泛地发扬主动精神的地方难免出现的某些错误所造成的后果严重得多。

……

工会在经济建设方面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通过工会，工人群众以各种形式直接参与对经济的管理。

……

工会还应该为使企业正确地工作而斗争，为消除一切阻碍生产进程和妨碍完成计划的缺点而斗争。诚然，

---

<sup>①</sup> 爱德华·卡德尔：《我国经济建设的弱点和缺点》（摘自1948年4月25日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上的讲话），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第1卷，第245页。

工会不能直接地干涉对企业工作负有责任的企业管理机构的事务，但是，工会有责任向这个管理机构指出妨碍生产的各种缺点，并帮助它克服这些缺点。工会还应该为改进生产过程的安排而倡议召开生产会议和组织工人开展全面的活动。

.....

特别在制定计划方面，我们的工会和企业管理机构仍然没有广泛地开展合作。在企业内部，应该给工人参与制订本单位具体计划的可能性，以便使他们能够在提合理化措施和制订响应计划等方面发挥主动性。”<sup>①</sup>

“.....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无论怎样完善的官僚机构，无论领导它的是多么天才的领导人，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只能从千百万群众的主动精神中产生出来，同时要有无产阶级政党、即最先进的有觉悟的社会主义力量的正确的领导作用。因此，社会主义的发展不能通过任何别的道路，而只能通过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的道路来实现，这是指人民群众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实行自治，是指越来越多地吸收他们参加国家机器——从最低一级的机关到最高一级的机关——的工

---

① 爱德华·卡德尔：《南斯拉夫共产党为新南斯拉夫、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而斗争》（摘自1948年7月26日在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第1卷，第291页、317页、318页、321页。

作，是指越来越多地参加每个企业、每个机关的直捷的管理。

.....

.....社会主义民主越是在实际上具备更多的社会主义性质，即社会主义国家越是更多地消除资本主义残余和过去残存的消极因素，那么，社会主义民主就会越来越成为全民的民主，就会越来越勇敢地发展人民群众的自治，直到它变成全体人民的真正自由，从而使它作为国家的形式而实际上消亡为止。

.....

然而，如果认为自治原则只适用于诸如人民委员会这样的政权机构，那就错了。不，我们必须在所有地方、在我国社会生活的每个组织单位，都越来越多地发展这一原则。无论在企业中还是在机关里，在群众的主动精神能对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作出贡献的一切地方，我们都应该发展自治的因素.....

.....劳动者能够并且应该以其他方式来参加国家的管理。正如我们这里所做的那样，劳动者通过各种委员会，通过人民委员会，通过农村的积极分子小组、人民监察机构和其他许多类似的形式，参加国家的管理。应该经常开展和推广所有这些活动。

在我们的许多工厂里，譬如，在富有主动性的和聪明的经理认识到他的成绩取决于工人的努力和主动性的地方，开始自发地发展了人民自治和劳动者参加管理国

家的又一种新的形式。这就是经理同最优秀的工人就企业管理的一切问题经常进行协商。通过这种自发的协商，职工同经理一起参加工厂的管理，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和具体建议。应该更充分地发展这种尚未推广的自发的形式，把它变成工人在管理我们企业方面直接合作的经常性形式。劳动者参与管理国家的这种形式和类似形式，在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方面前进了一大步，这些形式确实是在实践中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生产者直接参与管理经济的原则。我们这里之所以能采取这样的形式，是因为我们的工人阶级有高度的觉悟，并且与共产党有密切的联系。我国人民民主的这种形式，不仅应该向广度发展，而且也应该向深度发展，即更高级的经济管理机关也要吸引工人一生产者投身于直接的合作。

.....

应该加强个人的责任，但是不仅在一个方面。领导者个人对自己的工作既应该向上级领导负责，也应该向他在领导一定的企业和机关时所代表的人们负责。在这方面也出现了对个人责任原则的官僚主义歪曲，这表现在想取消自下而上的对领导人的监督。如果我们走这条道路，我们就会助长官僚主义，并阻挠广泛地发扬群众主动精神的可能性。实际上，这会是严重阻碍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官僚主义行政领导方式。

正因为如此，我在前面讲过的工人委员会对进一步

完善管理经济的社会主义方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sup>①</sup>

“自治并不是南斯拉夫的理论和实践的‘发明’，一些人把这归功于我们，而另外一些人则归罪于我们，两者都是不公正的。自治的思想与人道主义的思想一样久远，特别是与国际工人运动、与它的阶级斗争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历史一样久远。自治是人永恒地向往自由和自由的创造，向往掌握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向往更美好的生活的结果。在世界上，在工人阶级、进步人士和进步运动争取劳动自由和做人自由的斗争中，在迄今所有的社会主义革命中，自治的思想和愿望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sup>②</sup>

“自治不是我们的某种特殊的思想上或理论上的创造。它一向是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存在于巴黎公社，存在于列宁的苏维埃，存在于象我国革命这样的群众的一切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之

---

① 爱德华·卡德尔：《论南斯拉夫的人民民主》（摘自1949年5月28日在国民议会上讨论人民委员会法时的讲话），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第1卷，第430页、432页、448—449页、452—453页。

② 爱德华·卡德尔：《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见《南斯拉夫的自治（1950年—1976年）》文件选编的序言，南斯拉夫经济评论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77年版，第9页。

中，而它的某些形式和因素也存在于整个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之中。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迄今采用过渡形式的发展所处的特殊的历史环境，使得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治形式的发展遇到障碍，在某些地方还会长期遇到障碍。这一事实使下面这种倾向成为可能：社会主义革命初期所必需的特殊的国家所有制垄断变成了技术官僚结构在生产关系方面的某种垄断……

……我们的社会主义自治不是同其他社会主义实践隔离的任何特殊的‘社会主义模式’，而是整个社会主义实践以这种形式或者那种形式正在经历或者必须经历的一个发展阶段。就是说，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自治不是由于南斯拉夫的特殊环境和特殊需要才产生的某种特殊性，而是我们称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高级形式过渡的那个历史时代的一个重要的发展因素……”<sup>①</sup>

“……自治在我国的出现，与希腊和拉丁的传统没有任何关系，与斯拉夫人的合作社和斯拉夫人的博爱精神以及其他任何东西也都没有任何关系，只是与向往美好的生活、创造、自由、进步、掌握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的永恒愿望有关系。自治作为一种倾向出现在一个比较不发达的国家中是由下述事实造成的：自治是一个

---

<sup>①</sup> 摘自对《劳动报》的谈话，1974年4月30日、5月1日和2日合刊。



只有在深刻的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中才能体现的社会改革的过程。而我国革命正是这样的社会主义革命……无论如何，自治出现在我们这里，是与我国革命发展的性质和特殊条件密切相关的，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密切相关的……”<sup>①</sup>

“……每一个真正的群众革命，实际上就是最直接的自治形式。我国革命正是这样。游击队的产生，就是群众的自治的革命意志的体现。在这个自治的革命行动中，又产生了人民的政权机关。同样，在解放区对经济资源的管理也是实行自治的。因此，自治不是在革命以后才产生的，而是在革命的过程中、在人民解放斗争中和在人民政权的最初的革命文件中产生的。”<sup>②</sup>

“在南斯拉夫，自治是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产生的，一开始它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因素和形式。从1941年到战争结束，它在解放区得到了发展。由于这一解放区无论在面积方面还是在相互联系方面经常发生变化，因而没有条件建立某种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和国家制度，更没有条件对劳动、经济、社会事务和社会生活

---

① 爱德华·卡德尔：《自治不仅是劳动者在生产中的民主关系，而且是劳动者在生产中的经济关系》（1965年3月1日与《自治报》编辑部成员的谈话），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贝尔格莱德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72年版，第8卷，第27页。

② 摘自对《劳动报》的谈话，1974年4月30日、5月1日和2日合刊。

的其他方面实行中央集权的管理。我们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方针，即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解放运动的各个部分和解放区各个地区的全体人员的主动精神、自我组织和自我负责的精神。这样，在希特勒的欧洲王国中，人民解放委员会作为群众性的人民解放运动机构在解放区掌握了社会和政治权力，工人们接管了工厂和作坊，以各种自发的和有组织的形式保证使这些工厂开工，对这些工厂进行管理并使之发挥作用。”<sup>①</sup>

“……在人民解放战争中，政权不可能成为管理一切社会事务的某种官僚主义的行政机构，而是劳动人民自己在各种形式的人民解放委员会中组织起来，这些委员会各自负责本地区的秩序和保障人民生活的起码条件。而解放区的工厂由工人们自己管理。由于旧南斯拉夫落后，特别是在解放区，管理工厂的情况并不多，但已足以说明，在这里不仅出现了自治的思想，而且出现了自治的初步实践。”<sup>②</sup>

“……我们过去和现在通过自治制度和在这一制度基础上建立的代表制所发展的一切，其核心和萌芽产生于人民解放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是我国现在的代表制的萌芽。因为南斯拉夫新政权的整个体制就是在地方、

---

① 爱德华·卡德尔：《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见《南斯拉夫的自治（1950年—1976年）》文件选编的序言，第13页。

② 爱德华·卡德尔：《自治和不结盟》，见《社会主义》杂志1973年第12期，第14页。

村、乡、区、县、专区和州等各级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有这些委员会实际上都是从组织起来的人民的基层选出来的代表团，而不是政治上的某种联盟的代表机构……”<sup>①</sup>

“……如果不进行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劳动群众的人民民主革命，如果这些群众没有发扬自由的主动精神，在南斯拉夫战后发展中建立起来的这种自治民主关系很可能就产生不了……”<sup>②</sup>

“战后——在当时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影响下，即在教条主义的影响下——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方面也出现了某种摇摆……然而，人民群众在人民解放战争和革命过程中形成的革命觉悟十分强有力，以致简直不可能把在其他国家和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某种生活方式强加给新南斯拉夫。因此，1948年我们同斯大林发生冲突后，在人民解放战争中产生的那个自治的萌芽马上就开始成长为完整的社会机体。”<sup>③</sup>

---

① 就战时在乌日采出版的《战斗报》35周年向《战斗报》发表的谈话，刊登在1976年11月29日、12月1日和2日合刊。

② 爱德华·卡德尔：《社会主义自治政治制度的发展方向》，第二版增订本，共产主义者出版中心贝尔格莱德1978年版，第17页。

③ 爱德华·卡德尔：《自治和不结盟》，见《社会主义》杂志1978年第12期第14页。

“在战后的最初几年……人民解放战争中的自治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排挤，并且被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实行的中央集权的管理形式所代替。无疑，这种现象部分地反映了在群众民主地参加劳动管理、生产资料管理和社会管理形式方面出现的某种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摇摆，这种摇摆是在南斯拉夫革命所处的新形势的影响下，特别是在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实践的观点的巨大影响下产生的。但是，这种现象在不小的程度上也是由于一系列客观原因和我国在战后遇到的客观困难所造成的，这些客观原因和客观困难特别要求集中力量。换句话说，客观上不可能保留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产生的那种自治形式，而新的形式在这种形势下又难以显现。然而，在我国社会制度的发展中，尤其是在当时我国的社会实践和政治实践中，自治的因素依然强有力地存在着……

……尽管存在着严重的困难，暂时的动摇以及缺乏经验和知识，但是，自治逐渐地扩展到了社会劳动、社会活动和社会管理的各个方面。政治制度也越来越适应和从属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治形式。政治制度的性质和组织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发生变化：它越来越成为自治制度的民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与劳动和自治相脱离的政治结构。”<sup>①</sup>

“……我们的自治不是从1950年的自治法才开始

---

<sup>①</sup> 爱德华·卡德尔：《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见《南斯拉夫的自治（1950年—1976年）》文件选编的序言，第15页。

的。<sup>①</sup>在1950年，自治是正式在法律上被确认为我国社会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主要形式。自治起源于我国的革命，并且可以说从我国革命胜利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以各种方式进入我们的社会实践和生产实践中。自治最初是以工人参加生产委员会的形式和其他类似的方式，首先是通过工会的作用出现的。1948年底，尤其是在1949年，关于工人委员会的思想开始成形，因此，就在这一年开始自发地产生了第一批工人委员会。

……正如当代的每一个社会主义革命一样，我国革命也经历了革命的国家集权主义时期，即经历了以国家组织和国家强制为革命的决定性武器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时期。有些人把我国社会发展的这一时期称为斯大林主义制度时期，这证明他们不懂得当代社会主义革命的规律，尤其是不懂得我国革命的规律。当然，作为这一时期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主导思想的斯大林主义，对我国工人运动和我国革命进程也产生了十分强烈的影响。然而，革命的国家集权主义是我国革命的产物，也是我国革命的需要。因为我国在战争结束后不久的经济状况、低下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类似情况，要求集中一切社会力量和资金，来克服最初的困难和奠定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只有在我国社会的物质发展的这样奠定的基础上，才能逐步地实行管理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

---

<sup>①</sup> 指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1950年6月27日通过的关于劳动集体管理国营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联合组织的基本法。

的新的、民主的形式……

……对于我国社会和我国革命的发展的特点来说，在这一发展中是否或多或少地表现出国家集权主义和官僚主义—专家治国论的倾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国社会自身找到了力量，来通过争取确立劳动者在联合劳动中实行自治的斗争来反对上述倾向……”<sup>①</sup>

“从原则上讲，即使在战后年代，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这样的论点，即无论在社会主义劳动中还是在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方面，人民群众的力量必须以相应的民主的和自治的形式尽可能直接地体现出来。实际上，这种关系的最初形式在战后最初几年一直是存在的。但是，一方面，应该考虑到我国恢复时期所面临的特别困难的局面，这种局面要求高度节约和相互支援，同时要求对人力物力进行高度集中的管理；另一方面，应该考虑到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所固有的那种技术官僚主义的压力在增长。这两者促使自治的萌芽在其发展中受到阻碍，并被排挤到次要地位。这种情况之所以特别可能出现，是因为当时斯大林主义对我国的整个社会意识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其实，斯大林主义就是在走向社会主义的社会中最彻底地付诸实施的技术官僚主义垄断的意识

---

① 爱德华·卡德尔：《自治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1971年5月5日在南斯拉夫自治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贝尔格莱德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74年版，第9卷，第247—248页，250页。

形态。

与斯大林的冲突为我国革命中出现的自治的和民主的形式重新‘恢复了名誉’。对南斯拉夫所实行的几乎是全面的经济封锁，造成了特别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其他困难，这些困难使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发挥巨大的自治的主动精神成了客观需要。当时我国工人对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政策的支持越来越多地变成了在我们工厂中出现的各种形式的自治的主动精神。不管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 and 思想前提如何，也不管我们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实践如何，这一事实本身就预示着我国革命在社会主义自治意义上继续发展的道路……

共产主义者联盟在工厂中采取的政治行动就是这种意义上的初步行动。1949年，在我们的劳动组织中就出现了第一批工人委员会或者类似的组织。但是，据我回忆，关于系统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治形式的原则性决定，是在1949年春或者1949年初夏我们与铁托同志一起在斯普利特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作出的。我们分析了基本上是非常积极的到那时为止的经验。铁托同志对自治的要求给予了充分的支持。根据这些经验，并在铁托同志的鼓励下，我们当时决定，应该准备为社会生产资料的整个管理实行自治改革采取全面的行动。

但是，当时我们就遇到了巨大的障碍，一方面是由于客观上有困难，同时也是由于我国社会中已相当官僚化的生产技术机构在有意识地或者下意识地进行抵制。

因此，需要由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机构和联邦政府更坚决地同这种抵制作斗争。为此发布了第一个有关这一问题的正式的国家文件，该文件是由政府经济委员会主席鲍里斯·基德里奇和工会主席久罗·萨拉伊签署的。<sup>①</sup>据我回忆，在草拟这个文件时，我们就已研究了用法律来调节所有这些关系的必要性，但是我们当时认为，这样做还为时太早，我们必须在实践中取得进一步的经验。因此，关于自治的第一项法律是稍晚一些时候才制定的。”<sup>②</sup>

“……斯大林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我国革命以及对我国后来的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是十分强大的。但事实毕竟是，南斯拉夫整个战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包括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战前和人民解放斗争期间的实践，实际上是一个逐步地和日益明显地同斯大林主义分道扬镳并寻求自己的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正是这一点，也只有这一点，才能解释清楚，在斯大林进行干涉后不久，也就是在1949年，无论在我国劳动组织的实践中，还是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队伍中及其领导机关中，就出现了要实行工人自治的明确方针，而

---

① 指1949年12月23日发布的关于国营经济企业成立工人委员会及其工作的指示。根据这个指示，首先在215个企业中（试验性地）成立了自治机构（工人委员会），接着，在半年时间内很快就大约800个企业成立了自治机构。

② 摘自对《劳动报》的谈话，1974年4月30日、5月1日和2日合刊。



工人自治刚迈出头几步就开始对国家所有制关系制度进行了实质性的进步的改革。实际上，当我们在寻找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所作所为的原因时，我们不仅在斯大林的制度中找到了原因，而且也在我国自己的最初实践中，即在官僚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所有制垄断和政治专横这些现象中找到了原因。斯大林的干涉也有积极的一面，就是这种干涉大大削弱了南斯拉夫共产党内和我国国家机关中上述这种倾向的体现者及其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辩护士的政治力量。

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事件的过程，事情就变得比较清楚了：象与斯大林发生冲突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文件所规定的那样，要求切断党的机关同国家机关以及同经济管理机关融为一体的过程的含义，并不是要使国家政权和经济管理职能‘摆脱’共产党、即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影响，然而今天在我们的出版物上却经常可以遇到这样的看法。相反，这一要求的历史性含义在于，恰好是要共产党摆脱在国家政权机关和经济管理机关中产生的官僚主义和专家治国论的压力；是要共产党巩固自己同工人阶级基本群众的联系，从而使它变得更有能力，更加自由地反映他们的利益，并代表这一利益，首先是按民主的方式把基本群众组织起来，对国家机关和经济管理机关施加主导性的和决定性的影响。”<sup>①</sup>

---

<sup>①</sup> 爱德华·卡德尔：《公有制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矛盾》，第二版增订本，工人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76年版，第19页至20页。

“……我们不能赞成在我们有些地方出现的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随着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问题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种观点认为，共产主义者联盟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作用只是充当物的管理者，即只是通过良好的专家治国论式的管理、国家的控制和检查的手段，以及通过对劳动人民的物质进步的合理的关心，来为发展生产和发展经济而斗争。实际上，这是国家集权主义的家长式统治的某种心理状态。而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表明，这种国家集权主义的家长式统治不能成为社会主义进步的充分的和持久的力量，尽管在其最初的国家集权主义所有制阶段能够起非常进步的作用。

……

当然，在经济生活中从原则上抛弃一定的国家强制的手段，即使在自治的条件下，也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是毫无意义的和具有破坏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仍然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必要的和重要的因素和支柱。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自治的条件下，这种在经济关系和经营中实行的强制只有当它是支持联合劳动者的劳动和由这种劳动产生的利益的时候，才能产生积极的成果

……

……

我们决定实行社会自治，是因为我们希望为一种新的社会发展的逻辑开辟道路，这种逻辑不同于用行政方

法和专家治国论方法管理经济的逻辑。我们希望为这种逻辑开辟道路，这种逻辑将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即在一个更高级的历史发展阶段上，使劳动者与他的劳动条件、劳动手段和劳动成果重新结合起来，从而使人的这种社会经济关系和地位本身变成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这样就使自治不仅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主要形式和体现者，成为按照现代社会的性质本身只能集中地实现的一系列经济职能民主集中化的出发点，而且使自治也成为决定整个民主政治制度形式的因素……

……

在社会自治的范围内稳定经济关系和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大障碍之一，无疑是在扩大再生产的制度中最长久地保留了行政管理经济的旧制度的一系列因素。这首先是指，用税收方式提取积累；对投资基金的管理具有国家垄断性质；主观主义的标准和政治愿望对分配这些基金产生强烈的影响；而前两种因素又为后一种情况提供了可能性。

因此，实现扩大再生产过程的现行办法，尽管比以前通过预算为投资拨款的制度有许多优越性，仍然经常地和越来越多地落后于在社会自治基础上发展经济关系的基本解决办法。

诚然，扩大再生产制度是朝着资金分散管理的方向发展的，但是，无论在积累集中的规模方面，还是在作

出投资决定和支配整个扩大再生产资金方面，政治管理机关依然保留了决定性的作用。无疑，主要的缺点在于：由于通过税收和类似办法大大加重了劳动组织收入的负担，使劳动人民和集体在扩大再生产领域中的活动余地变得很小。实际上，这正是社会劳动的最重要的领域中缩小了他们对劳动条件和他们自觉地为提高生产率而进行的斗争施加影响的可能性。”<sup>①</sup>

“……我们经常左右为难，不知怎么才好：是赞成某种国家集权主义的家长式统治，即争取建立一个能够人道地关心‘愚蠢’的良民的好政府呢，还是争取实行劳动人民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自治，即争取建立劳动者可以自己关心自己的社会经济条件、物质条件的民主形式。当然，我讲‘自己’，并不是指孤立的人，而是指在社会劳动条件下共同使用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的人，就是说，是在一定社会范围内的人。”<sup>②</sup>

---

① 爱德华·卡德尔：《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社会经济任务》，1964年12月7日在南共联盟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文化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68年版，第7卷，第459、461、473—474页。

② 爱德华·卡德尔：《克服剩余劳动国家集权主义的异化——巩固自治的根本条件》（摘自1966年3月11日在南共联盟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贝尔格莱德出版社1972年版，第8卷，第232页。

“我们的劳动人民那时认识到，他们的命运和前途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而以铁托同志为首的共产党，即共产主义者联盟，明确地和坦率地告诉他们：‘如果我们自己不帮助自己，如果我们不自力更生，那就没有人来帮助我们了；如果我们的劳动人民不通过自己的劳动和努力来解决我们的问题，那就没有人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了。’于是，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工厂归工人——耕者有其田’的运动开始变成现实。

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南斯拉夫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有力地推动和支持了这样一种事态发展。然而，抵制是很强大的。我记得，当时我们不仅与共产党队伍以外的人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而且与共产党人，甚至与工厂、共和国和联邦的国家机关、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和工会等部门中担任领导职务、但却不理解我国革命的这个新阶段的许多人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因此，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我们的政府必须明确地和坚决地作出决定，迅速地确认自治，以便为自治的发展和使自治逐步变成我国社会经济关系的主要形式开辟道路，以便使自治获得自己体制上的基础。作为上述努力的结果，首先是政府和工会共同制订了文件，为组织工人委员会发出了具体的指示，然后是通过全面推行工人自治法。”<sup>①</sup>

---

① 摘自爱德华·卡德尔1970年9月19日在“锡萨克”钢铁厂工人委员会庆祝自治2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讲话，刊登在1970年9月20日的《政治报》上。

“在发展社会主义关系方面继续前进的必要性，不仅来源于我们发展经济的需要和我国劳动人民的经济利益，而且还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尽管旧制度曾经是必要的，但它同时又包含着官僚化的经常性危险，包含着排斥和限制劳动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危险，包含着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和官僚主义本位主义的危险，这两种现象只是一个统一的过程的不同表现而已。总而言之，旧制度包含着保留和扩大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因素的危险。

在我们这里，这些倾向既没有压倒，也没有严重地威胁到发展社会主义的路线。但是，可能产生上述倾向的制度开始越来越变成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向前发展的障碍。不仅出现了政治上的要求，而且也出现了直接的物质需要和社会需要，要求建立一种能使劳动人民自由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的制度，也就是说，建立一种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民主联合的生产者的自治制度。

自从制定1946年宪法以后，我国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也进一步提高了。劳动群众在新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取得了许多经验，并且开始逐步摆脱许多旧习惯。不仅如此，在我国发展的第一阶段，即在国家管理机关在经济领域内也是以行政事务机构的身份管理共同关心的事务的时候，‘共同利益’这个概念对于劳动群众来说

几乎只是一个政治概念，并不同时也是经济概念。然而，每个劳动者参加管理工厂和其他经济组织的实践，开始使我们的劳动者懂得他个人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与整个社会大家庭在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成就是多么紧密地联系着的。我们社会主义生产中的这种觉悟，不仅有力地激发了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而且也促使他们抵制官僚主义性质的进一步干预。

这就是说，这个现象也说明，所谓国家管理机关对社会主义成份的行政领导制度，不仅越来越没有必要，而且越来越有害。以铁托同志为首的我国社会主义大家庭从所有这些过程中得出了结论，并且在发展社会主义自治方面向前迈大步，与此同时，在限制国家管理机关的职能和作用方面也是向前迈大步。

.....

.....宪法性法律<sup>①</sup>保护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劳动人民掌权的政治制度，保护劳动人民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关系作出的努力。社会主义性质在宪法性法律中比在以往的宪法中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事实是生产中的社会主义成份今天无疑占有支配地位，而在1946年制订宪法时这一成份刚刚开始发展。

.....

宪法性法律.....是从这样的观点出发的：工人阶级

---

① 指1953年1月13日通过的关于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基础以及联邦政权机关的宪法性法律。

是社会主义的主要动力，是社会主义的历史体现者。然而，宪法性法律不是通过工人阶级的政治先锋队和管理机构中的地位来保证这种领导作用——归根结蒂，正如我们在斯大林主义中所看到的，这将使先锋队自身官僚化，使它同国家管理机构融为一体，最终还将使国家管理机构脱离工人阶级——而是通过劳动者在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中的自治，通过工人群众借助其自治经济机构对国民收入的使用和分配进行直接监督，来保证这种领导作用的。

在这方面，联邦国民议会和各共和国议会中的生产者院是一个全新的宪法机构。这种新的代表机构之所以重要，不仅由于它能反映经济组织及其劳动集体的最直接的经济利益，而且由于该机构中工人阶级的代表不是按照人口比例、而是按照工人阶级的实际社会作用产生的。

.....

.....宪法性法律把社会自治，即把我国全体劳动人民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通过自己的自治机构来管理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企业、组织和机构这样一种权利，作为社会制度的基础.....”<sup>①</sup>

---

① 爱德华·卡德尔：《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社会政治基础和联邦政权机构》（摘自1953年1月12日关于宪法性法律草案的报告），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文化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60年版，第2卷，第251—252页、255—256页、257页、260页。



“我们的工人委员会现在已经有了四年的经验。<sup>①</sup>这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已经可以对它的成功或失败、对它的合理性和今后的发展前景作出完全肯定的结论。

我认为，今天在我们国家里，甚至在国外，没有人会在认真分析这些经验后，还想否认工人委员会在我国社会发展中已无可争议地得到积极确认的事实。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各种积极成果说明，这一确认是极其成功、有力和丰富的。今天我们已可以断言，工人委员会不仅是我国的发展所特有的，而且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整个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中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出现的必不可少的因素。

.....

.....工人阶级通过工人委员会不仅摆脱了资本家，而且还在自觉的和自发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中独立于国家行政机关，即确实是充分地 and 直接地把这个机关变成了自己的工具。工人委员会的伟大历史意义首先就在于此。

我们的工人委员会由于具有这种性质，已经成为抵御反社会主义倾向——无论是官僚主义倾向还是从旧社会残余中产生的那些倾向——最强大的屏障。自从我们

---

① 在颁布关于由劳动集体管理国营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联合组织的法律（1950年6月27日）以后，立即举行了工人委员会的选举。有156,166名工人和职员被选进6,319个工人委员会，有43,351名工人和职员被选进了7,136个管理委员会。

有了工人委员会，有了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生产者院以及公社的初步萌芽以后，我们的制度开始在政治上大大地加强了，而革命的国家强制措施开始缩小到最低限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工人委员会和公社中已找到了这样一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不仅符合现阶段的发展需要，而且使社会主义社会关系今后能相当自由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进一步发展。通过工人委员会和公社，我们的劳动者将认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自己的社会平等，认识到自己对社会管理施加影响的可能性。换句话说，他将逐步认识到自己已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当然，第一，是在他的国家、即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他自己的劳动赋予他的物质可能性的范围内，第二，要根据劳动人民的整个大家庭的集体利益，而在确定集体利益时，劳动者也是直接参加的。”<sup>①</sup>

“……发展社会自治的方针是我国一切民主趋势的出发点。社会自治日益扩大，社会自治在解决社会管理方面的一系列问题的权限日益扩大，从实质上说，这是一个扩大作为直接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的过程，是一个日益广泛地吸收个人直接参加社会管理的过程，是一个

---

<sup>①</sup> 爱德华·卡德尔：《四年经验》（1954年8月为《劳动报》撰写的文章，刊登在第13期至16期上），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文化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60年版，第4卷，第185页、187—188页。

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逐渐减少国家强制措施的过程。我们今天所说的工人自治或者机关中的社会管理——社会管理实质上也是自治的一种形式——，所有这一切只是同一过程中的不同形式和不同阶段而已。今天还属于‘社会管理’方面的许多东西——因为特殊的过渡条件要求这样做——明天就可能成为完全属于社会自治方面的东西。”<sup>①</sup>

“……实际上，社会自治的实质并不是把职能‘转交’给劳动组织和有关的自治机构，而是通过它体现和保证解放了的生产者和其他工人在管理社会劳动资料、分配收入和处理劳动组织的其他共同事务方面的新的地位和作用。”<sup>②</sup>

“……我们可以把我国自治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自治主要地或者基本上局限于简单再生产领域，即局限于生产和现在劳动的领域。劳动组织的

---

① 爱德华·卡德尔：《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摘自1957年4月25日在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文化出版社贝尔格莱德版，第5卷，第262—263页。

② 爱德华·卡德尔：《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新宪法》（摘自1962年9月20日在联邦国民议会和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联邦委员会联席会议上作的关于新宪法草案的报告），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文化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65年版，第6卷，第108—109页。

收入主要是在简单再生产的基础上形成的。”<sup>①</sup>

“在自治发展的第一阶段，1950年关于由劳动集体管理国营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联合组织的基本法，以及1953年的宪法性法律，对这一阶段作了比较完整的规范性的规定。在这一阶段，生产资料的折旧和扩大再生产资金的积累，都由联邦法律作了十分详尽的规定和安排。开始时，这两种资金都象从前一样汇集到了联邦的国家基金中去。这意味着自治的经济基础十分狭窄，甚至连直接生产过程也只是部分地受到自治者的监督。自治仍然更多地是一种民主的政治关系形式，而不是自治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形式。此外，通过行政手段把资金集中起来的作法还从经济上削弱了现有生产组织的简单再生产，因为这些资金流入了用作新投资的国家基金。这样就出现了所谓现有生产能力无法进行投资的问题。

为加强自治的经济基础而迈出的最初几步是由对折旧制度实行逐步的权力下放而开始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劳动组织的压力下进行的。这就使劳动组织至少取得了某种物质基础，以便在直接生产领域内，以及在有限的程度上也在扩大再生产领域内，采取自治的主动

---

<sup>①</sup> 爱德华·卡德尔：《社会主义自治社会中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摘自1971年5月5日在萨拉热窝举行的南斯拉夫自治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贝尔格莱德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74年版，第9卷，第254页。

行动。然而，扩大再生产的绝大部分和决定性部分仍继续保留在国家所有制关系的范围内。诚然，通过建立社会投资基金，在这方面也开始逐步实行权力下放，但是这一过程完全是在联邦——共和国——区这三级之间进行的。”<sup>①</sup>

“……自从1963年颁布宪法以来，尤其是1965年实行改革以来，为自治而斗争的重点扩大到了社会再生产、劳动和产品交换的整个领域，即扩大到了社会资本的所有方面。诚然，我们还不能断言，在实现建设和稳定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这一决定性的历史性任务方面，我们在实践中已经走得很远，我们在各方面都已找到了真正的解决办法。但是，尽管迄今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是初步的和很有限的，这些成果毕竟肯定了我们的发展完整的社会自治制度的方针：从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即从劳动单位到大型的和复合的一体化整体，包括整个社会政治结构，从利益共同体和地方共同体到公社、共和国和联邦，从公社的在自治劳动中采取的直接民主的基本形式到共和国或省和联邦的议会。”<sup>②</sup>

- 
- ① 爱德华·卡德尔：《公有制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矛盾》，第二版增订本，工人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76年版，第28—29页。
- ② 爱德华·卡德尔：《社会主义自治社会中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摘自1971年5月5日在萨拉热窝举行的南斯拉夫自治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贝尔格莱德出版社1974年版，第9卷，第254页。

“……1963年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把工人的自治权利扩大到支配剩余劳动的领域，也就是接受了这样一个原则：劳动组织在支配收入方面必须是独立的。这样，在自治地支配收入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套关系就开始发展为从事联合劳动的劳动者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的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形式。然而，同时又从这样的一种立场出发：这种收入、尤其是个人收入的形成和数额，要由社会以一定的方式加以调节，其办法是建立这样一种体制，这种体制将保证使经营条件和获取收入的条件尽量趋于一致，并进而保证在按照劳动成果获取个人收入方面拥有尽量多的自由。也就是说，这种主张的出发点是，社会将抽取劳动组织不是因其集体的劳动，而是因市场上比较有利的地位而获得的那部分收入（超额利润、地租等），从而使经营条件趋于一致。曾经认为，这样将使所有的劳动组织都以几乎同样的方式按照劳动获取收入，也就是将使通过市场分配社会收入的办法对各个劳动组织获取的收入、尤其是对各个工人的个人收入的自发影响越来越小。”<sup>①</sup>

“在1971年修改宪法的范围内，所谓‘工人修正案’（第21、22、23修正案）构成了单独的一套改革。在这些非常重要的和革命的修正案的基础上，原则上保

---

<sup>①</sup> 爱德华·卡德尔：《公有制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矛盾》，第二版增订本，工人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76年版，第29页。

证了从事联合劳动的工人掌握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这些修正案以直接可以实施的宪法准则的形式明确地规定，从事自治联合劳动的工人，在相互依赖和相互负责的关系中，最直接地管理和支配通过自己的劳动（现在劳动和过去劳动）所取得的全部收入，管理扩大再生产资金，而不管这种资金周转和集中的形式如何。工人们只有依靠这样的经济地位才能保证自己在政权制度中起支配作用。为了使工人们更直接地与他们的劳动成果、收入、剩余劳动联系在一起，采取了联合劳动自治组织的新形式，首先是把联合劳动基层组织作为工人们上述一切权利和相互义务的体现者。

1974年通过了新宪法，从而完成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基础上发展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阶段。宪法是从人，从人的真正利益和需要出发的，是从人与人之间在其权利和相互义务的基础上形成的关系出发的，而不是从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出发的。实际上，国家只是，或者至少应该只是，自己管理自己并管理社会的人们这样形成的相互关系的反映和体现。由此出发，宪法规定，社会再生产的过程——在联合劳动基层组织中按自治方式支配公有制生产资料和再生产资金的基础上——要通过这样的内部经济关系来组织和调节，在这样的经济关系中，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工人，他们的劳动及其直接的和长期的切身利益和社会利益始终是这个过程的起点、目的和终点。

在政治制度方面，为了解决如何把自治的生产关系变成政治权力的源泉和基础这一问题，宪法规定实行代表制，即自治共同体的代表团的制度，并把它作为议会制度组成和发挥作用的基础和源泉，作为整个社会制度的基础。在这方面，宪法比以前更透彻地确定了社会主义的主观因素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工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意识的其他创造性力量的地位和作用。

.....

无疑，联合劳动法是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通过以后制订的最重要的法律。这项法律从实质上，在法律上和组织上，详尽地阐明了宪法原则，并在制度上确定了法律手段和其他的社会手段和机制，这些手段和机制应该保证富有成效地和始终不渝地实施宪法，保证迅速地和始终不渝地实现南共联盟第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所确定的关于建设自治联合劳动制度的思想、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方针。

.....

总的看来，这项法律所规定的一切解决办法和体制是相互联系的和统一的，应该成为在联合劳动中进一步实行改革的自治实践的基础和支柱。从思想和社会政治的角度看，联合劳动法是一部关于联合劳动的特殊法典，它是工人阶级在掌握社会再生产的全部资料和要素方面、在行使政权职能和管理其他社会事务方面有组织



地开展活动的可靠的支柱和武器。

所有这些改革都是在进一步巩固工人和全体劳动者的自治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方面，在发展整个社会主义自治制度方面采取的重要步骤。

.....

作为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我们的社会获得了自己的牢固得多的社会经济内容和结构，这种社会经济内容和结构是从具体地确定的和巩固的社会主义自治生产关系中成长起来的。无论在原则性的社会主义的和民主的意义上，或者在职能和组织方面，这种关系正在进一步发展。这种关系有可能并保证使我们的社会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在社会主义自治的社会经济关系所固有的客观内部规律的基础上，自由地、自主地和自治地发展。

.....”<sup>①</sup>

“.....按自治方式联合劳动是社会劳动联合的一种形式，通过这种形式，工人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实现自己在联合劳动中和在整个社会中的统治地位。工人的个人地位是这样来决定的：他们自由地、直接地和平等地管理自己的劳动和整个社会劳动，但是这种管理是在客观上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民主地负责和声援、自治地作出决定和各族人民平等的关系中进行的。这就是说，工人之间的联系是自治的和民主的，而不是从外

---

<sup>①</sup> 爱德华·卡德尔：《社会主义自治政治制度的发展方向》，第二版增订本，共产主义者出版中心贝尔格莱德1978年版，第10—11页、12—13—14页。

部强加的。工人不是‘孤立的人’，这就是说，他不是由于从事劳动，由于支配资金和劳动成果而与其他人隔绝，而是处在相互依赖和对其他工人的同等权利互相负责的关系之中。这正是形成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即自由的生产者共同体的条件。

.....

工人和劳动者民主地和自治地对收入和整个社会再生产作出决定，是社会主义自治联合劳动的重要特点，是每个工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工人在与其他工人相互依赖和相互负责的关系中平等地实现的.....

同时，联合劳动中的自治，也是在社会中、即在从区到联邦行使国家权力的社会政治共同体中实行自治的基础，也是劳动者和公民实现管理社会和管理国家的民主权利的基础.....

.....

现在，联合劳动中的自治与代表制一起，正在成为自治和自治利益对国家权力制度施加决定性影响、即在从区到联邦行使国家权力的社会政治共同体中施加决定性影响的真正的物质基础。同样，自治也正在成为使工人发展为既为其个人劳动和切身利益、又为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而使用整个社会资料的创造性人物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sup>①</sup>

<sup>①</sup> 爱德华·卡德尔：《自由的联合劳动——在布里俄尼的讨论》，工人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78年版，第12—13页、17页、18页、314—315页。

## 爱德华·卡德尔1949年在第四届 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

(第155页的附件)

关于1949年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和卡德尔在这次会议上阐述的南斯拉夫对外政策概念，卡德尔曾提醒说：“请详细地引用或摘录我在1949年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除了详细地摘引这个讲话以外，编辑部还指出了在形成和确定南斯拉夫独立的对外政策概念以前发生的某些事实和事件。譬如：南人解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决议，包括起草这些决议和向世界宣传这些决议的方式，以及在战后最初几年捍卫这些决议所确定的原则的情况；1944年9月12日铁托在维斯岛向达尔马提亚第一旅发表的讲话（“别人的，我们不要——自己的，我们不给”）；1945年5月27日铁托在卢布尔雅那发表的讲话（“我们不是任何人结账时的零钱——休想拿这个南斯拉夫来做交易”）；卡德尔在巴黎和会上的讲话；1948年12月29日，卡德尔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

民议会上的讲话（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关系）。

“……

—

我认为应该首先强调指出，言行不一<sup>①</sup>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这种情况在这个大厦中也有所反映。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大部分有争议的国际问题，在提到这里时，提到我们的面前时，已经面目全非了。

一方面，最近数十年来，特别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沉痛教训以后，人类的民主意识有了很大的进步，譬如，今天已很难公开地维护各国人民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殖民主义制度、帝国主义的扩张主义、列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弱小国家的权利等等，情况确实是这样。普通劳动者的舆论已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因素，而不管他们属于哪个阵营。

另一方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并不意味着那些遭到民主舆论谴责的行为已在实践中消失了。不，遭到谴责的行为仍在继续，但是，已用各种宣传的花招伪装了

---

① 这个讲话后来正是以《言行不一》为题，刊登在卡德尔的著名文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中，文化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54年版，第3卷，第23—30页。

起来。譬如，形式上已把对别国人民的奴役斥为犯罪行为，但是，今天仍在用各种政治手段和经济手段广泛地进行这种奴役。形式上承认主权国家是平等的，但是，某些口头上捍卫‘平等和主权’的人在涉及他们同其他国家关系时，却很少考虑这种平等。譬如，所谓为了维护和平应该用战争进行威胁，这种非常危险的策略仍在十分广泛地运用。最后，正当大谈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时候，这种干涉却在实践中成为了当前列强的国际政策的主要武器和新的战争危险的主要根源。但是，在舆论面前，所有这些事实都被千方百计地掩盖了起来，而在宣传中把它们说成完全另一个样子。

某些人显然有这样一种倾向，即尽可能把联合国变成进行这类宣传的讲坛。现在的问题在于：或者是我们在这里为谋求宣传效果而进行空谈和平的竞赛，或者是我们确实为争取和平做点事。这就是说，如果我们真正认为联合国是和平与国际合作的重要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我们首先就必须在这个大厦中为反对那种通过谋求宣传效果或进行民主空谈竞赛来‘解决’现实问题的倾向而斗争，换句话说，为反对言行不一的倾向和争取在这个大厦中讨论国际问题的实质而斗争。

## 二

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能否共处、能否和平合作而又

在各国人民之间保证稳固的和平？这是常常向我们提出的一个问题。

无疑，这种合作是可能和必要的，因为如果我们希望和平，那么我们就必须在当今世界的具体条件下，即在存在着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条件下确保和平。如果我们遵循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那么，社会制度的不同本身当然不是战争危险的根源。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从实质上可以归结为：如果我们从各国人民享有自决权和在本国自己确定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力的观点出发，那么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合作显然是完全可能的。相反，如果放弃这个原则，那么不仅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而且在同一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中，显然都存在着对和平的威胁。

这就是说，战争危险不是产生于社会制度的不同，而是产生于国际关系中的帝国主义的和反民主的倾向，产生于对各国和各国人民一律平等的原则的践踏，产生于对别国人民的经济剥削，产生于对别国内政的干涉等等。

正因为如此，在我们这个时代，为巩固和平而作出的努力必须与争取如下目标的顽强而经常的斗争联系起来：争取各国人民和各国之间的平等关系，加强小国的独立，为它们的独立创造经济条件和其他条件，在国际关系中消除各种形式的歧视、经济压力和政治压力。只有通过这条途径，才能为真正平等的国际合作创造真正

的条件。实际上， these 问题是检验爱好和平的言论和声明是否真诚的试金石。不能在谈论和平的同时，去威胁弱小国家，去践踏他们自主地安排自己生活的权利，或者在经济上剥削和奴役他们。不能说平等和主权的原则已经过时，需要建立使这个或那个大国在经济上或政治上的世界霸权合法化的世界政府或世界国家，而同时却断言这一切都是在保卫和平。不能在谈论不干涉别国内政和反对把战争威胁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的同时，对某个仅仅要求在国际关系中更多地实行民主与平等的政府进行种种威胁。

### 三

不言而喻，小国的平等和独立问题是与它们的经济进步、首先是与它们的发展方向密切相联的。在当代世界上，发达国家、首先是几个发达大国的技术财富和经济发展水平同不发达国家的落后状况之间的矛盾，本身就包含着对正常的国际关系的威胁。谁都不能否认联合国所代表的国际共同体的如下责任和义务：通过援助不发达国家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为了尽量多地尽量快地发展不发达国家自己的力量和加强他们的民族独立的目的，来援助不发达国家。

不言而喻，如果从小国和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必须成

为大国和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及其超额利润的源泉的观点出发，而不是从增强每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财富、最大限度地发展它们的生产力和加强它们的独立和平等的观点出发，来谈论平等的经济合作和政治合作，那是荒谬的。

正因为如此，把提供经济援助作为发展和加强不发达国家独立的手段，在今天的世界上完全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无疑，这是联合国工作中最薄弱的环节，尽管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是联合国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

然而，我们认为，当代世界存在着使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的现实的物质条件。以不发达国家依靠联合国经济援助的方式来正确地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将意味着在保证许多国家的真正独立方面，从而也在巩固和平方面，向前迈出一大步。

#### 四

.....

当我谈到言行不一问题时，不能不提到苏联政府对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反民主的做法。近来，世界舆论对此议论纷纷。

苏联政府对南斯拉夫的所作所为说明，苏联政府并不总是代表和平与民主的拥护者当前的愿望的。我们尊



重苏联政府有利于和平与各国人民和平合作的积极的和进步的立场，我们曾经支持并将继续支持这种立场。但是，我们不能不同时指出，苏联政府在一系列问题上言行不一，尤其表现在苏联对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上。不能在谈论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同时却采取象苏联政府今天对南斯拉夫这样的独立国家所采取的立场。不能在谈论爱好和平的同时，却进行象苏联政府对南斯拉夫所进行的这种威胁。

如果考虑到苏联政府是在对下面这样的一个国家采取这样的立场，这一切就具有特殊意义了：无论是苏联政府或者是全世界都知道，这个国家得不到任何一个集团的支持，没有参加任何秘密条约，也没有和反对苏联的任何人一起承担任何军事义务。显然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苏联政府认为可以对它采取这种不寻常的外交手段。这种手段是史无前例的，而这种手段的发明肯定不会给苏联政治增添光彩。

但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依靠自己的力量，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终于为自己赢得了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他们希望在本国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安排社会主义生活，因为他们相信，这不仅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且也符合各国人民平等合作的利益，符合和平与人类进步的利益。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希望这样，是因为珍视其他各国人民，珍视他们的文化、历史、他们作为平等的民族生活和发展的权利、他们为

人类普遍进步事业作出自己贡献的权利。

象在历史上发生的类似事件一样，这里也把争端的思想上和物质上的真正实质掩盖了起来，同时，用前所未闻的诽谤和谎言的围攻来进行威胁，这种围攻是很难在历史上找到先例的。为了想使我国屈服于别人的霸权主义倾向，千方百计地对我国施加压力。所施加的经济压力已发展到东欧国家对南斯拉夫几乎完全实行经济封锁的程度。其次，还企图通过连篇累牍的不寻常的照会和公开的威胁来影响我国神经脆弱的人。此外，还示威性地调动军队和制造许多边界事件。只要指出下列事实就足够了：仅在1948年7月1日至今年9月1日这一时期内就发生了由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方面挑起的219起武装冲突事件，还侵犯了我国领空69次……

除了这一切以外，还组织了挑衅性的诉讼，譬如匈牙利的拉伊克(拉伊克·拉斯洛)案件。这个案件在为了谴责南斯拉夫而不择手段地进行捏造方面，在国际挑衅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为了诬蔑南斯拉夫，竟然恬不知耻地向全世界散布这种肮脏的谎言，甚至不想花力气给谎言披上比较可信的外衣或者协调一下显然是自相矛盾的说法，因此，人们不禁要对这场卑鄙而肮脏的丑剧的组织者的道德面貌感到惊讶，然而，这一案件的组织者需要这一切，因为他们要想“证明”南斯拉夫是个侵略成性的国家，正是它在准备武装入侵所有的人民民主国

家。他们想以此证明今天对南斯拉夫施加侵略性压力是有理由的。

.....

南斯拉夫人民维护自己的独立并为争取各国人民之间的平等关系而斗争，实际上就是在为争取人类进步的条件、为争取各国人民不受妨碍地发展自己创造力的权利而斗争。在这方面，他们不是从某种利己主义的狭隘民族主义出发的，他们并不缺乏同别国人民进行合作的愿望，他们也不荒谬地相信任何一个民族可以脱离其他民族而生活；他们这样做，是由于他们认识到，人类的进步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而只能通过越来越广泛地解放人民的创造力的途径来实现，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使人民从别人的各种霸权下解放出来。同时，这也是通向真正平等的国际合作和牢固的和平的唯一途径。

.....

我们远远不是不考虑各个大国今天在人类生活中，尤其是在保障和平的问题上所起的实际作用。但是，我们认为，小国在为巩固和平而做出的一切努力中进行平等的合作，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个条件将使和平不仅成为各大强国的和平，而且成为平等的各国人民的和平，大家的和平，而不仅仅是那些掌握着强大武力的人的和平。”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正文